

# 斯特朗文集

*One Fifth of Mankind  
— China Fights for Freedom  
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

3

DE28/31

DE31/10

# 斯特朗文集

## 人类的五分之一

傅丰豪译

## 中国人征服中国

王厚康 吴韵纯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5967

3

新华出版社

1155967

DE 38/10

## 出版前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〇)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朋友。她一生追求进步,坚持真理,以犀利的笔为武器,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尤其热情讴歌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

斯特朗一八八五年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她自幼刻苦学习,年仅二十二岁,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为了追求公正和自由,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进步事业。斯特朗积极参加过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运动,参加过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参加过工人总罢工运动,创办过美国西部第一份支持十月革命的报纸。

年轻的斯特朗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二十多岁就出版了三部诗集和一部诗剧。为了鼓动劳苦大众参加社会变革,在她编《西雅图工会记实报》时,就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叫《安妮丝》的打油诗专栏,每天发表一首她写的诗。以诗论政,以诗讽刺社会,激励青

年，一直持续了两年，共写了六百首诗。这些诗被传抄到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斯特朗因为鼓动工人罢工而被捕了。她的一个同事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责备她说：“你的所有的老朋友都抛弃了你。有什么人站在你一边吗？”她回答说：“有！有拥有七千会员的锅炉制造工人工会，有锻工，码头工人，机械师，电机工人，和许多别的人。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赢得胜利。”从此以后，对她来说：不是自由主义的良心，而是群众的行动才是有希望的改变世界的动力。

斯特朗出狱后，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劳工工作。她在二十年代发表的一首诗《辞旧迎新》，就宣告了她对人类新时代的春天必将到来的信念：

旧时代行将过去，  
新时代定要来临。  
枯萎腐烂的落叶，  
终将埋入孕育新生命的沃土中。

……

现在是奔向春天的时候了！  
虽然还要经受无数严冬的风暴。  
人民的力量象熊熊的火焰，  
在每个民族的上空闪耀。  
笼罩人间的乌云在渐渐消逝，  
灿烂的光辉将慢慢把大地普照。

一九二一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斯特朗来到了列宁的俄国。她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她长期与苏联人民同过艰苦生活。在那里安家落户，结婚。她不仅写了大量作品赞美“人的新世界与新世界的人”，而且亲自组织美国专家去苏联工作，亲自募捐和运



送物品给伏尔加河灾区儿童。特别是为数万名在苏联帮助建设的美国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创办和主编了《莫斯科新闻》英文报。工作很出色。据说，她受到过列宁、斯大林的称赞。斯大林曾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请斯特朗列席，讨论她改进报纸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后来，她被错误地诬为“间谍”，被驱逐出苏联，蒙受不白之冤达六年之久，但她始终冷静思考，坚信真理，顾全大局，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向人类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

斯特朗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她曾六次来中国访问。一九二五年她首次来华，大部分时间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广州。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见到宋庆龄和其他许多进步人士、群众领袖。一九二七年，她访问了墨西哥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和其他一些地方，她不仅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的国内战争，也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背叛而导致的多少人流血牺牲的革命失败。她写道：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之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斯特朗第三次来华。她专程到晋西北访问了朱德将军的司令部，继而访问了华北各战场。她英姿焕发，穿梭于斗争激烈的敌后各条战线之间。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波兰女作家伊罗娜·拉尔夫·苏埃斯对斯特朗作过这样的描述：

“她既有当年乘“五月花号”船去美洲的先驱者的坚定性，又具有一位革命历史学家的清晰头脑。在她严峻、坚毅的脸上一双冷酷的淡蓝色眼睛，使我感到敬畏。……当她谈论她感兴趣的问题——苏维埃俄国、中国、工人运动时，我们为她的激情所吸引，倾听着她如何以严密的逻辑、惊人的清晰和非凡的远见一下子就深入到一

些最复杂的问题的实质。她讲话象机关枪开火一样：客观、不动感情，而且深刻。事实和数字都说明问题。”

一九四〇年底，斯特朗第四次访华。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僵持不下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已占领大部分大城市，并诱使蒋介石投降。在国民党内部再次掀起反共、投降的声浪，反动派则加紧策划消灭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罪恶活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向斯特朗介绍了这一形势，说明日益增长着的再一次分裂的危险，远比一九二七年那次还糟，因为民族生存受到了威胁。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即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及时准确地揭露了国民党这一阴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国际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政府对蒋施加压力，才使这次危机没有进一步扩大。

一九四六年六月，斯特朗对中国进行了第五次访问。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她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当时蒋介石不顾战后签订的协议，正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打全面内战。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她，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斯特朗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她的报道，“纸老虎”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后来，她在回忆延安的文章中写道：那儿“没有奢侈豪华的东西，也很少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有的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思想敏锐，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放眼世界。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胸襟在不断开阔……在这儿，我仿佛终于认识到人类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历史是可信的。”

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当她七十二岁的时候，决定晚年定居中国，直至一九七〇年她安然长眠。她和翻身后的

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十二个春秋。

斯特朗热爱中国，写中国，无限信赖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斯特朗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密切相联。她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友谊，为我国广大群众所熟悉与铭感。她同我国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邓颖超说：“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斯特朗八十五岁逝世。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她曾走遍世界许多地方，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经历了个人的严峻考验。但她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从不向命运低头，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她放弃舒适生活，不顾个人安危，哪里燃起斗争火焰，她就奔向那里，就在那里战斗。她总是站在时代的前线、险峰。她的一生，几乎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的故乡美国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称之为“理想的归宿地”中国度过的。她还到过西班牙、越南、朝鲜、柬埔寨、墨西哥、波兰等许多国家，在那里，留下了她的战士的足迹。

斯特朗终生以笔为武器，用她那敏锐的洞察力，引人入胜的笔调，反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传播各国人民的友谊。她一生孜孜不倦，直到晚年走路持杖的情况下，仍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活力。当她七十四岁高龄的时候，为了了解西藏人民推翻农奴制后的新生活，她还坚持要求去海拔三千六百公尺的拉萨采访。由于她惊人的勤奋和智慧，一生中写了上千篇作品，出版了四十多部著作。她的作品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影响着千百万读者。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

新闻记者,为了学习斯特朗一生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和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斯特朗文集》。这套文集合三卷,主要搜集了斯特朗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换了人间》(I Change worlds,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一九三七年首由纽约加登城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斯特朗于一九三五年写的一部自传体著作。本书详细描述了她前半生(一八八五——一九三五)的生活、成长过程和在美国、中国的经历等。从中可以了解她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的美国来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如何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姑娘成长为一名支持革命的进步记者,如何从信仰宗教转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这对研究斯特朗世界观的形成甚有帮助。

第二卷收有《千千万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和《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why I came to china at the Age of 72)两部著作。

《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详细介绍了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的中国革命斗争。其中主要记述了武汉革命政府蜕变成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记述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白色恐怖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记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崛起。书中还讲述了斯特朗与引退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乘车横跨中国大西北和蒙古沙漠,最后回到莫斯科的情景。作者以纪实的方法,通过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介绍了在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

《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是斯特朗于一九四七年离开延安到一九五八年重返中国的经历。主要介绍了她是如何于一九四九年在苏联被捕的,又如何以“间谍”罪名被驱逐出境的。她回

到故乡后打算与美共取得联系，但徒劳未成。后来又迁往洛杉矶，她一方面为她无故被驱逐出境进行申辩，另一方面也一天不忘对新中国进行宣传。一九五五年苏联政府为她进行平反。此时美国政府又百般阻挠斯特朗访华，她又为此与美国当局进行斗争，直至她的夙愿实现。

第三卷收有《人类的五分之一》(One Fifth of Mankind---China Fight to Freedom)和《中国人征服中国》(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两部著作。

《人类的五分之一》是一九三七年斯特朗来华进行了大量采访活动后撰写的。作者讴歌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并坚信中国抗战必胜。

《中国人征服中国》是斯特朗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利用“军调部的方便”，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东北解放区进行采访的纪实。在延安，她访问中共总部，毛泽东主席向她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她根据所见所闻生动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展望未来，她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两种命运的决战充满无限的信心。她看到了革命力量正在发展，她预祝一个延安式的新中国即将在烈火中诞生。作者文笔锋利，这是一本既有重要历史价值而又饶有兴趣的书。

斯特朗和斯诺、史沫特莱一样，都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记者。她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透彻，清新感人，堪称世界报告文学的巨著。作为记者，她采访深入，高瞻远瞩，具有锐敏的洞察力。她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描绘出一幅幅时代的巨大画面，闪烁动人的异彩。她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丰富，是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的文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版



这套文集,不仅对新闻文化界是需要的,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愿斯特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

# 目 录

## 人类的五分之一

- 一、中国为何抗战
  - 一场美国式的战争 .....( 3 )
- 二、通往东方之路 .....( 10 )
- 三、俯瞰中国 .....( 22 )
- 四、四千年遗产 .....( 31 )
- 五、西方闯入中国 .....( 44 )
- 六、革命高潮 .....( 52 )
- 七、日本以华制华 .....( 63 )
- 八、中国走向团结 .....( 76 )
- 九、日本大举进攻 .....( 89 )
- 十、中国转入内地 .....(101)
- 十一、西北的战士 .....(111)
- 十二、同八路军在一起 .....(121)
- 十三、军队和人民 .....(132)
- 十四、中国的戏剧投入战争 .....(144)

- 十五、中国的新女性.....(153)
- 十六、中国人斗志昂扬.....(167)
- 十七、中国共产主义化的程度.....(180)
- 十八、中国往何处去?世界往何  
处去?.....(193)

## 中国人征服中国

- 前言——关于白皮书.....(209)
- 一、回忆涌上心头.....(212)
- 二、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
  - 窑洞之城.....(226)
  - 历史的回顾.....(238)
  - 毛泽东.....(248)
  - 他指引航向.....(261)
  - 他们如何打到沿海地区?.....(272)
- 三、政治战略
  - “你们会长虱子的”.....(287)
  - 碗中豆.....(299)
  - 赋税——“人民的负担”.....(309)
- 四、经济政策
  - “耕者有其田”.....(321)
  - 新农民.....(333)
  - 自由企业.....(347)
- 五、建设新社会
  - 学校归人民.....(362)
  - 妇女的参与.....(374)
  - 新司法.....(385)

## 六、军事战略

从农民中诞生的军队 .....(396)

对付优势兵力 .....(408)

政府如何转入地下 .....(420)

## 七、中国人征服中国

满洲根据地 .....(437)

农民占领大城市 .....(450)

美国在中国的机会 .....(462)

# 人类的五分之一





# 一、中国为何抗战

## ——一场美国式的战争

“美利坚合众国为争取独立战斗了九年。如果中国要抗战九年才能取得独立，我们必能进行抗战九年。”<sup>①</sup>

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当战争进入第一个冬天、中国正处于最黑暗的时刻，蒋介石委员长在第二战区一次将军们的会议上说的一番话。<sup>②</sup> 六个月来，日本强大的“军事机器”闯进了中国内地的城市和农村。侵略者攫取了  
中国北方四省。他们占领了古都北平。他们袭取并洗劫了当今政府所在地南京。他们轰炸了华中大港上海，把这个东方的王后炸成一片焦土。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正从漫长的战线上溃逃，其规模之大，似乎纽约、大西洋南海岸和俄亥俄河谷在入侵者面前一下子都崩溃了。日本飞机甚至进入遥远的内地城市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母亲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炸得血肉横飞，正在车床

---

①（蒋介石的原话为：“中国必能抗战十年。”——译者注

② 是彭德怀将军向作者转达的。——作者注

旁劳动的工人连同厂房一起被炸得粉身碎骨。

委员长竟然把这个支离破碎的民族同大洋彼岸的和平和强大的美国相比较。他告诉那些打了败仗的将军们、在轰炸中得以幸存的工人们以及失去儿女的母亲们，这场强加在四亿五千万人民头上的战争可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可能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美利坚合众国为争取独立战斗了九年。……我们的资源比他们刚开始时多。”他就是这样激励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增强他们的信心。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是人类的五分之一人口为争取我们美国人的祖先所说的“生存、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尽管这两个冲突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中国的抗战和我们那时的斗争仍然有着许多十分相似的地方。这两个事件都是一个经济落后、人心涣散的国家遭到装备优良、工业发达的侵略者的入侵，都是在战争的分娩阵痛中，一个崭新的、统一的、要求新的民主的民族在被入侵的国土上降生。两次冲突的因果都属世界性的，只是中国的冲突的世界性范围更广，对世界前途更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比当初美国人有着更充足的理由进行抗战。我们这些殖民地是造一个曾经是合法的国王的反，而且，这些殖民地在任何意义上说从来都不曾是一个国家。可是，众所周知，中国四千年来一直是一个稳定的文化统一体，日本从未享有向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的丝毫权利。中国人民比我们殖民地移民更为耐心，他们遭到的侵略比我们严重得多，只是在最后忍无可忍才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殖民地移民是在英国干涉他们的贸易和关税，特别是她企图禁止他们同除母国以外的国家做生意时才起来造反的。日本同样要求在中国享有独有的权利，它甚至在冀东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这个傀儡政府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通过走私大量的船

来品打破中国对本国海关的控制。中国人对此采取了忍耐的态度，他们甚至容忍了对他们数省的入侵和占领。只是在他们国家的生存和四千年的文化统一面临威胁时，他们才起来抗战。

尽管中国人在法律上有着比我们当时更充足的理由，而又不轻易动武，但实际情况却和我们十分相似。中国的二十八个省<sup>①</sup>——美国是十三个殖民地——因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在努力走向更紧密的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趋势却受到外来势力的阻挠。北美殖民地领导人花了十五年时间试图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体；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于召开殖民地之间的会议尤为积极。而英国则在各州成立形式不同的政府，禁止他们互相联系，以阻止他们采取联合行动。一七六八年——革命爆发前七年，麻萨诸塞众议院向各殖民地立法机关发出巡回信件，极力主张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英国则下令各殖民地总督禁止一切“不正当的联合”。日本也施展了类似的阴谋诡计，对各省都督软硬兼施，阻挠联合，企图在中国开历史倒车。在这两个事件中，正是侵略者为摧毁一个发展中国家而采取的这些倒行逆施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战争却加速了它内部的联合。

并非所有的美国人——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接受战争的考验。如果独立和团结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那谁都希望得到，并且多多益善。但是，当真要发生冲突时，那些同英国经商并以此为生的美国大商人，大西洋北海岸地区的大地主以及那些富裕的特权阶层，因为害怕独立战争将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增强老百姓的力量，普遍都保持中立，甚至成了亲英分子。

---

<sup>①</sup> 中国本土原来划分为十八省，最近划分为十九省，加上边远地区，一共是二十七省，现在是二十八省。——作者注

上海的银行家和中国政府中的要员们由于同样的原因长期对日本采取了容忍态度。老百姓以及那些同英国——或日本——没有贸易往来,而其利益又受到它们威胁的资本家,才是这两场革命的动力。他们知道,只有取得独立,美国——中国——才会有远大的前途。

在这两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开始都是侵略者打胜仗。在美国,英国侵略者连续多年取得胜利,这是因为他们武器装备优良、军事知识丰富、工业先进,而被侵略的人民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被侵略人民的军队才建立不久,因此战斗力低、纪律松懈、贪污成风、开小差严重。政治腐败、军队组织涣散使中国受害非浅,但中国可能还没有美国当时的情况严重。美国的一些奸商利用国家的灾难肆无忌惮地赚钱,曾引起华盛顿不满,他称这些奸商是“扼杀我们事业的刽子手,应该处以绞刑”。

两个被侵略的人民有着类似的力量源泉:他们的国家疆域辽阔、远离侵略国、普通农民和手工业者具有为保卫自己家园而战斗的英雄主义气概。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农民在接到保罗·瑞韦尔连夜送来的信号后立即行动起来,拿起武器把英国军队从他们的城镇中赶了出去。现在,当日本人来袭击中国村庄的时候,类似的信号唤起了陕北和河北的农民。在美国,大西洋南海岸地区著名的“马里恩人”组织了游击战,今天,朱德在华北地区也组织了游击战。当乔治·华盛顿和蒋介石学会如何通过游击队的作战及正规军的支持来发动全国老百姓参加战斗时,他们就开始打胜仗了。

一批农民连夜行军,御侵略军于家门外;这件事不是发生在美国的历史中,而是去年冬天发生在陕北的山谷里。日本人沿着铁路和主要公路分两路而来,人们站在山上,从陷于一片火海的村庄



可以判断出敌人进攻的路线。来自山谷的农民，拿起手榴弹、猎枪和用他们的铁锅敲打出来的大刀、长矛，同敌人战斗了整整一夜，天亮时，他们胜利了。侵略者顺着铁路线撤走，从此再也不敢冒然侵犯他们的山谷。可是，三十名农民在寒夜战斗时，冻坏了脚，成了终身跛子。这件事发生在华北，但也可能发生在福吉谷地。

最近，近卫首相发表讲话，其措词同乔治三世在美国革命初期的讲话几乎完全相同。那时，乔治三世威胁说“要把殖民地移民打得跪下来求饶”，“使北美倒在血泊中，把北美城市夷为平地”。后来，他看到这项任务如此艰巨，因而感到恐慌，就主动提出较优惠的条件。最后，他甚至准备接受殖民地移民提出的、除了民族独立以外的一切条件，但是已经为时犹晚。这种情况目前在中国尚未发生，但迟早是会发生的。日本最终将不得不放弃也许除了满洲以外的一切要求。到那时，中国——象美国那样——会要求取得比开始时尚能使她满足的更多的自由。当然，会有些中国人试图接受妥协，当初在美国也有这样一些人。

这两场革命战争，都因为革命中孕育着另一场革命而变得复杂化。备受凌辱的老百姓，一旦在战争中拿起武器，他们的势力就增强了。随着美国革命的发展，许多曾经帮助发动革命的特权阶级，以及那些一贯反对革命的人，对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愈来愈感到恐慌，他们急于要同英国妥协，以扼杀这种独立性。但是，当战争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即大批爱国者正在为国家的自由和人民未来的美好生活而挨饿、受冻、死亡的时候，“企图破坏革命的美国的意志是一桩很危险的勾当”。<sup>①</sup>谁坚持这样做，谁就会以卖国贼论处，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被分掉。中国——

---

① 杰克·哈迪《美国的革命》。——作者注

些地区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做。用其财产帮助过国家的富人受到尊敬。乔治·华盛顿就是其中的一个。老百姓有权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斗争，成了美国民主的保证，并已写入权利法。中国同样也在采取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动员他们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斗争的方法走向民主。

当初，北美移民取得最后胜利并不是单靠他们手中武器的威力。他们同法国秘密进行武器交易。那时，法国同当今的苏联一样，被欧洲诸国排斥在外。法国、荷兰和西班牙都曾在早期援助过北美。法国后来还派遣军队和兵舰予以支援。英国对那些支援过殖民地的国家发起进攻。这样，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就同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交融在一起。英国的力量受到了牵制，这就为美军最后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独立战争的进程是否会和美国一样，最终也在一场世界大战中结束？蒋介石在号召进行九年抗战时最后说了这样一段含义深刻的话。他说：“我们不单是为保卫我们的独立而抗战，也是为维护国际条约的尊严即世界和平而抗战。”中国要求国际援助的理由远比美国正当。英国派遣军队到其统治的殖民地时，并没有破坏任何国际协议，可是欧洲诸国出于他们自己贸易利益的考虑，敢于对抗当时最强盛的世界大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破坏了它同世界大多数人民签订的协议——表现在国联宪章中，尤其破坏了它同九国公约缔约国之间达成的协议。这个公约是美国发起签订的，旨在维护其“门户开放”的政策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杭州对我说：“这场战争不单是针对中国的，它是日本向世界宣战的第一步。”但是，这场战争跟本世纪初那场战争不同，世界强国可以不采用战争手段就能予以制止。也许

美国独自就能予以制止,或者减缓它的进程,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够轻而易举地结束这场战争。英国当时是地球上第一个工业大国,日本同英国相比,力量弱小得多,它在物资供应方面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更大。今天,和平民主的力量在世界各地都很强大,而当时并非如此。但这些力量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因为当今世界也在迅速发展。除非在中国就把日本制止,否则它就会南下,跨越亚洲和太平洋,这样世界就要陷入一场烟雾弥漫的战火之中。在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世界人民及其改善生活和争取更加广泛自由的一切希望就会再次受到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的威胁,并且这一次将是世界性的。

但是,前景将更光明,全世界的前途是美好的。美国人民取得独立以后,他们斗争的成果在整个欧洲回响了几十年,民主运动得到加强,国王纷纷被推翻。中国胜利的成果将更广泛。这是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旦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组织起来,赶走侵略者,赢得国家独立和解放,他们的胜利所产生的回响将在亚洲砸碎更多的锁链。世界上的民主将得到稳定的发展。

## 二、通往东方之路

中国争取独立的战争，和我们美国革命虽有许多相似之处，然后，它毕竟发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轮船、铁路、电报、无线电、飞机，把世界各地都连接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的斗争都不是孤立的。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而现在，她却成了列强互相争夺的对象。

一八五二年，阿拉斯加著名人士威廉·西沃德预言：“在未来的伟大世界中，太平洋及其它的海岸和岛屿以及太平洋彼岸的广阔地区将是人类主要的活动舞台。”在那些东临太平洋、南连印度洋、工业落后、拥挤不堪的国家里生活着地球上一半的人口。一个多世纪以来，通往东方之路成了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路线，而整个世界也因现代贸易的发展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可是从美国到中国却没有一条直接的航线。班船都要先停靠日本。对旅游者来说，这仅是一次愉快的停留，但对中国名流来说，却面临着危险。远在战争爆发以前，

日本就有权盘查过境旅客，并寻找各种借口把旅客带下船去。任何秉性耿直的船长，只要得到本国驻日本领事的支持，都会严厉痛斥这种虚声恫吓。然后，当代的民主国家却是以屈服于讹诈而闻名的。为了避免卷入这场战争，美国班船拒绝载运任何会引起日本反对的货物。我搭乘的加拿大船就要求乘客清查销毁客舱内所有的反日书籍，乃至英属香港发行的报纸，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为了避免麻烦，有钱的中国旅客就搭乘直飞美国岛屿的中国远程民航班机，其他人则经常绕地球一圈，取道欧洲去美国。可以说，日本在正常的海洋航线上，封锁了美国至中国、乃至菲律宾诸岛的所有通道，这是前往东方之路上的首要事实。

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是欧洲去中国的一条捷径。可是，日本也是这条道上的拦路虎。一九三七年秋，中国人从欧洲回国，坐了一星期的火车，来到满洲边界，最后还是不得不按原路返回。如果你跟日本人关系好，这条路一般还是敞开的。可是，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当我打算从欧洲去中国时，美国驻神户领事，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把搭乘法国客轮回上海的二十名美国妇女从船上赶了下来。这件事差一点破坏了我那次旅行。

还有其他陆路可行。那是一些令人好奇的、神秘的路线：骑着骆驼或者冒险乘卡车穿越亚洲的沙漠地区和高山。两千年前，大汉王朝的征服者走的正是这条路线，后来马可·波罗也是沿着这条路线穿过土耳其斯坦的绿洲。一九二七年秋天，我从中国的中原出发，经过其中一条艰难的陆路，到达西伯利亚大铁路。我们在破旧的卡车上整整走了两个月。自那以后，道路情况有所改善。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国人吹嘘在土耳其斯坦修建了一条新的公路。这条路的详细情况属中苏之间的军事秘密，外国旅客被禁止通行。



旅客从欧洲去东方——一般是沿着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亚洲的南部海岸——一路上，行走缓慢，天气酷热。周游世界的广告牌上用图片展现了这条路线：热带、丛林、奇异的、传说中的东方——塞得港、亚丁、孟买、科伦坡、新加坡、香港。这些地名都带有传奇的色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是他们都是西方化的英属港口。英国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建立起大英帝国的。只有当你在旅行中办理护照时，你才会意识到，不知有多少人口众多、文化悠久的东方大国——埃及、印度、阿拉伯、马来亚——的丰富资源正在源源不断地从悬挂着英国国旗的港口中流走。你去东方，如果不绕道荷属东印度群岛或不在中国南面的法属印度支那停留——大多数客轮不停靠这些地区——的路上，办理一次英帝国的签证就足够了。

这样，中国基本上处于日本、苏联和英帝国包围之中。这些国家控制了通往东方的一切通道，不过，苏联通往东方的道路尚未开发。令人惊讶的是，从欧洲去中国，速度最快的客轮不是英国或法国的，却是意大利和德国的轮船。这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展高速客轮予以资助。这些客轮从地中海驶抵香港只需三个星期，而不是通常的四个星期，因而赢得了乘客的喜欢，甚至连英国商人的太太们去印度时也愿“搭乘意大利客轮”。我乘坐的船上就有数名英国商人的太太。船上还有一名回汉口的中国编辑和六名奥地利医生。这些医生因害怕希特勒侵略奥地利而离家出走，来中国寻找红十字会。一名美国企业家急于赶回上海处理被日本人搞得破了产的企业的善后事宜。他极力想说服一位认为日本人“正在中国帮助恢复秩序”的美国女旅客。他说，事实恰恰相反，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掠夺者。中国的土匪谁都不曾梦想象日本强盗那样如此野蛮地把长江三角洲洗劫一空。客轮上的官员和乘

务人员谁都不炫耀意大利的政治。可是，当我们悄悄地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沿海水域，顶着十二月份热带的烈日在甲板上的游泳池里游泳时，电台里向我们播送了歪曲事实的亲日的新闻报道。在我们遥远的北方，在陕西和河北的山上，中国农民正冒着严寒在为保卫他们的家园而战斗，他们的双脚在雪地里被冻僵了。

新加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门户。人们一到新加坡，就会突然感到中国对这些南洋地区的影响。它归属于英国，四周住着马来人，但它的文明却是中国式的。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商人和移民大批下南洋，给这些地区带来了高度的文明。现在，英国在新加坡建立了海军基地，以对付日本的南进政策，保护澳大利亚和印度。日本在新加坡周围占有许多属地，对这个港口构成了威胁：它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享有开采石油和种植橡胶的特权，据说在这些橡胶园里秘密修建了机场；它在新加坡群岛拥有各种金属矿井；它在丁加奴附近有一些富铁矿，据说在那里有一些秘密军火库。日本的势力在向欧洲扩张的长途中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新加坡。日本已经向阿富汗派遣了一个代表团，日本教官正在靠近印度北部的阿富汗军事学校内执教。日本人曾帮助伊拉克起草一份工业化计划。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青年应邀去日本留学，其一切费用都由日本政府负担。

日本对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渗透仅刚开始，但它对南洋地区已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去爪哇的乘客把荷属东印度的忧虑告诉我们。他们断言，如果美、英等强国同意，荷兰将十分乐意停止向日本运送石油。“我们是在向将来奴役我们的人提供燃料，”他们说，“如果中国被征服，下一个就是我们。你们美国人也在逐步树立将来进攻你们的敌手，继我们之后，就要轮到你们了。”话是这样说，可是南洋地区发生的唯一明显的反日行动是在日本矿井干活的矿

工举行的反日罢工。战争爆发后不久，丁加奴的四千名中国矿工离开了矿井。日本人从印度南部招募了一批泰米尔人，不久，他们也举行了罢工。于是，把马来亚人招进来代替泰米尔人，后来马来亚人也不干了，并向新加坡华人请求资助。这些民族以前从未进行过合作，也不可能有什么约在先，但他们的工人都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示抗议。

那些封锁中国北部和太平洋通道，并威胁其南部通道的日本群岛上的情形又怎样呢？那里，春天樱花簇簇，秋天菊花盛开。岛上的老百姓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到爱美、创造美、讲礼貌和助人为乐的教育。在日本，我每到一处，善良的人们，尽管与我萍水相逢，却都不厌其烦地为我指路。有一次，在东京一家旅馆的休息厅里，一位陌生人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向我弯腰鞠躬，并把他那只靠窗、能晒到太阳的座位让给我。看来，他在我意识到之前就料到，这样做可能会使我感到愉快。

日本一家主要报纸<sup>①</sup>登载的一则消息闯入了这幅善良、谦恭的人民的画面——津津有味地描写“杀千人比赛”！在华日军中的野田副官向酒井副官打赌说，他将第一个杀满一百名中国人。后来他发现杀人轻而易举，且又惬意，便把赌注加码到一千人。“在华北，”野田准尉兴奋地写道，“因追赶敌人而疲劳不堪，使这场比赛大煞风景。可是在华中，杀人不费吹灰之力。在进入南京城以前，我已经杀死一百零五个人……后来在围歼战时，我又杀了二百五十三人。杀人很容易，但只有当你尽情地屠杀时，你才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现在，我已经和酒井君达成杀一千人的协议。”凡了解当时攻打南京情况的人都知道，野田所说的围歼战，实际上是对

---

① 见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作者注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大屠杀。日本报刊上的这篇“杀人比赛”的报道得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的赞赏。

“要始终记住，有两个日本，”一位同我在东京共餐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对我这样说。

这种赤裸裸的野蛮的军国主义竟然也会在如此甜美和光明的岛国犹然存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以从日本的历史中找到答案。中国农村处于半自治的状态，中国农民只是通过贸易和纳贡形式松散地联结在一起。而日本却跟中国大相径庭，它是一个封建制度严密的国家，神圣的天皇主宰着一切。日本封建大地主是通过专职的武士阶级、而不是士大夫的官僚机构来对农奴实行统治的。世世代代以来武士都高人一等。而在中国，士兵被人侧目以待。日本军队是封建主义的直接产物，日本人民从未从传统的武士统治中解放出来。

当西方工业主义拥入日本时，日本上层阶层迅速抓住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具。封建大家族创办起资本主义大公司。他们利用手中的封建特权和资本主义财富继续进行统治。天皇的地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忠于他的人民心目中他是神的化身。同时，他又是最世界上最殷富、权利最亨通的地主兼资本家。<sup>①</sup>日本有六个大家族形成了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财阀。三井家族控制了二百二十四家公司，拥有六十亿日元资本；三菱家族控制了九十二家公司，拥有三十二亿五千万日元资本。在资本主义和它的同盟军——封

---

<sup>①</sup> 据比森在《日本在中国》书中说，天皇拥有三百八十万英亩地产，其中有森林、农场和市区房。共值日金六亿三千七百二十三万四千元。他在资本主义大公司中拥有三亿日元的股份。天皇的年俸为四百五十万日元。——作者注

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下，日本人民生活其他工业国家无法与之比拟的贫困线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是佃农或半佃农，他们收成的一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四分之一用来向化学托拉斯缴纳化肥款。每年有大批农民被迫卖女到工厂去做工。百分之八十的女工为偿还家里债务而做苦工，自己却分文不得；日本工厂里男工的工资只相当美国工人的八分之一。<sup>①</sup>在满洲、朝鲜和中国，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工人的工资水平更低。在亚洲大陆，日本人所到之处，都拼命压低工资，以榨取最大利润，支撑他们不稳固的社会结构。

由于封建主义和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这一社会结构已经腐朽没落。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拯救日本的老百姓。日本的统治者是竭力反对这种变革的。相反，他们试图通过加强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的控制使广大群众继续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贫穷的日本人民，按他们的财富比例来计算，为了维持日本的军队，作出的牺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大。政府机构是一个大杂烩，新兴的资本主义受到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主义的制约。除了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内阁——各个政党（主要地）为了维护自身的资产阶级集团利益而勾心斗角的场所，还有一名协助天皇挑选内阁首相的“元老”和利用控制接近天皇门径而左右国家大事的宫内府。

“双重政府”是日本政府最突出的特点。最高军事委员会和陆海军参谋本部直接向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或内阁负责。陆军参谋本部可以不同内阁商量而自行决定发动战争，也可以用拒绝批准陆军大臣人选的方法来阻挠组阁。最近几年，当比较明智的资

---

<sup>①</sup> 见安特烈的《日本泥足》。——作者注

产阶级设法通过议会来约束陆军一些比较狂热的计划时，军人集团就求助于他们封建传统中屡见不鲜的法西斯强盗手段。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强盗武士曾数次通过暗杀内阁大臣来更换政府。现在，他们不仅同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并且代表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重工业和战争的利益。日本人民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大选中流露出日益增长的反法西斯倾向。但是，军国主义者组织健全，而人民却还没有组织起来。强盗集团在封建传统势力和现代大企业势力的支持下，统治着这种素来被教以崇拜天皇、服从军队，逆来顺受的人民。

战时有效的新闻检查制度使日本人民无法了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连日本外交部的官员也不总是能马上得到情报。我的一位日本朋友懊丧地对我说，他们在中国的目的仅仅是要使中国“回心转意”，同日本友好。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只要军人继续统治下去，军队惨无人道的行径就破坏了建立友谊的一切可能性。他们告诉我，他们要把中国人从盗匪活动中拯救出来。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军队对中国老百姓肆意奸淫掳掠，屠杀焚烧，使他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了脸。饱尝苛捐杂税之苦的日本小店主们告诉我，他们作出这些牺牲是为了“帮助友好的姐妹国家——满洲国”。但冷酷的事实是，所谓“保护村”实际上是一些集中营，成百万满洲农民在武力威逼下被驱赶到那里集中生活，如果他们稍有对征服者不忠的嫌疑，就会被处死。可是日本人民对这些真实情况却一无所知。

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当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听说他们的飞行员轰炸了在长江里的美国炮舰“帕莱号”后——他们坚信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对此深感不安。他们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向受难者家属赠送礼品，并对此“可怕的事件”表示深切的歉意。格鲁大使从海

军报告中获悉,轰炸开始时,这艘美国炮舰正在护送三艘满载着撤离南京的美国难民的美国船向长江上游驶去,三艘船的最高一层甲板上都涂有醒目的美国国旗;那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高,先是三架日本轰炸机、六架战斗机,然后是另外六架轰炸机,最后又增加了两架轰炸机,轮番进行轰炸,炸沉了三艘美国船,炸坏了第四艘。他又进一步得知,轰炸中共有二十颗炸弹扔在“帕莱号”和附近的水面上。两架飞机攻击时使用了机枪,其中一架飞机还用机枪扫射了一只正在运伤员上岸的救生船。一艘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的机帆船用机枪打“帕莱号”,并登上了该舰。<sup>①</sup>后来大使对我说,据他所知,由于新闻检查,善良的日本人民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毫无疑问,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他们企图占领整个亚洲,把白种人赶跑,进而统治全世界。对这一点,他们在官方和非官方文件中都直言不讳。那个叫野田的青年,在讲述了他的“杀千人”比赛后表示,他希望“跨越昆仑山,涉水印度河,挺进帕米尔。”陆军省编的官方小册子公开宣扬皇道:“战争是万物之父、文化之母。战争是生命的源泉,是生命的推进器。战争激发并促进个人和国家的创造性的生命。”<sup>②</sup>多次出任内阁大臣的荒木将军说:“我们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把整个宇宙纳入我国版图……这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政策……如果有哪一个大国的行动不利于我们帝国的利益,我们就打击那个大国……皇道必须宣扬,并向全世界传播。”<sup>③</sup>

---

① 海军部向报界散发的报告。——作者注

② 日本陆军省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编印的小册子。——作者注

③ 荒木贞夫将军:《昭和时代 日本的问题》。——作者注

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计划。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将军向天皇呈递的著名的奏折，就是其中一个最明确、最全面的计划。奏折概括地提出了征服世界的步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乃至欧罗巴洲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日本人在正式场合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在私下是承认的。奏折的细节在许多正式文件中得到进一步阐述，比如，日本政府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声明，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又如一九三四年十月军部颁发的小册子，等等。日军入侵满洲六星期以前，日本驻满洲关东军司令本庄将军在给陆军大臣的信中说：“如欲进攻美国，我军必先在支那建立巩固的地位……占据苏俄远东领土，并把这些国家稳操在我们手中。”<sup>①</sup>

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旅行时，所有去中国的路最后都在英属港口城市香港汇集。那时，日军已经占领或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沿海城市，但它还不敢封锁香港来同英国决一雌雄。有一条铁路从英国这个港口通往中国内地——坐车往西两小时到广州，然后再用两天时间到北面的汉口。外部世界运往中国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是通过这条一年多以前刚建成的、漫长的单轨铁路线。这是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条通往东方之路，在这条路上，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农民敢于同强大的日本空军进行搏斗，始终保持这条狭窄的铁路线畅通无阻。

---

<sup>①</sup> 转摘自《中国战争》，雷·斯图尔特著，纽约国际丛书出版。——作者注



我在同广州市长共进午餐时响起了空袭警报——那天的第四次空袭。广州对于轰炸已经习以为常。如果是连续几天的大轰炸，人们就逃到香港去避一避；如果是一般的空袭，他们甚至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市长说：“日本人对平民进行轰炸，真是愚蠢透顶。昨天，他们轰炸了周围一些小村庄，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军事目标，只有一些我们广州人的祖庙。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这样做恰好帮助我们在全省组织起来。去年，这儿的农民还对政府不感兴趣，他们只想逃避税收，现在农民村庄被炸，船工在向上游拉纤时遭到机枪扫射，我只要说一声我们是在筑一条抗日公路，马上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志愿报名参加修路，尽管每天的报酬只有两顿饭。他们还积极地挨家挨户去动员别人一起参加。我们就是这样在二十四天内建成了一条从广州到香港，长达九十英里的公路。共有十万农民用这种方法来回答飞机的轰炸。……”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一九三七年二月日本驻香港的通讯社估计，约有五十万吨的军事物资通过这条公路运往华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前，日本人已在那条铁路上扔了一万五千多枚炸弹，现在这个数字大概已经增加到三倍，但铁路依然在使用。一九三八年八月的今天，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火车正在奔驰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气概，保证了这条铁路畅通无阻。铁路线上，每隔八到十英里，就有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应急修路队。每当铁路被炸，当地修路队就立即赶到现场填土。一两个小时内，修理车就载着枕木、铁轨和技术工人赶来，在农民填过土的地方铺上铁轨。这些都是一名站长告诉我的。当我要他谈谈具体的英雄事迹时，他说：“几乎天天如此，成了公式：轰炸——破坏——修复——通车。有一次，一座桥被炸，火车停了两天，但桥是不容易被击中的，因为我们有高射炮掩护。通常是在铁

路上炸个坑，我们只需要用两三个钟头就可以修复。我们有足够的备用铁轨，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我们还可以坚持一年半。”“只是有一条，”他用广东人那种喜欢讲究经济效益的口气补充说，“我们这条铁路去年刚开始能够偿还债券的利息，可是遗憾得很，今年由于修理费支出太多，我们要亏本。”

“日本人花两万日元在地面上挖个洞，我们只用十元钱就把它填满。”广东的苦力就是这样嘲笑日本飞机的。世世代代以来，中国人的幻想多次遭到破灭，但他们还是活着过来。当他们的家被毁后，他们就重建一个新家园。

但是，樱花岛上善良而受蒙蔽的人们应该知道，他们孩提时代的神是罪恶的，应当鼓起勇气，不顾一切地把他拉下马。只有当他们的军队遭到失败，其程度大到能够冲破新闻检查制度，他们身上盲从的枷锁才能被打碎。在那以前，一味的逆来顺受，只会助长军国主义者企图奴役日中两国人民、威胁世界和平的气焰。

### 三、俯瞰中国

我们的飞机从英国港口香港起飞，在犬牙交叉的海岸线、陡峻的峭壁和湛蓝的海水上空绕了一圈，然后越过几座中国的山头向北飞去。乘飞机到位于中国心脏地区的汉口——中国政府的临时首都，需要五个小时。由于到汉口的火车经常因空袭而误点，所以飞机上十分拥挤。到目前为止，日本尚未对这条航线进行过袭击，毫无疑问，因为这是德国的航线。

起飞前，我们听德国飞行员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飞行。他的三年合同即将满期，他要回“家”去了。我们这些了解纳粹在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采取的战术的人们，马上意识到，他在德国能否找到一份好差使，将取决于他带回去的情报——有军事意义的照片。整个大地都袒露在他的眼底下，所以他搞这些间谍活动是轻而易举的事。他驾驶飞机到过中部地区的汉口、西北部地区的西安、西部地区的成都和南部地区的法属印度支那，途中飞机上均没有中国的检查员在他身旁。看来

这个国家是多么容易受到众多敌国的袭击！

时间在流逝，我们的飞机在悄悄地向前滑动。底下是一座座渺无人迹的山头，在凛冽的严冬中袒露着褐黄色的肤色。连绵不断的凄凉的山麓下穿插着一些被一块块不规则的农田覆盖着的河谷，田野上村镇星罗棋布。但是这样的景象很少能看到。整个大地显得空荡荡的。难道这就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吗？这时，我们想起了一句俗语：华南是“八分山，一分水，一分平地”，可耕面积，甚至包括山区梯田在内，也不满五分之一。正因为大多数地区都不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人们都不得不集聚在江河流域。但山区也可用来作避难所。四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外来侵略，都曾使华北平原遭到蹂躏，但崎岖不平的华南山区却难得——即使有也很慢——被征服过。

让我们在空中俯瞰中国——中国的空间和时间！中国位于东南亚，形状象一只盖袋。天然屏障——热带丛林、世界最高的山脉、最浩瀚的沙漠和最大的海洋——从四面八方将她与世隔绝。她的东南沿海海岸呈一个大半圆形，向南太平洋洋面凸出，沐浴在温和的雨水里。她的西南部与炎热的马来亚丛林接壤；在西部的西藏地区，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把她同印度隔开，在那里，最低的山口也比美国和欧洲最高的山峰高。在西北部，这些高山沉入荒漠的土耳其斯坦高原和蒙古高原中，这里是两千英里长的浩瀚沙漠，一些艰难而危险的驼队小道穿插其间。北部的内蒙古平原和满洲平原的发端，是唯一易于进入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时常有侵略者从这里入侵中国。中国也曾凭借其文化、有时是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向外拓展疆域，远达这些天然屏障千里之外。但在这些屏障内是面积达一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本土，大约相当于美国领土的一半。

我们现在正顺着一条大河朝西北方向飞去。大河两旁，城市、村庄、农田密密匝匝。这就是亚洲最大的河流长江。两亿人民，即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靠长江及其支流排去他们农田中的积水。长江发源于西藏的高山峻岭，向东流入太平洋，把中国一分为二。它的大河谷就是著名的中原地区。长江以北同它平行的是秦岭。秦岭山脉峻峭的山体是中国南北两大部分不同气候的分水岭。

秦岭以南一直到广州是一个多山的地区。这里降水丰沛，河汉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布。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地区旅行一直是很困难的。人们只能从海路或水路先到一些中心城市，然后从那里沿着稻田里的石路 and 山间小道步行，才能进入这些地区。直到最近那里才筑了一些机动车公路，但为数不多。因此，中国的南方被分割成许多互不关联的区域，那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和方言。长江及其支流是中国南方大多数省份的主要交通干线。但是最南部的三个省或者地处沿海，或者有一些汇流在中国南方大港广州的河流流经其境。

在中国南方，每一寸平地都精耕细作，不太陡的山坡上修筑了梯田。亚热带气候——在南面几个省是热带气候——使勤劳的中国农民每年可以种两茬或三茬作物。最大的平地可以在三个地区看到：南部的广州三角洲，中部海岸的长江三角洲和最西部的、位于长江上游一千四百英里的四川紫色盆地。这些是属于世界上农业高度发展的地区。中国总长度为二十万英里的江河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尤其集中在号称“平原水乡”的长江三角洲。紫色盆地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比其他两个区域较少为外国人所知。但现在由于中国生活中心内移，它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这里人口稠密，平均每平方英里居住着二千一百五十名农业人口；作物品种繁多，有稻米、小麦、甘蔗、棉花等。这是世界上景色最秀丽的田园胜地

之一，它以其山上的梯田和二千多年前伟大的水利工程师李冰兴建的卓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闻名。

中国北方——秦岭山脉以北，在自然条件各个方面，都同我们刚才描绘的那部分中国成鲜明对照。这里非但没有从南太平洋吹来的暖湿季风，还经常遭到来自中亚细亚沙漠的大风沙的袭击。这里土壤肥沃，但雨水分布不均匀。大西北是黄土高原，风沙堆积而成的黄土层，厚达数百英尺。这里毗邻戈壁沙滩，气候特别干旱。尽管黄土非常肥沃，但由于土质疏松，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沟壑纵横；因此这里是“饥荒带”。

这就是著名的黄河流域。由于含沙量很大，河水成滚滚泥流。它象一条大蟒蛇，沿着陕西和山西两省的交界处弯弯曲曲地向南延伸而去，然后折向东流，经河南中部平原和山东沿海平原，注入大海。这些平原是长期以来由黄河从亚洲的心脏地区冲刷下来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冲积平原。在它们形成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向自然界开战。年复一年，由于泥沙不断淤积，河道高出两岸平地，全靠中国劳动人民人工筑堤防洪。但在洪水季节，特别是在战争和内乱期间，由于水利失修，防范松懈，黄河河堤经常决口，洪水泛滥成灾，数百村庄被淹，但也为后代留下了更为肥沃的土地。

中国的每一个地区，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住满着人。生活在中国平原地区的人数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类似的地区都多。其中五分之四的人口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地球上最勤劳、最坚忍不拔、最简朴的农民。四千年来，他们一直在为生存而顽强奋斗，充分利用每一寸现有的土地。他们挖运河，筑梯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亿万人民，男男女女，为重新安排山河田野作出了贡献。”<sup>①</sup> 在中国用来耕作的那些土地上，穿蓝裤子的农民似乎

<sup>①</sup> 克里宾；《中国的地理基础》。——作者注

成了整个风景的活的画面。四千年来，自然界和人类互相适应、融为一体。

这些劳苦农民充分利用一切资源。他们对土地精打细算：洼地有堤坝保护，山上有梯田。江湖两边许多低洼地在世世代代以前就已经被开垦成良田——有时开垦过多。北方的道路狭窄，而南方的道路更窄，只有人行小道。他们节约用水；江湖被利用来兼搞运输和灌溉一块块连成一片的农田，从江湖底挖起的淤泥施在田间作肥料。人畜粪便充分得到利用；甚至大城市的粪水也被收集起来，辛辛苦苦地运到乡下给田地施肥。副产品也被利用起来；稻草、麦秸、植物茎梗用来盖房或作燃料。中国农民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善于实践，充分利用土地、水和人畜粪便，在耕种了四千多年的土地上继续获得好收成。

四千年来，<sup>①</sup> 这些农民祖祖辈辈依靠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土地提供的农产品过日子。北方盖的是泥房，南方筑的是竹屋。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房屋的外表和自然景色相同，很难予以区别。屋顶上铺盖着稻草和麦秸。窗是用纸糊的，外面看不见里屋，但阳光仍然能够照射进去；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十年前，我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那里的村民仍然从未见过玻璃窗。他们把我们乘坐的道奇车上的玻璃窗看作是魔术变的。在黄土高原，黄土土质紧密，有直立性，可以切成竖墙，人们就在断崖壁上精细地开凿出多室窑洞，作为住宅。他们对我说，这些窑洞“夏凉冬暖”。断崖上面是农田，田地里往往有烟囱从底下的住宅里穿出来，这样，农民在田间劳动时就可以看到他们家里的烟囱在庄稼中间冒烟。今天，这些窑洞又多了一个功能：空袭时，它们还可以用作防空洞。

---

① F·H·金：《四千年的农民》。——作者注

中国农民世代代都为生存而斗争，这使他们学会了如何节衣缩食。收割季节，他们每天可以吃上三顿饭；但在冬天，他们的饮食就减少到每天两顿粗茶淡饭（南方吃大米，北方吃小米）。吃猪肉是难得的享受，只有在节日期间才能吃上，把肉切成小片，这样，能尽量享受肉的美味。食物供应情况也决定了农村的运输方式。在北方，饲料供应充足，人们把家畜拉的两轮大车作为运输工具；在南方，狭窄的河谷里田地都种三茬作物，土地十分珍贵，不种牧草，因此人们就用船来运东西，或者干脆肩挑背驮，这样比喂养家畜还便宜。

节约燃料的办法也是祖传的。北方寒冷，房屋都朝南，这样就能晒到太阳，避开来自戈壁沙滩的凛冽的西北风。用泥砖砌成高出地面二英尺的“炕”占去了内室大约一半的面积。炕的下面通着炉灶的烟囱，用炉灶的废气来加热，也可以在屋外的小洞里烧稻草来加热，这样可以少许提高室内的温度。特别是在晚上，当全家都睡在炕上的时候，就不觉得冷。即使气温降到零下，中国农民也舍不得在室内生火。他们用一种小型的金属木炭盆来暖和冻僵了的手；身上穿上几件棉衣，比我们身上穿的毛料衣服暖和得多。上一个冬天，正是这种棉衣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因为这种棉衣很厚，挡住了不少冲击力不大的弹片。

几代以来，也使他们养成珍惜金属和木材的习惯。在北方，木材特别缺乏。造房子时，木头只用来做房柱、栋梁、门和窗框，这些东西都是前人留传下来的。当泥墙因年久倒塌时，这些木料就继续被用来造新房。炉灶用泥砖砌成。我想起有一种可以搬动的小炉子，它是把泥巴抹在用铁丝扎的框子上做成的。我在陕西时，这种炉子被拿来为我们煮开水沏茶。我们的主人向炉子顶部中间一个约二英寸大的洞口每次加一小块木炭，火苗很小。炉子上面一



只底大顶窄的铜壶搁在三块小石头上，其高度正好能让火苗钻出来。炉子的形状、水壶的形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经过精心设计互相对准的，以便最充分地利用热量。炉子搬动起来很方便，天热时，就拿到屋外去烧。夏天为了降低室内的温度，把窗纸撕掉；如果房主有钱，就装上纱窗，而纱窗则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

由于土地是生活的源泉，又是由家庭中的劳力来耕种，所以土地把每一个家庭世代代拧在一起。这是一种由“老人”决定一切的家长制家庭。“老人”指挥他的孩子们参加劳动，并支配他们的生活，即使老人自己丧失了劳动能力后也是如此。儿子成年后，家庭替他们找妻子，让他们跟全家住在一起，可能是在宅基上用泥巴和竹子为他们盖一间偏屋。家庭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土地，十分珍惜它，并努力改良土质，以便将来传给子孙时，他们可以继续靠它生活下去。父母亲死后埋葬在自己的土地里，通过为他们竖立的坟碑，让他们继续成为家庭生活中的一员；他们的后代在坟碑前烧香叩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生命和生计的根源来怀念。

这些自给自足的大家庭在一起组成村庄，村长由各户户主挑选，管理村里的共同生活，并在灌溉、供水和小额交易等方面同别的村庄进行联系。唐朝一位诗人在下面这首诗里描写的乡村生活，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多大变化：

家家守村业，  
头白不出门。  
生为陈村民，  
死为陈村尘。①

---

① 白居易诗，海伦·普拉特译：《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可是，在看起来似乎平静的农村里，也发生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富有的家庭成了地主。他们剥削佃农和雇农。他们发放高利贷，用重利盘剥借债人。穷苦的家庭，由于连年干旱，为生活所迫卖女为奴。村子里的官员屈从于富人的意志，假借“主持公道”坑害穷人。古往今来，农民造反、土地改革，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从封建时代一直到现在，总是千百万勤劳农民在各个方面受到剥削。今天，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耕者有其田的人数还不到一半。

在亿万农民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代代相传的中国古老的文明。这些农民，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含辛茹苦，节衣缩食，终于有了少许积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手工艺、贸易、创造发明和艺术。围有城墙的大城市拔地而起，成了远近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里居住着巨商、士大夫、军事长官以及一些大地主。耕者则向他们进贡、交租、付息、纳税。城市里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并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比拟的水平。一些有名的中心城市发展了自己的特产——优质丝绸、珍贵木器、织毯、精致的瓷器。许多世纪以前，这些产品就已经通过贸易，越过亚洲，进入到后来成为欧洲的那些地区。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文化传播史，而不是一部帝国征服史，尽管有时她也曾是一个征服过别国的帝国。中华民族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不如说是在各种共通的文化、语言、艺术与传统的基础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多民族的融合体。中国文明起源于西北黄土高原，然后渐渐向南发展。二千年前，它征服了长江三角洲并南下到广东，继后又传入南洋诸岛。在西部和北部，中国文明跨越了浩瀚的沙漠和高山峻岭。而欧洲做到这一点则是在几个世纪以后。

中国在三千年以前就有水利工程；两千年前建造的宏伟工程

现在依然在宁夏和四川紫色盆地发挥作用。治水工程项目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以前。现在，在省志中可以找到这些记载。中国人最早在航行中使用罗盘。他们发明了火药和养蚕术。他们在公元前就编写了医药和有关人体的书。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在两千年前就曾讨论过千军万马的粮草给养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早期的皇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袭击而修筑的绵延起伏的长城是迄今最伟大的防御工事。为向皇宫运送贡粮而经过世世代代人工开挖并一直保持畅通的大运河是世界上一条最长的人工水道。

每当新的土地的开发和新的生产工具的发明应用增加了中国的剩余财富，或者比较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使她的老百姓富裕起来时，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光辉时期，出现了兴盛数百年的伟大王朝，出现了诗画和文化教育的黄金时代。北方及戈壁大沙漠上的游牧部落一直在骚扰这个文明古国。特别当这个国家因滥用权力而发生内部分裂时，这些部落就一再进犯中国，并把当时的王朝推翻。王朝兴起、没落，政治上合而分之，分而合之；但是，经过历次的动乱不定，中华民族的文明的疆域不断扩大。通过军事征服、和平渗透、商业往来和征服者的同化，这个文明把数十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种性、不同的语言融为一体，浇铸成现代的中华民族——这项任务，古罗马和现代英帝国都从未尝试过，更谈不上完成了。

从四千年前一直到上世纪，中国人从未遇到过任何比他们更高的文明。

## 四、四千年遗产

趁我们的飞机在长江上空滑翔，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眼底这块中国大地几千年的历史沿革。早已成为过去的时代，通过遗产和传统，依然在影响着当今的生活方式。

四千年前，当人口众多的长江流域仍是一片丛林密布的沼泽地区、而世界上尚无铁制工具可以用来开垦这块大地的時候，人类已经在北方比较干燥的旷野上从事耕作。河南中部平原的商朝诸王都懂得如何使用铜器，黄土高原——在现在的陕西境内——上的周朝修建了简陋的水利工程。经过一千年辛勤的劳动，出现了可靠的、有确切纪年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那时候还没有买卖土地的现象，但是已有“私田”、“公田”之分，农民靠种“私田”养家糊口，同时替贵族种“公田”。公元前771年，北方游牧部落洗劫了周朝的京都；在随后的五百年间，中国的诸侯互相进行厮杀。铁器开始在生产上使用，牛也用来犁田。这样就有了剩余财富，诸侯的势力也增强了。

中国首先是在文化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实现统一的。公

元前五世纪，出现了“诸子百家”，它同古希腊的哲学时期同属一个时代。这两个国家遥遥相对，互不认识，但都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也并不完全陌生。诸侯国之间互相进行战争，但都认为自己是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哲学家们都努力寻找某种能把所有的诸侯国都统一在一个和谐的势力之下并具有权威性的伦理哲学体系。<sup>①</sup>古希腊和古中国的哲学家们都创立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但却未能找到去除政治弊病的办法。

孔子遐迩闻名。在西方，人们主要认为他是一名在公元前五百年就从反面提出了《圣经·新约》中的待人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导师。在中国，人们倒认为他是一名发展了建立在家庭制度基础上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哲学家。他在封建战争中寻找稳定而非变易，他发现永恒不变的古老家庭制度在一切社会大变动之前早就存在，并在这些大变动后继续存在下去。他把确保家庭制度继续存在的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准则以及两者之间牢固的相互关系应用到更广泛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生活中去。人类的首要职责是在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君臣之间保持“伦常的关系”。他的所谓伦常是指稳定、传统与仁义的关系。他以为，人民起义应归罪于统治者造的罪孽，甚至外来侵略也是对君王道德沦落的惩罚，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其身正，不令而行。”当蒋介石为他的军队纪律松弛——这导致他在西安被扣押——在中国人民面前自责时，他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在思考。

中国古代有些哲学家的话听起来出奇地象现代说的话。墨子（公元前五世纪）反对孔子的思想，主张超越家族和国家的人类兼

---

<sup>①</sup> 本章大部分摘自菲茨杰拉德的《中国文化简明史》。——作者注

爱。他说：楚人皆我兄弟。甚至他对战争的谴责也具有现代意义：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在其他许多人写的著作里也有同样永恒的评语——例如荀子(公元前208年)写的一段话：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又如庄子(公元前三世纪)对最终归宿的沉思：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这些二千四百年前精辟的思想片断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封建诸侯时代的结束并不是由于哲学上的缘故，而是因为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兴起。他是一个来自现在陕西这个地区的暴君。他在其领地内废除了封建诸侯制度，建立了稍微比较自由的阶级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土地耕种者租用土地，用粮食交纳地租，免除劳役和“封建徭役”。由于这个因素，再加上他拥有最大的灌溉运河及较多的新发明的铁器工具，其农业生产力比较发达，从而加强了她的统治地位，使他能够征服所有的争霸对手而立自己为始皇帝。他下令在全国废除封建特权，制定统一的法典、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甚至统一的车轴，以便使农民的手推车能在同样深的车辙中行驶。他把早些时候筑的城墙延长，形成一座东起大海，西至一千四百英里以外的西部山峦的中国长城；

对入侵部落来说，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他残酷地强迫数以万计的犯人和退役士兵服徭役，结果引起老百姓的憎恨。他还焚烧了前朝的诗书，因而引起前朝士大夫的憎恶。在他的王朝建立十五年后，这两股仇恨就把它推翻了。这件事发生在他儿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自己只统治了十一年。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的观念和暴君的名声。在二千一百年以后的今天，当中国人民谈起他时，仍然对他表示憎恨。

一名普通的士兵发动了起义，推翻了第一个独裁者，全国各地被压迫的农民和士兵纷纷起来响应。出身低微的刘邦，经过七年的奋斗，登上了皇帝宝座，创建了大汉王朝；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新发现的铁金属的广泛应用，以及由于有了剩余财富才有可能进行的贸易，是这个政权得以不断扩张其势力的基础。商人富了，就要买土地，并向新的地区推进。这些势力比皇帝的敕令更能破除封建主义。刘邦跟新兴的商人阶级站在一起。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据说，他吃的败仗比打赢的胜仗还多，但他从不在关键战役中打败仗，因为他对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辨别力总是使他赢得最后的胜利。他颁布一道法令，规定儿子们可以平分他们父辈的遗产，于是，一个诸侯国分成许多小侯国，就再也没有力量同他对抗。他就这样逐步地把他们消灭。他规定，不论封建地位如何，有学问的人才才有资格当大官；他让精通哲学和伦理学的人在官府当官。这样，他既赢得了保守的儒生们的支持，又赢得了新兴的商人的支持，并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通过经商致富，也可以通过掌握知识而在官府中任职。

汉王朝发现并征服了西域。现在人们所知道的基督纪元开始后的头几十年中，卓越的行政官班超——他的妹妹在当时是第一

流的女学者，跟他一样蜚声中外——把汉朝的统治扩大到土耳其斯坦的绿洲——主要靠声望，也通过利用当地部落替他打仗，就象精明的贸易资本今天所做的那样——最后，五十个“土邦王”一个一个地俯首归顺，十万名中国军队来到里海的东海岸，仅隔着里海的海水和亚美尼亚山脉同当时的罗马帝国遥遥相望。班超曾派遣一名使者去同当时（公元九七年）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联系，但是帕提亚向导带错了路，他们领着使者朝南走，穿过亚洲，到了波斯湾。这样，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帝国一度近在咫尺，但由于狡诈的土族人的干预却从未相遇。

可是，那时的贸易却超越了所有这些界限。中国的丝绸、玉器、漆器和艺术品打进了罗马帝国，甚至进入到遥远的不列颠海岸——北海中一个寒冷的孤岛，当时，美国在那里的早期的祖先为躲避凯撒的军队正在丛林中逃窜。这种来自中国的丝绸贸易是古代最广泛的大规模的商业交往。但它最后却决定了汉朝灭亡的命运。那些具有现代思想的古代统治者废除封建主义后开始碰到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货币贬值，物价不稳，国防开支庞大——在封建时期，由于付款采用劳徭或实物支付的形式，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无足轻重的。铁器制造商和盐商逐步比旧时的封建君主更富有，他们用自己的财富购置土地。一种新型的半封建制度发展起来，在这个制度下，雇农和佃农租用富商和官吏的田地，并受到他们的剥削。

汉王朝同邪恶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艰苦斗争。刘邦刚掌权的时候宣布建立一个开明的政府，他用简明的约法三章取代第一个独裁者的严酷法规：①

---

① 海伦·普拉特《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样就促进了正在兴起的自由贸易的自由发展。不久，这些法律证明是不够的。公元初年，土地高度集中和佃农租地耕种的弊病日益严重，人民在沉重的地租、税赋和债务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帝国的繁荣日益受到威胁；这时，一位进步的皇帝——王莽——起来反对地主。他颁布法令，把全国土地改称为王田，归朝廷所有，分给耕者耕种；他还颁布法令实行“五均”，由官府控制工业和商业。公元二三年，豪富们把他杀害了。

个别皇帝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经济规律：在主要财富是通过小规模农业经营而取得的社会里，少量财富的私人占有滋生大量财富的私人占有，产生地主所有制，引起农村债务，导致农民起义。正象当代农民在同样的压力下所做的那样，破产农民当了土匪；帝国的力量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但是在汉朝统治的数百年中得到巩固了的变化成了统一中国的永久性因素：统一的文字和终身制的文官制度。统一的文字把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共同遗产一直流传下来；终身制的文官制度不同于封建社会根据出身选拔官员的制度，至少在名义上它的大门对所有的阶级——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学习——都是敞开的。所以，尽管汉朝被推翻后的四百年间发生了有关类似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的蛮族的入侵和内战，但从来没有象当时欧洲那般黑暗，因为对过去的记忆从未断过，统一的文化留传下来了。

帝国分崩离析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长江三角洲和四川紫色盆地崛起而成为独立地区。勤劳的中国农民掌握了新的铁制工具后，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向蒸笼般的丛林开拓。丛林被开垦以后比早先的旱地更确保丰收。这就为被称为“三国”时期的内乱提供了基础，<sup>①</sup>在那一时期，四川和长江三角洲的军阀进行了反对北方统

<sup>①</sup> 纪朝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地区》。——作者注

治者的斗争。经过几个世纪的内乱，中国又变成一统天下。这时，它已经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国家了。长江三角洲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富饶粮区，并通过开凿的大运河运贡粮向北方京都称臣。蛮族已被同化，随之而来的新的影响，改变了思想，并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在隋朝进行了几十年的苛政但高效率的统治后——它征服了敌手，凿通了大运河，并建立了通过统一的科举考试录用文官的制度——中国在增加了许多富饶农田的基础上再次实现了和平，进入她的黄金时代。

繁荣的大唐时期(公元六一七—九〇七年)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上疆域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时中国的体制已不再是汉朝时期建立在首次出现的初期商业资本基础上的原始民主体制。唐朝第二个皇帝、王朝的实际缔造者李世民是一个跟其他两个王族结盟的新兴豪门的王子。他既是学者，又是行政官，也是艺术的赞助人。他以命运的主人及统一和内部和平的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人民厌战情绪高涨的社会中。他在位第六年时<sup>①</sup>重新分配土地，迅速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分配的土地有一定的限额，并“永远”归真正的耕者所有。买卖土地也受到限制。文官制度得到改善，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第一次设省<sup>②</sup>，省界线的划分比现在还合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帝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国库增加。唐朝统治一百年后的公元七四六年，中央财政年度收入为：白银十二万五千磅，粮食一百多万吨，普通丝绸七百四十万匹，优质丝绸一百八十万匹，衣料一百三十五万件。中国疆域南至马来丛林，西南越过西藏，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同穆斯林帝国接壤。

① 普拉特的《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② 唐朝谓道。——译者注

唐朝的京城是长安，即现在的西安，但比当今城市大很多；当时，长安是一座世界性大都市，街头灯火辉煌。唐朝三百年间，共有四千名诗人，绘画艺术也同样十分繁荣，但后来历经入侵者的洗劫，传下来的很少。京城里到处都是一群群来自东西南北的不同种族和民族——贝加尔湖地区的西伯利亚游牧民族，印度丛林地带的居民，希腊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本人。那时日本才刚刚开始发展，热切地吸收着唐朝的高度文明。广州是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阿拉伯人通过海上贸易把中国商品传入欧洲。尽管欧洲世界除了接受中国的商品外对她一无所知，而中国当时一名旅行家却用文字描绘了君士坦丁堡。

那时欧洲正处在宗教战争和迫害的时期，可是李世民皇帝对人类心灵的一切追求却都能接受。他对一切可能获得的教义都亲自作了研究。按照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伦理的思想比战争更值得皇帝的推崇。唐皇对一位他所认识的名叫阿罗本的第一个基督教使者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他给佛教使者以类似的荣誉，他赞成道教，支持儒家，准许拜火教。他的宽容大度是他的国家和时代的象征。

在世界历史上，象李世民所建立的范围如此之广、文明程度如此之高、并长期保持稳定的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少有的。即使最终推翻唐朝、一再洗劫其京城并毁坏无价之宝的绘画的外来入侵都未能中断文化的连续性。学者和艺术家去南方，特别是四川避难——今天，中国大批学者和艺术家也去那儿避难。经过五十年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在华北尤甚，另外一个伟大的王朝——宋朝——又统治了三百年。它开始时统治着全中国，后来由于蛮

人入侵，它的统治就逐渐限于南方。随着帝国的衰落，唐朝传统的朝气和活力逐步被日益讲究炼字琢句、精心选择富于色泽的词藻的风气所代替，但艺术和教育仍然在蓬勃发展。绘画在宋朝臻于完善，直到后来蒙古游牧民族蹂躏东方世界。

然而，这两个伟大的王朝存在着内在的弱点，这些弱点在这两个王朝统治的六百五十年间不断增长最终加速了它们的衰亡。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尚未结束，诗人们就写下了农民在帝国发动的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其言论之自由现在看来相当惊人：

边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

……

千村万落生荆杞，

……

况复秦兵耐苦战，  
被驱不异犬与鸡。

……

且如今年冬，  
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  
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①

另外有一名诗人，也是乡村官员，他把自己的命运跟一名抱着孩子在收割庄稼的人后面拾遗穗的贫苦农妇作比较：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②

这些诗歌所反映的日益加剧的阶级摩擦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长江三角洲一带正在全面开发。如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国那样，那里已没有空闲的土地。把土地分给耕者和限制买卖土地的法律颁布后不久就失效，并以被废除而告终。中国的国家机器寻找了对策——象当今罗斯福执政下的美国一样：求助于用巨大开支来兴办公共工程。据官方报告说，四十三个县仅在一一七四年一年中就建了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一项治水工程，可灌溉农田七十五万二千英亩左右。③ 宋朝的京都迁往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后，那儿的人口更为增多，从而对土地的需求更大，这就导致人民在江湖地区筑堤排水，开垦大片圩田。但是当时的诗人们明确指出，这些田地大多落入贪官污吏手中。这些贪官污吏想方设法，加重对下户自耕农的压榨，通过提高他们田亩的等级来达到增加赋税收入的目的，而自己虽拥有大量十分肥沃的土地却长期隐瞒不报，逃避赋税。水利化农业耕作要求对水实行公正的集中管理，而个人应珍惜土地；土地的私有性质妨碍了第一点，分成租制则妨碍了第二

---

① 杜甫，公元七二七年，转摘自普拉特的《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② 白居易，转摘自普拉特的《中国未竟的革命》。——作者注

③ 纪朝鼎《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经济地区》。——作者注

点。这个问题在宋朝成了长江三角洲的一个中心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宋朝的失败，并非是因为缺乏聪明的思想家。两个思想派别发展成为两大政党，相互斗了几百年；同儒士和上层阶级的利益拴在一起的保守派和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变法派。王安石是早期的变法派之一，在他掌权的几年中，他进行了大胆的、切中时弊的变法。他让官府在夏秋未熟之前低息借钱给农民，夏秋后偿还；这一做法被形象地称为“青苗”法。他废除各种差役——穷人受此压迫最重，采用“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他采用市易法限定商人赢利不得超过售价的五分之一。保守派上台后罢废了他的新法。一百年后蛮族入侵，把所有派别都一网打尽。

十三世纪，好战的蒙古游牧部落袭击了中国的定居地区，当时，中国的力量因内部的腐败和动乱而削弱。他们杀绝了西北地区的人民，以至一些大型水利工程不复存在，许多城市永被沙丘吞没。南方在遭到入侵时幸免肆意掠夺，得以继续为中国文化的中心。野蛮的蒙古人沿袭了中国的文化并引以为自豪。他们在北京新建了大都，并修凿新运河把它同南方连结起来。

马可·波罗正是在蒙古皇帝忽必烈汗统治时期从欧洲出发，穿越蒙古人在消灭居住在蒙汉之间的各个部落时所开辟的沙漠之路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看到比他故乡威尼斯更加灿烂的文明。他特别注意到中国人在精工细作金属制品方面的技术；他带回了关于“能够燃烧的黑石头”的不可思议的故事。中国人懂得使用煤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可是马可却感到惊奇。他还这样描述长江：“我敢担保，它流程如此之长，经过的农村和城市如此之多，在江面上往返运输的财富和货物确实比基督教世界全部河流上的还要多。”

马可时代已经过去六个世纪。继蒙古人以后，还有两个王朝兴亡。一个中国贫农的儿子在蒙古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明朝，其统治疆域北面一直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并扩大到满洲的沈阳。中国人进行了海洋探险，下西洋进入菲律宾、印度支那、安南及南洋群岛，他们不仅去经商，并且去寻找定居的新大陆。明朝时期出现了得到日本贵族资助的倭寇，他们骚扰中国沿海地区，掳人勒索。欧洲的海上贸易——先是葡萄牙、荷兰，然后是英国——也象海盗一样进入中国沿海。在明朝统治下，中华帝国的疆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辽阔。清朝取代了明朝，帝国进一步扩大；它包括西藏、土耳其斯坦、蒙古、朝鲜、缅甸和安南。可是文化却变得僵化、呆板，害怕变革；在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社会基础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任何真正的变革都不再是可能的。千百年来形成的制度根深蒂固，它的习惯势力跟任何变革都是势不两立的。

中国文化的光辉并没有很快消失。十八世纪到中国来的法国传教士把她描绘成世界上最光辉灿烂的帝国，胜过他们伟大的国王统治下的豪华的法国。在西方发生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风暴的那几十年，也正是乾隆皇帝统治中国的时期。他是学者，又是诗人和艺术的赞助者；他在位六十年间，中国一直国泰民安，从未受到破坏，他的帝国的外观跟大唐初期一样宏伟。但在表面的背后，却是停滞、衰败，以及对思想的压制。科举考试制度的目的原是为了选拔那些精通民族文化的人担任要职，但在那时却成了一成不变的八股，甚至采取舞弊的手法让满人考取。过去，皇帝渴求外国最先进的知识，而现在，甚至外国人找上门来都被挡在门外。科学被认为不是儒学而置之不理。清王朝和中国的上层阶级从四千年历史中只学到了一点，即任何变化都意味着他们要被打倒。

这样，四亿勤劳、能干、俭朴和耐劳的农民生活着的中国大地，

在世界上被看作是建立在一成不变的极端贫困基础上的一成不变的无比壮丽的象征。

十九世纪,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文明的领导地位转移到西方世界,转移到那些把我们乘坐的飞机和我们朝下所看到的高耸着烟囱的工厂和轮船带到长江三角洲来的国家。



## 五、西方闯入中国

我们的飞机飞快地朝着万余间矮小的房子屋顶冲去；这些房子被宽阔的河流分割成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这里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工业中心，是中国的芝加哥。由于汉口机场因战争被征用，我们就在古老的省会武昌降落。在一块潮湿的野地上，一位中国官员前来迎接我们，他没有接我们递过去的护照，只是有礼貌地向我们要名片。接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数以千计洞穴式的商店门面，一次由于修筑了街垒和防空洞而变得更严重的道路堵塞，最后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原始渡口。

寒风凛凛，河水浑浊，经过半个小时的艰难航行，我们来到汉口；在那里，我们特别感觉到西方的渗透。纽约花旗银行和英国汇丰银行高耸在河边的一条现代化大街上。用英、法、德、俄、日各种文字命名的道路从这条大街延伸出去。直到不久以前，这些大国在汉口的滨水区都拥有他们各自的地盘——租界；在这些租界里，他们的领事法庭取代了中国的法律。现在只剩下了路名和一些企

业公司；除了法国租界，其他租界都已归还中国。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的汉口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它正在把一个国家组织起来。中国广阔的、多方面的生活在这里为建立一个新的基地而努力。现在，上海已被摧毁，武汉三镇成了中国最大的现代工业中心。平时，千里以外的乘客和货物，从四面八方沿着长江和汉水的古老航道及现代化的南北大铁路涌入这个中心。他们来自中国各地——盛产小麦的干旱的北方、水稻田纵横交错的南方以及围有城墙的古老的城镇。可是现在前来的都是难民和军队代表，他们来自十几个前线战场。无畏的男男女女在同摇摆不定的政客的投降言论进行斗争；爱国热忱在向低效率和混乱开战。许多外来的压力在瓦解汉口的斗争气魄；其具体表现在沿江一带的前租界区。前德国租界的房屋屋顶上用巨大的卐字装饰，显而易见，这是为了想威慑住日本的轰炸机。那撤空的日本租界被新组建的中国军队和政府部门所占用。仍然处于外国统治的法租界在空袭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区；在那里，有房产的人们出租避难所。汉口被上百个燃眉的事实和五六个大国的间谍和特务所散布的上千个谣言所折磨。

那些既发展又阻碍中国工业活力的外国压力从何而来？它们来自西方的意志，并非出于中国的意愿。数百年来，欧洲人一直在觊觎这个国家精湛的产品——丝绸、瓷器、玉器、漆器、茶叶。但是，一千多年来对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抱欢迎态度的中国人并不喜欢欧洲人。他们把欧洲早期的航海冒险家看成与不时骚扰他们

---

① 德国租界在大战期间归还中国；俄国租界在一九二〇年由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英国租界在一九二七年被汉口工人收回；日本租界是在当前敌对行动开始时，“在我们回来以前”交给中国市长“托管”。——作者注

沿海地区的倭寇一样，都是他们的文明帝国不能容纳的危险的野蛮人。他们这一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自从一五一七年葡萄牙船驶入广州港、获得当地总督许可进行贸易以来，来自欧洲的冒险家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海盗式的劫掠。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全都一样，他们抢劫驶往菲律宾进行贸易的中国帆船，朝中国沿海城市乱放枪；他们认为当地居民是“异教徒”，对他们进行屠杀是合法的，也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后把那儿的中国移民全都杀了。

所以，当乔治三世在一七九二年——他被在北美的侨民打败后不久——遣使要求同乾隆皇帝发展贸易关系时，那位体态文雅的诗人君主的答复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有礼貌地宽恕了乔治国王的无知和冒昧，他说：“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可是，中国南方的商人对这些新贸易伙伴颇感兴趣，他们对满清皇帝的控制不满。在他们的压力下，这个皇帝最后准允开放一个口岸——远离他的北方京都的广州——进行对外贸易。这一许可使商业资本主义得以在南方建立，并在一百五十年后推翻了他的王朝。

美国爆发革命前一年，北美快速帆船已经开始从事对华贸易。由后来成为美国革命资助人罗伯特·莫里斯配置装备的“中国皇后号”于一七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从纽约港启航。在某种程度上，远东茶叶贸易加速了革命本身的发生。华盛顿任总统时，对华贸易占美国进口贸易的七分之一，美国为此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快速帆船船队；这支船队使美国水手成为公海上的速度之王。聪明的美国佬知道中国人对外国商品缺乏兴趣，于是从新英格兰向热带的广州运去冰块；香港的冰室街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随着美国快速帆船的消失，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但是它的工业产品销路很小，为了支付购买茶叶和丝绸的钱款，英国商人耗尽了欧洲的白银。后来，因为鸦片可以使需求不断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了利用鸦片的可能性。他们通过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把这种贸易强加给中国，这场战争还迫使中国开放五处外国人可以定居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由他们本国的领事审讯而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规定进口货税率最高为百分之五，以及把后来称为香港的岩石岛割让给英国。

在后来的六十年中，对中国货的欲望以及为他们本国产品寻找市场的需要把世界列强都吸引到这个东方的宝库来。通商口岸增多了，在一些口岸建立了租借地，由外国人在他们本国政府武装力量的支持下自己管辖。其中最大的租借地是在长江流域二亿人民进行对外贸易的口岸上海的公共租界；一八五〇年以后，它成了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中心。中华帝国的边远地区在这几十年中纷纷落入外国的统治。英国并吞了缅甸，并兼并了毗邻印度的中国属地；法国夺取了印度支那；俄国开进了黑龙江以北荒无人烟的领土。

鸦片战争在全中国引起了一阵社会动乱。这在一贯仇视清王朝的南方反应尤其强烈。在这里，由于水田少，地主所有制的压迫最为深重。鸦片战争的赔款以及外国商品的倾销导致传统手工业者的破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中国有头脑的领导人对于朝廷未能捍卫住他们的国家而深感耻辱。中国人民在此重重压迫下，忍无可忍，奋起造反。

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四八—一八六五年）跟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同，这次运动由于外国施加压力而变得复杂。叛乱始于南方，然后席卷了中国本土十八个省中的十六个，并建都南京——

汉族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京都。起义军领袖并不反对外国，他们把中国的衰落归罪于满清；他们甚至谋求外国的帮助。他们在教会传播的教义影响下，信仰一种混乱的基督教；他们建号太平天国，称他们的领袖为“天王，耶稣之弟”。他们焚烧地主的田契和高利贷者的借券，颁布新的田亩制度，把土地分给无地的耕种者。开始时，英国为了迫使满清皇帝签订一项条约曾援助过他们的运动。但英、法达到目的后就派遣武装部队镇压太平军；在长期战争中，有千百万人丧命。中国人民认识到，要推翻腐败的王朝，现在仅仅反对国内的统治者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进行斗争，把他们的国土从外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此以后，中国所有的进步运动，在提出的口号中，尽管用词含糊，但都提到了外国列强的压迫。

年复一年，中国愈来愈落入被奴役的深渊。邻近的岛国日本在上世纪末的兴起，突然加速了这一进程；短小精悍但高度集权的日本统治阶级能够比中国更迅速地抓住现代工业，尤其是战争机器。它于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对它的姐妹国家发起的进攻，表明它已经登上世界的舞台。由于中国国内权力分散，仅是北方诸省对战争感兴趣，日本得以迅速战胜中国。日本夺走了台湾，拆散了朝鲜同中国的关系，强迫中国用巨款赔偿战争损失。赔款数额之大及其利息条件之苛刻，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处于外国金融控制之下。

既然日本揭开了中国的弱点，其他列强就一起出动对中国进行抢劫。英、法、德、俄诸国取得了大片的长期租借地。列强控制了中国的关税，用关税收入来偿还中国欠他们的债务。外国人取得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权利，中国法律不得干预。一八九八年，中国一位懦弱的皇帝试图推行改良运动，可是这个运动是建立在上层官员的基础上，只进行了一百天。义和团运

动是一场盲目的农民起义，反动的慈禧太后把它引向对外国人和外国思想的全面仇视。这次运动遭到外国军队的残酷镇压。体态文静的乾隆皇帝曾蔑视一切对外交往，一个多世纪以后，许多列强的军队洗劫了北平的宫殿，并抢劫了历代儒者宝贵的藏书。新的赔款也增加起来，使中国在财政上陷入更深的奴役。一九一〇年日本并吞朝鲜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眼里已不再是一个充满生气的帝国，而是一个待分割的赃物；中国幸免这一厄运，是因为列强之间的欲望互相冲突，而不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力量。

商业发达的南方首先提出要求，要根据西方民主的模式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政府。他们在同外国资本家进行贸易中结成联盟，同外国资本家竞争，并从中得益。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能为中国人采用外国方法的独立的政府。研究过西方学说的开明学者和结成古式秘密社团的不满现实的农民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反对独裁统治的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震撼了亚洲亿万人民，并对土耳其和波斯革命起过一定作用。中国人民也受到这场革命的鼓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中国爆发了反对满清帝国的武昌起义，两天后，起义队伍跨越长江、进入汉口和汉阳。起义风暴迅速席卷全国，这次起义是由孙中山先生通过新改组的国民党领导的。

中国新兴的实业家摧毁了古老的帝国，但是没有能力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稀里糊涂地同满清旧官僚机构的残余北洋军阀及半封建的地主阶级结盟，结果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代表这些反动势力的袁世凯虽然破坏了议会制政府，但没有足够的势力自称皇帝。帝制分崩离析；各省的将领夺取了当地的权力，并为扩大他们的统治地盘而打仗。外国帝国主义就抓住这个机会同地方军阀讨价还价，攫取采矿权和租界，廉价收购中国的珍宝，从而加剧了中国的混乱局势。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不仅要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来

扶养家庭、供养地主和地方官吏，而且还要供养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军阀；这些军阀向他们预征田赋，一次预征许多年。但是在这一片混乱中，新的希望在升起。西方商品所象征的、西方的机器使之成为可能的生活更丰富一些、自由更广泛一点的愿望，渗透到各个基层，甚至中国的农村。

世界大战的冲击，削弱了欧洲侵略者在华的势力，从而把扮演首席侵略者的角色让给日本。日本法西斯团体的前身“黑龙会”的官员说：“目前是最好的时机。……这样的机会在今后几百年中是不会再有的，……”欧洲列强忙于欧洲事务；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有利可图的军火贸易及大战的进程。日本军国主义开始采取奴役中国、征服中国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上强加的最苛刻的条件是日本大臣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北京政府提出的、现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自那以后的几个月里，日本一直在向美国否认这个文件的存在。“二十一条”把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权利转让给日本，为日本向满蒙渗透打开道路。它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给除日本以外的国家，要求中国聘任日本人为军、警、财政顾问，大大增加日本在华的钢、煤利益，允许日本投资修筑铁路的优先权，允许日本在中国南方建立海军基地。“要求”经过修改，被北京的腐败的当权者所接受。实为傀儡政府的“安福集团”在一年之中向日本借款四亿元（中国币），肆意挥霍、贪污；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取得了对华自然资源和工业的控制权。日本资本家纷纷涌入中国开厂，不择手段地、肆无忌惮地剥削中国人。中国虽然进入了机器时代，但没有获得自由，她仍然受到外国首先是正在加强对她支配的日本的控制和奴役。

但是，随着奴役的加剧，中国开始觉醒。首先觉醒的是学校里

的青年，而不是商人或政客。他们是一批对于国家的衰落特别敏感、对西方取得的成就最为了解的学者——按照历来的传统，他们都是一些领袖人物。首先在文化方面出现复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著作，不仅吸收现代科学，并且研究俄国 1917 年革命及苏维埃政权驱逐世界帝国主义的成功经验。学者们还简化了书面文字，使他们的知识能被更多的人所掌握。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学生们大为震惊。他们期待凡尔赛和约——以及伍德罗·威尔逊——能挽救他们。当和约批准日本占有山东的租借地时，他们失去了对威尔逊自由主义的信任；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自救。

一万五千名北京学生冲上街头，要求严惩同意那个条约的“卖国政府”。运动似燎原烈火迅速发展到其他城市，最后参加的学生达五万人。逮捕、殴打、严刑拷打都无法阻挡他们。他们成立了全国学生会，涌向农村、涌向工厂，到工农群众中去。他们宣布抵制日货，并取得了中国商人的支持。运动爆发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后来出了名，到七月中旬，他们迫使卖国贼辞去政府职务。尽管接替他们的人仍然是一批腐败的政客，表面上也没有马上发生什么变化，但是，跟推翻清王朝相比，“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意义更大的转折点。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遭到西方优越的科学技术的野蛮欺侮，现在，中国青年转而亲自掌握那些西方知识来解放他们的国家。进步运动的矛头第一次明确地针对外国的统治和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个进步运动第一次涉及到所有阶级。中国思想界的青年领导人第一次不仅以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并且作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 六、革命高潮

世界大战以后的十年，中国国内发生的社会变化比明清皇帝漫长的数百年统治时期内所发生的还多。西方世界的廉价工业品充斥中国市场。美国煤油代替了农民从油菜籽中榨取的自产油，工厂生产的棉丝品取代了土纱土布。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生存的边缘上，如今，他们失去了赖以勉强维持生活的家庭副业。敌对军阀之间的冲突，进一步使他们破产。与此同时，新兴工业打进中国，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在洪水、饥荒、农村生活的社会压力的驱赶以及码头、工厂招工的诱惑下，农民离开拥挤的乡土，蜂拥进入城市。

这样，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就在中国产生。开始时，数十万工人根本没有工资，每天只能吃到几碗饭。手工业学徒通常住在师傅家里，学徒期间不领工资，但同师傅家里人一起吃饭；他们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新建的工厂乘机沿袭了这些传统做法；他们让工人睡在工厂盖的拥挤不堪的工棚里，不给他们定劳动时间，除了供应吃以

外几乎没有别的报酬。汉口工厂里的童工开始时每月只能领到三角钱。在铁路上工作的技术机修工在产业工人中工资最高，每月拿十五至二十五元（中国货币）。工人每天劳动十二至十六个小时，每月休息两天。在其他国家，现代工业刚兴起时，工人的境况也大致如此。但在中国，由于勤劳的、低工资的工人人数庞大，再加上资本已经国际化，资本的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工人的处境更为恶劣。

为了改善条件，工人开始组织起来。中国第一批工会是在香港产生的，然后扩大到广州，直到最后建立了二三十个类似的组织。这些工会迅速发现，他们不仅在跟个别老板，而且在跟外国帝国主义的整个体系进行斗争，因为大工业主要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发动的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游行示威唤醒了产业工人，使他们也认识到组织起来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三年以后的一九二二年，长达五十天的海员大罢工的胜利，第一次向中国工人表明，外国资本是可以被打败的。翌年，两万名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罢工工人同汉口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在同本国军阀发生的第一次公开搏斗中，有五十名工人被打死。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代表二十五万组织起来的工人。大会决定，应按工业系统建立劳工组织。两年后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一倍；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劳工联合会，并一致决定跟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参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民族革命”。

在同一时期，第一批工会建立时受到的影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十名党员；一九二三年六月，即海员罢工的第二年，它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许多来自新建的工人阶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决定向孙中山先生组建的、主要由开明的上层阶级和专业

人士组成的国民党建议建立统一战线。大会接受共产国际代拟的决议，强调了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必要性。

世世代代以来，在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一些秘密社团，他们有着诸如“红矛”、“黄棍”、“大刀会”、“天门会”之类的生动形象的团名。这些社团通常由当地地主和富农操纵，对城里人持十分怀疑的态度。面对土匪和各地军阀部队的骚扰，人们迫切需要寻求保护，这就促使许多这样的社团去夺取对本地区的控制权。

但是，由于他们的领导权掌握在地主手中，他们不可能制定出一个社会纲领，尽管制定这样一个纲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南方农村更为必要。在许多省里，自耕农不及农民总数的一半；地主强迫佃农交纳五成至七成半的地租，而高利贷者放债利息高达百分之百，利息以大米计算，农民要用两个月的口粮来付息。一九二三年，一名青年学生在离广州不远的海丰组织了第一个农民协会，提出了反对高额地租和商人重利盘剥的纲领。开始时，农民十分害怕会遭受新的压迫，所以当征求他们入会时，他们都吓跑了。当他们看到集体行动的力量，并得到正在兴起的爱国运动的支持时，他们的组织迅猛发展；他们开始不仅要求减租减税，并且要求根本变革政府。

在一片激动人心的革命骚动中——学生起义推翻内阁，工人罢工反对外国资本家，农民组织新农会，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些力量曾经推翻了满清王朝，但后来分裂成互相倾轧的派系，因而在中国军阀混战中和外国的压力下未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政府。孙先生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以及在俄国顾问的帮助下，决定吸收觉醒了的工农来加强他的运动。代表来自中国诸省、来自满洲、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和华侨团体。他们

改组了国民党，重申了党的纲领。他们接纳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扶持工农，公开声明同苏联友好，称苏联为“唯一希望看到中国解放的国家”。

孙中山先生多年前第一次提出的著名的三民主义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民族革命”的基础。“民族主义”被宣布为争取独立，反对外国控制和争取包括蒙古族、满族、回族和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平等。“民权主义”以前仅指选举权，现在有了新的定义，其中包括言论、新闻、集会自由以及工人农民享有建立组织的权利。“民生主义”被扩大为一个纲领，包括实行耕者有其田，改革税赋制度，减租，国家向农业提供贷款，建立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保险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和义务教育，用人民的军队来取代军阀的雇佣军，等等。中国一切进步力量就是在这个宣言的基础上团结在一起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是胜利的三年；团结和希望使国民军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掌了权。他们先在南方的商业中心广州建立了进步的国民政府。当上海一家日本人办的纺织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导致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决定命运的游行示威时，全国爱国力量团结一致起来；在那次游行示威中，外国警察打死了九名中国工人，打伤了几十名。三十五万工人举行反帝总罢工，上海港和香港当即陷于瘫痪。香港工人纷纷迁居到同香港竞争的港口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为了表示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开展了抵制运动；抵制运动持续了一年多，几乎毁了那个英国港口。

爱国工人和学生从中国各地成群结队前往广州，参加国民政府的新军。军官在黄埔军校接受俄国顾问的训练。现任苏联远东军司令的卜留赫尔将军<sup>①</sup>当时是顾问团团长。政府的政治顾问也

---

<sup>①</sup> 当时化名为加伦。——译者注

是一名俄国人，叫鲍罗廷。他是孙先生亲自邀请来的。国民党所代表的爱国运动的威望同主要由共产党人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了。一九二六年，国民军在蒋介石将军率领下开始了旨在唤起民众、统一全国的北伐。

忠诚的新农会为“自己的军队”带路，他们沿着秘密的小道，越过中国南方的高山、河谷，向当地军阀发起突然袭击。在上海，武装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亲手把北方军阀的军队撵走，夺取了政权，然后把它移交给蒋介石的军队。千万名参加农会的农民和三百多万组织起来的工人是国民军得以在六个月内横扫中国南方，并越过长江三角洲，逼近华北平原边缘的一支民众的力量。汉口和九江的工人游行队伍，开进英租界，替中国政府收回了租界地。

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一度摆脱了地主和腐败的县官的控制，建立了名为“人民政权”的地方政府。以我在一九二七年访问过的湖南省永丰<sup>①</sup>为例，永丰四周邻近的土地分属于十二家富家，他们把土地租给佃农，收成对半分。他们粮仓里大米堆积如山，占这个地区粮食总量的一半；他们惯于囤积粮食，等穷人断炊、粮价上涨时才拿出来卖。有时他们囤积奇居，待饥民发生骚动，粮价暴涨时才卖。买不起粮食的农民被迫借粮，收获时要用高出两倍到三倍的粮食来偿还。

永丰镇坐落在镇上唯一的一条街的左侧，镇上有一万二千人，是全区贸易和货栈中心；街的右侧是一条从灰蓝色山峦上下来的河流，水流湍急，呈棕褐色。镇上店铺里的店员每月工资为一个半到四美元，吃饭免费供应，女店员每月工资只有几个美分，店主

---

<sup>①</sup> 现改名为双峰。——译者注

把家里穿旧了的衣服送给她们。货船刚靠码头，一群苦力就蜂拥而上；年轻力壮的苦力冒着生命的危险跳上船头，为的是挣几个铜板，而年老体弱的就只好等着挨饿。一长列苦力背负着货包沿着石子小道，穿过稻田，朝村子里走去；马力已被众多的廉价劳力挤走了。

在国民军进行北伐、宣传人民当家作主的那一年，湖南大中院校的学生，踊跃奔向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永丰四周的村子都建立了农会，在永丰镇上相应有一个农会总部，负责人是两位深孚众望的佃农。镇上还成立了二十四个工会——有码头苦力工会，佣人工会、厨师工会，竹器工人工会，碾米工人工会，等等。一个新成立的妇女协会要求男女平等。国民党也在当地建立了支部。另外，还成立了商会。每一个组织都为自己的会员制订了规则，比如，码头苦力工会要求轮流雇用苦力，以使年老体弱的苦力也能有受雇的机会。

所有这些令人惊异的组织都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之间的三个月内建立起来的。这些协会合在一起，组成了“人民政权”。较大的地主大多逃离该区，但大多数县长却留了下来。用一个在当地居住的德国人的话来说：“他们除了在‘人民政权’颁布的决议上签字外，没有任何其它权力”。农会控制了所有多余大米的供应，答应秋后偿还，但不付利息，借一磅还一磅。每天他们按照精心分配的定额向缺粮户掣出三四千磅。每隔三英里设一个人民粮仓。其收入一部分用于“人民学校”。建立“人民学校”的方法很简单：命令在私塾里教富人子弟的当地教师为所有孩子开课。对成立农民合作社的计划也进行了讨论，合作社应该用大米基金资助购买更多的大米和优良稻种。中国农民在这次大动荡中显示出来的惊人的组织才华在以前是少见的；在不到六个

月的时间里，这些仍然处在半封建时代里的文盲和相信迷信的人们，正毫无畏惧地、民主地和精明地管理着地方政府，控制粮食和安排教育。

人民法庭也建立起来。法庭一般由各协会代表组成。在永丰这样的小镇，他们只审判小的案件，县城的法庭才有权判无期徒刑和死刑。蓝小姐是一位办事认真的青年妇女，她曾在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现在作为妇女协会的代表在其中一个法庭中工作。她向我讲述了反映中国农村生活中存在着严重问题的两件死刑案例。“有一个叫张华堂的人，是一位高级官吏，也很有钱。他千方百计反对我们的农民协会。他占有二百英亩土地，拥有一支七十五名步枪手的非法武装。他的佃农无力交租时，他就把他们关进监狱。有一次，他派手下的武装去镇压农民和平游行，打死了三十个人。另外一个人姓商，是一名小官吏。他利用权力强迫人民向他本人交税。在他的压迫下，一名穷寡妇上吊自杀了。谁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把他抓起来，把他的一只手和一只脚绑在一起，吊起来毒打。有四十五个人到农会告他的状，要求把他处死。人民法庭把这两个人判了死刑——这是本地区仅有的两桩死罪案例——但是后来反动派夺取了政权，救了他们两人的命。”

这些叙述中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佃农与地主，工人与老板，土匪与人民——由于占领上海而大为激化。上海是中国工人组织力量最强的中心，也是最反动的资本家和国际资本的中心。当武装工人夺取这个城市的政权，并把它交给蒋介石时，上层阶级惊恐万分，要求蒋解除工人武装，整顿工会，清除革命分子，恢复秩序。他们主动提出，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向他的政府提供财政资助。蒋照办了。他采取相当大的暴力镇压了工人组织，从而赢得了中国最强大的财团的支持和外国列强的

承认。国民党极大多数执委连续几个月谴责他的行动，并在武汉三镇继续保持在原来统一战线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后来，他们也人民组织进行了镇压，驱逐共产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最后，他们同南京政府握手言欢。

中国南方的农民领袖被驱散了。他们逃进深山避难藏匿。上海和广州的工会领袖也躲藏起来，因为一旦被抓住，他们就要被处死。但是，数千万人民心中已经被燃起的希望之火并不是能轻易扑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在工厂、车间、乡村建立起秘密的基层组织，并派遣代表去农村发动起义，于是武装起义席卷全中国。

感到迷惑不解的雇工和佃农起初用梭标、大刀和农具来对付当地地主和军阀的进攻，保卫他们的“人民政权”。他们向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吁，向国民党呼吁，保护他们认为已经答应给他们的权利，使其不受“反动士兵”的侵犯。一部分国民军拒绝镇压工农运动，宣布脱离政府以示抗议。这部分国民军加入了农民的行列。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同地主和军阀站在一起时，一些革命力量就开始用“苏维埃”的名义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共产党领导人把分散的部队组成“红军”。

广州附近的两个村子，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革命十周年时最早建立了地方苏维埃。一个月后，广州工人也夺取了政权，释放了三千四百名政治犯，宣布成立广州公社。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迅速推选出来的代表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宣告中华苏维埃政权诞生。三天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日本海军陆战队协助国民党军队屠杀“赤党分子”。但是，公开宣布的雄伟壮观的规划，其中包括把大庄园分给无地农民，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废除奴役和童工制度以及其他许多进步的法律，在随后几年中成了一把火炬，



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工人、农民团结在一个新的名字下面：“中华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春天，后来蜚声中外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两支红军在江西和湖南边界会合，建立拥有七个县的“苏维埃边区”，边区里有一所军事训练学校，一座军火库和一些医院。他们没收地主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地契付之一炬，并办起了学校。到一九三〇年，已有十几个省存在着分散的苏区。红军号称十万，国民党只承认有六万六千。一九三〇年夏天，他们多少有点鲁莽地占领了湖南省府长沙，但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在外国炮艇炮火支援下赶了出来。外国政府提出要求，如果蒋介石希望他们承认他是全中国的统治者，他就必须镇压“赤区”。从一九三〇年夏天到一九三一年夏天短短的一年中，蒋发动了三次反共军事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第三次围剿时，他亲自率领三十五万兵力。这三次围剿都失败了，因为红军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给他们分了土地，在忠于他们的农民中扎下了根。

在后来的三年中，苏维埃继续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和其他许多分散的游击区内掌握政权。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各省的七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包括三百零三名贫农，二百四十四名手工业工人，一百二十二名雇农，五十三名苦力，二十五名中农，八名产业工人，二名店员，六十四名商贩和自由职业者——具有中国农村人口的广泛代表性，仅仅把地主和富商排斥在外。他们在中心体育场用三个小时检阅了红军部队，然后，代表大会在一支乐团的演奏声中在悬挂着赤党座右铭的大厅里开幕。毛泽东在他的报告<sup>①</sup>中就他们存在

---

<sup>①</sup>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俄文版，《游击队》莫斯科。——作者注

的问题和所取得的成就第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权威性的叙述。

“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军部队在统一的指挥下行动……苏维埃选举不再是一次群众大会，而是将选民的名单贴出来进行核对……在许多地区，百分之八十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在一些地区，当选的妇女代表占四分之一。”苏区开办了新的学校，共有十八万四千二百二十七名注册学生，另外，为十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一名成年人举办了识字班。有些识字班上，妇女占三分之二。“妇女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这种情况在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政府为建设国营工业成功地筹措了三百万元的内部贷款，组织了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货栈合作社，在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中设有水利灌溉、学校、卫生和向红军士兵家属分配土地的常设委员会。这一切都说明政府是有力量的。提到的困难是同在土地和家畜分配中发生的贪污现象作斗争——“他们应该分给贫农，不应该分给苏维埃干部”——以及由于蒋介石实行封锁而造成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盐的奇缺。穷苦人民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以前，大多数农民一年中总有一段时期要挨饿，而现在，由于土地分配比较合理，赋税减少，饥饿现象已经消灭，人民的生活至少比过去提高了一倍……雇农跟他们的主人吃得一样好……。”十几个行业的工资统计数字表明，在两年中，工资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在苏区都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在所有的城镇和许多村子里，设立了监察员，监督这一法律的实施。

列举的成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政府竭尽全力封锁这些地区，但他们的影响仍然慢慢地传遍全中国。南京政府年年派遣军队讨伐红色区域，以图用武力把全中国置于中央统辖之下。他们占领了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但红军主力总是能够跑到别的地方建立新区。他们的宣传比子弹更有效，因为大多数政府军士

兵是贫苦农民的儿子；当男人、小孩、妇女在晚上或战斗间隙向他们大声呼喊时，他们是很听得进去的：“白军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要为地主打仗？我们是穷苦的农民和工人，我们在为你们的利益而奋斗！把土地分给农民和士兵！不要交租，不要还债，不要纳税！弟兄们，到我们这边来；把你们的枪和子弹带过来，为革命而战！”

国民党军队——其中有些是共产党人——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北伐时在全中国点燃的革命希望烈火，在后来的十年中，或被沉重的炉灰封压在炉底下，或由历尽骚扰但仍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携往全国各地，点亮新的指路明灯。希望之火从未熄灭过。

## 七、日本以华制华

一九二七年夏末，武汉政府已经垮台。一天晚上，月色溶溶，在陕西的一个果园里，前高级顾问鲍罗廷同中国一名前官员在交谈。他们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将领们的影响。然后，鲍罗廷讲了一番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者将变本加厉地压迫中国。国民党依靠人民大众时，中国民族主义者处于支配的地位；汉口和九江的工人将外国租界收归中国。现在国民党镇压人民大众，帝国主义将会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上海大企业集团不可能把中国从外国列强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同外国列强结成了联盟，并受益于他们。”

在以后的几年中，似乎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证实这些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间，他的军队在工农组织的帮助下，从广州推进到长江流域；翌年，他们又在上海金融家的帮助下继续推进到北京。北京——“北都的意思”，它代表北方入侵者、先是蒙古人、然后是满人的统治——改名为北平，

即北方的和平，以表示同北方的战事已经结束的愿望。新都建在长江三角洲的南京；汉族最后一个王朝明朝曾在这儿建立统治。中国的传统从而同现代工业和商业结合为一体。尽管改组了工农组织——这种改组实际上意味着暴力镇压——但许多爱国人士寄希望于国民党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一九二八年十月，新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北方和南方的将军们，甚至包括满洲的将军们，都公开表示支持，这时，东西方传来了一片祝贺声。

祝贺声中也参杂了一种不和谐的调子。日本从一开始就对南京政府把势力扩展到北方诸省明显表示不满；这些是属于它的势力范围。它精通东方政治，曾趁机利用中国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它先向中国懦弱的末代皇帝施加压力，然后对腐败的北京政客进行贿赂，后来又对不时在北京掌权的满洲军阀、封建贵族张作霖提供资助；它通过这些手段使自己长期处于支配的地位。当蒋介石的新军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向北京进军的时候，他们在山东发现有五万名左右的日军在阻挡他们前进。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数百名中国士兵；中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和其十二名随员在特派员公署中遇害。由于双方都没有作好大动干戈的准备，中国军队才得以继续向北京进发。张作霖弃都而逃，成了日本人暗杀他的导火线。日本人还警告当时控制着满洲的张的儿子张学良不要悬挂中华民国的国旗；张学良对此置之不理，宣布支持南京政府。可是，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将军还是通报了各国列强驻东京的代表：“决不允许中国内战的战火扩散到满洲。”

然而，日本没有马上采取公开的侵略行动。它用三年时间进行精心策划，挑拨中国各个派别之间的关系，从中坐收渔利，并着重扶植反南京派的力量。祝贺中国取得新的团结的喧闹声还没有平静下来，人们就已经发现，这种乐观有点为时过早。蒋介石借削

减军事预算之名，欲解散与其竞争的军阀的部队，他的这个第一个尝试导致了内战白热化；他先同广西军阀打仗，接着又跟西北军阀开战。西部诸省的军阀持不介入态度，至多美言几句，敷衍南京政府。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革命旗”下，各地军阀雄踞一方，争权夺利；日本则在其中玩弄花招，伺机插手。

以美国实力为支柱的著名的九国公约是制约日本立即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世界大战向日本提供了成为东方主要侵略者的机会，同时也使美国第一次在世界事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凡尔赛和会结束后不久，当中国的爱国者还在为日本占据山东领土而痛心疾首时，美国国务院于一九二二年在华盛顿召开了由对远东事务感兴趣的主要列强参加的会议。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九个大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sup>①</sup>——保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各国在中国都享有商业机会均等；这就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被要求归还它在山东夺取的领土。哈丁总统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参议院——从而也是说给日本听的——新的条约打消了日本在华享有特殊利益的一切念头。

日本国内的形势也推迟了侵略行动。一九二三年发生的大地震摧毁了日本部分海军基地，财产损失达几十亿美元，国家发展暂告停顿。一九二五年通过的法律，使更多的人享有选举权，这样，日本在后来的五年中比以前或以后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主。政党更为活跃；资本家集团分别控制的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试图扩大议会权力，把陆军或多或少地置于议会控制之下。日本的企业家跟陆军一样，也竭力主张向满洲和中国扩张，但他们想

---

<sup>①</sup> 苏联和德国由于在大战后丧失了威信，没有被邀请与会。——作者注

通过慎重的现代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币原喜重郎外相宣布，促进日本繁荣最好的基础不是征服，而是同南京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发展贸易。代表资产阶级温和派的民政党为了制订一个稳妥的预算甚至试图削减武装力量。一九三〇年民政党政府甚至批准了限定日本兵舰数量的伦敦海军公约。陆军军官进行了反击，他们暗杀了滨口首相——这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暗杀行动的序幕，军国主义集团通过这些暗杀活动恢复并加强了它的权力。

一九二九年及其后来几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日本在满洲进行侵略活动提供了机会。美国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后来写道，<sup>①</sup>日本选择了可能是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开始它震撼世界的军事推进。中国的形势对它是有利的。蒋介石正忙于对中国苏区进行第三次大围剿。北方两位军阀——冯玉祥和张学良——正在互相威胁要攻打对方。有一半以上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参加的新政府正在中国南部的广州出现。中国报刊似乎理由十分充足地指控日本怂恿了这种种派系斗争。在日本国内，由于经济萧条，农村出现饥饿现象，城市工人普遍失业，大批小企业纷纷破产，阶级冲突扩大，从而削弱了民政党政府的力量。军方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对内实行法西斯计划，对外进行侵略。大资产阶级虽然在应由谁来执政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但都认识到这样做的好处。

入侵满洲的借口是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被炸毁，当帝国主义认为进攻的时机成熟的时候，此类事件肯定是会发生的。入侵前六星期，日本驻东三省的军事司令官本庄将军在写给陆相的信中说：“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sup>②</sup>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在此以前，日本根据协议已经在满洲驻军。这个协

<sup>①</sup> 引自他的著作《远东危机》。——作者注

<sup>②</sup> 指苏联。——译者注

议允许他们在日属南满铁路驻兵维持治安。就在爆炸事件发生的那天下午，日军显然是按照早已下达的命令，占领了数座相隔甚远的城市。他们在四十八小时内就夺取了整个南满，解除了十多万多名中国士兵的武装。不到一个月，他们又占领苏联边界线以南的北满。一度看来，日本下一步计划似乎要攻打苏联，因为苏联那时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头几年的极端困难之中，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加强它同满洲的边境。但是，尽管如此，看来日本还是明白，征服中国比较容易，更有利可图，也是它进攻苏联的必要的第一步。于是，它挥兵南下，以加强其对把满洲和华北隔开的长城沿线的控制。

对南京的中国政府来说，日本入侵满洲尖锐地提出了随后五年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两个主要敌人中间，它应该先打哪一个？先打中国苏区，还是先打日本入侵者？蒋介石认为，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抵御日本；据报道，一九二七年日本人在山东攻打他以后，他在一次将军会议上说，中国要有力量进行抵抗，非需十年时间不可。对日本入侵满洲，他宣布采取不抵抗政策。当时，张学良在东北拥有一支强大的部队及一些世界上最优良的兵工厂；当他急急忙忙飞到南京请示，并请求支援时，委员长赠送他一架飞机，要他回去准备向日本屈服。

中国人民不甘在日本侵略面前保持沉默。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运动席卷全国，尤其集中在日本拥有大量投资的上海。上海也是南京政府经济力量的源泉。于是，日军继入侵满洲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进攻上海。他们开始几次进攻都被现在闻名的十九路军击退。十九路军的英勇防守最后虽然被冲破，但在全中国激起了一阵意想不到的民族自尊心，并使日本在外国军事观察家心目中的威望扫地。日本纵有什么好名声，什么骑士风度，什么品行端正，



都因它对上海市民的残酷屠杀而永远扫地；这次屠杀为后来一切法西斯侵略——无论是在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还是在华北——开了一个先例。甚至在这人情如纸薄的东方港口，那些对一切都变得无动于衷的记者们，在目睹了血腥大屠杀后都感到震惊不已。

“跑马厅内我常到的一个看台的入口处堆满了刚被杀害的尸体。我目睹了这次屠杀，”大美晚报编辑萨克雷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写道，“被杀的人中有妇女和儿童；妇女是从背后被枪杀的，她们穿的棉袄被刺刀戳穿，儿童身上弹痕累累；农民装束的男人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他们的伤口流着鲜血，把地都染红了……房屋被点上了火，我看着它们烧起来，烧得净光，没有浪费一根火柴，也没有多添一根引火物。”他描绘了一名日本军官杀害正从着了火的小屋里向外逃命的农民们的情景。“他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军刀，在空中闪晃一下，插入人体做的刀鞘中，直到只露出刀柄；躯体倒了下去。第二个人过来，军刀再次插进活的刀鞘。接着来了一个高个子，可能是个小伙子，他一头栽在两具紧贴着地皮的尸体上，当他摔下去的时候，六名军官举起手枪朝他射去一排子弹，在他背部顺着脊柱豁开了一道口子。”这就是侵略上海时的暴行的典型事例。对上海的入侵以妥协的方式——让日本在该市获得一个永久的立足点——和平解决。

“即将发生的战争是一场主宰世界的斗争。满洲冲突仅仅是个开端。”日本军国主义报纸<sup>①</sup>上的这些话，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次入侵的真实意图。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并非象他们有时所声称的那样，只是在满洲为日本过剩的人口寻找一条出路；除了官员、浪人及一些技术人员外，没有其他日本人在那里定居。甚至他们

---

<sup>①</sup> 《日本》，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作者注

主要地也不是为了获取初级原料和市场；按照喜重郎的看法，这些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友好贸易来取得。日本在满洲寻求的是权力，是为后来的侵略建立一个基地。这次入侵是法西斯列强在全世界进行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第一步，最终将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美国曾试图和九国公约的其他签字国一起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条约的破坏者，但因英国的反对而遭到挫败。这样就丛患了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并开创了惧怕法西斯侵略、间接支援法西斯主义的风气，自那以后，西方民主国家就一直采取这一态度。

土地肥沃、盛产小麦的满洲平原仅仅是日本在建立帝国道路上的第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的铁、煤和棉花。华北四省——察哈尔、河北、山东和山西——拥有中国的百分之六十煤铁产量和百分之五十的棉花产量。东亚未来重工业的基础就在这里。如果日本选择同中国和平相处，日本完全可以和平地从中国获得这些原料，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获取原料，而且是垄断控制，以便遏止中国工业的发展，使日本在和平时期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能够战胜其他国家，在战时能确保它的霸权地位。日本的征服计划是它一切行动的首要原因；它在华北不是为了煤铁而寻求战争，而是为了发动未来战争而寻求煤铁。

后来几年，日本以满洲为基地，不断地向华北诸省推进。对于日本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间在该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人们很少了解。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政治、军事等形式。日本采取了“以华制华”的政策。它把一个省的中国地方军队、满军和蒙军组织起来，在日本军官指挥下去攻打另一个省。它

---

① 比森在《日本在中国》一书中作了精辟、详细的叙述。——作者注

对南京也施加压力,要求华北政府应由“对日友好”的人士组成,它所说的“友好”人士是指那些承认它的特殊利益、甚至不惜违背南京政府利益的人。当甚至是奴颜婢膝的官员都一个一个地对日本贪得无厌的欲望不敢从命时,它就坚持要求把他们撤职,换上更盲听计从的人。日本金融资本采取步骤控制铁矿和煤矿,以及从北平西行的中国铁路;这对它将来攻打华北和苏联的计划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样,在从未正式宣布过的持续不断的战争中,日本逐月向南面的热河和西面的察哈尔推进。北方诸省政府,包括仍然保持着国家首都传统的北平政府愈来愈受到它的控制。由于政府对报界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日本步步进逼和中国政府节节屈辱的消息都瞒着中国人民。南京政府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的条款全文从未发表过,但行动胜过公开发表的条款:中国军队全部撤到北平以北仅十公里的一条分界线以南,而分界线以北地区却由日本飞机和军队来维持治安。翌年,即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蒋介石亲自前往华北,改组当地政府,以此讨好日本。他在包括满洲和华北之间的战略要隘山海关在内的地方政府机构中聘任了许多日本顾问。

在日本的压力下,甚至华中和华南的利益也牺牲了。一九三四年,中国政府批准新的税率,把华商纺织厂使用的原棉税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三(从而削弱了他们同日本的竞争力),同时降低日本输入中国同国货进行竞争的三十九种棉织品的税率。由于在华中的海军船埠中聘任了十七名日本工程师负责建造一艘中国战舰,中国海军的秘密就被日本所掌握。

军国主义的胃口愈吊愈大。一九三五年,日本人竭力企图在华北搞一个完全自治的政府,以使黄河以北五省完全脱离南京控

制，把它们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同南京签订的协定为此铺平了道路；<sup>①</sup> 根据这两个协定，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和政治团体全部从察哈尔省和北平所在地河北省撤出。日本人劝诱中国北方的将军们，尤其是山西的独裁者阎锡山出面主持自治政府，但未能得逞。于是，日本军队就开始亲自出面在北平和天津逮捕中国公民，把他们扣押在日本兵营内。一百名商界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就是这样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头两个星期内遭到逮捕的；但是在中国官员允许日人按照日军所开名单去拘捕中国人以后，这种拘捕行为就不再发生了。<sup>②</sup>

由于将在下一章叙述的爱国运动的兴起，建立华北自治政府的计划遭到挫败。但是，日本还是在从东海岸一直到离北平不满十英里远的战略要地的冀东建立了受它控制的自治政权，并有组织地利用这个政权破坏中国政府对华北，特别是对关署的控制。冀东一带海岸挤满了川流不息的走私船，它们把鸦片和日本货运入中国，把白银走私出去，以图瓦解中国的新货币体系。日本为了保护白银走私分子，强迫在长城沿线的中国海关官员解除武装；三个月后，它又强迫沿海的中国海关缉私艇拆去机枪，并命令它们远离冀东海岸三英里。当中国海关缉私艇想在三英里界限以外的海面上行使搜查权时，日本就告诉他们将作为海盗行为予以处置。走私货物由武装的朝鲜人护送，他们随时准备向前来的海关官员发起进攻。据统计，大规模武装走私逃避的关税达到令人震惊的数字——五千万美元。<sup>③</sup>

---

① 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作者注

② 见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密勒氏评论报》。——作者注

③ 见比森《日本在中国》133页。——作者注

关于日本人的统治对中国人民生活的影响，很多记者都作了报道。天津的日本租界成了东方最大的鸦片和海洛因中心。<sup>①</sup> 鼓励毒品交易，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堕落，无力进行抵抗。“烟馆、当铺、妓院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林云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的《中国之声报》上写道，“多数是由朝鲜人经营，并在日本使馆注册，因而享有治外法权。中国人从烟馆出来后，中国当局才可以将他逮捕，但贩卖鸦片的人却逍遥法外……进口伪钞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在日本印刷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以面值的六折或七折价格出售给华北商人……第三种有利可图的买卖是按月计息放债，利率高达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北平人称之为“两级跳”或“赛马利”。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朝鲜债主从那些无力偿还债款的父母手中夺走他们的小孩，去当奴隶。谁也不到法院去要求伸张正义，因为涉及日本公民的案子是由日本法院审理的。”

日军在华北的所作所为，似乎他们已经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他们从村前到村后走了一遍又—遍，把喜欢的东西都攫为己有，”—名姓殷的记者在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中国之声报》上这样描写在天津附近举行的演习，“每家农户都要出—个人来服侍皇军。他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得不去做—切卑下的重活，无偿地为‘客人’消耗他们贮藏的燃料。如果日军对固定的靶子打腻了，他们就把进入他们视线的牲口当活靶子打。鸡狗损失惨重。甚至活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寻欢作乐的神枪手的靶子。紧张的演

---

<sup>①</sup> 美国驻鸦片调查委员会观察员斯图尔特·丁·雷勒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作者注

习结束后，‘友军’要寻欢作乐，就把注意力转向年轻的村女。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军队驻扎期间，村庄之间的互相联系是禁止的。”

在满洲可以看到在日本统治下的丰硕成果。比松先生一九三七年<sup>①</sup>访问满洲时，发现人民生活水平自一九三一年以来严重恶化。人均粮食和大豆等主食消费从一九三一年的四百四十五公斤降为一九三五年的三百四十公斤。“除了一些为军事需要服务的重工业外，满洲国事实上没有发展过什么工业。”在当地当铺里，越来越多的抵押品被没收，农民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农民习惯于在春天把衣服和个人财物拿去抵押，换钱买种子和化肥，收割后再把他冬天需要穿的衣服赎回。近年来，他们已经没有能力赎回这些物品了。庄稼人经常在收割季节需要劳力的时候被强迫去修筑军事公路。许多农民饥寒交迫，沦为土匪。

教育也退化了。教育部的预算只有东北四省前中国北方政府在一九二九年拨的教育经费的一半。“在整个满洲国，没有一所象样的大学。张学良时期一度繁荣的六所大学和学院都关闭了……从中国和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毕业返回满洲国的学生要受到警察的盘查和监督；他们在国外时，警察经常到他们家中查问他们的父母亲。”据一位中国教育家<sup>②</sup>说，小学里教的课本内容主要是日本人的言行，中国人的学说和事迹受到禁止。学校不教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中国的国名也从所有的课本中删掉。所有学校每周都要上六个课时的日语。“另一个受到同样重视的科目是所谓的劳动训练，其中包含许多应由仆役们担任的劳役。……教育是根据这样一个口号来进行的：‘我们日本人已经为满洲安排好了一切，他们

---

① 见比森：《日本在中国》的最后一章。——作者注

② 秦佩：《中国呼声》，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作者注

只要使用双手就够了，不必再动脑子。”

满洲数万中国士兵并没有向入侵者屈服，他们从一九三一年开始一直坚持战斗到现在。他们隐藏在高山丛林中，得到当地农民的保护，几乎所有农民都站在他们一边，许多人还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于是，日军在一九三六年想出一种严厉的办法，企图切断武装义勇军同老百姓的联系。他们把整个地区的人们都集中到用泥土堆成的高墙、深沟和铁丝网围起来的“保护村”里。村外的农舍都被夷为平地，有些地区地里长着的庄稼也被烧毁了。为了控制外人进入，村民都要登记注册，并定期检查户口。村民如果不能出示他们的居住证，就要被处死。在比松先生参观过的一个典型村子里，生活在那儿的一百五十户农家中，有三四十户左右人家是在他们的家被日本人放火烧了以后，强制从周围地区迁居过来的。日本当局对他们在村子里盖房不提供任何财政帮助；房子是在其他中国人的帮助下盖起来的。土地税等于一九三一年的二三倍。另外还有“军事保护”附加税。大约每星期都有一支四五十名日本士兵组成的分遣队到村子里来，村民必须欢迎他们，向他们免费提供吃和住。到一九三七年年中，五六百万农村人口被限制居住在这些村子里。由于这种恐怖的统治，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迁往满洲边远地区或长城以南居住。动乱和缺乏安全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

年复一年，南京的中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味迁就。中国人民提出抗议就遭到镇压。抗日学生和教师被关进监狱。直立的爱国报纸被下令要对日本表示友好；否则就要遭到封闭。中央政府亲自把抗日的官员从华北的地方政府中清除出去。当日军向西紧逼察哈尔时，冯玉祥将军组织了一支“民众抗日同盟军”，三个月内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可是南京政府随即命令冯玉祥将军解

散他的部队，要他从该省离开，并调动军队逼他执行命令；于是察哈尔北部就落入侵略者手中。一年后，当其他北方的部队对向日本压力屈服的命令表示愤慨时，蒋介石把其中的十四万五千名将士调往南方。南京政府如此步步退让，以致有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它几乎象是日本的代理人。

中国许多爱国者立即指责这个卖国政策。毫无疑问，日本代理人和那些跟日本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人中间的卖国势力的确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他一些人称之为中国人的容忍和建立和平关系的愿望；这个因素也是存在的。许多中国领导人无疑是真诚地相信，采取和解的态度会得到日本人的积极响应。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和平主义者的主张会比委员长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的雄辩的演说更精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机，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sup>①</sup>

中国所作的让步都未能使日军感到满足。对法西斯屈服投降从来是行不通的。一九三五年末，当南京正在进行最丢脸的投降屈服活动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少将宣布，“只要蒋介石集团继续统治着支那，”跟南京打交道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日本帝国应该独立采取行动。”<sup>②</sup> 显而易见，尽管南京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不管这种让步是容忍还是卖国，是软弱还是精明的拖延政策——日本人还是预感到，中国内在的抵抗力量总有一天会向他们的统治提出挑战。

---

① 《中国年鉴》，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433—434页。——作者注

② 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密勒氏评论报》306页。——作者注



## 八、中国走向团结

在日本向南步步进逼的同时，南京政府也在分秒必争地努力采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熟悉的各种方法统一全国。此举得到了上海银行家的资助，并颇受外国的赞赏。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贷款和外国顾问。美国的飞机和飞行员以及德国的军事顾问加强了蒋介石的军队。难以驾驭的各地军阀这时也开始向中央政府表示至少是名义上的忠诚。

新筑的公路和铁路、新建的工厂以及漫长的航线开始改变旧中国的面貌，并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物质基础。南京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政府大楼标志着这样一个国家正在形成之中。发展工业的二年、三年、十年计划业已制定。筑坝、垦荒、把新开垦的土地分给农民。当蒋介石宣布终止不平等条约、收回在制定关税税率方面有限的主权时，国家声望增加不少，尽管当时关税收入和海关管理权仍然操纵在外国人手里。

混乱不堪的货币制度是阻碍省际交往和进行贸易的

最大障碍。地方上流通的货币往往只取决于当地军阀拥有的印刷机，银元为最坚挺的货币。美国在一九三二年制定的白银高价收购政策，使白银价格猛涨，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广大农村流向国外，结果造成大批破产。政府利用这一紧急状况，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制定了稳定的、全国性新货币制度。三家政府银行被授权统一将白银收购入库，发行法币取代白银。人们踊跃用银元兑换法币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积极性，表明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新货币立刻稳定下来。新币制一开始就执行得很顺利，带动了工商业的普遍复兴，从而保证政府能够更迅速地开展国家建设项目。甚至一度将使国家陷入混乱的白银高价也被巧妙地用来当作一笔宝贵财富，因为通过在国外出售白银，在伦敦和纽约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就提高了中国政府在国外的信誉。

中国竟敢不经日本许可，擅自加强国力，因而在东京引起了一片谴责声。

为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相应现代化，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蒋夫人对此尤为热心。这场运动提倡把孔子的四德，“礼”、“义”、“廉”、“耻”贯彻到现代化生活中去。它推动了教育，促进了运动场的建设和城市道路的整洁，激励人们参加体育运动和进行健康活动，激起人民大众对鸦片的憎恶情绪。这场运动只对青年知识分子和上层社会有影响，对千千万万中国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苦难却毫无触动。

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中国农民和佃农的负担。军费占去了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饥荒日益严重：一九二七年，受饥荒影响的饥民为九百万人，一九二八年，饥民人数达二千七百万，一九二九年，达五千七百万。①

① 盖尼斯，《中国统一时》，第125页。——作者注

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骇人听闻的大洪水，灾情因堤坝常年失修而加重，被淹土地面积有英国本土那么大。甚至标志着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新建公路，也成了贫苦农民的额外负担。农民被强行拉去筑路，有时毫无报酬，私人土地上的公用道路被无偿征用。当地农民还不能在新建的公路上推硬轱辘的手推车。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七年以后，一位有资格的外国观察家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查尔斯·霍查斯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号的《亚细亚》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大地主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正在侵害贫苦农民的利益……，在腐败的军事当局的纵容下，他们攫取了历来属于国家和社会所有的土地，并在损害贫农和中农利益的基础上，盘踞一方……。被盜匪、内战、洪水、干旱和饥荒逼得背井离乡的难民大军，已经成为中国苦难的明显标志……国民党人一九二七年上台时，无家可归的人仅比荷兰人口多一点。到一九三三年，人数竟达六千五百万，相当于战后德国的人口。贪得无厌的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的双重祸害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里继续在广大民众的头上肆无忌惮地作威作福。”

有迹象表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他的政府正在脱离老百姓，并对此表示遗憾。在他执政的第三年，他号召国民党党员纠正各自的缺点。他说：“我们这些革命人士，现在被人民认为是特权阶级。他们象对满人一样仇恨我们……根本找不到哪一个（国民党）党部是真正关心人民福利的。他们全都染上了腐败、贿赂和追逐权力的恶习”。①

尽管委员长已经意识到这些祸害的存在，但是他除了诉诸武

---

① 《中国年鉴》，一九三一年，第541页，《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中央党部的讲话》。——作者注

力对付民众的骚动以外，别无他法。在他看来，苏区是国家统一的主要障碍，中国攘外必先安内。一九三二年，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军队，从而唤起全国人民民族自尊心的时候，正当中华苏维埃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反共围剿。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他重整旗鼓，采用新的战略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围剿。用现代化军事装备武装起来包括一支空军部队在内的七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江西中央苏区渐渐逼近；一路上他们修建了数百英里长的军事公路，构筑了成千上万个碉堡。为了获得当地农民的好感，他们作出了把土地分给农民，免征其苛捐杂税的允诺。

在这种步步为营，铁壁合围战术的逼迫下，苏区逐渐发生缺粮现象。特别是食盐的短缺，使苏区濒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一九三三年，他们“向国民党政府，向所有政治领导人和中国所有的政治团体”发出呼吁，主动提出愿同一切愿意抵抗日本侵略的军队实行军事上的联合。早在一九三二年，当日军入侵上海时，他们就已经对日“宣战”，但当时无法把这个宣言付诸实施。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对苏区的战争，要求赋予中国人民民主权利，要求让他们武装起来，为中国的独立而战。可是，他们的建议犹如石沉大海，甚至还不让见报。于是，他们决定采取现时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勇敢行动，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九万名武装人员组成的红军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突破四道封锁线，开始了现在举世闻名的“长征”。

在二万五千里的路程中，红军跨越了世界上地势最为崎岖的一些区域。他们倏忽而南，倏忽而西，弯弯曲曲前进，然后绕一大圈子直奔北方。在行程一年多时间里，红军共翻越了十八座大山，跨过了二十四条河流。沿途大战不断，小战几乎天天皆有。他们

除了巧妙地甩掉或击退奉命尾随而来的中央军各支部队外，还突破了十个省的军阀部队的层层包围，顺便还占领过六十二座城市。他们通过了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区域，有些是几十年来中国军队从未涉足的地区。他们还穿越了荒无人烟的西部大草原。

抢渡大渡河是一次举世无双的壮举。从三国时期到太平天国，多少浩浩荡荡的大军在这条河的峡谷中惨遭全军覆没。在到达大渡河前，红军进入桀骜不驯的彝族境内。他们同彝族首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从而消除了彝族人民心中长期形成的对汉人的疑虑，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出敌不意地提前到达大渡河。他们发现过河的最后一个机会是一座铁索吊桥，桥上的木板已被拆除。三十名志愿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缘着铁索，迅速向奔腾咆哮的大河对岸冲去。几名勇士倒下了，其他勇士冲到对岸，攻占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并为大部队过河铺好了桥板。他们荣获了金星奖章，这是中国红军的最高一级勋章。两年后，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西北见到这些英雄们时，才发现他们的年龄都还不到二十五岁。<sup>①</sup>

在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在宣告，中国必须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作好准备。内战的风云突变，才逼得他们踏上这充满艰险的历程。他们正是利用这一点向十一个省的人民宣传民族团结的必要性。他们宣告，抗日战争不可避免，他们正是为了迎接这场战争，才开赴西北。一九三六年初，他们抵达陕西。陕西是中国西北地区文明的发源地，现位于蒙古大沙漠的边缘，土地贫瘠，道路崎岖不平，人口稀少。这个地区虽然经济十分落后，经常发生饥荒，但却是战略

---

<sup>①</sup>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作者注

要地，因为它地处日军试图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设置一道屏障的进军路线上。

如果说，红军利用长征之机通过宣传，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那么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长征也帮助了蒋介石在军事上统一了中国。遥远地区的省份过去一直仅是表面上承认南京政府，而现在，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在追击红军过程中得以开进这些地区，名义上他是用其精良的武器装备去帮助他们对付共同的敌人——红军，而事实上，地方军阀究竟最为忧虑的是什么？是惧怕偶然跟红军部队交锋一次，还是担心永远隶属于南京政府？谁也不得而知。长征结束时，许多遥远的省份，特别是四川、贵州和云南，都被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其控制程度是清王朝覆灭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长征帮助统一中国内地诸省的一年半时间里，另外一场团结救国的运动在北平掀起了。在一九三五年整个一年里，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并扬言要建立一个自治政权。日本飞机不断在中国城市的上空盘旋；在天津附近的中国国土上，日本人的一个巨大的飞机场正在加紧建设之中，<sup>①</sup>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挑衅性地列队穿过华北城市的大街，并且占领了北平的两个主要入口之一丰台火车站。华北两省宣布，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成立新政府。新政府由当地的军事将领以及几名臭名昭著的亲日的安福系成员组成，这批家伙早在一九一九年就被中国学生赶下台。日本人声称，这个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脱离中国，实行完全自治。

北平的学生再次奋起救国。十二月十六日，从清晨到深夜，他

---

<sup>①</sup> 比森，〈日本在中国〉。——作者注

们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万人秩序井然地行进在大街上，前面的队伍被警察冲散了，后面的人马上补上去。甚至当警察用皮带、枪托和拳头毒打他们时，学生们仍然心平气和地同警察展开辩论，并向警察的口袋里塞传单，上面写着：“致警察们，亲爱的，佩带武器的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帮助我们拯救国家。不要打我们，去打日本人。”当消防队把水龙头对准从早晨六时至下午四时一直站立着或行进中的青年们喷射时，他们毫不畏缩地迎着刺骨的冷水前进，结果惨遭毒打。受伤的人由他们的同志们抬走照料。这些青年们非凡的自我克制精神获得了全市人民的同情，以致使得新政府成立的日期不得不往后推迟两天。这个政府也就从来未敢宣布它是“自治的”。日本人妄想通过软硬兼施而毋需经过大规模的战争就把华北从南京分离出去的美梦被学生们打破了。

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在上海，数千名学生占领北火车站，要求乘车前往南京向政府递交抗议书，上海的铁路交通因此而处于全面瘫痪状态。有些学生竟然强占了一列火车，到沿途的城镇和农村举行了振奋人心的群众集会，以致军事当局不得不破坏一座桥梁来阻止他们向首都进发。在武汉三镇，省当局为了防止示威游行，下令轮渡停驶三天，但最后还是被迫同意一万多名学生在汉口举行一次游行。新年放假期间，学生们携带数千磅传单成群结队进入华北农村。

不仅学生，各行各业的人士也都纷纷投入到这场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并成立了许多“救国”团体。他们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并要求国内各党派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协商。五月底，来自二十一个地区的代表在上海举行大会，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这个组织一成立，就面临一次对救国诚意和判断能力的考验。当时，广西省的白崇禧将军宣布他正在组织一次北上抗日的远征，要求向他的军队开放北上抗日的通道。由于南京政府当时尚未对这一行动作好准备，因此就引起了一场可能会导致内战的严重的政治危机。虽然白将军是救国运动的一个朋友，但由于这次远征会导致内部不和，他们经过充分讨论，最后还是谴责了这个远征建议。紧张的局势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是社会舆论在中国第一次强大到足以能够制止敌对军事力量之间的尖锐矛盾发展成一场内战。除共产党外，广西将领是不服从蒋的最重要的集团，其意义就更大了。

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的第一个迹象是，在为他举行的五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上，进行了向政府移交大众捐献的五十五架飞机的仪式。委员长在一篇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宣告：“只要我们还没有收回失去的主权和恢复领土的完整，我们就永远不是一个自由的民族和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同一篇讲话中，他又声称，所有“汉奸”，“特别是共产党人”，都必须予以清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被说成是共产主义。“全国各界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捕。他们都是著名的民众领袖，其中包括一名法学院院长，一家银行的副经理和几位著名的律师和作家。

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团结将产生重大意义的戏剧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事件的背景是发生在位于北平西北的绥远省的战争。当时，当地的中国将领们正在击退由日本人率领的满洲和内蒙军队的进犯。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支援这些保卫者的热情燃遍整个中国，北平的妇女组织给他们送去了一万多个急救药箱，做苦力的献出了他们的铜元，官员们拿出了十分之一的月薪。南京政府向



西北运去了大批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八十架轰炸机。这些军事装备一直运到铁路线的终端西安，似乎准备向绥远转运。委员长也跟着去了。但是他一到西安就立即明确告诉那些争着要北上绥远支援他们英勇同胞的当地军队，他们将先去打共产党，而不是打日本人。

驻扎在西安的部队主要是前满洲军阀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他们同中国其他军队一样，对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战斗力、杰出的战术和高超的指挥才能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亲人至今仍然居住在沦陷的满洲老家，因此对赤色分子提出的敦促他们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印象尤深：

“打回老家去！  
赶走日本强盗！  
东北是我们的！  
起来，全中国人民！  
我们不愿做奴隶！  
打回老家去！”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东北军曾在西北同红军打了几个月仗。在这些战斗中，他们有两个精锐师向共产党投诚。有些人被俘后又获释放。这些人回来后交口称赞共产党军队的纪律、士气和抗日精神。最后，张少帅自己也同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并实现了非正式停火。

显而易见，委员长亲临西安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点燃反对红军的战火。于是西安的学生就举行示威游行。在游行过程中，警察

当局把两名十二三岁的示威者打成重伤。张少帅请求去打日本，不愿意打共产党。委员长不予答复，只是让他看了一道正式命令，命令宣布解散他的部队，另派一名将军接任。并限他在第二天早晨之前作出抉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东北军的十三名军官当机立断，翌日清晨六时顺利完成任务。起义人员不仅在拂晓的一次戏剧性的追捕中，在山腰的雪地里逮住了委员长，并将他的卫兵全部解除武装，关押起来，而且还占领了警察局，接管了机场上的轰炸机。甘肃省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这样，这两个省就处于公开反叛中央政府的地位。

大规模的内战迫在眉睫。起义队伍声明，蒋仍是他们公认的领袖，他们无意进行叛乱，只是想进行“兵谏”。进谏内容包括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救国运动七位著名的领导人和所有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改组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委员长拒绝了这些谈判条件。南京的好战分子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们轰炸了距西安不远的一个小镇，全然不顾这一行动可能导致起义者把委员长处决的后果。南京亲日分子的企图昭然若揭，他们希望看到发生这种情况，以便他们在内战的废墟上上台。全中国的爱国力量都对此深感不安，他们尽力争取用和平方式使委员长获释。蒋夫人亲自同委员长的外国朋友和顾问端纳先生一起飞往西安，接着，她的被认为是自由爱国人士的哥哥宋子文也来到西安。

西安以北的陕西苏区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对左右局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没有参与这次行动，而且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一事件。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虽然蒋多次发动反共围剿，但他还是准备最终领导中国进行抗日的。任弼时后来在山西对我说：“我们不是根据他的言论，而是根据他的行动逐步相信这一点的。他修筑了公路和铁路；加强了河岸以及北方某些山口上的防

御工事。这样就改变了我们自己对统一战线的看法。于是，我们就不再希望团结中国人民进行抗日反蒋，而是开始希望同蒋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然而他不相信我们的诚意，一味认为我们的目的仍然是要推翻他。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使蒋认识到我们希望中国团结一致、反抗侵略者的愿望是真诚的。从此以后，合作才有了可能”。<sup>①</sup>

共产党人一听到委员长被关押的消息，就立即从苏区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十年前，周曾在广州的黄埔军校同蒋共事，后来在上海被蒋定为死罪。他运用他在东北军军官中的巨大影响，极力劝说他们释放委员长。蒋夫人曾说过：“同外间所传恰恰相反，他们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sup>②</sup>

代表团向头脑发热的东北军官们转达了全国上下日益高涨的反对新的内战威胁的强烈呼声，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成功地说服了他们放弃公开审判委员长的要求。假如进行公开审判，委员长可能会被处死，至少要威信扫地。关于双方讨论的情况，蒋介石是了解的。最后，蒋听从了关押他的那些人员和周恩来的劝告。当周恩来奔赴西安劝说东北军释放在若干年前曾悬赏八万元要他首级的那个人时，通缉令还没有撤销咧！

中国最高领导人被他的部下用武力扣押，他的部下再三向他

---

① 中国共产党书记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六年年初就宣布过：“如果蒋介石确实想抗日，那么，中国苏维埃政府将在抗日的战线上明确地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国际新闻通讯》，伦敦，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四日。——作者注

② 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原文为：“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作者注

表示歉意，最后经过他的敌人的调停，他获得释放——西安事变的发展，令人惊讶不已。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事变发生之初，大有爆发一场中国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内战之势，其结局却使日益增强的国内团结终于大功告成。这一戏剧性的事态发展使委员长认识到，共产党人确实是真心诚意地把团结抗日的事业置于宿仇之上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局势朝着建立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稳步发展。

然而这一目标并不是立即实现的。在西安戏剧性事件发生后的数星期里，事态急转直下：张少帅因抗上而被捕，后又获得委员长的赦免；国民党二月会议谴责“共产党匪徒”，同时又表示要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根据最后达成的协议，苏区进行了改组，成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特别边区”；举行了地方民主选举，在大多数地区，共产党人当选而继续掌权。地主获准可以返回家园，但除了保留能满足自用的耕地外，不得收回原有的土地。共产党人同意在新开辟的地区，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以换取国民党保证，在全国扩大民主权利、关心“民生”。红军被改编成一支政府军队，并被派往抗日前线，从而实现了他们在长征中所作的预言。但是，那是几个月后日本大举入侵以后的事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十分清楚西安事件的重要意义。西安事变谈判期间，日本首相就扬言，如果中国各派力量在那里取得和解的话，日本就不能继续采取“观望”政策。在西安被释放的四百名政治犯——他们是在中国即将获释的成千上万名政治犯中的第一批——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长期的囚禁生活使他们疾病缠身，许多人患有肺病，心脏病，有的人伤口尚未愈合。然而一俟获释，他们似乎忘却了肉体上的创伤，立即如饥似渴地阅览报刊新闻，热烈讨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战术。因为他们知道，

日本是不会容忍在西安实现的日益增强的中国国内团结的，抗日战争即将来临。

## 九、日本大举进攻

闪电划破寂静的长空，因为平静本身充满着必将发生闪电的理由。

一九三七年春天，中国正在以十余年来最快的速度走向国内和平和民族独立。南方和北方将军们的部队在进行改编，统归中央政府的领导。共产党人在制定同国民党合作的具体计划。国内经济形势，政府财政收入和对外贸易正在从一九三四年的萧条中迅速复苏。公路、铁路、航线和其他设施正在加速建设。一九三六年新建的粤汉铁路是中国中部连贯南北的最后一条运输线。

中国政府在一九三六年末同日本进行外交谈判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独立性。针对日本提出开辟一条通往上海航线的要求，中国建议日本应首先停止它的飞机在华北的非法飞行。针对日本提出中国进一步降低海关关税的要求，中国建议冀东傀儡政权停止大批的走私活动。针对日本提出中国聘用日本顾问的要求，中国政府回答说，不管在什么领域，只要日本技术人员水平最高，中国将十

分乐意雇用他们,但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针对日本提出取缔中国国内“排日运动”的要求,南京的外交官说他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但是这些活动正是日本奉行的政策所引起的。日本要求在华北享有特殊地位,并主动提出愿意帮助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南京没有公开答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南京均已加以拒绝。华北自治问题因学生示威而受挫。绥远战事表明,日本已经不能继续利用日本军官指挥的满蒙军队来向前推进。满蒙军队的进攻不仅被中国地方军队击退,并且他们内部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发生了反日起义。要么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来削弱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要么放弃继续向前推进的企图,日本军方必须二者择一。

日本国内形势也要求采取行动。日本人民开始公开反对军队日益严重的法西斯化。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的大选——四年来第一次大选——表明反法西斯情绪迅速高涨。<sup>①</sup>军方极端分子为了对付这次大选举举行暴动,一度占领东京,杀害了包括内阁大臣在内的数名政府高级官员。精明能干的高桥藏相的死是一大损失。他按照谨慎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在指导日本,他主张削减军事开支,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同苏联开战。头脑发热的青年军官发动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政策却被更为保守的军方领导所采纳。人民的反法西斯倾向继续在发展。生活费用的急剧上涨引起了罢工风波。据官方统计,一九三七年头四个月共发生九百二十九次劳工纠纷,差不多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一倍,是日本历史上劳工纠纷最多的四个月。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突然再次举行的大选中,

---

<sup>①</sup> 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最保守的政友会失去了六十八名议席,而温和自由派的民政党赢得了七十八名议席。社会大众党(工会)的议席从三名增加到十八名。无产阶级工党的议席从零增加到三名,无党派人士——大多是自由派——的议席从十名增加到三十一名。——作者注

成份复杂但代表工会的社会大众党从民政党手中夺取了很多选票，得票数增加了一倍。事情明摆着，除非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对外进行武力征服、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野心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民所制止。

国际形势看来也对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有利。欧洲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班牙，欧洲各国都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苏联正在忙于清洗军队里的奸细。美国通过了中立法，孤立主义倾向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严重。所有这些事实，特别是中国国内团结日益增强，都促使日本军国主义者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一个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独立的大国将在他们面前崛起，从而永远挫败他们征服世界的野心。

六月底，北平到处都在谣传：要出乱子了。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谣言越来越多了。引起中国人担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军队在卢沟桥<sup>①</sup>举行了军事演习。这一地区在北平以南，位于京汉线上，控制着唯一未被切断的、通往中国其他地区的通道，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一个条约准许日本在这一地区举行演习。尽管中国多次提出抗议，演习仍然持续了十天。七月七日一八日的午夜，日本军队声称一名士兵失踪，并说“有人”曾向他们开枪，然后逃往附近一座县城，要求进城搜查。由于当时已过午夜，城门口的守军拒绝打开城门。战斗于七月八日凌晨四点三十分爆发，一直持续到九点三十分。中国军队遭到日军重炮轰击，约二百人伤亡。<sup>②</sup>中国当前的这场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sup>①</sup> 即卢沟桥。——译者注

<sup>②</sup> 《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关于对事件的详细分析及对头一个月战争的报道，请阅比森《日本在中国》的第一章。——作者注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有时进行地区性的和平谈判,有时又发生混乱的武装冲突。在此整个时期,有一点十分清楚:当中国指挥官尚在迟疑不决,有的主张抵抗、有的主张投降的时候,数以千计的日本军队正蜂拥进入华北。七月十一日,日本驻中国各地领事接到命令,通知日本侨民准备撤退。同日,配备有野战炮、装甲车和飞机的日本军队抵达天津。从一开始,事情就明摆着,这场战争是日本陆军部一手挑起的。七月十二日,南京政府建议双方停止调动部队,并宣布,没有它的批准,当地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无效。而日本却要求华北省政府向日本屈服,南京不得干涉,并要求中国不得派政府军北上。日本自己的军队则继续大量涌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在七月十五日声称,他要“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sup>①</sup>在整个七月份,日本人民对他们的军队的意图十分怀疑。于是东京政府列举了许多小规模冲突的例子,制造一种假象,似乎小股日本军队正在中国受到生命威胁,以此来煽动人民的情绪。

七月二十八日早晨,日本军队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他们在中国长驱直入。中国人民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军事上的准备,也没有抗战的总体计划。当中国军队奉命不经战斗就撤离北平时,他们都痛哭流涕。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冀东政府”内部爆发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表明日本不再能依靠他们豢养的中国雇佣军了。这些雇佣军从前都是盗匪,日本人怀疑其中有些人不十分可靠,就在七月二十七日把他们赶出冀东首都,并在此期间杀了他们数百人。不到两天,即在七月二十九日,留在首都的其他中国雇佣军举行了起义。他们杀了少量的日本军队及二百多名日本居民和高丽

---

<sup>①</sup> 《北平时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作者注

居民。这些居民主要参与了冀东政府的走私活动。

另外一件使中国难忘的军事事件也发生在七月二十九日：日本攻打天津。在那里，他们不仅没收了堆满私人货物的堆栈，其中包括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国产面粉，并且还故意摧毁了南开大学。这是他们多次进攻中国高等学府的开始。中国人民从中认识到，日本的目的不仅是要征服他们的国家，而且要消灭他们头脑中的一切独立思想。中国一名学生作了这样的描写：“谁能看着密密麻麻的机群携带着可怕的炸弹飞越南开上空，而不发出咒骂的声音？眼睁睁地看着第一架飞机向我们的图书馆屋顶扔下一面旗子作为轰炸的目标，紧接着，成群结队的飞机有条不紊地扔下炸弹，然后再飞回基地装上新的炸弹。为了达到彻底破坏的目的，士兵们搬来了煤油桶，放火烧光了校园里所有的树木……接着，炮兵向未被烧掉的混凝土建筑物开炮……南开是给我带来现代科学伟大成就的第一所中国教育机关。它为发展我国北方提供了工程师，化学家和经济学家。”<sup>①</sup>几个月后，在汉口，中国一些知识界领导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对我说，日本攻打南开大学以后，他们认识到，除非他们起来抵抗，否则甚至连蒙古游牧部落也自豪地予以保存和模仿的四千年文化也将面临毁灭。<sup>②</sup>

---

① 《中国呼声》，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作者注

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近百名大学校长和著名教育家在上海发表了一则由他们签署的声明，声明说：“三个多月来，日本军队在我中国各地，利用飞机大炮，毁灭我各级教育机关，业已指不胜屈。在草拟这个声明时，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毁坏者，大学、专门学校已不止二十三处……据可靠人士说，（日方此种举动，系有计划、有系统）故如中央大学初即为日本空军所圈定之轰炸目标，结果陆续惨被轰炸四次。日方此种举动，再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其他如国立中山大学和同济大学——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辽远，且绝与军事无关……皆属遁辞耳。”——作者注

中国军事领导人和民众领导人迅速团结在中央政府的周围。给南京的声援电报从中国国内和海外纷至沓来。禁止进行抗日鼓动和演唱抗日歌曲的命令撤消了。七月三十一日，著名的七君子——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官员——在苏州被释放。他们曾以反日的罪名在那里被监禁了八个月。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各地的军事领导人纷纷抵达南京，表示愿意为国效劳，其中有来自遥远的北方的阎锡山将军，有来自遥远的南方的白崇禧将军，有来自遥远的西部地区的刘湘将军，有来自云南、首次来南京的龙云将军。南京政府同共产党人之间达成了协议，红军改编为政府的第八路军，由朱德任军长，并开赴山西北部前线。至八月底，中国的每一个军事领导人都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

日本的目标是占领包括中国重要煤铁产地在内的北方五省，并同时使南京政府陷于严重瘫痪，造成华中和华南不得不俯首贴耳的局面。日本军队计划沿三条铁路南进占领华北全境；一条从北平向南到汉口，另一条从天津向东南到南京，第三条向西而南，越过山西高原通到西安。在那里，黄河同陇海铁路的最西点会合。这三条从北到南的铁路控制着整个华北。由于在华北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无论具有多大的破坏力，都不能立即影响到以长江流域，特别是以港口城市上海为基地的南京政府的军事力量，于是日本在战争初期就侵入上海。

日本的一个海军中队利用公共租界的治外法权，于八月十一日直接在上海码头登陆，同时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走并拆除其在城市附近的一切防御工事。中国政府急忙调动了两个师的兵力在闸北一江湾地区布防。第二天早上，好几个地方爆发了战斗。开始时，日本军节节败退。只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在日本海军的援助下，才有越来越多的部队得以在黄浦江两岸登陆。与此同时，

日本飞机不仅袭击了上海，还袭击了中国内地的城市。尽管日本的军事装备和飞机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但他们仍然不得不为每一寸土地付出巨大的代价。闸北一江湾一线顶住了日军飞机、军舰和机械化部队长达七十六天的猛攻。最后，由于大量日军登陆并迂回包抄，中国军队才撤到一条新的防线，在那里，他们的两侧仍然被敌人包围。日本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并遭受了自日俄战争以来最沉重的军事损失之后，才于十一月十二日完成对上海的占领。

上海的陷落并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士气；士兵的英雄行为第一次使他们相信，最后定能打败日本。事实证明，在白刃战中，中国士兵至少可以跟日本士兵打个平手，并且常常超过日本士兵。许多英勇的部队在致命的枪林弹雨中一直坚守到最后一人。其中有驻守在宝山的一个营，所有的官兵都在九月九日战死在他们的岗位上；还有从湖南来的四个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从他的机枪前后退，直至十月二十四日被装备上占优势的侵略者全部消灭为止。那最著名的“孤胆营”，是八十八师的一个营，他们藏身在离“公共租界”不远的堆栈内，凭着他们的手榴弹和机关枪，和敌人的大炮、高射炮和燃烧弹坚持了四天的抵抗。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紧张地从租界边上观看着；上海地方协会把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偷偷地带给他们，这面旗帜高高地插在堆栈的屋顶，群众都能够看得见。当蒋委员长最后命令他们撤离早已着火的建筑物时，全中国的民众都赞扬这些士兵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并开始相信，中国是可以打赢这场战争的。

全中国名义上有一百多万军队，但是其中有许多是训练很差，装备很坏的地方军队，在实战中不堪一击。甚至中央军中最好的一些师，步枪和机枪的数量也分别只有日本师的四分之一和六分

之一。<sup>①</sup>其余的部队由于刚归中央政府领导，所以不但将领方面没有统一，而且空军、炮队和步兵之间，甚至在独立的步兵队之间都不能协同作战。《字林西报》在描写华北的一场战斗时写道：“两军装备之悬殊几乎相当于用弓箭来对付步枪。日本人拥有数以百计的卡车、坦克和各种现代化的大炮。大部分战斗都是由一支拥有一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进行的。这些飞机象雨点般地从空中袭击既没有一架飞机也没有一门高射炮的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伤亡。它们摧毁了中国军队的所有阵地，使他们无法在任何地方坚守下去。”

中国军事机构中的这些严重缺点，在上海的白刃战中暴露得并不十分明显，因为在那里主要靠个人的勇敢。但是在北方的大多数战场上，以及当战区扩大到上海市区以外的长江三角洲时，这些缺点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十一月的后三个星期里，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附近的所有地区，并分兵几路并进，直逼国民政府的骄傲的首都南京。至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京也被占领。日本为这一天作了长时间的准备，他们的谍报工作做得很好，所以人们注意到，日本军队比大多数中国将领更熟悉长江三角洲地带的河流的全部组织。

伴随着南京陷落而发生的大规模奸淫掳掠和大屠杀震惊了整个世界，在其他城市和农村也发生了类似的暴行。但是南京有许多外国的旁观者，无可争议的事实传到了国外。千余名未经战斗就缴械投降的中国士兵被捆绑在一起分批遭到屠杀，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听从了外国传教士的劝告才投降的，因为外国传教士认为，

---

<sup>①</sup> 苏联在《布尔什维克报》上的估计。——作者注

这样做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数以千计的市民因为被怀疑曾帮助过中国军队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甚至妇女和孩子，只要在什么方面得罪了日本士兵，也会惨遭杀害。一名中国士兵因为被一堆尸体压在下面才幸免于死。他向那位曾劝他投降的外国传教士朋友报告说，他的一些战友被日本兵用来练刺杀，有些被当作活靶子打死，余下的人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至死，然后被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在长老会教会医院治病的伤员都被杀死在病床上，中国的护士和医生被强奸或杀害。

日本军队掳掠大批妇女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名美国慈善机构的医生告诉我一件发生在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城镇中的事情。日本军队在该城的一个地区布下了岗哨，赶走了所有的男人，把妇女扣下来供他们随意糟蹋，十名在美国慈善机构里工作的姑娘，通过她们被赶走的男亲戚向外传达口信，一名勇敢的美国医生把她们从日本卫兵的刺刀下拖了出来，才使她们得救。其他传教士也跟我谈了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同样的事情；手无寸铁的男子被迫让他们的妇女听任命运摆布。

甚至美国人的家庭和美国慈善机构也不总是能够保护好他们的中国女佣人，以及躲在他们围墙里面的避难妇女。美国国务院向日本提交的抗议中，列举了十五起闯入美国民宅、扯下美国国旗的事件。日本军队任意侵入外国的住宅，他们的飞机多次蓄意袭击停在长江口的美英船只，包括明目张胆地击毁美国“帕莱号”炮舰和三艘美国油轮等。这些无视外国权利的行为，几乎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日本现在自信能够征服中国，因此它已经开始向西方列强挑战，要把他们赶出去。

南京陷落后，日本以为中国政府会全面投降。但由于若干因素，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两个月前日军和八

路军之间在长城关口上所进行的一场战斗。平型关是一个极其偏僻的关口，而且不被外国记者所注意，所以，只是在数星期后，人们才认识到，那里的胜利以及后来的忻口战役对于拯救中国甚至比后来比较为人所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意义更大。

日军当时沿着三条铁路线向中国南部推进，有一条是向西穿过山西高原的，它在战略上最为重要，因为这片高原位于两条峡谷通道的侧翼。日本深知它的重要性，因此派遣了由他们最著名的军官板垣少将——后来担任陆军大臣——指挥的大批新近投入战争的精锐部队去夺取它。这些部队进入山西时非常蔑视中国军队，他们甚至连巡逻侦察队也不屑派出就向高山上的长城隘口逼近。九月二十五日，当日军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峡谷时，八路军的部队从山上向他们猛扑过来，把两英里长的一个纵队的人、马、物资和车辆全部消灭。日落时，他们已歼灭了半个团的敌军，并占领了敌人所有的阵地。

中国这一胜利大大打乱了日本的推进计划，当他们后来由其他山口进入晋北时，中国军队采取了联合防御的方针，由卫立煌将军的部队守卫前方阵地，八路军骚扰敌人后方，这样就把日军阻挡在忻口近一个月。板垣精锐部队在晋北受阻，使平汉线上其他日军无法继续前进，最后，他们被迫暂时放弃自己的目标郑州和汉口，而向西增援板垣。

在那种形势下，时间是关键。在山西的延误以及其他部队改变向南推进计划，使日军未能在决定性的时刻进入华中。那时候，汉口实际上没有设防，委员长所有精锐部队以及他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战斗上。日本显然有一个夹击南京的计划，即不仅从上海方向，而且想在占领汉口之后沿江而下，会攻南京。要是当初他们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是由于平型关战役，他们很

可能已经做到了<sup>①</sup>——那末，南京的陷落就会使中国政府无处可退。在失败主义集团的影响依然强大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必将导致向日本彻底投降。

当南京最后陷落时，情况已经大不相同。胜利者自己由于在上海遇到出乎意料的顽强的抵抗而搞得精疲力尽；中国军队也已撤退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当双方都稍事休整以备再战时，中国人已获得时间来充分汲取战争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这些征服者将给他们带来的不单是政治上的压迫，而且是对中国文化的无情摧残和对人身安全和人民生活的肆意践踏。他们认识到，失败意味着屠杀老人和儿童，掳掠家财，奸淫妇女。他们认识到，投降并不会带来宽恕，而只是意味着农民在“保护村”中受奴役，有抱负的青年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也知道，尽管日本可以依仗机械化威力的优势把最英勇的中国士兵扫除，但是在白刃战中他们是可以被打败的。最后一点，他们从平型关战役中开始认识到，通过对它的侧翼和交通补给线发动突然袭击，即使这样的机械化力量也是能够被摧毁的。

这些认识使他们既增加了继续抗战的决心，也逐渐形成了未来的作战计划。这些认识也使中国政府有了一个新的力量基础。南京的失陷结束了中国政府对港口城市上海长达十年的依赖；它不能再依靠上海的银行家、上海的外贸以及在那里的各国帝国主义了。蒋介石十二月初从武昌的新的军事司令部里向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这个演说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新的力量基础。他说：“中国未来的长期抗战的胜利基础，并不在南京或其他大城市，而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人民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些话表明，委

---

<sup>①</sup> 关于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见第十一章。——作者注



员长又回到了十年前曾赋予国民党的北伐战争不可战胜的威力的力量源泉。

“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也就是输掉了这场战争。”今天在中国，人们会机敏地用反论法来对你这样说。两个首都丢失了，五个省份被侵占，大工业和商业遭到了破坏。但是，对于坚定地屹立在拥有顽强、勤劳的农民的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大地上<sup>①</sup>，背靠着亚洲的大山和沙漠的中国来说，战斗才刚刚开始。

---

① 应为三百七十万平方英里。——译者注

# 十、中国转入内地

在战争旋风的驱赶下，中国人的生活向内地转移。首都迁移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最西部的重庆，中国历代领导人在遭到敌人入侵时，都在那里避难。这不过是一场意义更重大的迁移的先兆吧了。迁往西部内地的不止是政府，也不止是整座南京城。生活、工业和文化——上海的银行、工厂，北平的学生、教授，沿海诸省的数百万人民——都被席卷到西部地区。他们努力在穷乡僻壤安居下来。一个新的中国在内地诸省开始了。

上海曾经是中国主要的商业中心，现在却成了一座死城，中国人称之为“孤岛”；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自然地理而言，而是说它陷入了日军的汪洋大海之中，与中国大陆隔绝。公共租界地和法国租界地在外观上还存在着——庞大的办公大楼躯体内不再流着生命所必需的商业血液。除了运载军队和军火的日本船，码头上停靠的船只大为减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怕冒风险而不来上海，而是因为上海不再有托运货物的生意。外国商人和记者装作颇

有点儿茫然的例行公事式的样子，这是他们过去几十年的老习惯。一些人开始迁往其他城市，另外一些人则在揣测——上海会不会在一年、五年或十年之内恢复原样？对他们来说，要承认上海过去的繁荣是来源于中国广阔的内地而不是外国人，是很难的。上海这个东方最大的港口，一旦与那些穷乡僻壤的生活隔绝，就成了一座死城。

外国租界的周围是上海的中国城，面积比租界大得多，居住着二百万人口；此城甚至在外观上也已不复存在。它不仅是座死城，而且是座被屠杀了的城市。我驱车数英里，穿过曾经人口稠密、而现在却是一片废墟的工厂区。我在其他战争中还从未看到过这般严重的破坏；这不是战争中发生的正常现象。破坏是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日军占领一个月后，位于郊区的南市被焚毁。在小小的虹口区域内，有九百家工厂遭到破坏。全中国估计有八千二百九十七家工厂遭到破坏，<sup>①</sup>其中大部分是在长江三角洲。

我带着特别通行证，漫步走进废墟——破坏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日军还是不准原来居住在那儿的中国人回家，到处都是灰烬和歪曲的柱子。一连数英里渺无人迹。我偶然见到一群群苦力，在日军的刺刀下，在支离破碎的建筑物里捡废铜烂铁。搜集各种遗留的铅管装置、金属器皿，甚至生了锈的铁钉。据估计，到一月份为止，从上海遭到破坏的住房里捡了十万多吨废铁，运往日本兵工厂。在一些尚能辨认的屋墙和被洗劫一空的内室附近，陪同我的朋友告诉我：“这里原来住着一户广东人家和五十名学徒……这家男人是从浙江农村来的，全家通过辛勤劳动，好不容易才买了一台车

---

<sup>①</sup> 中国在日内瓦国际劳工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作者注

床，并雇了工人……现在松井回去可以对日本的企业家说：‘你们在东方的一个主要竞争者已经死了。’”

战争暴风雨来临之前，数千万人民，从长江三角洲跨越中国大地，向西迁移。我沿着陇海线旅行时，看见车站上挤满着人群，在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车。但是，他们中还有许多人分散在远离铁路线和航道的地方。汉口、西安、长沙一线以西，公路上挤满了人群；新建的汽车马路，为了保护路面，不久以前还不准农民笨重的手推车通行，而现在，马路上五花八门的原始运输工具样样俱全。富裕人家坐轿子、黄包车、马车或者骑毛驴、骡子；其他人用手推车或者独轮车搬运他们少得可怜的家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却只能用背来驮。帆船、平底船，甚至舢板都在江河上运送成群成群的难民。

人们难以想象这场人类灾难的混乱状态。在汉口的一个难民营里，一对夫妇正在为几天前上火车时混乱中丢失的九岁儿子而悲伤。这种妻离子散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情况更为严重，听起来令人心酸。有一户人家，把变当全部家产而换来的二百元钱藏在患病孩儿的尿布里。孩子死在路上，由于在拥挤的船上无法保留尸体，他们就把它扔入河中；在心烦意乱中，他们全然忘了取出这笔家产。另外一户人家说，他们把钱都交给母亲保管，由于船上人多，母亲在睡觉时掉入河里，扔下了她的丈夫和六个小孩。

部分向西大迁移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人们按照军事计划撤离南京：先是伤员，然后是政府职员——他们上午接到命令，下午乘专门为他们安排的火车和船离开——最后是普遍老百姓。有的工厂和大学向上游搬迁时，所携带的完整无缺的设备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不已。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用船把一千一百名学生，全体教员，全部的图书馆藏书和实验室设备运到一千英里以西的重庆。在那里，由于没有空房，他们就先在用泥砌成的小屋里上课，并在四十

天内盖了二十四座临时建筑物。南京有名的兴福斋饭馆，号称自明朝开馆以来从未歇过业，十五世纪时且有皇帝光临；这家饭馆因不愿招待日本人，就从南京搬往汉口。蒋夫人的坚毅的精神曾保存了南京博物馆中的数百箱艺术珍品；这些自中国艺术黄金时代以来的无价之宝，都被疏散到中国西部的几个城镇。

在艰苦跋涉的大迁移人群中有一些英雄人物，他们不仅进行自救，而且努力维持秩序，维护团结，把知识授予别人。我在汉口遇见一群从上海来的目光锐利、热情奔放、具有献身精神的纺织工人，她们自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为他们的国家义务工作。她们曾在女青年会办的夜校里学习急救护理；在大撤退以前，她们一直在上海帮助抢救伤员。后来，她们决定随部队后撤。她们中有一个人穿着军装，第二个穿着蓝棉袄，其他人都穿着用羊皮做衬里的外衣；她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没有别的行李。他们要去“组织人民与军队之间的合作”。这种组织工作十分必要，并且要煞费苦心地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农民和士兵之间长期存在着对立情绪，而且是因为这些女青年所属的八十七师士兵都来自西部和南部诸省，不会讲上海话，可能被误认为是敌军。女青年们替他们当翻译，既向士兵告之以礼对待农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又对农民解释为什么要向军队供应粮草，为什么要照料伤员。

向西大迁移虽然存在着极大的混乱，经历了种种苦难，却是一次爱国的热诚。它不仅给中国的边远地区带去了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且也带去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力量和智慧。三十多年来，中国工业界、商业界和教育界内的有组织才能的智囊团一直在向沿海的银行、工厂和大学寻求支持和解决就业问题，现在，他们则转向内地，发展中国的农村。新的公路、铁路、兵工厂、机场、工厂和大学正在建设中——有时候速度慢、效率低，有时候速度惊人。由于中

国国家领导人的到来，以及处于战时紧急状态，内地各省政府都感到精神振奋，要努力干一番英雄事业。

国民政府新迁的首都——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内河港，也是土质肥沃的四川紫色盆地的门户。它位于距海口一千四百英里、三峡上面的长江上游，日本炮艇开不进去，飞机空袭因路程太远也难以奏效。可是，大多数政府部门中途曾在武汉三镇停留。在那里，南北大铁路和长江通往全国各省和前线战场。政府官员乘飞机往返于两个新“都”之间。他们向更远的内地迁移的速率，要看他们在重庆方面能否找到办公室，另一个原因是在汉口有没有那种意料中的危险。我在一九三七年圣诞节抵达汉口时，很多人预言日军会在两周内来临。市里到处流传着要投降的谣言。南京战场上的溃败，数万名丧失战斗力的士兵和伤员以及数百万难民象潮水般涌入内地，把政府都吓坏了。中国抗战处于最低潮。

日本人通过德国使馆主动提出和平。日本驻华盛顿大使说：“世界将会对我们的节制态度感到惊讶。”但是，节制的态度并没有使中国人感到惊讶。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日本不再以占领华北为满足，它要统治整个中国。递交给委员长的文件内容包括：日本控制中国的对外关系（“坚持反共产国际协定”），控制中国国内的治安权（“合作共同反共”）、控制中国的自然资源（“合作开发经济”）；以及日军驻守中国战略要地，在军事上保证以上诸点之实施。如果中国要作为一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除了抗战外别无其它出路。

我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当德国大使在那年十二月带着条款来见委员长和蒋夫人时，顽强不屈的夫人由于事先知道了——尽管不是通过官方途径——条款的性质，在迎接时说的话使大使大吃一惊：“哎呀，陶德曼先生，你给我们带来了幸运！今天下午我们

击落了四架日本飞机！”

大使被这种接待方式搞得有点措手不及；他一面把文件交给她（外文的文件都是由她念给委员长听），一面说：“我只是转交，不加评论。”

“我可也是这样想的，”夫人说着，一边把文件推向一旁，似乎不屑一顾。接着，她笑容满面、亲昵地问：“陶德曼先生，你那几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今天好吗？”这个事件就这样巧妙地结束了。

这些和平条款在中国发表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应跟蒋夫人差不多。他们不屑一顾地把它扔在一边，开始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委员长宣布全面改组军队，并开始到各条战线进行视察。他每到一个战区，就对召集而来的将军们说：“美利坚合众国为争取独立战斗了九年。如果中国要抗战九年才能取得独立，我们必能进行抗战九年。中国的资源比美国多。我们目前打败仗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十九世纪式的。我们必须建立支新的军队，使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必须想些办法，让普通士兵也能提出建议和批评，也许可以通过建立某种士兵俱乐部的方式进行。必须要有统一的纪律，临阵脱逃或者没有充足理由而擅自先退的将领，一律枪毙。我们不仅要把军队组织起来，还必须把全体人民组织起来。我们目前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再维持两年，这些钱用完后，我们还可以寻求别的途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不应该依赖国外；一旦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外国就会来援助我们。”<sup>①</sup>

这些会议上决定的战略，是在过去六个月惨痛的失败经历以及八路军在山西运用运动战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包括阵地战同灵活机动的战术相结合。现在不会象在上海那样，再

---

<sup>①</sup> 彭德怀参加了洛阳会议，他向我复述了这些话。——作者注

命令英雄营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个人，这些英雄的牺牲代价太大。只有在日本机械化威力还没有使守住这些阵地需要付出很大牺牲时才坚守阵地，但当不值得作出这种牺牲时，就会把阵地破坏后予以放弃，引诱日军深入中国内地。与此同时，游击队不断出击，骚扰敌人交通线，拖住敌人的后腿。这一战略决定了战斗的长期性，最后必将把日本拖垮。日军愈是深入中国内地，他们的交通线就拉得愈长。在内地某个地方，他们将到达一个终点，自那以后，他们就无法再继续前进，而中国军队日益加强的进攻，将把他们消灭在那里。

我在汉口时，人们经常对我说：“日本的大炮和飞机可以把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夷为平地或者加以占领，但要想夷平或占领我们所有的城市是绝对办不到的。那几个小小的岛屿想违背我们大家的意愿，把整个中国永久占领，它们还没有那么多人呢。”这段话里包含的战略有赖于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和坚忍心。因此，必须动员人民团结起来，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大规模地改组军队为此作了准备。摇摆不定的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把山东省会拱手让给日军，因而以叛国罪和其他卖国贼一起被处死刑。他的这个北方省就由来自南方的著名的主战派将领白崇禧和李宗仁防守，他们曾经在广西英明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乘坐委员长的专列前往汉口，途中，他们讨论了游击战术。此后不久，群众动员部（一种战时的民间组织）那位保守的部长被精明能干的陈诚将军所替换，他曾在一九三四年最后把共产党军队赶出江西。同样那些共产党人在汉口的首席代表周恩来被任命为副部长。这样，通过这些大胆的做法，团结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从南方的广州到西北的甘肃，在中国一切非沦陷区内，建设事业迅猛发展。华南长沙以西的铁路迅速修到西南地区被山隔绝的



贵州省；直到不久以前，那儿的人们连带轮子的手推车都从未见过。此外，还做了准备工作，要把铁路继续向西南延伸到法属印度支那，同海洋连接起来。战争爆发后的头六个月里公路修建的速度是战前十年和平时期的四倍。修建公路不仅是为了国内的交通，而且是为了把中国的内地同欧洲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其中有两条“万里公路”（三千英里）最为壮观：一条向西南通往缅甸，另一条向西北通往俄罗斯的土耳其斯坦。甚至在没有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中国劳工的干劲和速度，在武汉机场的改建中，惊人地显示出来了。新的轰炸机需要一条很长的新跑道。美国工程师说，用美国机械来修建需要一个月时间。四万名中国苦力，在没有重型机械的情况下，只用了十天就建好了。他们在那些并非必需硬路面公路的地方把路面挖起来，再铺在机场上作为跑道。一位朋友对我说：“我在下午二时从格里菲思—琼斯教会学校来到城里，下午七时我回去时，我来时经过的公路都不见了。他们把公路整个地搬到机场里去了。”世世代代以来，中国人曾建造过大坝、长城和大运河，他们靠的是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劳动，而不是现代化的设备。

内地各省都注意来年的粮食供应问题。中央政府禁止种植可提炼鸦片的罂粟，并命令改种粮食作物。用于酿酒的糯米种植面积减少，以增加食用大米的种植面积。在我访问期间，湖南的银行为农业发放信贷六百万元（中国币），用于改良种子、购买化肥和兴修水利工程。四川也为此拨款一千万。广州市长邀我共进午餐，吃的主食是白薯——味道很好，但那是穷人吃的。他向我解释：“我们向全省颁布了一道政令，一个月内有三天不吃米饭。明年我们将生产足够的大米，但今年大米不够吃。我们只要还有其他品种的粮食，就决不应该从国外进口大米。”

在我访问期间，农业部派出了两批勘察队，在甘肃和四川调查矿产资源，找到了很多对军事工业有用的矿产。据说，还发现了有开发价值的油田。由于影响战争前途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汽油，因此，内地的公共汽车都接到命令烧木炭。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制造了一种烧木炭的附属装置来开动汽车。这种装置炭灰很多，要经常清除；对这个问题，他们早已开始着手解决。

我认识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是匹兹堡大学的毕业生。他把他亲自培养的四十名炼钢技术人员全部带出南京。“精确、准时，同美国人完全一样。”他正准备去新加坡，用政府的资金进口并装配一家“流动钢铁厂”。他解释说，大型钢铁厂需要大铁矿和现代化运输工具，可是他打算建立的那种小型钢厂，最多只需五万美元金币，如果复制的话，化钱更少。这种钢厂将建在边远地区分散的小铁矿附近，离日军很远，日本轰炸机到不了，规模又很小，无论怎么轰炸，影响都不大。每家钢厂每天出钢三十吨，还可以哪儿最需要，就搬到哪儿去。

甚至数百万仓皇逃离战区、踏上混乱不堪的长途跋涉的难民，也开始被纳入中国的有组织的生活。在初期难民蜂拥而入的冲击下已耗尽粮食和医药用品的汉口市，正忙于用船把难民运往农村，在那里，每天用一个半美分就可以让他们吃到饭。与此同时，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开设了难民营；他们教难民念书，努力为他们找工作。事实上，所有外国教会机构也都在这样做。过去的中华同乡会——临时居住在外省的同乡人的组织——在照顾来自他们家乡的难民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这些组织在前几天曾被看作是反动势力，因为他们在幕后操纵同乡人，危及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他们互相竞争，努力办好难民营，以争取评上优秀难民营的光荣称号。难民营不仅提供食物，而且开设了理发店、医务室、阅览

室和娱乐场所。各种各样的机构组织难民利用空闲时间做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比如建造防空洞，做担架，等等。

上述这些仅仅是一九三八年头几个月在中国内地正在进行着的巨大的组织工作的一些实例。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是文化上的大提高。过去，一半以上的高等院校都设在北平、天津和上海地区；由于这些院校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或被迫关闭，教育就迁入内地。许多遭到破坏的院校联合起来，在西安和长沙办起了两所“联合大学”。其他一些院校整个地迁走了；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搬到新都重庆。遥远地区的人民欢天喜地地迎接著名的北平教授。在中国四千年历史中，内地的儿女们从未享有过现在这样的受教育的机会。由于战争的需要以及跟内地实际情况的结合，教育本身也开始变得更为实际。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学习架设浮桥，建造防弹掩体和混凝土碉堡。社会科学的学生学习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

中国依靠她辽阔的领土资源和自觉为保卫家园而斗争的人民的人力资源，来对付日本现代化武器的优势。政府开始对内地人民规定工作方针，把他们鼓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去赢得胜利。这样鼓动起来，组织和武装起来的人民不仅将在战争中表现自己的意志，并将在以后的和平时期，在重建国家和行政管理体制中表现自己的意志。要认识新中国，不仅要看汉口。一月初，我获得机会乘坐阎锡山将军的专车前往山西，去见早已闻名的西北战士。

# 十一、西北的战士

傍晚，汉口火车站前的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前来乘火车的人们全部挡回，他宣布说，当天北上的火车已经开走了。我的译员神气十足地说：“我们是来乘阎老人家的专车的。”我们就这样走进了车站，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一长列火车停在那里，阎将军的私人车厢和餐车在中间，前后两节车厢里全是卫兵。靠近机车有一辆装甲车，上面架着两门轻型高射炮，因为我们将通过的地区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

火车的后尾是十多节货车车皮，里面乘着六百名学生。他们和我们一起北上，在阎将军领导下去开办一所新的大学。一节二等车厢里有数名教授，一路上在制订课程。我同幽默而精力充沛的李公朴教授在一个包厢里，他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曾被关押在苏州监狱。他的经历包括在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学习两年，在那里，他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时，这本书在中国是禁止的。他在归国途中绕道巴拿马和欧洲，以便在纽约和伦敦这

两个世界资本的堡垒里观察一番。回国后，他再三拒绝接受南京政府中的肥缺，而把时间都化在办几家自由主义的刊物上。这些刊物经常不断地遭到查禁。他被捕时正在管理一家中国最大的巡回图书馆，一所有五千名学生的夜校和一家进步的双周刊。八个月的监禁生活提高了他的声望。现在，他在开办新大学的问题上给阎将军当参谋。他计划过些时候越过日本人的战线去西北为农民游击队开课。

他说道：“这些青年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阎将军收到了来自最遥远省份的电报。我们已经收到二千五百份申请书。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贫穷。他们出身于有闲阶级，这个阶级喜欢安宁，爱学文化，喜欢过安逸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他们发狂似地争先恐后要上前线。他们跟普通士兵一样坐货车。他们知道山西气候寒冷，他们去的地方很穷，吃的很差。他们知道，铁路线可能被切断，他们也许多年回不了家。可是他们对这一切都不怕，他们只是担心错过报名的机会。

“有的人有些犹豫，但并不是因为怕吃苦。他们所以犹豫，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将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难道能怪他们吗？不能，因为连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高兴地放声大笑，“现在我知道了一点儿，因为我已经同阎进行过初步的讨论，他接受了我方案的第一部分。我们必须唤起民众，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他们，武装他们；我们必须改组军队，向政府注入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民族革命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为此，我们需要领导人，因而，政府向第二战区军事指挥部领导的“国民革命大学”提供经费……在美国，人们不喜欢革命——他们喜欢进化。”他笑了笑，“然而，在过去的中国，我们不是在为民族革命，甚至也不是在为民族进化而进行教育。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培养新的领导人，到军队

中去从事政治工作，或者去替换政府中的下级官员；这些下级官员中有许多人不是笨蛋就是贪官。阎已经从我以前的学生中任命了十七名县级官员。”

这些学生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山西的重要战略地位；这片高原控制着周围各省。他们知道这里靠近前线，靠近著名的八路军。守住这些山区比耗费很多人力去防守上海更为重要，因为这里是煤铁基地。学生们都渴望着立即参加运动战，但我们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先学习三个月，然后学校和军事指挥部会决定他们继续学习下去还是到前线去实践。他们的实践活动一直是在他们的教授们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必须拥有四五位在中国最有名的教授，那样，我们的学校就颇为可观了。”——二千五百名迫不及待的爱国青年，围着思想界著名的领导人，他们在学校里接受训练，以便离校后去组织人民——这就是他创立一所大学、实现山西农村革命化的想法。

我们缓慢地穿过河南，那是一片平坦的、呈土色的大地，四周郁郁葱葱，农民正在冬小麦地里锄草松土。然后，我们沿着黄河河套向西而去，只见群山高耸，山上悬崖峭壁千姿百态，象一座座雕塑。这里的人们居住在窑洞里；有的地方，窑洞俯瞰着精耕细作的家庭田园；有的地方，一排排崖洞住宅向山口延伸，最上面是一片平坦的田地。千百年以来人走出来的狭隘古道，沿着峻岭峭壁之间的峡谷，逶迤而下，通往地面。我们是在一个天色朦胧、风沙迷漫的黎明过黄河的。一群孤独的飞雁在阴沉的上空排成黑色的图案。底下，原始的渡船艰难地把我们渡过浑浊的河水。我们新的专列已经过伪装，车厢是在太原阎的装备优良的兵工厂里制造的，现在这座兵工厂已落入日本人之手。

我们愈朝北走，天气就愈冷。由于我事先知道中国的车厢和

住宅在冬天大多没有暖气设备，所以我早已准备好行装，穿了三件厚毛线内衣和毛衣，外面还穿了一件中国的丝棉旗袍。尽管如此，我在离开黄河的那天上午还是觉得冷；我把肥皂碟放在餐车的桌子上，里面的水不到一小时就结成了冰。可是中国人似乎对此已习以为常。阎的强健结实的卫兵整夜不盖毯子，依然睡得很香；他们东倒西歪，躺在车厢的过道里，别人几乎难以通过。他们穿着很厚的棉军装和羊皮外衣，不仅足以御寒，并且能够挡住一阵阵冲力不大的弹片。他们脚上穿着用绳纳底的棉鞋。

年老的阎锡山将军穿着一套不匀称的灰蓝色军装，望之俨然，一副独断独行的气派——他在山西当了二十七年事实上的独裁者。自从满洲失陷以来，在中国各省中，唯独他的政府还继续存在。这个政府倚仗大山、长城和黄河三重天然屏障，在中国军阀的常规部队的进攻面前巍然不动。日本的机械化部队虽沿着山西的铁路线长驱直入，但还未把山区征服。山西农民在八路军的支援下，依然据守着这些山区。

不过，日本人把“老人家”从他的省会里赶了出去；他目前同秘书们一起住在晋南防弹峭壁下的一个较好的窑洞里。他在接见我时，一开头就表示对他管辖下的大片领土的丢失感到羞愧。他应该感到羞愧，因为他的晋军在敌人进攻时一触即溃。但是，甚至他们的逃跑，也说明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听起来似乎是荒谬的，但实际上确实如此。按照军阀的老传统，败军要被胜利的军队收编。而“老人家”和他的军队都没有被日军收编。多年来，日本人一直在引诱他去北平领导傀儡政府。尽管他不太胜任打一场现代战争，然而，他宁可体面地战败屈尊窑洞，也不愿住在北平的皇宫里蒙受耻辱，因为阎是一位保持着老传统的士大夫都督，他了解过去四千年的历史，也明白今后几个世纪的发展。他机敏地

提了一些关于苏联的问题，并长时间地论证他的通过废除货币进行社会改革的得意理论。他对此兴致勃勃，而对讨论战争中不愉快的细节却兴致索然。他那泰然自若的神态，从容不迫的谈话和手势使我难以忘却——建立国家，最后消灭国家，规划大区域，保护城镇和农村——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表面上一点也没有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情绪。

那时候，第二战区的指挥部设在临汾，这是晋南铁路线上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城市；现在，来自北方的士兵、官员和难民把这座城市挤得满满的。李教授和我被安排住在一家面粉厂的两间办公室里，每间房内有一只炉子，把室内的温度升高到五十度；这使我们享受到了在当时来说很不寻常的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主人是一位年老秃顶的面粉厂经理。他告诉我们，由于人们以前种的主要是棉花，因此附近村子里的小麦只够吃四个月。但在山区，一般村民倒屯积了充足的小麦，够吃二三年。可是由于当地的交通工具正作为运兵之用，迄今运到临汾的小麦很少。市里的商人已经把他们大量的棉织品和羊皮都贮藏在离这儿有一段距离的山窑里。万一日本最后占领铁路线，<sup>①</sup>迁往山区的人们就能够得到供应。

我们的主人描绘的这幅图画，充分说明了整个山西的形势。日本人已经占领了该省北半部的铁路线，但是在面积上，他们只占据了全省一百零五个县中的十四个县左右。由于不断遭到中国游击队的袭击，他们甚至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铁路线。而中国人却很容易在日本人占据的城市和火车站之间选择一些偏僻的地方，穿过铁路线，来往于全省各地。如果有中国游击队一站接着一站的专门护送，他们还能够穿过日本人声称已经征服、但实际上仍为中

---

<sup>①</sup> 日本人在数月后占领临汾。——作者注



国机动武装力量所控制的地区，一直走到北平，甚至可以到满洲去。我在日本人后方访问的几个星期里，一位名叫卡尔逊的美国军事观察员正在作这样的旅行。另一位名叫伯特伦的美国记者也是如此。这样的旅行，速度是慢的，因为不可能乘火车，也不可能利用一些公路。但中国人习惯于这种缓慢的旅行，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铁路。

阎将军领导的第二战区军队的组织情况表明中国正在走向团结。直到不久以前，各省的都督分别指挥自己的人马，从来不把自己的部队借给别人。可是第二战区在统一的指挥下由三个省组成——山西以及北部的察哈尔和绥远。其部队包括这三个省的军队以及其他一些部队：战斗力强得多的中央军几个师及过去是红军、现在改编为八路军的全体官兵。一年前，阎将军曾经负责围剿这个地区的红军；现在他们都在协同作战。在临汾的北面，中央军和晋军居守着谷地，而八路军则在两侧的山区。再往北，在日本占领区的腹地、八路军的部队来往于五省的一些地区；他们把当地人民组织起来，在面积同新英格兰一样大的区域里进行抗战。

日本据点和这些周围地区之间的战争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侵略军开往农村讨伐，在村子里放火劫掠，把妇女掳掠到他们的营地。中国人进行反击，他们歼灭掉队的日本兵，破坏日本人占领的铁路。日本人占领城市后，人们纷纷迁居农村。连堂皇的中国官吏都撤离县城，到乡村中去设立巡回裁判所。中国武装部队时常收复城市，驱赶或处死日本人扶持起来的傀儡政府官员，让过去的官吏恢复原职。日本人承认，如果不是几个人一起，并且拿着武器，他们是不敢离开军事大本营的。在省会太原，日本人由于不敢出城买菜，吃不到蔬菜，中国特工人员就化装成农民，自由出入太原，用蔬菜换取他们需要的面粉。

在日占区的腹地山西北部，依然有一些连成一片的广阔地区在中国人的管辖之下。其中有一个地区，南北约三百英里，东西二百四十英里——有伊利诺斯州那么大，阎将军任命的一位副都督，曾在八路军的护送下，越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前往接任。他的这个国中之国，四周被敌人占据的铁路线所包围，可是它在五台山区却有它的首府，由中国武装部队守卫着。副都督汇报说，在这个被日军包围的地区，以中国政府名义征收到的税款比战前还多。五台山这个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地域广阔，高山峻岭易守难攻。从这里出发，随时可以去攻打平汉线上甚至在北平附近的日军。这充分证明日本人的战线实际上是多么单薄。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比它更能提高中国的士气。

阎将军说：“在我的战区里，所有部队都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当然，他们中间有着自然的分工；中央军和大部分省军进行阵地战，而八路军和一些新成立的省军则开展运动战。”阎下面的主要将领中，卫立煌是一切阵地战的司令，朱德是八路军游击战的司令。

卫所统率的部队，因为在忻口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守住阵地而闻名。这是敌人在向华北推进中第一次严重受阻。这次持续大半个多月的战斗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次战役和早些时候发生的平型关战役，在关键时刻阻止了敌人向华中进军，否则，对南京和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意味着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sup>①</sup>它对中国后来所有的战役有着同样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次战役中第一次发展了把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结合起来的战术。

大批日军向南进逼，蜂拥闯入晋北，兵临长城诸关隘。平型关有着特别的诱惑力，因为那里没有完好的防御工事。九月二十五

---

<sup>①</sup> 关于这次战役的战略意义，见第九章。——作者注

日晨，正当日军第一支纵队八千名士兵漫不经心地向这个关隘靠近时，大批手榴弹象冰雹似的从两边山上向他们飞去。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出现在抗日战争战场上时的壮观。日军被截成两股。他们紧挨着关隘北部的全部阵地都被占领。经过整整一天的战斗，一个师的日军有一半被歼灭，剩下的一半溃不成军。大批军需物资被缴获。可是，日军强行攻下了其他关隘，最后从背后进攻，也占领了这个关隘。但是，他们进攻的势头已遭破坏；并且，游击队后来在对日本交通线进行一系列进攻时继续采取了在这次战役中形成的战术，从而极大地延误了他们向山西的推进。

卫将军率领的中央军在忻口集结进入道路两侧的阵地，阵地工事差，仅在几座小山上有几道浅的壕沟。他们和所有的中国军队一样，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日本军队。日军在坦克、装甲车、大型野战炮和轰炸机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开过来。头五天，在忻口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表面上看起来，卫将军似乎要被迫放弃阵地。但是八路军部队在日本人后方钳制了他们的运输线，贺龙牵制了日军的西侧，刘伯承牵制了日军的东侧。他们在连续四十多次的遭遇战中，不断攻打日军的运输队，缴获或销毁了日军的物资和军火。

后来，许多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将军们跟我讲了许多轶事。贺龙描绘了他的部队参加过的三十余次战斗中的一次战斗情景。一百名中国军队来到山区的一条路上，看到二百辆满载着日本步兵的卡车，就向车队中间一段扔了手榴弹，几辆卡车燃烧起来。车队前面和后面的日本步兵跳下卡车，想冲过去，但是路太窄，影响了他们的速度。一辆坦克和一辆装甲车把中国军队的一个班围在中间，用步枪和机枪向他们扫射，坦克越来越逼近他们，班长看到已经无法撤退，就命令用手榴弹进攻，打退了坦克和装甲车。接着，

日军的骑兵猛冲上来，但也被手榴弹击退。这个班没有遭到任何伤亡，但进攻整个车队的一百名中国人中大约有二十人伤亡（一半战死，一半负伤）。贺说道：“我想让你有个深刻的印象，即日本的摩托化部队不是不可战胜的。”

忻口北部战斗最著名的辉煌成就，是刘将军的部队在一个晚上击毁了二十多架飞机。他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家，在一九二七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在红军中功绩卓著。他在长征中领导过著名的强渡大渡河战斗。“在忻口，”他对我说，“卫将军领导的中国军队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敌军飞机不断地进行轰炸，因此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飞机搞掉。我们通过当地农民一直掌握着机场的情况。我们在等待时机；最后我们获悉那里停着二十四架飞机。那天晚上，七六九团的二千名战士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曾在群众大会上表过决心，为了搞掉这些飞机，必要时，不惜献出生命。他们分成三组，两个组分头在机场的两边狙击日军反攻，第三个组用手榴弹直插机场。我方牺牲七十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勇的营长，另外有三十一人负伤。这次战斗对于巩固忻口阵地帮助极大，以致中国政府的空军司令专程拜访了我们的代表周恩来，向我们表示祝贺。

在日军后方进行的此类战斗使卫将军的部队和敌军大抵势均力敌。日本的野战炮因缺少炮弹不得不从前线撤走。装甲车和坦克因缺少汽油只好停止参加战斗。日本步兵的给养大为减少，以致那些幸存下来的飞机不得不用来空投粮食，而不能去扔炸弹。在这种援助下，卫将军的部队顶住了敌人的进攻近一个月之久。如果不是其他日本军队放弃直接向汉口南进，掉过头来援救他们在忻口的部队，卫将军的部队也许能把他们赶出山西。卫将军告诉我，日军在忻口损失一万六千人，其中包括许多指挥官——这是到那

时为止，他们在中国的所有战役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朱德后来对我说：“从这个省的战果来看，日本人是无法占领中国的。如果他们所有的部队都象板垣部队那样在忻口遭到惨重损失，那么，他们还没有赢得最后胜利，兵力就早已耗尽了。”游击战和阵地战之间的紧密配合——这在忻口出色地实现了——成了中国其他战线学习的楷模，并终于使中国军队在后来的山东台儿庄战役中取得辉煌的胜利。

## 十二、同八路军在一起

在山西北部某地，在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几个村子里，我找到了八路军。我们坐着一辆由旧的福特牌运货车改装成的汽车，在狂风卷起的漫天尘埃中，沿着坎坷不平的道路缓缓前进。由于这个冬天还没有下过雪，风沙始终没有减少。我们来到一座用树枝和稻草搭成的桥梁前，桥下是湍急的河水，桥柱给冲得直摇晃。我们的汽车作了一次过桥的尝试，农民们在旁边提心吊胆地看着，不断地大声发出警告。我们最后还是驶了过去。接着，汽车冲上多石的山坡，把车下的大石头压得嘎嘎直响。我们穿过几条极窄的山谷，黄土的山壁居然擦着了汽车的车顶。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风雨剥蚀的、用泥土建成的村子。在我们看来，它和别的村子毫无两样，但是我们的司机却用一连串的喇叭声同它打起了招呼。

身穿蓝色衣服的男人、妇女和孩子，莽莽撞撞地从土屋中向我们跑来。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满身尘土，穿着灰蓝色的衣服，很象一个朴实的农民。他俯身隔着司机同

我握手，一边用不标准的德语同我打着招呼。朱德！赤色的美德！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们说他能从四面八方遥望百里；他轻轻一摇扇子，敌人立即东逃西窜；他能搅起狂风；他死而复生！是的，是他，这个和蔼、朴素、看上去象农民一样的人。他一点也没有架子，和农民们一起在漫天灰尘中跑出来迎接一个刚刚抵达的外国朋友。

八路军所有的将军都在那里。我真走运。我抵达时这里正在举行一次军事会议，师长们都从山西北部各地赶来了。粗壮的贺龙，看上去更象一个身体结实，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神情的游击队将军。他身穿灰布棉衣，袖子上用别针别着一块旧臂章，写着“一二〇师”几个字。他是步行四天，再坐了两天卡车赶来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具有学者风度，戴着一副眼镜，举止彬彬有礼，他走的路程更远，他指挥的那个师正在联结太原和(北)平—汉(口)线的铁路以南一带活动，这一地区在东面，距离这里有十天的路程。林彪是其中一名最年轻的将军，他的外表看上去象一名怕羞的学生。他驻守着山西东北部五台山的一大片地区，距离这里有二星期的路程。这个地区斗争最艰苦，四周被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包围着。(我访问以后，林彪负了伤。)

同其他中国将军一样，八路军指挥员的军事生涯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德在世界大战期间是云南的一名军官。后来留学德国。他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那次远征建立了中国现在的政府。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夺取汕头的战斗以及组建红军的工作。现任八路军副军长的彭德怀，在十年前的北伐战争中是一名团长。那时候贺龙统率着两万来人。刘伯承在一九二七年参加国民党军队时已经是一个素负盛名的四川将军；那时候，林彪刚从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时率领一个连队。从那以后，他们都已

在红军中有了十年的经历。

十年前，他们每个人都在政府军中身居要职，但是他们放弃了这些职位，变成进行非法活动的人、起义的领导和被压迫农民的战士。他们中的任何人，在过去十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背叛他的信仰而重新获得高官厚禄；然而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全都过着艰苦的生活，每个人都受到悬赏通缉，但却依然幸存。他们现在仍然过着艰苦的生活，并在政府军队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同日本人作战。

“在这个战场上，你们是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作战呢，还是作为政府的盟友战斗的？”我问朱德。

他回答说：“我们是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一支正规的政府军队，作为第二战区的一部分，我们的顶头上司是阎锡山司令长官。我们通过他的指挥部同本省的其它部队——中央军和地方军——发生工作关系。我们既能进行阵地战，也能进行运动战。目前我们是在日本人的后方用轻型武器作战，因此，在这个战场上我们采用了运动战的战术。我们相信，拯救中国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华北开展运动战的部队身上——不仅包括我们自己的部队，也包括在我们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农民志愿军。正是这些部队阻止了日本，使之不能巩固其战果，无法把华北变成进攻中国南部的经济和军事基地。”

我在八路军司令部住了十天，同他们一起吃饭，并经常同士兵和指挥员谈话。他们给我在当地一个村民家中找了个房间。这间房间不象临汾的面粉作坊那样华而不实。我睡觉的炕占去了它四分之三的面积，剩下的地方，摆了一只金属火盆，盆里放着冒烟的木炭，室内温度达到华氏四十度左右。上午九、十点钟开饭，这里没有阎将军款待时那些丰盛的正餐，也没有热酒。在一间三面是



墙，一面直通严寒的露天的小屋子里，地上放着一只五加仑的大煤油桶，里面装着大米饭，这种桶既可以用来作炊具，也可以用来装饭。不远处，摆着两只并在一起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碗蔬菜或萝卜，此外还有一大壶淡而无味的茶。我们吃饭时很随便，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摆得东一只西一只的小板凳上。下午三四点钟，开第二顿饭，这次大米饭换成麦面馒头。参加军事会议的五位将军每天吃的就是这样两顿简单的饭菜。

那几顿早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结实、威武的贺龙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嘴上露着若无其事的笑容；有学者风度的、戴着眼镜的刘将军弯着腰从大煤油桶里添饭；和蔼可亲的朱德，嘴上露着斯文、好客的微笑，耷拉着肩膀，从从容容地坐在那儿，双脚搁在桌子下的横档上，为的是使脚能不碰到冰冷的石头地。就在这里，我上了一堂游击战术课，听到了闻名的英雄事迹，并了解到使一支军队始终和它为之战斗的人民保持亲密关系的方法。也就是在这里，我渐渐地认识到并喜欢上这支军队的特点——中国军队中罕见的，也是世界任何地方所罕见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这支军队获得了力量和声望。

我首先要讲的是，这支军队的领导人的朴素和直率，以及他们对“架子”的漠不关心。别的中国将军，有谁会这样不拘礼节地跑来迎接我的汽车，或者用这样的粗茶淡饭来招待我？其次，我要谈谈真诚和廉洁。有一个事实很说明问题：为了扩大他们的队伍，指挥员和士兵都削减了他们的薪金和口粮。在我访问期间，政府送来了四万五千人的给养和薪金，但是，他们通过与新入伍的士兵共同分享这些给养，使当时部队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象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

可笑的零头。

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十天中，我还注意到了他们间深厚的同志情谊。他们之间不存在内部倾轧，没有吵架，也没有粗暴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从事情的消极方面来说。我还记得战士们在谈到他们的指挥官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喜悦神色。我注意到他们用担架抬上他们的伤员，进行长途跋涉的情景。哪一支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的士兵？对八路军来说，每个普通士兵都是宝贵的；不仅他的生命，而且他的主动精神都是宝贵的。这些领导人的特点中，给我那个从汉口来的译员——他具有同中国将军的相处的广泛经验——印象最深的是，完全不存在官僚主义，上下级之间的友情，以及从等级最低的士兵到最高级的指挥员所发挥的主动精神。

我的译员说：“过去我从未见过把下属训练成和他们一样出色的军人的将军。通常将领不在的时候，他的下属就会一筹莫展。但是看看朱德——你看不到他在下命令，几乎看不出他是在指挥一个军。他总有时间同农民、外国记者和普通士兵谈话；他有大量时间，他看上去一点也不“专横”。他们隔了一些时候，总要开一个会议，散会后，各人都主动去做全体决定了的事情”。在运动战中，发挥主动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部队必须化成小组分散活动，而同时又要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协调行动。

朱德谦虚地对我说：“游击战并不是个新事物，美国抗英的独立战争曾广泛运用过它；法国革命时期，人民曾用它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俄国人民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抵御外来干涉的战争中也曾经开展过极其广泛的游击战。这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国家和人民，用来对付拥有优势军事装备的敌人的一种战术。我在德国学到的东西使我相信，德国的模式对中国来说，过分复杂，过分机

械；不能灵活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因此我更多地研究了运动战的方法。我从中国的古典作品中，尤其是一千多年以前写的古代小说《三国志》中找到了我的最好的教科书。”

经常以前线指挥员的身份参加战斗的彭德怀接着说：“游击战在军事上的运用是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切断交通线，吃掉他们的掉队人员。尽管八路军主要以游击战方式进行战斗，但它并不完全是一支游击武装。平型关战役那样规模的战斗当然不能被称为是游击战。由于我们的军事装备非常少，所以我们就利用熟悉的地形以及和人民密切的联系这些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胜过日本人。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获得农村广大人民的信任，其次是我们每个普通士兵的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高度的觉悟。由于我们没有飞机，没有野战炮，没有摩托化部队，我们只有手榴弹、步枪、几门迫击炮和几挺机关枪，所以我们在制订战术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这类武器。同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制订她的战术时，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她所拥有的一切。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这场战争从总体上来说必须是持久战。但是具体的战斗应该是速决战。持久战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因为日本是在我们的领土上作战，四面楚歌，因而士气低落，运输困难。对我们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因为敌人入侵这一事实，唤起人民起来进行自卫。‘人民反抗压迫的自卫行动’——这就是用来概括总结游击战的一句话。这种战斗的政治方面比军事方面更加重要。因此我们派了政治干部而不是军事干部去组织人民。他们激励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人，阻止他们组织傀儡政府、征收税赋和抢夺财产，并且抵制日货。这种不合作态度的目的在于不让日本人建立一个立足点。

“速战速决地解决每一次战斗，好处在于，敌人无法利用其优良装备的有利条件。我们闪电般地迅速发起攻击，并同样迅速地撤离，因此敌人几乎没有准备，他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我们进行每一次战斗都必须有胜利的把握，因为我们没有可以依靠的后备部队，因此除非我们知道怎样摆脱敌人，否则就会被全部消灭。所以，只有当敌人处于不利地位时，我们才同他们交战；我们既进攻小股敌人，也进攻敌人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或者部署得很糟的大部队。我们经常主动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进行这种类型的战斗，我们只需要很少的弹药，而敌人需要的弹药则很多。但是游击武装不可能取得任何战争的最后胜利，它们的作用是提高人民的士气，并通过在一场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来帮助正规军。”

八路军采用这种战术，已经在四个省的部分地区连续战斗了五个月。在此期间，他们进行了五次大的战斗和数百次小规模战斗。在我访问期间，没有一天无线电台不收到他们广阔的作战区各地发来的有关这些小规模战斗的战报。下面是几个典型的战役：

一月八日，日军卡车百辆从A地南下，遭我W分队伏击，打死打伤敌军多名，击毁卡车十六辆，烧毁十五辆，俘虏敌军三名，缴获步枪五支，弹药若干。

同日，林彪部队的一支分队再次炸毁C地附近的铁路桥，并烧毁堆放在附近的全部修建材料。

同日，林彪部队另一个小组占领日本控制的煤矿，击溃卫兵数十名，缴获无线电发报机一台。

一月十日，日军卡车九十辆于娘子关南遭我伏击，击毁十七辆，烧毁八辆，缴获无线电发报机一台，步枪五支，打死敌中队长一名，军曹一名，士兵四十人。

同日，贺龙部队与日军二百人遭遇，打死打伤敌人三十余名，我方伤亡十人。

一月十一日，日军六百名企图在井陘附近发动进攻，为我侦悉，设伏于敌必经之途的悬崖上，用手榴弹杀死杀伤敌人七十人，我方伤亡十人。

这是我访问期间收到的，三天的小规模战斗的战役。这只是一些小小的接触，谈不上是正规战斗。但是，五个月以来，这种小接触一直没有停止过，八路军用这种方法使日本人无法利用他们在山西的胜利，他们拆毁了六十五英里铁轨，使日军无法使用太原以北的铁路。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约三十座县城，并恢复了地方政府。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他们缴获了三千多支步枪，二百多挺轻机枪，一千多匹战马，数以千计的军服和大衣以及大批弹药，并击毁一千余辆运输卡车，八十辆装甲车和三十辆坦克。他们是经常使敌人遭受比自己更大伤亡的唯一的中国军队。

由于我住在司令部，所以能够看到他们每天的训练课程，这些课程培养了士兵的主动精神和战斗力，使他们能够取得上述的成果。军事训练只是训练课程的一个部分，此外还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与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大部分新入伍的士兵都是文盲。但是入伍后立即有人教他们读书和写字。每天的作息时间为：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出操，九点半吃早饭，十点政治训练，十二点军事训练，下午两点文化教育，四点半吃晚饭，接着是游戏、集会和唱歌，直至九或十点睡觉。每项教育进行两个小时，往往第一小时上课，第二小时讨论，学习或休息。睡觉的时间相当长，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口粮的严重不足。饭是小米饭或馒头加一些蔬菜，但是一天只有两顿。

隔过几座小山，在距离朱德的司令部所在的村子约一英里远

的地方，有一个类似的村子，驻着八路军的政治部，所有教育工作以及军队同当地人民的联系全部由它组织。下设五个处：组织、教育、民运、敌工和锄奸。组织处帮助挑选适于担任军队中中下级的军官，以及适于在农民中做政治工作的人员。每个连队有一名政治指导员，负责连队的教育，并随时注意通过训练选拔具有培养前途的士兵。军事指挥员由上一级指挥员任命，但须征求政治部门的意见。

教育处不仅负责培训干部和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教育，而且还组织俱乐部和各种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教育活动。甚至在行军途中，或者战斗以前，仍在进行某种方式的教育性训练。这个处的处长说：“如果我们只行军十英里或十五英里，我们仍然能够上一堂短课，如果我们行军二十英里或三十英里，当天我们就不上课，但是各连的政治指导员，利用休息和吃午饭时间带领大家唱歌和讨论时事。在战斗以前，指挥员和政治指导员先召集干部开会，介绍这次战斗的目的和意义；然后军事干部和基层政工人员就在士兵会议上把情况向大家说清楚。在平型关进行的那次伟大战斗的计划，是林彪在战斗前一天告诉全体士兵的。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里，士兵都是不知道他们要往何处去以及为什么要去。在我们的军队里，为了在军事上保密，有些细节也是密而不宣的，然而每个士兵都知道未来战斗的意义和大体的行动计划，并必须准备在情况紧急时主动采取行动”。

对士兵进行的许多宣传鼓动，都归纳成几条便于记忆的简单明了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十大纲领”。自从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后，它们的内容已经有了变化。三大纪律的第一条——行动听指挥——保留了下来，但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成了“不拿中国人民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成了

“执行抗日十大纲领”。“八项注意”包括了一些如何正确对待老百姓的、简单而朴素的规定，例如“离开以前要打扫干净……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公平(过去的军队，习惯于拿东西不付钱或付半价)……说话和气……不搜俘虏的腰包……不随地大小便”。为了保障军队的安全，甚至对伤员和垂危人员的行动也作了安排。在短短几分钟的战前动员中，政治指导员告诉大家，“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唉声叹气”。

一天晚上，将军们正在举行一次军事会议，我把三个普通士兵——年轻的警卫员——叫到一起。他们有个额外的工作，就是给我送柴火和热水。我挨个问他们，什么时候为什么参军。其中一个江西人，穷苦佃农的儿子，一九三一年十七岁时就参加了红军，他说：“为了爱国；而且我父母也同意我参军。”第二个是船工的儿子，也是十七岁在江西参军的，“因为我想把中国人民从日本人手中解救出来”。第三个不到三十岁，当过木匠，南方人，参军时家里留下了妻子和儿子。他说：“他们有时给我写信。我父亲是石匠，他会照料他们。我的岗位在这儿。等到我们战争胜利了，我们就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那时候有的是回家团聚的机会；倘若我们打败了，我们谁也没有回家的机会”。

这个年龄大一些的年轻人十分明确地向我解释说：“日本的计划早在他并吞台湾和朝鲜时就开始了。他们一占领满洲，我就知道他们下一步棋想占领中国，然后进攻苏联。因此我们不得不决定，中国是要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呢，还是遭受日本奴役。我决心在救国事业中贡献我的一份力量。那时我还不识字，我是从学生们在国耻日发表的演讲中知道了这一切。自那以后，我在红军部队里学会了识字”。他告诉我，中国的形势光明多了，“过去，大家都以为日本是不可战胜的，现在，经过几个月的抗战，整个中国军队

的情况改善了，对自己取得胜利的能力也有了信心。人民开始以各种方式来帮助政府同日本作战。”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质朴的船工的儿子。我也曾问他：“现在情况好些了吗？”

“是的”，他回答。整个脸庞容光焕发，好象在他的身体内部点上了一盏灯。

“为什么好些了？”我进一步问。我的翻译——一名从汉口来的新闻记者——开始向我解释说，当一名政府军的士兵，每月可以领两个美元，这当然比当一名半饥不饱的“共匪”要好些。我坚持要他把我提的问题翻译给这个孩子听。

“现在好些了，”船工的儿子回答说，脸上依然闪耀着红光，“因为那时候，政府是反对我们的，而现在，我们全在一起了，中国统一了”。



## 十三、军队和人民

距离朱德的司令部所在的村子约两三英里远的地方，另外有一个村子，驻着林彪的一个连队在休整和补充兵员。这个连队经过几场恶战，一百名士兵中，在平型关损失了三十人，在广阳损失了二十人。现在这些损失已由一百二十名新兵所补足。他们全是山西的青年农民，目前正在接受训练。其中有一个青年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他是在几个月前，部队开赴前线途中参军的。现在他正在向家里人讲述他参加过的许多次战斗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他很高兴见到他的父亲，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有几个邻居自愿同他一起到前线去。

我挨门逐户地走，战士们分组住在里面，每间房要住六个人或十二个人。室内十分整洁，墙上挂着水壶，步枪架成一个个尖塔形整齐地排列着，叠好的被子端端正正地放在炕上。因为许多士兵没有被子，所以村民们就借给他们六十条，等将来他们供应好转时再归还。在一座高大的屋子里，有两间房间被用来作“抗日俱乐部”，里面摆满

了粗制的长凳，其中有些仅仅是两头撑起来的一段段木头而已。屋子里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纸，墙上贴着标语，气氛很活跃。有一条标语写着：“为中国的自由而战”。墙上还有一些图片，说明怎样保养步枪，怎样进行埋伏等。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标出中国哪些地区已经沦陷，什么时候沦陷的。在一个小小的讲台的上方，挂着孙中山、蒋介石和列宁的画像。陪同我参观的那位政治指导员正在考虑，是否要把列宁的像拿走，因为这不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俱乐部；或者，让它保留着，以显示对统一战线的尊重。

俱乐部的一端有个小小的“博物馆”，收集了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各种战利品，包括旗帜、笔记本和明信片，甚至还有一张古老的俄国沙皇时代的一百卢布钞票。许多士兵穿着缴来的日本军装。士兵们东一群西一群地聚集在俱乐部外面的一个大院子里，有的坐在长凳上、在阳光下看书，有的在用枪练习瞄准，另一些人在玩一种简单的球类游戏。有两名士兵用一排砖作网打乒乓球。另外两名在下棋，一个老农，满口无牙，正站着观棋，露出和祥的笑脸。很明显，这些青年士兵已使他们自己成了农村生活的一个受人欢迎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代表战争，也代表了新的游戏，新的教育以及同外部世界的新的接触。

村里的农民微笑着告诉我，这是一支好军队，他们希望它能留在这里。军队在村里举行了一次新年聚会，邀请每家推一名代表去吃晚饭。村长也回请了连队军官们吃饭。士兵们与当地的“自卫组织”亲如兄弟，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并向他们提供有关战争的情况。当我问一群士兵，日本人打得怎样时，他们都咧开嘴愉快地笑了。“他们有精良的武器，有大炮和飞机，步兵虽然训练有素，但也不见得怎么好。”“我们中国人在进攻时更加坚强有力”。他们还

告诉我，这些山西的新兵刚参军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识字，但现在已有五分之二的人能看报了，而且他们全都在学习。他们是在几个月的战争中学会的。

我走进一座房屋，它的拱形的砖瓦顶以及宽敞的房间清楚地表明，它的主人相当富裕。有些房间里住着军队，其余的仍由这一家子居住。房内摆满了漂亮的、擦得亮光光的衣箱——红漆的底子，配着黄铜的装饰，或者用油漆画着古怪的图案。整洁的炕席，一叠叠暖和的棉被，以及用窗纸糊的窗户上镶的四小块玻璃，都显示出这一家的富有。当我们走进内室时，一个妇女正在一只铜盆里洗孩子的衣服，另外两个妇女和几个婴儿正舒舒服服地在炕上休息。这一家的家长告诉我：“一九三六年红军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一点没有动我的东西，但他们从比我们富裕的邻居那里拿走了食物和钱。那时候，穷人热爱他们。可是现在，人人都热爱他们，因为他们保护我们不受日本人的奴役。”所有的妇女也都连声说：“好，好。”一个小孩抚弄着任政委的手，并且笑了起来。

“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间，就象鱼儿在海里一样”，八路军的领导人就是这样来说明他们在中国农村中的活动。军队同人民紧密相连，是人民的军队。此外，它还努力发动群众并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它所使用的方法已成了所有其他中国军队的楷模。八路军驻汉口代表周恩来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民众动员部”副部长。因此，用一定的笔墨来叙述一下这种方法是有益的。

我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任弼时政委进行过多次谈话，有一次他说：“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旧的力量无法打败日本，我们必须解放新的力量。首先，我们把日寇在占领区内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讲给人民群

众听，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发动起来。然后，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一面抗击日寇，一面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人民组织起来既是胜利的保证，又是战争结束后民主的保证。

“日本当然也有他们的那一套宣传方法。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我们是中国人，现在回到老家，是为了把你们从罪恶的政府手中，尤其是从八路军手中解救出来’。他们也利用汉奸散布失败主义，说什么‘我们太弱了，打不过日本’，或者派汉奸渗入各种宗教组织，叫嚷什么‘让我们逆来顺受，求菩萨救命吧！’。他们把海洛英和吗啡大量倾销到华北各地，使人民堕落；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通过冀东的傀儡政府进行这一勾当，因此，虽然阎省督在禁止抽鸦片方面曾经取得成功，但现在山西也受了这些烈性毒品的祸害。当村民们被战争搞得无家可归的时候，日本人就设法用食物和军火来收买他们，组成受日本人领导的游击队。我们的许多村庄常常是被穿着中国军队服装的日本人，或者是在日本人强迫下的满洲的中国人烧掉的。日本人就是企图利用这些方法在中国人之间制造分裂和散布失败主义。”

任接着说：“但是，只要有足够的组织者去向人民讲清形势，就可以很容易把人民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甚至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游击队也经常携带着新式装备来向我们投诚。日本人的暴行是我们最好的宣传材料，他们在崞县屠杀了两千多名中国老百姓，在宁武杀了一千多人；他们在乃文县（译音）把县政府的官员活活烧死，并杀了六百多人。他们把平型关附近七个村子的人杀得一个不剩，说他们都是苏联人的奸细。在整个山西北部，他们把占领区内的房子几乎烧掉了一半。他们随便朝镇上开枪，不仅在战斗时如此疯狂，即使占领以后也是如此，甚至杀害两岁的孩子。”

“强奸和强迫卖淫十分普遍。他们把许多中国妇女从这一地区

弄走，供日本士兵糟蹋。仅朔县一地，他们就弄走了三千多名妇女，送往他们的兵营。对于那些试图保护本村妇女的当地村民，他们的做法尤其残忍。例如，有三个日本兵闯到岚城附近的一个大村子，强奸了一个农民的妻子、妹妹和弟媳，这个农民叫醒了邻居们，把这三个士兵杀了。为了报复，日本人派出一支大部队，把村里的人全部杀光，并把整个村子烧光。他们用一个钩子穿过那个杀了三名士兵的农民的身体并挂在树上，活活地开了膛。此后不久，我军来到这一地区，在这个被烧毁的村庄的废墟上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从附近四周的村子里吸收了大批农民入伍，组成了一支几千人的抗日队伍。”

人民发动起来以后，被组成民众团体或战斗小组。这项工作由军队的政治部所属的“民运”处来完成。它同当地军政官员进行联系并根据情况组织农会、工会、学生会、教师组织、自卫团和农民战斗小组。它最终还将组织专门的妇女组织。但是山西的农村妇女一向是落后的——甚至缠足的陋俗改变得也很缓慢——至今她们只是参加在别的组织中活动。人民通过所有这些组织，反对汉奸，向军队提供紧急援助，并且设法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

向军队提供援助，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通过人民自卫团和农民战斗队。人民自卫团由身体健康，不拿武器的男子和妇女组成，他们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仍然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但是还另外开展一些活动。他们在道路上巡逻，盘查陌生人，当通讯员传送情报，帮助照料伤员，有时还用担架把他们转移到有两个星期路程那么远的地方去。当日本人接近他们村子的时候，他们就坚壁清野，很快地把妇女和小孩转移到山里去，并且把侵略者必经之地的道路和桥梁破坏掉。

农民战斗队由已获得武器的男人组成，虽然有的时候，几个人才有一支步枪。他们切断电话线，进攻火车站，并且袭击小股日军，从他们手中夺取武器。他们从当地人民极其有限的物力中得到一些支援，并希望有朝一日能被补充到正规部队中去。他们是八路军一支巨大的后备力量，八路军给他们派去了领导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人员方面的补充。贺龙曾对我说：“农民们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组织才能，有一个地方，事先我们根本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他们却自发地派出岗哨，检查陌生人。那些没有步枪的人则造出了非常有效的土武器。有个一百来人的农民战斗组，当初是为了在忻口战役中为部队提供援助而组织起来的，他们擅长于夜间奇袭日本兵营，夺取步枪和弹药，然后经常留下收条。有时候，他们在夺取一个兵营的弹药之后，在山里休整一段时期，然后再来进攻”。

任和朱德都相信，中国战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农民组织，因此，任，甚至朱德本人都代表这些组织向我求助。朱德说：“我们不是在为自己寻求援助。我们是政府的正规军，因此，我们没有权力，也不想接受外国的捐助。但是这些农民战斗队生活非常困难，饥寒交迫，有没有可能从美国那里为他们取得一些帮助？他们经常没有外衣或羊皮穿，虽然一件温暖的外衣还不值三个美元。当地村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支援他们，但是村民的生活也是极端贫困，他们的庄稼和房子经常受到破坏，至于医药用品和医生，则完全没有”。

组织人民的规模扩大了，生活水平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军队设法通过由当地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来减租、减税、减息。任说：“我们想办法不让这些要求提得过高，以致使有钱人破产。因为我们并不想加剧阶级矛盾，而是要减缓它，以利于团结一致，共

同对敌。有几次，一些自发的农民组织不仅打日本人，而且也同当地的地主展开斗争。这时，我们就要进行解释，只对汉奸地主才应该斗争；对其余的地主，应该加以说服，使他们明确自己在共同事业中的责任。我们团结所有的阶级。我们向有钱人解释，除非人民的负担得到减轻，否则他们就无法继续抗战；而倘若日本人胜利了，那么谁都别想过好日子。我们曾经在许多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县里帮助组织地方政府，如果原来的县长是爱国的，我们就恢复他的职务，否则，就从当地最有名望的人士中组织临时政府。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举行选举”。

我在中国听到了许多极其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充分说明了所有阶级是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侵略者的。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把从日军运输队里俘虏到的三十来个来自满洲的中国人，带到了一个村子的群众大会的会场上。当地的农民高呼着：“枪毙汉奸！”军队的政治指导员要这些吓得发抖的满洲人讲讲，他们是怎样会去给日本人做事的。他们说，自己是如何被困在“保护村”里，一个汉奸又如何骗他们说冬天要给他们一个好差使干，引诱他们来到日军运输队。在那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而且毫无报酬。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晚上用铁链子把他们的手腕同马腿锁在一起。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当作人质留在满洲，迫使他们老老实实地卖命。

会议结束时，当地一名代表对军代表说，“收下我的房屋、土地和钱财吧！让我和我的两个儿子参加你们的军队吧，因为你们打鬼子打得好。与其象这些人一样过奴隶般的生活，不如战死在沙场。”军队把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新兵收留了下来，但表示他们无权接受钱财和土地；他们建议那个地主用它们来帮助当地的自卫组织。会后，政治代表们同这些满洲俘虏进行了谈话，告诉他们现在已经

在自己的抗日同胞中间了，他们愿意出力吗？这些衣衫褴褛，两足疼痛的俘虏们哭着举起双手，恳求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干！告诉我们，该怎么干！”他们被组织起来，为伤员抬担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谈到过，她曾看见过他们抬着伤员沿着崎岖难行的小道前进的情景，并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献身精神作了高度评价。<sup>①</sup>

由于八路军和周围群众紧密相连，它的谍报工作——锄奸工作——无疑做得比任何其他的中国军队都好。任说：“农民替我们保守秘密是非常出色的。我们部队日前所在的村子里的每个人，都会在陌生人面前装得一无所知；相反，如果陌生人来了，他们马上就会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甚至连组织严密的日本间谍机关也认为，要打听到八路军的驻地非常困难。因此，当五名重要的将领集中在离前线这样近的一个村子里，举行了一次长达十天的会议，居然连一架日本飞机也没有来光临过，这确实是令人惊奇的。

甚至我在山西遇到的外国传教士也对八路军极为友好。他们说：“去年，人人害怕他们；今年，他们到处受人欢迎。”有一个传教士惋惜地告诉我，他最好的福音传道人和教士都放弃他们优厚薪金的职务，去过八路军的艰苦而又危险的生活。这支军队成功地激起一种全心全意的自我牺牲精神，而这是他一直所未能办到的。有一次，朱德带着一群士兵参加了一个天主教堂的礼拜仪式，后来在教区的房子里还谈到了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相似之处。他说，这两种人生观都希望它们的信奉者能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愿望，甚至生命，而不要求有任何酬报。他接着说：“你们天主教徒认为，有一个魔鬼在世界上到处作恶，每个人都必须跟它斗争。我们

---

<sup>①</sup> 《中国进行反击》。——作者注



也同意这种观点，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个魔鬼的名字告诉你们——它就是‘法西斯主义’”。

八路军相信，甚至个别日本人的信仰也是可以感化的。他们对于优待敌人的工作可以追溯到红军建军初期。任说道：“一年半以前，我们俘虏了一些张学良的军官，我们对他们以宾相待，甚至优于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款待使他们深为感动，后来他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日本人，则需要用新的方法，因为他们甚至连中国话都不懂，而且上级一直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被捕，他们会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处死。因此，他们为了避免被俘而拚死战斗；在平型关战役中，中国人最大的伤亡并不是在实际战斗中，而是在解除俘虏武装的时候造成的，因为他们无法向后者解释他们的宽大政策。这以后，政治部门就训练每个连队的士兵用日语高喊：“缴枪不杀！”从此以后，抓俘虏就比较容易了。他们不仅受到良好的对待，而且根据他们的习惯，让他们吃得比中国士兵好。经过一个阶段的教育之后，他们常被送回日军阵线那边去。人们认为，即使他们重新参加战斗，他们曾受到良好待遇的经历，也将削弱敌人的顽固性。如果他们由于曾同八路军呆在一起，而被日本军官处死，正象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也会损伤日本人的士气。

任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每个月用在传单上的钱就得几千元。在散发给日本人的传单上写着：‘日本的工人和农民都不会从你们的侵华战争中得到好处。他们只会变得更加贫困，而你们的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则从战争中捞了一把……他们告诉你们，这次战争是为了在东亚制造和平，但是，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东京做了你们正在这里干的事，在东京会有和平吗’”？

在一个一端直通室外严寒的拱形过道里，凭借着一支蜡烛的

光线,我对两名日本俘虏进行了采访。他们都穿着中国军服,但是从他们进来时多次弯腰鞠躬这个习惯上,一下子就可以认出是日本人。敌军工作处的一名朝鲜人,先把他们的话译成汉语,随后,我的译员再把它译成英语。烛光照在砍劈而成的屋梁上闪烁不定,多年来,烟把屋梁都熏黑了。我们坐在两只满是灰尘的小桌旁边,一会儿向后退,让桌子底下烧着的炭炉冒出的烟散掉,一会儿向前移动,在炉子上暖一暖脚,或用茶杯暖一暖手。室内光线半暗不明,寒气袭人。室外,天空中缀满了星光,在中国式的呈曲线的屋顶上闪烁,俘虏们用发颤的声音谈起了他们在日本军队中的生活,谈到了那个可怕的时刻,从那时以后,他们就得了再生,不再是一台台机器,而是一个个会思索、具有人性的人。

他们说,大多数日本士兵都不想到中国来。也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他们来,无非是什么“日本人让人给杀了”以及“这是对天皇的义务”。他们日复一日地处于对未来极为无知的境地。“上级只对我们说,准备明天早上八点钟出发;接着,要我们跟着前面的人走”。他们受过严格的战斗训练,除此以外,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强有力的日本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

事情发生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一小股日军在山上两条小溪交叉口被分成三处,正在这时,山上突然飞来步枪子弹,真是“枪林弹雨”。一些士兵跳入路边的一条小沟,等待天黑下来。他们听到了中国军队的军号声。黄昏时,他们朝附近的一个村子匍匐前进,想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们中的一个人突然与三名中国士兵相遇,喉咙旁挨了一刺刀,后来乘天黑逃走,躲在一座谷仓里。他痛苦难熬,精疲力尽,以为无论如何要完蛋了,于是,他就用自己的刀割喉咙,想一死了事。

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上身赤裸，周围都是中国士兵，其中一名士兵正在包扎他的伤口。另外一名士兵给他看一张纸，上面写着，要将他送往医院。日语口语虽与汉语不同，但书写文字是借用汉字的。从那以后，他躺在担架上，一连几天被人抬着。“一路上，我都碰到了友好的士兵和军官，他们待我都很好，我比任何一名中国士兵都吃得好，穿得好。一名政治工作者每天都同我交谈，他向我解释了我从未听说的有关战争的事情，我看清了过去我是怎样象一个工具那样，毫无目的地在战斗。现在我认识到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抵抗我们的军队，我打算回去后把这一切告诉我国人民。我怀疑地问，这样做难道没有危险？他回答说，这样做当然有危险，但他要在精心计划和周密准备以后才走。

在人民中间进行组织工作，需要数千名政治上受过训练的领导人。八路军在临汾附近建有一所学校，有六百名学员，其中一百名是妇女。他们中有些人将从事于简单的群众组织工作，其余的将执行比较复杂些的游击战任务。但是，并不因此就要求学员们毕业后一定得为八路军工作。有许多人是从别的中国军队派来专门学习八路军战术的。中国许多地方的其他学校和大学，正开始训练类似的领导人。

蒋介石委员长曾经号召中国所有沦陷区的人民扩大类似的武装抵抗。“全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时刻到了，因为这是他们能够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唯一出路。让那些从日本人占领区逃跑出来的人们回到他们的老家去，在那里组织小分队，消灭敌人的占领军。作为军队的总司令，我将对这些小分队和正规军的部队一视同仁。”

离开山西以前，我在临汾参观了李教授办的大学的入学考试。学生们都住在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生宿舍里——那所中学的学生都被战争吓跑了。考试是在一个露天阅兵场举行的。场外附近的水

塘里还结着冰，但是学生们向我解释说，在太阳底下比在他们没有烤火设备的屋子里暖和。他们在压得坚实的泥土地上一长排一长排地坐着，相互间隔十英尺。每个人领一份考卷，上面有五十道题，要在两个小时内答完。“社会的定义……国家的定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族革命的定义……民族主义……社会革命……”对正在学习如何把遭受战争创伤的山西人民组织起来的学生们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必须了解的。

我站在阅兵场的冻土上，有正月天气的阳光照着，临汾古老的参差不齐的城墙，象有齿的齿轮一样，在远方朦胧的群山衬托下，更为显明。我遇到一位最近刚从北平来的哲学教授，他现在穿着一身用廉价灰布做的士兵服装。很久以前，他曾在德国留学四年，于是我们就用德语交谈起来。

“你在这里怎样运用你的哲学呢？”我挑战似地问，“这儿的工作是向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士兵读书写字。在这方面哲学有什么用？”

“战争与革命的哲学是存在的，”他回答。因此，我又说：“好吧，那么战争的哲学是什么呢？”

“有进步的战争和倒退的战争，”他告诉我，“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进步的战争。它将粉碎几千年以来的社会形态，因为这些社会形态经不起战争的冲击。它将解放新的力量。中国的解放也将有益于整个世界。”

## 十四、中国的戏剧投入战争

我在中国所看的最好的戏是在八路军司令部驻地附近的一个露天的乡村剧场里演出的。为了庆祝军事会议的结束和招待两位从汉口来的客人——李公朴教授和我——朱德召集附近驻军的士兵们开了这个会。这天晚上，军队指挥员和客人互相简短致词以后，就开始演戏。有两个剧团参加演出：一群在各个战场上巡回演出的上海演员和由著名女作家丁玲组织的、八路军自己的剧团。

下午五时，灰褐色村庄上空一轮暗淡无光的太阳开始落山。三个月的严寒天气并没有减弱这个村子的活力。空中一点儿风丝也没有，令人窒息的华北风沙已经平静下来。只有几百双脚在走向村庙时扬起一阵薄薄的尘雾，尘埃高高地升起，然后又徐徐地沉落下来，在落日的那一边形成一片阴霾。晚霞的余辉映射在庙宇庭院四周高高的成曲形的屋顶上，五光十色，闪闪发亮。庭院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七八百名前来开会的人。几个胆子大些的不拘礼节的人坐在屋顶上。唯一的座位就是戏台前

面的一条长凳，上面坐着朱德、八路军的将领们以及应邀前来的客人。

戏台占去了庙宇庭院的整整一边，它是一间形状象方盒的房子，面朝观众的一边已被拆除，只有部分地方重新被一块简陋的幕布遮着。舞台上没有出入口，演员们必须从观众前面走过，再爬上一个马马虎虎搭起来的七英尺高的梯子，才能到达舞台。所有演员都在节目开始时这样走上舞台，然后消失在黑洞洞的后台，躲在家具或侧幕后面，等待着要他们表演的信号，由于演出时在观众面前下场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所以在演出结束前，谁也没有退场。他们都在布景后面的黑糊糊的方盒里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文艺演出结束，然后他们一起走到前台，在观众鼓掌告别声中爬下舞台。

两个剧团就在这样原始的条件下表演了他们的节目，使观众们着迷了许多个小时。太阳落山后，冬天的繁星在乡村剧场上空闪闪发光，舞台上点起了煤油灯。在凛冽的正月的夜晚，身着蓝灰色军装的士兵站着，边看，边笑，边鼓掌，直至十点以后。这些戏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方面的事，都是士兵们所熟悉的生活的写照。

这两个剧团所演出的节目，在技巧方面说明了今天人们所喜爱的两类娱乐。丁玲的剧团演出的是“大鼓戏”，这是一种古老的、具有北平风格的曲艺，由大鼓和弦乐器伴奏。她的剧团就用这种在中国的茶馆里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演唱了“平型关战役”，该村在场的观众中有一半人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他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有关他们自己的胜利的故事。

上海的演员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他们都是学生业余演员，有几位专职演员担任领导。他们演出了几个反映发生上海周围真实战斗的独幕剧。其中最受欢迎的一出戏是“黄浦江两岸”，它把那些在晚上游泳出去将炸弹系在日本船上的码头苦力们的英雄主义

行为搬上了舞台。这出戏开始的场面是在上海的一个码头上，有一位年老的苦力，半裸着身子，冻得直打哆嗦，他为了暖身已经喝得半醉。三名便衣看见他在码头边徘徊就过来要抓他，于是他就借此机会出示证件并说明他的意图。一名年轻的苦力来了，他表情严肃，忧心忡忡。他最近才结婚，不愿在他刚刚成功地获得这么一位好姑娘就去死。大家都嘲笑他的犹豫不决。然后，这两个苦力跳入水中。远处传来了爆炸声，随后年老的苦力回来了，他说他的同伴被抓走了。机枪声迫使中国士兵和年老的苦力撤离现场。日本人带着那位年轻的苦力走上舞台，他们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严刑拷打，逼他出卖同志。他痛苦地呻吟着，但没有说出来。结局是令人高兴的：中国卫兵的增援部队回来了，把他救了出来。

这个战时戏剧的情节惊异地充满了喜剧场面。年老的苦力是个喜剧性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充满了现实生活中的滑稽动作，尤其是绑在他身上的炸药包更是令人发笑不已，当他那褴褛异常的衣衫在微风中徐徐飘动的时候，人们能够看到他贴肉藏着的炸药包。这两个苦力都没有以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的面貌出现。一个喜欢饮酒说笑，另一个则开始时不敢干，在日本人严刑拷打时又大声呻吟。但是两个人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而且都没有背叛。戏演得好极了，中国人似乎是天生的喜剧演员。上海的剧团清楚地给大家一个启示，告诉人们，即使象平凡的上海码头苦力那样的普通人，也具备英雄的本质，这对观众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上海的演出队还在访问期间临时创作了一个剧本。其过程显示了他们的许多剧本是怎样产生的。有一个批评家友好地指出，上海的生活对于山西的农民来说，太遥远了些，如果能够再编一个反映农村战斗的剧本，那就好了。于是他们就通宵赶排了一个新剧“保卫农村”，并且在第二天晚上向广大的农民观众演出了——用

的是山西方言！虽然在这次首场演出中，舞台提词显得多了些，但是比起反映上海情况的戏来，它还是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保卫农村”描写一个老年农民正同他的儿媳讨论着日本人即将到来的事。他们是留下来同侵略者和平相处呢，还是组织起来到山里去战斗？老人断言，日本人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杀掉，而且，他本人又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因此他们或许会对他表现出仁慈。他责怪他的儿子和一个邻居，他们正在山里组织一支农民战斗队；他说，农民对任何政权应该服从。他小心翼翼地把值钱的东西藏在院子里，准备等待暴风雨的来临。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一名当地的汉奸来到了他的家，把一个年轻的妇女拖进了卧室，最后由于无法制服她而开枪把她打死。日本军官冲出来，又朝老人开枪，因为老人在吃惊之余曾表示抗议。儿子带着农民战斗队回来了，打死了日本军官和汉奸。老人临死前对他儿子说，他原先指望日本人会表现出仁慈，但他错了。他说，唯一的出路是抵抗。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戏剧的情节。

中国的戏剧已经投入战争，战争不仅激励着中国的作家们去创作新的、英雄主义的题材，战争也破坏了原来的戏剧和文学方面的文化中心——上海，北平——并且迫使作家和剧作家们分散居住在中国各地。作家们和演员们的足迹遍布全中国。他们在内地各省避难；他们在战斗的前线寻找题材，艺术被迫回到了人民中间，内地省份的一种新的文化开始了。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化一直面向欧洲。一九一九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把中国青年的注意力引向欧洲和美国的作家们，并打破了中国古典著作的统治地位和影响。中国的男女学生来到沿海城市接受教育。出身于比较富裕人家的学生出洋留学欧美。他们成了商人、银行家、买办或翻译——外国的商品和外国的思想



通过他们这些途径进入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模仿着外国作家的作品。

战争破坏了二十年来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心和欧美文化进入中国的渠道，这就迫使中国人去寻求新的文化和途径。大学搬到了内地，在偏僻的农村地区的土棚屋里办起教育，并迅速盖起了新的宿舍和实验室。作家、戏剧家和演员们也都迁往内地。许多演员组成剧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他们中有的专业剧团，有的只是一些经过简单的训练、背诵一些爱国诗的学生宣传员。大多数剧团是由一些专业人员领导的业余剧团。其中有一些是学生在假期中进行演出的临时剧团。我遇到的武昌华中学院的二十七名学生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他们利用寒假去附近五个县巡回演出。其他的剧团在整个战争期间存在的时间相对地比较长。

例如，在汉口，我遇到过一个由十三名学生组成的剧团——其中有三名是女生——他们从上海到华中蜿蜒曲折地步行了近一千英里，沿途不断演出爱国的戏剧。他们组织起来的过程是十分典型的。他们叙述道：“我们集合了一群能够唱歌、演讲和画漫画的人，我们是自己主动地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从朋友那里募集资金，数月达到了三十块美金左右(金币)，用这些钱买了服装。接着我们向‘人民抗日协会’进行了登记，他们给了我们一张证明，上面说我们是在农村中进行宣传鼓动的学生，有了这张证明，当地人民就接待我们，向我们提供食物和住宿。有时候，一个爱国的地方官员管我们的吃住，有时候则是当地的一个组织，甚至干脆是观众来照料我们，我们演戏不要钱。”

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的所有演出队中，最使人感动的是一个由二十四名上海孩子组成的演出队，他们年龄最小的九岁，最大的十九岁。战争毁坏了他们的家园，把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赶进

了难民营。但是他们不愿呆在那里。他们中间有一个姓朱的十五岁的孩子在一面旗帜上写道：“我们不愿成为增加国家负担的难民，我们决心为抗日运动贡献力量。”他们在全国巡回演出时就带着这面旗帜。他们把自己称做“儿童剧团”。开始时，他们只能背诵几段课文和唱几首在学校里学过的歌。后来，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就免费给他们上课辅导。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后，这些孩子就出发前往汉口，他们的领导人只有十九岁，原先是一名小学教员。有一次，他们差一点闯到战场上去，但是中国士兵送他们上了另一条路。另一次，他们旅行时坐的船被军队征用了，于是他们就携带着舞台设备步行许多英里。他们一路上边走边演出，抵达汉口时，已经拥有九个能随时演出的战时剧目，其剧本都是由著名的剧作家为业余剧团创作的。剧名充分反映了内容，它们是：“最后的胜利”、“抓汉奸”、“放下你的鞭子”、“日本鬼子的小胡子”、“支援我们的游击队”、“十字路口”、“团结起来”、“北平之梦”。

这些战时节目演出时全都遵循着一定的程序：地方当局致开幕词，接着表演诗歌朗诵和独幕剧，随着打鼓声和拨弦声，报幕员经常这样开始：“给你们带来了来自前线各条战线的消息，它们来自山东和河北，来自山西的北部，来自我们伟大祖国最南面的广州。”巡回演出的演员常常教他们的观众唱最新的爱国歌曲。这些业余演出尽管很粗糙，但是他们向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们提供了传播他们作品的场所。

我在汉口遇到的编辑们都告诉我，中国文学的新潮流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家们致力于写一些满洲的游击战士和华北的战斗农民的个人传记。当目前的战争爆发、战火大规模地蔓延到全国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有名的作家用他们的笔来为抗战服务。文学作品变得简单而富有情节，目

的是为了唤醒民众。它并不花许多笔墨来描述日本国际性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是刻意具体地把侵略者描绘为强盗和杀人凶手，描写他们焚烧房屋，强奸妇女。它的主题与其说是“抵抗帝国主义”，不如说是“保家卫国”。它充满了中国士兵的英雄事迹和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

由于沿海地区的一些大报纸遭到破坏，迫使大批新闻记者失业，他们大量涌进汉口，造成了汉口新闻记者过剩。这些记者开始贴出“墙报”，这是一种手抄的报纸，张贴在引人注目的地方，其内容包括新闻摘要以及有关战争的特写报道。两三个撰稿人或新闻记者担任这种“墙报”的编辑设计工作，实际的誊写工作则委托给一位书法家去做——在中国，书法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他们以一种轻松的、甚至幽默的笔调，讨论“怎样帮助伤员”，“怎样发现汉奸”以及其它急待解决的问题。一群群人聚集在墙报周围，观看漫画和图片，而人群中受过教育的人则大声地把墙报念给大家听。

诗人、剧作家、甚至小说家也加入了争取中国独立的战事。在诗歌中，出现了一种叫做“朗诵诗”的新颖诗歌，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也不同于传统的浪漫诗，素以写浪漫诗闻名的穆木天，也着手写这种朗诵型的诗歌。一位不太有名的叫高兰的年轻诗人出版了整整一本题为“朗诵诗”的诗集，他写这些诗都是为了激起民心。诗人们开始亲自走向农村，把他们的诗歌朗诵给农村的群众听，有时还用音乐伴奏。

在戏剧方面，十分简单的独幕剧已成了一种流行的形式，它们适宜在寺庙的平台上，甚至在乡村的街道上演出，很少需要换布景。著名左翼作家田汉写了两个深受戏剧团体欢迎的短剧：“保卫芦沟桥”和“最后胜利”。有些剧本极为简单，因此附近农村的老师都能够带回去教他们的学生，然后在乡村学校里演出——其中有

许多情节还可以即兴创作。如“中国老人”一剧的情节，是描写一个老人四周围着一群穿蓝衣服的女儿，一个坏邻居闯了进来，张牙舞爪地发起了攻击，抓住一个女儿，并把她从舞台上拖走，她背上写着“满洲”二字露了出来。接着，他又来抢夺别的女儿——“热河”、“察哈尔”。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所有的女儿都夺走，这一家的儿子——贴着“中国军队”的标记——来保卫他的姊妹了。他制服了坏邻居，随即原先被抢去的女儿们从后台朝门里微笑，象征着她们即将归来。象这样简单的短剧很快就被别人照搬过去，甚至孩子们在游戏中也模仿这样的短剧。目前已经流行着许多不同的改编本。

许多作家已走上前线积极为唤醒民众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左翼作家领导人、女作家丁玲、著名小说家徐静和作家周立波。他们中大多数人由于活动太忙，而无法花很多时间来考虑写作的理论问题。我请丁玲给我谈谈中国文学最近发展的趋势，她回答说：“我对文学的发展趋势一无所知；我刚在前线呆了六个月。然而我对一个作家的责任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今天只有一个任务：为拯救国家出一份力量。我们不能因钻进文学理论堆里而迷失方向，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写作，以唤醒民众”。

接着，她迅速地解答了所有理论性问题，话题转到了她的“战地服务剧团”的工作上，“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已经向八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有许多是士兵——进行了演出。从艺术的观点来看，我们演的戏是落后的，但是农民们喜欢看我们的戏，因为我们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搬上了舞台。我们象普通士兵一样生活，我们吃的东西不足，我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自己的两只脚。我们演戏，向群众发表演说，在农村的墙上画漫画，并教农民们唱歌。我们在每个村子必须至少教会唱两支歌。”

“你也看到，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是当我们的观众看到我们来了，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甚至在这种充满着危险和死亡的环境下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也感到快乐。”

丁玲就是这样谈了中国的作家和演员的“文学倾向”，他们正在为唤醒自己的同胞去赢得这场战争而努力工作。两天以后，她和她的剧团又出发了，这一次是到山西前线的某个地方。

## 十五、中国的新女性

今天，进步的中国妇女以赞许的口吻谈论着徐州的一位妇女，她向警察局告发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多次向日本人传递了有关中国军队调防的情报；最后，日本人根据他的情报进行了空袭，炸毁了许多运军火的车皮。开始，他的妻子心平气和地试图劝阻他。当上述通敌行为终于发生后，她就大声呼喊：“汉奸，汉奸！”直到邻居们过来询问。

她丈夫被枪毙后，邻居们问她是否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她回答说：“不。我虽然失去了一个丈夫，却挽救了许多同胞，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

也许没有哪一位西方妇女会从那个悲惨的小故事中完全感觉到相互冲突的道德标准。千百年来，中国妇女一直在受到这样的教育：她们唯一的责任是忠于自己的家庭；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背叛家庭是十恶不赦的罪恶。徐州的那位妇女，为了她的国家而背叛了她的家庭；而意义更大的是，中国妇女界对她的行为表示了赞

许。可是，她仍然感觉到以改变了的形式出现的中国古老的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名正言顺地要求个人服从集体。西方的妇女也许会谈到个人的损失，或者谈到矛盾的心理。中国的妇女却只是想到她的责任；心安理得就是她行动的目的和正当的理由。

我在别的国家里还从未发现过比我在中国遇见过的性格更完美的妇女。端庄娴雅是她们的禀性。她们不为人所重视，历代相沿，她们认为她们自己只是整体中小小的一环。当她们在这份遗产(旧观念)中增添了一种现代社会的认识时，她们对其为之服务的事业的虔诚态度既无懈可击，又不是歇斯底里的。她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显示浪漫主义，但是充满了平凡的而又忠诚的期望与责任感，那是世世代代以来，她们用以建设家庭并料理家务的动力。

中国妇女活动的圈子比西方现代工业国家的妇女窄，但她从未象封建制度统治下的日本妇女那样完全受到压制。中国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妇女参与公众事务的例子。黄帝之妻嫫祖以发明养蚕方法而闻名。伏生女(羲娥)是一位伟大学者伏生的独养女，奉汉文帝之命，曾帮助其父对晁错讲授《尚书》。探险家和征服者班超的妹妹班昭是一位著名的女史学家。当然，这些都是个别杰出的例子，但它们至少表明，妇女受教育并不象在大多数亚洲国家里那样被认为是一种罪恶。女孩子未受教育主要是因为家境贫穷，或者是因为让传宗接代的儿子们受教育更为重要。富裕人家的女孩不仅学音乐和刺绣，有时也学诗歌和经典著作。现代较富裕阶级的家庭往往把他们的女儿送往外国教会学校读书，有的甚至送往国外学习。

在中国，妇女处于从属的地位，并不是由于对战争顶礼膜拜的封建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对妇女的歧视，这是个人的生活都必须服

从整个家庭的一部分。男子受到器重，因为继承家业，而女儿是暂时的，她们要嫁到夫家去，在那里，她们成了最新的、因而也是最不受尊重的成员。她们与其说要忠于一个男人，不如说要忠于整个家庭；她们要侍奉老人，扶养子女，还要关心亲属。儿子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她们主持家政的权力比日本妇女大。古时候，中国妇女甚至可以主动要求离婚——事实上总是男人首先提出——直到十二世纪，朱熹在印度教的影响下，对经典著作作了新的解释，要求妇女宁可悲惨地死去或饿死，也不能再嫁人。

跟其他国家一样，普通家庭的妇女走向生活更广阔领域的第一步是伴随着现代制造工业的产生而开始的。现代制造工业把妇女从家庭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却给她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屈从。一群来自上海纺织厂的二十岁左右的女工——她们稳重得难以置信，跟她们的年龄极不相称——向我叙述了一九二七年以前妇女长期遭受压迫的情景。她们象唱圣歌那样反反复复地说：“按照旧的风俗习惯，妇女是不允许外出的……她们的双脚缠得很小，否则她们就会找不到夫家……她们的婚姻是强迫的，因此婚后生活是痛苦的……当她们走入工厂，受尽工头的欺压；她们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回家还要做家务……今天，如果她们参加工会，她们的丈夫就常常压制她们，还加上夫家的姑叔……她们本身的无知和文盲也压抑着她们……在国民军教她们组织起来以前，妇女根本就没有自由。”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国民军北伐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在村民中——他们仍在为糊口而卖女，他们中的贞妇在丈夫死后仍然终生守节——出现了一批剪短发的大胆姑娘；她们身穿军装跟国民军一起行军，宣传男女平等。他们唤起全国人民，组织妇联，采用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的简单做法离婚。后来，当农会和工



会遭到镇压时，数以千计的妇女因为剪了短发而被认为是危险人物，惨遭杀害。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我重返中国，亲眼看到十年相别最明显的变化是，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现象增多了。十年以前，当我要找一位私人秘书兼译员时，他们给我找了一个男子，他的妻子则在很远的另外一个省里看家。现在已经有女秘书来担任这项工作。她们正在扩大到许多别的领域。有地位的妇女，同她们的丈夫一起，或者在妇女组织中开展爱国活动。妇女们跟十年前勇敢的短发姑娘一样也在军队中服务。但是她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吵吵嚷嚷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因而她们在那里更受人们的尊重。对她们来说，帮助赢得战争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她们期望在战争结束以后，妇女将跟全中国人民一起得到更加广泛的权利。

全世界都知道著名的宋氏姐妹，她们在中国的国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够与之比拟。世界上一般只知道是孙中山遗孀的宋庆龄，她是我所结识的中国女友中的第一位。她娇小的身材，穿着一身极其清洁的、按照中国式样裁剪的亚麻布服装。她是我所认识的最温柔、最高雅的人。然而，她具有钢铁一般的性格，坚定不移地献身于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中国十年不统一的局面当中，她始终坚决遵循孙中山最初的纲领——扶助工农和联合共产党人。尽管她象其他中国妇女一样，从小受到尊重家庭的教育，但是她也反抗家庭的重重压迫，坚持十多年之久。她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孜孜不倦地组织争取公民自由权和解救囚禁的中国爱国者的运动。全中国没有一位妇女象她那样受到群众的衷心爱戴，因为在她们受到压制的那些年月里，由于她的威望，她是唯一能为她们的事业奋斗而当局又无法压制的战士。

今天，她仍然主张这个纲领，而这个纲领已经成了政府的纲领。她虽然身材娇小，态度温柔，但性格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坚强。

她的妹妹宋美龄，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蒋介石夫人，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一位妇女。她身材同样娇小，但长得更漂亮，神态显得更老练。由于她丈夫专心致志于中国的事业，无暇学习外语，她就替他跟外国的外交官们打交道。蒋夫人对社会运动的兴趣同另外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有点相似。蒋夫人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她曾经一度负责中国的航空事业，但是，由于战争的扩大使她不可能既继续从事这个事业，又同时和她丈夫在一起，因此，她就予以放弃了。她正确地认识到她最重要的工作是协助她丈夫。她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效率完全是西方式的，她对有些中国人对她的过分突出表示不满，而有些外国人则误认为她是一家之主，甚至能支配她的丈夫。但这决不是事实。她只是用她的语言知识把世界情势解释给他听，而在中国的一切事务中，他是绝对的主人。

任何一位美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会长都会羡慕蒋夫人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才能。现在，她领导着妇女抗战后援会。这是一个支援前线、照顾难民的全国性组织。她可不是一位仅仅挂个名的领导人，她对工作孜孜不倦。她亲自抽出时间给我寄来一封封关于中国战争孤儿苦境的长信。她还给她的卫斯理学院的校友写过许多封信。她在电台上发表讲话，有一篇是从中国讲给美国女青年大会听的。蒋夫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以基督教教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野蛮和腐败。我曾在武昌蒋委员长的指挥部里同她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她告诉我，她曾担任航空事务，是为了铲除其中根深蒂固的贪污恶习，“你们美国一些公司也卷进去了，

但是，我要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尽管他们贪污，他们还是把好飞机给了我们。有些欧洲人骗了我们的钱，却运来了不中用的飞机。”直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她的来信依然表明，她对日本的野蛮行径和世界各国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震惊。“人们居然会目睹野蛮行为死灰复燃却不屑去谴责应对此负责的国家，真是太奇怪了。……我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居然会去接受这种野蛮的状况，感到十分痛心……我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起来反对不公正和惨无人道的行径。”

但是，人们并不只是从这些杰出妇女的身上才清楚地看到妇女今天在中国所起的作用的。千百万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于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家庭的妇女，英勇地献身于中国的事业。在华北，农家妇女们组织了镰刀队，为她们的男人服役的军队割马草；她们受过训练，知道空袭时如何分散和卧倒。在湖南南部遥远的农村里，妇女们一针一针地为北方冰天雪地里的战士们编结着长袜。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下的上海，难民营里的不幸妇女们，虽然被剥夺了庆祝自己国庆节日的权利，也在“扫除垃圾”的妙语双关的口号下，用宣布“大扫除日”来安慰自己。

在汉口的女青年会里，我见到了一群出席一次会议的妇女，她们来自许多不同的阶层，正在组织“湖北省妇女支前会”。其中有些是来自两代人受教会影响的上流阶层家庭的妇女，她们的举止和观点酷似美国女青年会委员会的妇女。另外，还有新生活运动的组织者、女学生、纺织女工和女共产党员。她们中有的报告说，已经为士兵们征集了五千件衬衣；有的报告了为士兵做一万双布鞋的运动进展的程度；还有的讲到了做绷带、推销救国公债、组织剧团到农村巡回演出等情况。

与会者中有一群上海纺织女工，她们迂回曲折地步行了一千

英里，刚刚抵达汉口。一路上，她们帮助救护伤员，并在农村中做宣传工作。她们告诉我，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之间，当工会的力量强大时，纺织行业最高的工资是每月十至十五元（美金）。一九三二年，在日本人入侵上海后，工人们的工资的跌落最大，尤其在日本人拥有的工厂里，更是肆无忌惮地大幅度削减工人的工资。战争爆发时，大多数女工每月只能挣三至六元（美金），而且没有工会来保护她们的利益。但是她们对世界事务并非一无所知。在工会活动受到禁止的那些年月里，女青年会的职工班向上海工人阶级的青年妇女们进行了广泛的教育。这些姑娘说：“工人和妇女的解放必须同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在日本人的压迫下，工人和妇女受苦最深。日本人的工厂最坏，它们常常强迫我们每天工作十六至十八个小时，星期天还要工作到中午，而什么额外报酬都没有。现在日本人已毁坏了我们的家园和工厂，因此，劳动妇女支援军队最坚决。我们要到最前线去。”

著名女作家胡兰畦，曾对战线后方的妇女的工作进行过最令人惊异的报道。在战争初期，她曾组织了上海的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她们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胡小姐本人对中国农民的思想了解甚深。她是一个文静的、相当自信的年轻妇女，富有幽默感，极其坦率和诚实。她和她的穿制服而不佩戴武器的女团员活跃在长江三角洲的军队和乡村中间。虽然妇女组织战地服务团，在中国农民面前是一个奇迹，但她们工作的效果却往往大于军官或大学生。她们劝使中国农民们晚上到敌我交界处的农田里收割庄稼，改造了数十名“小汉奸”，并且阻止住了许多士气低落的士兵的溃退。

胡小姐叙述说：“八月份战争开始时，我们被分配到一支部队里去工作，我们主动向军长要求分派任务。他告诉我们，他主要的

困难是士兵缺乏粮食，因为附近的农民都逃走了，庄稼没有人收割。我们就尾随农民到他们逃往的地方，劝他们回家，要他们至少在士兵们还在的时候留在家里。我们说：‘中国的新时期已经来到。军队不再剥削人民了，相反，他们希望同你们交朋友。他们愿意帮助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应当向他们提供热水，帮助照料伤员。’开始他们不相信我们，但我们向他们作了保证，并且请求要那位军长履行诺言。这样，上海后方的一大片领土又住进了人；人民向士兵提供了住宿和食物，而士兵则帮助农民收割庄稼。”后来，有一块庄稼，接近火线，情势危险，无论怎么劝说，农民也不愿去收割。于是，女团员去登门访问，并保证同他们一起去。她们征集了一百三十名志愿者，在一个晚上就把庄稼全部收割完毕，获得了八十车粮食。

当士兵们拿了农产品却付很少的钱、从而违背了“新精神”时，女团员就十分敏感地去做士兵的工作。“假如有一个农民抱怨说，一名士兵拿走了一口价值十元的猪，却付了四元钱，我们不是采用责备士兵的方法使他丢脸，相反，我们却向他表示祝贺，说他没有白拿猪，他还是相信军民关系中的新精神的。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农民为了帮助军队已经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并建议说：日后如果他付的钱能够比农民的要价更多一点，那将是一个有礼貌的表示。‘比如说，我们知道猪价是十元一口，如果你有时候付给农民十六元，那不是很好吗？’结果，他就会去找那位农民，用十六元钱再买一口猪。这样，大家的自尊心都顾全了。”

“小汉奸”问题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日本人用金钱从一些六至十岁的孩子那里换取有关炮兵阵地的情报。有几个炮兵阵地连同阵地上的士兵就这样被消灭了。士兵们愤怒极了，骂这些孩子是汉奸，要求把他们处死。有一个孩子确实就这样被枪毙了。但

是，这件事发生后，胡小姐说服了军长，把被捕的儿童交给女团员处理。她们通过简单而又明瞭的解释，成功地全部抵销了日本人的影响，以至于连那些依然从日本人手里拿钱的孩子也不但不为日本人工作，反而为自己的人民工作了。

女团员们完成的一项最危险的任务是阻止了整整一个纵队的军纪败坏的士兵的溃退。他们的溃逃危及着整个战线。他们不再听从他们军官的命令，一边逃跑，一边把枪扔掉，或者乱开枪。女团员先取得了士兵们将要经过的一个村子的农民的合作，她们清理了几间房子，在里面设了急救站，并准备了热茶。然后，当士兵们到达时，她们就走到他们中间，热情主动地提出对伤员进行急救，并向大家供应茶水。姑娘们在喝茶的房间里主动跟士兵攀谈，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好消息告诉他们，然后有礼貌地问：“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到哪儿去？”她们假装不知道士兵们正在退却。当士兵们把这个事实说出来时，女团员装出十分惊讶和不相信的样子。“那么，所有其他正在坚守阵线的士兵们会怎么样呢？”她们一点也没有谴责这些逃兵，只是表示惊愕。士兵们聚集在村子周围互相讨论了几个小时，然后，为了避免别人注意，悄悄地走出围墙，整好队形，重返前线。男子汉的自尊心要求不能让女团员明显地感觉到，是她们影响了这些男人。

数以千计的其他妇女在同中国军队一起执行这些任务。有的参加红十字会工作，有的进行政治组织工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她们才参加实际战斗。当著名的“孤胆营”奉命最后撤离闸北那座烈火熊熊的仓库时，向他们欢呼致敬的观战的人们惊异地看到，三百七十名士兵中竟有七名年轻的女兵。杨小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曾给这些卫士带去了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前几年她一直在北方帮助游击队工作。在那里，由于进行的是非正规的活动，妇女们

可以经常帮助部队。她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叫姚瑞芬(译音)；这位小姐曾于一九三一年在满洲的一次同日本人进行的山地战斗中，领导过一支由五百名中国士兵组成的连队，当时，她仅仅是一个十六岁的学生。后来，她同十九路军一起参加了保卫上海的战斗。她多次死里逃生。有一次，正当日本人在沈阳全城挨家挨户地搜查她时，她却携带着四千元钱，经过沈阳，把钱送到在山区的中国游击队手中。她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在华北一支进行运动战的部队里参加战斗。北平附近有一位著名的曹太太，是一位游击队指挥员的母亲。这位披着蓝斗篷的朴实的老太，经常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运送军火。另外，《立报》上记载一位不知姓名的“中国母亲”，尽管她是一位六十三岁缠足的老妇人，她仍然有时候随游击队一起行军，帮他们洗补衣服。当她不能跟随他们时，她就把抗日标语藏在要洗的衣服里，一面装作静静地在村子里的小溪中洗衣服，一面用浆糊把这些标语贴在显眼的地方。

在广西，两千多名姑娘要求组织一支“娘子军”。经过严格的挑选，最后只有一百五十人合格。她们都具有健康的身体、一定水平的军事知识和枪法，以及一定的组织和演讲能力。她们受过如何组织农民进行游击战的训练。她们步行了差不多整整六百英里，来到汉口，身上还背着五十多磅重的装备。她们戴着巨大的、用竹篾编成的斗笠。这些斗笠不仅可以防雨，而且由于涂上了伪装的颜色，可以把戴斗笠的人隐蔽起来，不致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北平的一位活泼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刘小姐，作为“华北抗日军”的代表从中国遥远的另一端来到汉口；这支军队是一个新近由约二十个不同的游击组织组成的联合阵线。她告诉我，沦陷区的妇女怎样在晚上偷偷地散发爱国传单，以及出版一种叫做《天津妇女》的地下刊物。她们用油漆在小木板上写上标语，然后把它们扔进

天津的河里，这样，它们就可以顺水漂流而下，穿越城市，被人看到。

甚至汉口的歌女和上海舞厅的舞女都建立了救国会。上海团体的领导人是一名漂亮的广州姑娘。她原先是一个知名的夜总会的皇后。几十名专业舞女赶制绷带和慰劳袋，或者白天在医院里为伤员们表演节目。她们劝使许多跳舞厅的老板把营业场所改成伤兵医院，后来又改为难民收容所。汉口的歌女把酒馆中所唱的爱情歌曲改为歌颂中国历史上的勇士的民歌。她们把自己的金银首饰捐献出来，作为战事基金，并分成几个小组在汉口的街头上一边游说一边唱：“把你们的金银献给国家”。这个运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大家纷纷把传家宝和贵重财物捐献出来。

世界上找不出比英勇的女共产党人更有忍耐力和勇气的妇女，她们同红军一起进行了长征。在一年多的长征中，她们背着个人物品爬过积雪封顶的高山，越过湍急险恶的河流，边行军、边战斗。她们中间有从前是农村姑娘的毛泽东夫人，一度给人家当烧饭丫头的朱德夫人，以及前乡村教师的周恩来夫人。毛夫人喜欢人们叫她自己的名字：“贺子珍指挥员”。她长得纤弱、秀丽，然而穿上红军军装已有十年了。她在前线打过仗，组织过妇女战斗队，护理病人，并搬运伤兵到野战医院。当她出发长征时，她的身上还带着刚刚由榴霰弹造成的二十来处伤口，其中有八处伤势严重。当时她还怀着孕，后来在途中生下了一个孩子。她被迫把孩子留给一家农民扶养，从此以后一直未能再找到她。但是所有这些痛苦的经历，并没有削弱这位二十八岁妇女的斗争意志和青春活力。

朱德夫人——她本人的名字叫康克清——在一九二七年当她还是十几岁时，就摆脱了给人家作烧饭丫头和放牛娃的生活。她组



织起本地区的“妇女先锋队”，领导着三十多名妇女。她们的武装包括从厨房用具到步枪，什么都有。当一九二八年毛、朱在这个地区出现的时候，这些妇女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长征途中，两营这样的“妇女先锋队”打败并缴了川军整整一个旅的械。参军时连一个大字都不识的朱夫人，在二十六岁的今天，已成了延安的红军学校的一名政治教员。

周恩来夫人向我讲述了妇女们在长征途中的生活情况。长征开始时，她自己因患肺结核正卧病在床。最初四个月的路程，她是被人用担架担着走的。以后她身体一点点好了起来，就同大家一起步行。“只要我们一停下来，放下背包，妇女们就在人民群众中召开会议，告诉他们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是到西北去打日本的。我们还帮助当地人民逮捕贪官污吏，并调查他们的罪行。最艰苦的是医务人员。抬伤员的人们无法跟上队伍。我们离开江西时还有运输队，但是在贵州，我们只得雇佣当地的劳力，但是他们有时会逃走。这样，妇女们就只得自己来抬担架，这是极其困难的。

“将近一百个十岁或十岁以下的孩子参加了长征。他们全都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并自己背个人用品。他们还参加演戏和唱歌，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贡献。他们中间有的人身体垮了下来，就在各个地方留下了。其余的走完了全程，他们现在正活跃在山西的八路军中。

“有八个孩子是在长征途中生下的。其中有四个生在我随之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这四个孩子都被迫留了下来，因为在长征途中无法照顾他们。我们把他们交给了当地农民，他们答应照料这些孩子。其中有一个是男孩，其余三个是女孩。女孩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毛的女儿。我们一直在设法寻找这些孩子，但

是至今没有找到。因为，直到最近我们才能够合法地到中国各地去。我们最担心的是那个留在四川边境土著居民那里的孩子，在那里要找到一个同意照顾孩子的人是很困难的。这几位母亲都幸存下来了，并继续长征。幸喜每一次分娩的时候，都碰上部队有一天休整，因此母亲有足够的时间把孩子生下来。生在红二方面军中的那四个孩子比较幸运，因为红二方面军长征的时间比我们早一年结束，孩子们是在长征快结束时出世的，而且都生在荒无人烟没有人来照顾的地方，所以部队就带着他们前进。一个小女孩生在草地上，那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个住处；她就取名为‘长征’。肖克指挥员的妻子生了个儿子，也是生在无人居住的大草原上，但是有一间泥棚可以避一下，所以，他的名字叫‘小泥屋’。四个孩子全活了下来，现在长得都很好。”

我问周夫人，她怎么会在那个可怕的长征途中消除肺病的。她回答说：“我认为，是愉快治好了我的病。”

“愉快！”我惊叫起来，“但是，艰苦呢？”

“什么艰苦？”她问道。

当我问到她是否挨过饿时，她平静地回答说：“这是常有的事。在草地上，我们有十多天除了野草，找不到别的东西吃。在贵州，我们才能从田里收到一些稻谷，但是土匪把我们的炊具都偷走了，我们没有可以用来做饭的东西。是的，我们常常挨饿。”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那样高兴呢？”我问她。

“因为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团结一致，并且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听到许多新鲜的事情。”

“你现在感到象那时候一样高兴吗？”我进一步问她。

周夫人仔细地考虑了一会儿，接着回答说：“我认为更高兴些，  
因为现在事情更有希望了。”

## 十六、中国人斗志昂扬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我到了汉口，就在那一个星期当中，蒋委员长的乐观态度，成了外国记者心目中一个主要的谜。根本就不存在令人鼓舞的明显的理由。在长达一千英里的前线阵地上，他的军队正在溃逃。他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在上海和南京被杀。他已经丢失了古老的京都和现代的首都，以及四分之一的国土。他大祸临头却如此欣喜，其根据何在？是不是美国已经向他作出了什么允诺？或是英国有什么保证？还是仅仅为了挽救面子而装出高兴的样子？

都不是，而是另有根据。我也曾看到委员长的情绪极佳。我在武昌跟他的才华横溢、讲究效率的夫人长时间交谈后曾经见过他。她打开书斋的房门，他走了出来，彼此招呼了一下。我极少见过比他更深沉而精明能干的人。我不想指责他那种无忧无虑的样子；他在感谢我对中国的良好祝愿时神情十分严肃，但又充满着信心。只有当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互相统一、他跟他自己——并且

不仅光跟自己——高兴地融为一体、坚定而又明确地朝着向往的目标前进时，才能产生这种自信。从那个深刻的意义上说，委员长是高兴的。我到北方前线去过以后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自那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山西前线来的一位年轻妇女一边跟来自青岛的前警察局长点头打招呼，一边说道：“中国人愈战斗，斗志愈旺盛。”

我们挤在平汉铁路的一列火车上，从辽阔的北方战场十几个分散的点返回汉口。军官们、政府官员、传教士和记者同我们一起前往南方办理重要公务。火车每到一个车站，一群群难民就试图冲上车厢，因此，车门口有士兵拿着刺刀，以资警卫。与我同排坐着的那位年轻妇女，身穿军装，精力充沛。她曾为阎锡山将军担任后方救护工作。几个月前，她被迫撤离保定，丢下了一千名伤员在病床上惨遭敌人残杀。

青岛前警察局长，身着绸袍。他既文雅和蔼，又勇敢大胆，挺惹人喜欢。他在青岛失陷的时候，率领一千七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骑着摩托车，到山区建立了一支游击支队。他是前往汉口去请求指示，并要求提供军需。他洋洋得意的神态表明，他已经发现游击战比他那种管理市警察局的古老的工作更合他的心意。

而现在，这位英雄却因为和两位妇女同乘一间包厢而感到很窘。“这是战争，”他内疚地说，“在战时，人们必须对一切都习惯。”

那位妇女和前警察局长按惯例同一位外国人有礼貌地寒暄一番后，就开始在他们之间讨论起旧中国的困难、落后和腐败现象。“在保定的民族耻辱……在南京的溃败……某将军的叛国；应该象韩复榘一样枪毙他……很多人应该枪毙……汉口一些官僚也应该枪毙……”话象锤打一样铿锵有力，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前线发现

这种言论自由。他们说话时很有力量，显出热烈的神情，以致我最后忍不住说：“你们谈到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尽管如此，你们看上去都没有泄气。”

他们坚决地摇了摇头，表示他们毫不气馁。他们摇头时的那股猛劲，似乎足以折断一根脊椎骨。接着，那位妇女用一句名言作了回答：“尽管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民气可用不可失。”这句名言值得各地优秀战士永远记住。

那位前局长补充说：“有三条理由使我们不气馁。第一，日本人原来认为中国只会屈服，不会起来战斗，但是他们遇到的只是战斗，而不是屈服。第二，这场战争使中国实现了新的统一。第三，即使最偏僻的村庄里也在出现一种民族意识，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终将实现自治。”我已经习惯于在中国各地听到这番话，从南方广州的市长一直到西北的阎锡山，都曾这样说过。

他转过脸笑着对那位妇女说，离开自己的家到前线去，为了战争而放弃她宁静的生活，这对一个妇女来说的确是不容易的。她说道：“日本人来侵占我们国家的时候，如果我在家里呆着，我的心灵是不会得到安宁的。”

“假如丧失精神，一切都完了，精神没有丧失，那什么也不会丢掉，”前警察局长回答说，“日本人的侵略已在中国激起了一种新的精神。”

那些了解中国的人们对于中国精神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一位中国政府前高级顾问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对我说：“日本占了十分之九的优势，但它最后将在十分之一上面——中国伦理道德原则的力量——被打败。中国人是十分讲究伦理道德的人民。两千多年来，他们对于团体——儒家的家庭——的忠诚超过他们对个人生活的追求。他们从未形成过现代资本主义赋予西方国家的那种个

人主义。凡是他们家庭的良心告诉他们合乎体统的事情，总是比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中国人认为打仗是不正当的，你即使把他杀死，他也不会去打仗。我曾看到一些人因拒绝服从一位军阀而被砍头，他们在走向刑场的时候，还在咧着嘴笑，边交谈边抽烟，漫不经心地好象去上工。当他们最后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化为对更大的团体——国家——的忠诚，并下定决心，认为为国家而战是正当的时候，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那种精神，会使全世界感到惊讶。”

凡是以破坏任何民族精神的打击，事实上却加强了中国人的斗志。在战争的锤炼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对家庭的忠诚被更大范围的忠诚所代替。长沙附近的一个区宣布废除一切祭奉祖先的宴席，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援助生活困难的士兵家属。十四岁的男孩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甚至在遥远的重庆，征兵当局一天就要回绝三名来参军的人。西安有一名十四岁的男孩，当他的母亲想阻止他去参军时，他对她说：“妈，强盗已经进屋了，唯一的选择是，要么战斗，要么当奴隶。”甚至有钱人家的青年也逃离家庭投奔军队。其中有一名青年在汉口报纸上发表启事，把他出走的理由告诉他父亲：“最亲爱的爸爸，我并不是因为不爱你而离家出走，而是因为我更爱我们的国家。”

这种民族意识在中国是新的现象。人们可以把它发展的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当韩复榘在十二月不战而逃，放弃他的省会济南时，我记得当时汉口感到无可奈何。中央政府当时看来根本无法去处置一个独立的军阀；对此就是没有办法。政府开始只是满足于采取权宜之计，把李宗仁部下的精兵，调防在韩复榘部队的后方，来阻挡退却。接着委员长逮捕了韩复榘，将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并将他和二十几名在敌人面前逃跑的官员一起枪毙。民族自

自尊心在中国各地高涨起来：“我们终于强大了，我们能够对付汉奸了。”由于对这个反应完全没有把握，以至于汉口有人误认为，第一次宣布执行死刑的消息是为了检验一下公众舆论的反应，只是当公众舆论明显地表示赞许后，死刑才正式执行。

战争的初期依然打上了中国过去残余的烙印。不仅刚建立的统一的军队之间相互缺乏联系——有些部队仍然保留着军阀的作风，简直跟半土匪军队差不多——而且军民之间的合作开始时也几乎完全局限于八路军活动的山西地区，以及表现在上海工人的爱国行动中。北方有些城镇，商人甚至组织了接待委员会，准备欢迎日本征服军，以求得宽恕。但是战争的严峻考验，把军阀式的军队赶出了舞台。要求处置接待委员会的公众舆论日益高涨，参加接待委员会的人或被爱国者暗杀，或在中国军队返回时被处死。欢迎过侵略者的人不再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保护他们家庭的精明人而受到尊敬，大家骂他们是汉奸。上海附近有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在强迫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时自杀了；他的行动在全中国受到赞扬。

一九三八年四月震惊世界的台儿庄胜利——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胜利——主要归功于这种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这次胜利是由广西将领率领的军队取得的，这些军队几年前还在同蒋介石政府打仗，而现在却成了它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这次胜利的取得，也是因为采取了把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同八路军——另外一个宿敌——创造的游击战略结合起来的战术。它证明，阵地战同袭击敌人交通线的游击战的结合不应限于八路军，而可以迅速地扩大到其他各省广泛地予以采用。这次胜利是在各部分中国军队在广大的地区相互精确配合的基础上取得的，从而说明了这些军队的组织工作有了改进，他们的攻击能力有了提高，他们得到了中国人民



越来越多的支持。

数月来，日本人一直在向陇海铁路线的主要枢纽徐州推进。他们占领了徐州，就能控制黄河河谷地区，从而巩固他们对整个华北的占领，并打通西进和南进的通道。当他们的军队经过山东省的沿海地区时，游击队袭击了——开始时是小规模的骚扰——他们愈来愈长的交通线。在一些小河附近做苦工的一群群“农民”扒开河堤，让河水淹没了日本人运输物资必经的公路；其他一些人在关键时刻把铁轨炸掉。三月二十三日，当日军从三面向徐州围攻时，台儿庄战斗打响了。十五天后战斗结束，日本人朝北狼狈逃窜；六万二千人中有四万多人被打死、打伤或者当了俘虏。中国军队的一支部队在正前方狙击他们，另外一支部队在两侧发起突然进攻。当时，由于游击队袭击敌人后方，日军的物资正好已经枯竭，野战炮没有炮弹，坦克没有汽油，一些日本士兵在被俘前差一点饿死。

世界各地报刊欢呼中国这一胜利，把它说成是日军遭到的第一次惨败。这种说法不十分准确，因为发生在山西北部平型关和忻口的战斗也使日军遭到了重大伤亡，并大大地延缓了日军的进攻，而这种延缓在当时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sup>①</sup>但是，台儿庄对于中国在全世界的威望影响更大。它在几个重要方面改变了远东的全局。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世界战地记者的众目睽睽之下被粉碎了。东京笼罩着内阁危机。各国保守的军事专家开始第一次承认中国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但有一个重要前提——如果中国人的斗志能保持下去。

---

① 卫立煌将军声称：在忻口歼敌一万六千，在平型关歼敌三千。它们是几乎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参阅第九章。——作者注

台儿庄对于中国人士气的影响同样是重大的。中国人在其他战线上发动进攻，并收复了一些失地。中国游击队甚至在北平和上海的郊区袭击日军小分队。每一座中国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汉口，汽车和卡车满载着高呼口号的人们，轰鸣着通过市里的街道。傍晚，来自一百个组织的十万人民聚集在市公园里，然后举着火炬，浩浩荡荡地穿过几条主要街道。文艺队伍在行进中表演动人的节目。学生和儿童合唱队高唱中国新的军歌，沿途，商店和住家点放了数以万计的鞭炮，向他们致意。

台儿庄战斗后一个月，大批日本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进中国。他们虽然最后占领了徐州，但比他们计划的要晚好几个月——比中国人自己估计的也晚几个月。<sup>①</sup>他们沿着陇海铁路向黄河河套地区推进时，突然被黄河的洪水所淹没。决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治水专家多年来一直在说，黄河改道已迫在眉睫。常年的战争使每年修堤计划难以兑现，汛期洪水泛滥实际上已不可避免。日本人为了过河，也炮击了大堤。不管中国军队是不是象日本人所指控的那样，帮助选择了洪水暴发的时间，总之，他们清楚地知道，洪水即将发生。他们巧妙地用军事手段变洪水为武器，其意义可以同历史上荷兰为淹没入侵者而掘开大堤的著名事件相比。他们使撤退和洪水暴发同时发生，这样，洪水就把他们和日军隔开。大多数中国军队和民众已经撤离；中国在人员方面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大批日本军事装备被埋在泥浆底下。轻装的中国游击队蹚着没膝的大水，夺回了一大批日军阵地。洪水使进攻长江流域地区大为艰巨，从而保全了汉口。它还保护了汉口和大西北之间的铁路运输。几个月后，日本人仍然不能进入黄河河套地区。

<sup>①</sup> 李宗仁参谋部的一位将军一月底在汉口告诉我，他们本来希望在徐州坚守一个月，实际上他们坚守了四个月。——作者注

在这几天中，中国飞机进行了两次出色的空袭，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的士气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声望。中国飞机成功地轰炸了台湾，当时，日本人正在利用这个中国南部沿海岛屿作为进攻广州的空军基地。这是敌对飞机第一次进攻日本属地。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徐州陷落的那一天，中国以完成空袭日本一些城市的壮举回答敌人。从飞机上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呼吁日本人民起来制止战争的传单。共有五种传单从空中投入人口稠密的日本城市，它们是来自中国空军、中国人民、中国劳工联合会、日本士兵中的反战组织和在汉口的日本战俘五个方面的传单。

前两种传单使用了外交语言，语气谦恭，除了在远东，世界上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谦辞：

“亲爱的日本士兵：

伟大的中华民国的空军现正在贵国上空飞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生命或者破坏财产，而是把贵国的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全境犯下的罪行告诉你们……”（下面列举了一长串日本飞机轰炸中国老百姓的罪行。）

中国劳工联合会给日本工人的呼吁书口气完全不同：

“听啊！听啊！

自由是不会自行到来的。人民夺取自由的时刻来到了。工人兄弟们，你们控制着生产，你们手中掌握着日本军国主义所必需的物资源泉，认清你们伟大的力量吧！你们掌握着东方的命运！打倒日本军国主义！举行总罢工，为把我们两国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而斗争。”

来自日本部队的传单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告诉日本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士兵中，存在着一个反战组织。

“士兵兄弟们：

现在是粉碎军事集团长期暴政的时候了。他们暗杀了高桥，他们胁迫议会，他们把五十万同胞送去当炮灰，他们通过税收从人民身上搜括了几十亿元……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他们渴望正义……哦，士兵兄弟们，不要去送死，不要去负伤，要设法回老家去。

东京、大阪、京都、  
满洲师团反战同盟”

来自日本战俘的传单是重要的，因为它证明有日本兵被俘，中国人饶赦他们的生命；而日本新闻检查制度却掩盖了这两个事实。

“士兵兄弟们，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你们。我们受了伤，当了俘虏；我们想这下子完了。过去我们被告知，中国军队很残忍。可是事实上他们待我们很好，我们过着自由的生活。中国当局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并不恨日本人民。哦！每当我们想起我们过去是怎样对待这些充满着爱的人们，我们就感到无地自容。

在汉口的日本伤兵”

说明中国人新的精神面貌的最令人惊异的例子来自富有战斗精神的敌后中国地方政府。骑兵为贫苦农民耕地；工人一边无报酬地为游击勇士做军服，一边唱歌、欢呼；步兵用的“无形进击”战术胜过了敌人的机关枪——这些是一九三八年夏天来自华北的私人信件中叙述的部分情况。<sup>①</sup>住在平汉铁路沿线各城市的美国传教

---

① 资料来自传教士的信件和美联社记者哈尔·汉森的报道。——作者注

士现在都携带着两张通行证，一张是控制铁路线的日军颁发的，另一张是守卫在周围地区的八路军颁发的。他们从铁路边出发，骑自行车走几英里，向中国哨兵出示通行证，就进入完全由中国人控制的地区。这样的地方政府有好几个。其中最强大的是在山西东北由林彪部队守卫着的五台山区；报道最多的是在河北的一个地区，除五台山区外，它的力量最强，也是最容易进出的地区。

这个在河北的地区包括十七个县，有七百万人生活在那里。全区的组织都军事化。每一个村庄和十字路口都有哨兵巡逻；人员和物资的来往都要有通行证。每个县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当地农民和绅士组成的“动员委员会”；为了防卫，他们可以征用人员和物资。防卫部队包括一支小规模快速部队和自卫队。快速部队装备较好，拥有机枪，主要对铁路线的敌人进行作战；自卫队由五十万农民志愿兵组成，他们仍旧在地里种田，但是组织起来保卫家乡，他们的武器有手榴弹、大刀和少量的左轮手枪和步枪。年轻的男人在培养成为运动战的领导人。儿童担任侦察工作。妇救会有四十万会员，她们在家里做绷带、鞋子以及类似的物资。七百万人口中有一百多万人活跃在防卫工作上。

美联社一名记者亲眼观看了一次军事演习，他的描述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三千来人卧在二英里见方的一块空地上，每人相隔二十英尺，身穿跟地皮一样颜色的衣服，因此，他们很难被发现，空袭时，一枚炸弹最多只能炸到六个人。随着信号发出，右边很远的地方站起一个人，向前奔去，趴下；他仅仅露面四秒钟。当他跑了三分之二的距离时，另外一个人在左边站起，他同第一个人一样向前奔去。人们从四面八方前进逼，但是由于参差交错，没有一个机枪手能迅速地把机枪瞄准向他们扫射；十二挺机枪朝地下横扫，半小时也只能打中十个人。这名记者说道：“看到这支伟大而又隐身

的战士向前进逼的情景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游击区生产足够的小麦和棉花，严格的控制确保了大部分小麦和棉花不落入日本人之手，迫使他们从外地进口粮食。有一家军服厂每天用土布制做一千一百套军服；冬天穿的军服是褐色的，便于在光秃秃的地里进行伪装；夏天穿的军服是绿色的，和田野里的颜色相一致。每套军服价值三十四美分；一个士兵的全部衣着——包括内衣、袜子、鞋和帽——值一美元二十美分。有十一家小型兵工厂生产步枪、迫击炮、炸药、手榴弹和大刀。战争开始时，有一大批运往太原的机床和废钢铁在途中被八路军截获，所以他们现在有足够的钢材。来自北平的化学教授们正在兵工厂里生产硫酸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其他紧缺物资通过秘密途径从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中搞来，或者通过袭击去截获。中国军队用五角中国币换一磅从日本人的电话线路中搞来的铜线，当地人民对此积极性很高。整村整村的农民参加了拆铜线的远征，他们搞来的铜线太多，以致军队无钱全部收购。

美联社记者发现，这个地区的学校数量相当于教育中心北平周围日本人管辖下的所有区域中的学校数的十倍。中国老百姓无论在哪里，一旦有了权，就立即惊人地增设学校。该地区的通讯设施还包括遍及三千个城镇和村庄的邮递网以及拥有六百家地方营业所和三千英里长线路的电话系统；这些都是完整地接管过来的。有十家电台播放着军事消息和来自外界的新闻。这些新闻都刊登在十七家日报上；报纸的版面虽小，但却是许多县第一次看到的报纸。蒋介石在汉口的讲话，北平大都市的报纸也许能够加以封锁，但是，日本封锁线内的河北农村十七个县在第二天就见报。

在中国各地，当日本军队沿着铁路线向前推进时，在他们的后方就涌现出大批类似的组织。战争日益成为不单是两支军队之间

的斗争，并且是侵略军和顽强不屈的全体人民之间的斗争。为反对日本庞大的现代化战争机器，中国把她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人力资源都组织起来。日本人企图通过建立他们自己的中国游击队进行反击，并把整个村子烧光、杀光。但是，日本人在河北扶植的十二股土匪中有八股在建立后的头几个月不是被中国人解除武装，就是自动地向他们投诚。甚至烧毁村庄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中国人的反击所制止。当地有很好的情报系统，当村庄无法保住时，就向农民发出警报，进行撤退，日本人离去后，地方政府再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日本人的主要目标是想动摇中国人民的意志。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本对广州进行了有史以来最野蛮的空袭，炸死一万名老百姓，引起美、英的抗议。即使如此，它既未能中断去华中地区的铁路交通，也未能迫使广州中断同中央政府的关系。

日本人愈向前推进，就愈陷入组织起来的、敌对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四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九三八年暮春，蒋介石夫人抽空给我写信说：“自从你离开后，中国人民的士气大振。我们的信念使难民和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够毫无怨言地忍受对他们的磨炼。我们的士兵正以前所未有的斗志在进行战斗。”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委员长在抗战一周年时说：“我们丢失了领土，但那是在我们的战斗中丢失的。我们这样做，已经使中国意志的精神烈火烧得更旺。这种意志将能在日本造成的废墟上，建设起一座新中国的机构。”

我了解他说的这番话的意义，因为我亲眼看见他面带愉快之色，即使在比现在的前景更暗淡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也是那样乐呵呵的。我在后来的几个月也了解到其中的道理。不管我走到哪里，无论是中国的北方还是南方，我都看见人民一致拥戴他起来抗

日。不管他是在什么压力下作出那个决定，由于他作出了那一选择，他现在发现自己在战争中同中国人民十分融洽。南方的广州曾经多年同他打仗，现在，当他的镜头在电影中出现时，人们也向他鼓掌。北方的共产党人说：“十年来，我们知道他是顽强的，现在，我们相信他也会顽强地反对日本的。”

任何人，如果他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他是继承了四千年的历史以及他自己的行为也将作为先人那样被记载下来，就不可能取得象委员长在中国那样高的地位。他化了整整十年时间，力求用武力统一中国，但得到的仅仅是愠怒的、半心半意的、夹杂着仇恨的顺从。他现在知道，他仍然有机会作为领导实现孙中山和中国一切进步力量所梦寐以求的中国的统一、独立和新生的领袖而载入那漫长的史册。



# 十七、中国共产主义化的程度

在一阵事实、谣传和夸张之中，中国共产主义突然成了新闻。蒋介石夫人收到她在卫斯理学院时的同学来信问：中国是否正在走向共产主义。美联社从“河北地区一个共产主义政府”那里发出了各种通讯报道。这个政府地处日本人后方，而为遥远的中国中央政府所批准。东京坚持说，整个中国已经转向共产主义，否则，中国怎么会如此无理地反对日本？相反，一些保守的中国人却会对你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共产主义，甚至在共产党人的头脑中也没有。“他们认识了过去行为的错误，已经归顺国民党。”这就是他们的套话。

尽管说法不一，但是有一些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大家都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最高领袖，他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同共产党人打了十年仗。）众所周知，国民党是执政党。人们也清楚，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合作——正如一切其他公开承认的团体和政党都在合作一样——这就是中国当前力量的基础。但他们是如何进行合作的？如果有

让步,谁向谁让步?这种合作是否牢靠?是否可能永久合作下去?它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现实的或潜在的共产主义化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成了世界报刊报道中国政府的每一次改组,国民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党的每一个宣言的主要新闻。

给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非但没有在走向共产主义,相反,她正在开始走向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二个事实是,共产党人对每一项民主成果都报之以最热烈的欢呼。我们甚至看到了《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把国民党的一项法令说成是向共产党人让步的令人惊异的奇观,这项法令允许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并保证在战后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三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共产党人在中央政府中迄今徒有虚席,可是,不论在哪一个地区,只要在他们的影响或控制之下,他们都使之特别民主,而且特别忠于中央政府。

产生这些似非而是现象的原因寓于中国历史之中。中国有大量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他们从来不懂得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村庄——不同于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拥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但是他们的头头是由大户人家的家长们挑选的,青年人和穷人没有发言权。世世代代以来,中央政府实行君主专制。一九一一年满清被推翻后有一个短暂的时期,议会是选举产生的,但是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使很少一部分人能够参加选举,大多数人则被排斥在外。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以民主自居;它曾声称,为了将来某个时候实行自治,它正在对人民进行教育。今天,在战争的冲击下,自治的希望提前降临。正是这个事实,以及它将给老百姓带来更加自由、更加美好生活的希望,激发了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气概。

人们一旦了解共产党人自建党以来从未试图立即实现共产主

义<sup>①</sup>或设想可以这样做，共产党人和这些日益增长的民主希望之间的关系迅即一目了然。他们认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中国国内的因素，而且涉及世界范围的因素。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成立以来一直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并且对它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作出了贡献，并予以贯彻执行。但是，自从该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他们在中国的当前要求一直是工人农民有权建立组织、参加政府，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要求的前提是中国摆脱外国的统治。因此，当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在为实现一个统一、独立的中国而进行斗争时，共产党人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加强和扩大力量，他们认为这是改善全中国——也是全世界——人民大众生活的第一步；人民生活的彻底改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参加了蒋介石赖以上台的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两党都支持过著名的“三民主义”，在这一次统一战线时期，三民主义得到了最充分的系统阐述。<sup>②</sup>在随后的十年内战中，共产党人甚至有权可以认为，他们比南京政府更积极大胆地在支持这个主义。当政府在一个接着一个省份丢失面前表示逆来顺受时，他们敦促进行抗日——“民族主义”。他们在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建立组织的权利被剥夺的年代里要求这些权利——

---

① 广州公社以及后来的苏区甚至要求把大型工业收归国有，把地主的庄园分给耕者——换言之，在农村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在城市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化；这两点正是孙文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注

② 孙先生曾这样阐述过：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相容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孙中山全集》“第二讲”34—48页，他同共产党的关系十分友好。——作者注

“民主主义”。当受银行家控制的政府认为“民生主义”就是要用武力实现统一，稳定货币和建筑更多的道路时，他们宣布通过减租、减税、发放农业信贷、增加工资和提供社会保险来实现“民生主义”。共产党人有正当理由可以声言，进行坚决抗日，增强民主，也就实现了他们长期主张的纲领。

根据国民党理论家的观点，“阶级斗争”是两党重大的分歧。这话是对的，但它不是表现为通常所指的、过分简单化的、因而容易引起误解的那种形式。两党的分裂是由阶级斗争引起的；然后双方又继续进行了这场斗争。南京国民党政府禁止工人与农民的组织；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地方也要推翻地主和高利贷者。他们把土地分给耕者，拆除地界，烧毁地契。他们建立苏维埃政府，剥夺剥削分子的选举权。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如下的信念：只有推翻地主和与之结盟的土匪般的军阀政权，才能把中国人民从难以忍受的处境中解救出来。日本的入侵使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改变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它使一切阶级共同面临陷入奴役深渊的危险，但与此同时，通过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也加强了工农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功劳归于共产党人，因为是他们首先看到了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民族共同敌人的必要性。日本人一侵入满洲，他们就主动提出同中国任何抗日的力量合作。本书前面<sup>①</sup>已经叙述过关于这些提议和最终建立反对入侵者的统一战线这段历史。这里只要提一下就足够了：根据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种合作不是一种倒退，而是向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他们纲领中的第一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他们不单是作为中国的善良公民，而且是作为优秀

---

<sup>①</sup> 指第八章。——作者注

的共产党员，忠于中国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他们为了统一战线甚至作了一些让步。主要的让步是，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地区不再剥夺地主的公民权，也不打倒他们。甚至在一些当地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和地主的地区，八路军也努力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只打击“汉奸地主”，应该向别人解释联合抗日的必要性。

任弼时坦率地对我说：“我们是缓和而不是激化阶级斗争。在一些我们已经把日本人赶走的地方，如果人们要求我们建立地方政府，我们不再通过召集穷苦农民的会议来建立一个把富人排斥在外的政府。我们建立代表所有阶级的地方政府。当然，我们确实要求减租、减税、减息，否则老百姓无法承受战争的重担。如果地方上的冲突引起了流血事件，比如一个地主杀死了一个佃农，佃农的家属扬言要向地主报血海深仇，我们就努力对他们进行仲裁，要求地主向佃农家属作经济赔偿。当我们大家都面临着被日本奴役的更大危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中国人打中国人。”

著名的“河北省共产党政府”——美联社从那里发过电讯稿<sup>①</sup>——是近来这些策略的最令人瞩目的典范。这是建立在日本人后方的应变政府，它忠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它的建立也业经中央政府批准。事实上，它比该地历届政府都更自觉地忠于中国中央政府，因为在过去，这里的政府都是被半独立的北方军阀所控制。尽管这个地区的组织是八路军建立的，访问过该地的外国人都说，共产党人甚至不顾当地政府办事效率所必须，拒绝接受更多的政府职务。美联社记者报道说：“他们最担忧的是国民党内一些分子可能会停止合作抗日，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别人指责他们争权。”

---

<sup>①</sup> 已在第十六章叙述过。——作者注

共产党人虽然没有剥夺地主财产,但他们足智多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逃往北平的地主——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逃往北平——的田地依然被看作是他们的财产,但暂时归新政府使用。政府把这些土地分给穷人和无家可归的难民,从中收租。地方政府承认欠着这笔钱,待地主们返回时还给他们。但在此期间,政府就可以掌握一笔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地租都减轻了,一般是百分之二十五。所有债务都宣布延期三年偿还,期间利息定为百分之一。分等级征税,于是,征用粮食、服装和购买武器的费用就由富裕人家来承担,较贫穷的人家就免于征税。各县具体做法不一。典型的做法是,农户每个家庭成员可免交半英亩的土地税,从而保证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不纳税。军队的骑兵帮助缺乏耕畜的农民犁田,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无家可归的难民缺粮,地方政府就在庄稼收割前供给他们粮食。所有这些措施,激起了绝大多数人民对政府的无限忠诚。

共产党控制时间最长的地区是陕北“特别边区”。这里靠近蒙古,在南蒙大沙漠的影响下,土地贫瘠,山峦起伏,人民生活贫穷,是“饥荒带”的一部分。这个地区面积虽然较大——约六百五十英里长、三百英里宽——但人口只有一百五十万左右,人们吃的是玉米、小米和土豆,偶尔有很少一点白面和羊肉。一些苏维埃小区,在当地武装部队的保卫下,已经在这个地区存在了九至十年。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军主力经过长征,跨越了整个中国,才来到这里,建立了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大的苏区。

将近一年以后,埃德加·斯诺访问了这个地区,发现“佃农、贫农、中农和所有穷人”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善。<sup>①</sup>为使农民有个喘息

---

<sup>①</sup> 见斯诺《西行漫记》215、216、219、231页。——作者注

的机会，新区在第一年废除了一切形式的赋税。在老区，只征收单项的土地累进税和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营业税。财主们的土地和牲畜重新分配给穷人，大片荒地——主要是无主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开始被开垦出来。鸦片已被彻底消灭；乞丐和失业现象已经“消失”；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

苏区特别重视教育和其他文化事业，并取得显著成绩。那里办起了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一所农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工会学校，一所培训党的组织干部的学校和二百所小学。红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不仅随身携带武器，并且还带着简单的工业器具——车床、旋床、冲床、铸模和数十台胜家缝纫机。他们用这些机器开办了一些工厂。他们带着制版机和轻型印刷机，进行了一年半的长征，开始在荒僻的西北传播文化。斯诺说道：“我注意到，大多数农民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一九三七年统一战线建立的时候，苏区改名为“特别边区”；这是受到中央政府全面控制的地方政府。这一变化的标志是允许地主回乡，如果他们提出要求，就分给他们土地，供他们自己使用，但不是把他们过去所有的土地都还给他们。以前把土地分给耕者的“土地改革”曾经证明是预防和减缓饥荒的主要因素。共产党人自动发起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举行了民主化的地方选举，使以前无选举权的地主和商人都可与农民一起投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参加的选举。选民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妇女。选举前进行了紧张的竞选活动。选民们分到了无记名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由学生帮助写选票。在大多数村子里，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参加了选举；只有一半人参加选举的地区被认为是落后区。共产党人在大多数地方重新当选，但并非全部如此。

共产党在目前战争形势下制定的现阶段纲领也许可以解释为是一个民族阵线的纲领。其细节体现在公开宣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人通常喜欢采用数字的形式。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到处都张贴着这个纲领。共产党人相信，在当前的危机下，中国人民是能够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的。

《十大纲领》如下：

一、抗日；收复一切失地；没收日本在华财产作国防经费。

二、没收汉奸财产作难民救济费。

三、改善人民生活；赈济灾荒。

四、废除苛捐杂税；整顿国家财政；发展工商。

五、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生活条件。

六、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七、向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

八、实行民主原则；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

九、实行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保护旅居国外的中国人。

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联合朝鲜和台湾的老百姓；跟一切同情中国的国家合作；同一切保持中立的国家友好。

这些原则是作为当今中国中央政府当前的行动纲领提出来的，并非是共产主义的原则。

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曾经亲眼看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死在同南京政府进行的内战之中，而现在却忠诚地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当我和著名女作家丁玲相遇时，我惊讶地发现她还活着。多年前，她和她丈夫一起被关进南京监狱，以后一直杳无音息。大家认为她已在那里被杀害。我在同她讨论了她的新剧团后请她跟我谈谈她个人的经历，以及在据说她已经死了的情况下“她是怎么活过来的”。她犹豫了一下，接着回答说：“由于我们现在同政府建立了统



一战线，我不想谈论我在监狱中的经历。”共产党人有许多痛苦的回忆要忘掉，但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他们已经坚决地把它们忘掉了。

在中国，唯一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是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亲日汉奸。人们常常发现他们有时公开地、有时隐蔽地结成邪恶的联盟。战争初期，托洛茨基分子公开鼓吹一种理论——我在汉口时，他们中有一个人曾向我陈述过这种理论——即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工人的头号敌人，中国工人们应该帮助推翻它，甚至不惜通过日本之手。这是明显的汉奸观点，因此没有一个人公开追随他们，后来，连托洛茨基自己也在报上宣布放弃这个观点。有种种迹象表明，有些承认自己过去是“托洛茨基分子”而目前在中国政府或国民党中担任职务的人暗地里仍在执行这个政策。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是中国最严重的隐患之一，不仅危及共产党人的生命——他们已经搞了多次暴徒暗杀共产党人的事件，甚至危及中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例如，国民党的异端派人士过去都是公认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在武汉曾公开夸口说，他们要组织学生去打八路军。周恩来向我讲述过关于一些在空军中身居要职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情况，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中国和苏联的飞行员之间制造不和，他们甚至在南昌煽动向一名苏联飞行员开枪——他仅受了伤。我曾亲耳听到许多失败主义的谣传和造谣中伤，这些都是现在否认有政治色彩的前托洛茨基分子散播出来的。江西的将领们率领大部分部队奔赴前线时，他们把被共产党开除、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黄公图留下担任要职。他们刚离开，他就企图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他的企图没有成功，他和其他七十个人一起被处死。另外一名被共产党开除、后来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人，名叫张慕韬，他在1933年

企图引诱冯玉祥将军同日本人结盟反对蒋介石。后来他又在西安鼓动处死委员长。他因此而声名狼藉，于是就乔装打扮；后来人们发现他充当日本特务，化名在山西阎的新大学里进行活动。他被发觉后继续向北逃窜，仍然在替日本工作。最后他被八路军抓获，据最新消息，八路军现正在努力征求中央政府同意，将他处死。

由于八路军取得的胜利，共产党在中国的名望和声誉明显提高。在我访问期间，汉口所有的书店里，关于共产党人的书，特别是关于他们军队的书最畅销。其中《红军怎样成为八路军》一书居首位，其次是《回忆八路军》、《苏维埃特区的生活》和《毛泽东——一个革命家的传记》。只有关于上海英雄的书，才跟以上好销的书籍一样深受读者喜爱。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共产党人终于获准在汉口出版日报，其发行量在三个月内增加到五万份。据说，这是中国内地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共产党人现在的地位的取得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我在一九三七年年底访问汉口时，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象美国共产党人那样取得合法地位。十二月初，武昌学生举行集会，邀请周恩来去演讲，结果遭到镇压。可是到了二月份，周恩来成了国民军中央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他是由于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杰出才能而取得这个职务的。共产党人办的日报，尽管是合法批准的，但在发行后第一周，就遭到托洛茨基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暴徒的联合袭击，最后他们被报社的工人赶了出去。在其他场合，直至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还遭到政治暴徒团体的袭击，甚至遭到杀害。在各地，有时也在汉口，反动、腐败的官员们用高压手段镇压了共产党的活动。每当这些高压行为引起委员长注意时，他就立即下令禁止，并谴责那些肇事者。对共产党人报社的袭击是在委员长不在市里的时候发生的，因为，众所周知，他是支持他同共产党人

达成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协议的。

“如果中国赢得战争，国家就要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是国民党一些成员不时流露出来的怀疑。为了消除这一怀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声明，主动提出不仅在战争期间，并且在取得胜利后建设新中国时，继续同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几个月以后，即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共产党在汉口的机关报对此作了进一步有力的阐述：“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努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那么国民党就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它是为争取中国民族生存而斗争的最大的政党，它的领袖蒋介石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日战争的领导人就将是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到那时，谁还会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也将……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尊敬，谁也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推翻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将进一步发展在战争最艰难时期两党合作中逐渐形成的精神。”

毛泽东说：“共产党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它不可能在二三年，乃至五年内实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直到最后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的政府制度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机关报在上述文章中又说：“在胜利进程中诞生的”这个民主共和国在本质上“不同于欧美式的旧民主共和国。但是我们提议建立的也决不是苏联式的或者没有资本家的共和国。它将是，也必定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国。”

在中国实行民主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在这一点上所有政党都是一致的。中国朝这种民主发展的程度最明显的迹象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特别代表大会<sup>①</sup>以及

---

<sup>①</sup> 应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译者注

新建立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在七月初举行会议。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保证言论、新闻、集会和结社自由，但这些行动不得与国防基本任务相矛盾。它宣布，胜利不能单靠军事力量，而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认识到必须促进建立“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的联合会”，以吸引人民投入战争的任务并为参政作好准备。它成立了容纳各党派和政治团体代表的国民参政会，作为人民群众参政的开始。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依据周恩来的说法，“是十年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代表大会”。

七月的第一周，二百多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代表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的开幕式。他们有的来自中国诸省，有的来自五个特辖市，有的来自蒙古和西藏。国民党任命参政会的议长和副议长，并有权批准参政员的任命。尽管如此，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来自全国范围的代表有机会发表意见。参政员中有九十一名政府和党的官员，五十九名教师，六名金融家，六名文化工作者和六名新闻工作者。女代表有九名。汪精卫是国民参政会的议长。他宣布说，参政会的使命是“团结民众，使抗战力量不断加强，同时在抗战期间，为民主政治奠定稳固的基础，使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可以从容的进入于宪政时期。”蒋介石委员长也对参政会表示欢迎，称之为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共产党在二百名参政员中只占七名，它在一个正式决议中说：“中国的政治生活正沿着民主的方向继续发展。”

只有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才敢于在战争期间增加民主。已经采取的措施，例如组织人民和武装人民，保证了战后中国社会制度的任何改革都将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来进行。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党敢于提供比这更少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提出比这更高的要求。

但是,正当中国走向民主的时候,日本在迅速走向法西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皇家军部开始控制战争。三月份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五月份该法的几个部分已经实施了。于是军队中的极端分子在内阁中的力量已经大为增强。

从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争取自由的斗争就逐步发展成为全世界人民群众争取权利、反对法西斯压迫者和战争制造者的斗争的一部分。

# 十八、中国往何处去？ 世界往何处去？

如果“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只涉及中国，已经够复杂了。但是，由于地球上所有大国都卷入这场冲突，所以问题就成了“世界往何处去？”

一九三八年七月八日，为纪念战争爆发一周年，日本和中国都举行了官方的庆祝活动。从军事地图上看，日本可以夸耀说它已经占领了中国的四分之一国土——华东和华北的四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它的军队挺进的速度尽管减慢，但仍在前进。它虽然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派往大陆的一百三十万军队中，二三十万已在战斗中被消灭，四十万需要在满洲据守，六十万分散在支离破碎的一千五百英里漫长的战线上，<sup>①</sup>有的孤守在山西的一些城市内，陷于中国游击队的包围之中，只能通过空投来获得给养；有的正在长江沿岸蒸笼般的稻田里挣扎着；有的被黄河洪水困住。日本每天扔

---

<sup>①</sup> 埃德加·斯诺《星期六晚邮报》，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作者注

在炮火中的费用达五百万美元，<sup>①</sup>迄今耗资已是它在曾使它的青岛经济衰竭的日俄战争中全部开支的两倍多。可是，结束战争的前景看来比开始时更加渺茫，因为中国似乎才刚刚开始战斗。

中国损失惨重，并面临着今后更大的苦难。五十多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已经战死，大约五十万平民也惨遭屠杀。地平线上中国的民房在燃烧，火光冲天，表明敌军在步步进逼。一些城镇全城撤空，数千万人无家可归，长江三角洲曾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现在却成了一片废墟。中国失去了她四分之三的现代工业，三分之二的铁路，大部分国际港口和她两座著名的都城。中国人可以庆祝的主要是中国的新精神。由于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所以尽管中国损失惨重，她却比过去更强大。在汉口，中国人自称“在我们四千年历史中，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组织得更好，更加团结。”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中国这种精神远远超出前线范围；它使军事地图变得毫无价值。地图上标明的日占区里到处都是忠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和武装部队。北平仅是一座陷于游击战汪洋大海之中的用城墙围起来的都市；中国快速部队进入到它的郊区，占领发电厂。上海居民也几乎每天晚上都听到游击队在市郊开枪；单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有成千上万的中国非正规军队在活动。日本人派遣去管辖当地一些县的县长经常被当地人民杀死，他们只服从忠于遥远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县长的管辖，并保护他们。甚至日本人占领长达七年之久的满洲，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动乱；七月下旬，沈阳一座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军火库发生爆炸。几年前，当日本军占领满洲后得意忘形地说“象吃肉丸子一样鲜美可口”时，幣原男爵就警告他们，肉丸

---

① 《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作者注

子里也许包着一枚炸弹，会在他们体内爆炸。这个警告看来正在成为现实。

中国人说：“战争初期，胜利属于拥有火力最强的大炮的一方。战争结束时，最后胜利则属于在人与人搏斗中忍耐力最大的一方。”

日本在推进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削弱了它的力量，而中国却在这期间积蓄力量，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她时而减慢敌人的进攻速度，时而阻止敌人的进攻，时而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攻势。中国就是这样把三种不同的战争结合在一起：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三种战争都增强了她的力量。委员长说“我国地大物博，这使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的财力是无穷无尽的。”来自西南地区组织得最好的广西省的白崇禧参谋长公开表示，不管战争打多久，损失多大，中国能够继续保持二百万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农民战士们在占领区阻止日本巩固胜利。朱德对我说：“中国未来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北的农民志愿军。”

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开发内地诸省，在那里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基地。南京失陷后，中国迁都重庆。重庆离长江口有一千四百英里，前有著名的三峡天险，日本人对它鞭长莫及。历史上，中国领导人在遭到外来侵略时曾多次来四川这个省避难，并长期保持独立。该省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之称。一年两熟使各种农产品都十分丰富。近二年来，似乎为了应变，新建了六条大公路，把四川和邻省连接起来。这些公路使该地区丰富的煤、铁、铅、镍、锡、银、金和其它矿藏得到开发；甚至石油也有发现。它虽然比较闭塞，却可以通过友好国家同世界保持联系：南达法属印度支那，西南达英属缅甸，西北达苏联的土耳其斯坦——最近新建了公路直通这些国家。四川人民从来就是勤劳的；今天，他们觉醒



了，他们正在组织起来。

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打了很多胜仗，但他们在国内却开始在走向失败。经过一年的战争，日本国内已明显地暴露出种种疲惫不堪的迹象。生活费用上涨，主要商品实行了配给制，民用工业正在走向破产。铁锅很难买到，棉制品不再向市民供应；在爱国主义的借口下，人们被要求穿木屐而不穿皮鞋。日本在华北投资，原指望利用华北的丰富资源解决它的经济问题，结果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赔了老本；一些总值为一亿美元的纱厂在青岛被炸。一年前对日本来说还十分有利可图的华北市场已遭破坏。战争在日本人民中十分不得人心。他们依然顺从、爱国，但是，一千本各种各样反法西斯小册子的印发（据法务相承认）和公开宣布的一千三百名反战积极分子的被捕，说明已存在不满情绪。甚至在日本士兵中偶尔也发生兵变。据报道，大阪有七千名士兵拒绝开赴前线，徐州有两千名士兵不愿继续打仗。上海南市有十四名日兵同时自杀。他们留下遗书说：“我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因为我们不想打你们中国人。”大多数外国军事观察家在战争进行一年后一致认为，只要中国继续团结一致，日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征服中国。可是这决不是说，日本军国主义已处于穷途末路。现在他们不仅在为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而打仗，而且也在为他们本阶级的生存而打仗，因为国外的失败和国内不满情绪的增长，可能会危及这个阶级的生存。经过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总动员法的颁布和五月内阁改组，军队中的极端分子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比近代历史中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加强。同时，日本强大的资本主义也通过外贸渠道得到了其他国家，甚至是人民对中国友好的那些国家的资本家的援助。

日本在中国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日本本身的力量和中国的抵

抗；它还取决于在寻找市场的美国的铁和石油，以及正在寻求投资场所的伦敦城和华尔街金库里的黄金。这种国际援助向谁提供？给日本还是给中国？这些黄金去哪儿投资——去开发中国内地的矿藏，建设那里的工厂和铁路，还是资助日本开发满洲和华北？这些因素如果不会决定中日冲突的最后结局，至少也会决定其进程的长短。而进程的长短可能会对世界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可能制止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英国的影响在历史上是最长久的。三十多年来，她的外交政策帮助日本建立和发展了帝国主义——首先是在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日本对华战争期间，十年后在日俄战争中通过英日同盟。这个同盟在美国的压力下，由于签订了九国公约而解体，但它的阴魂不散，在实施九国公约时继续作祟。当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满洲时，英国两度拒绝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采取联合外交行动的建议；她在国际联盟中支持日本。这不仅为国际联盟的衰退，而且为世界范围的法西斯侵略打开了大门。希特勒法西斯的兴起，对埃塞俄比亚、西班牙、中国和奥地利的入侵，日德意对国联的公然蔑视，他们之间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都是英国采取那个行动的结果。今天，在英国扶植下已经羽毛丰满的日本法西斯正威胁着它的恩人。日本士兵在中国践踏英国国旗，向英国炮艇开火，用机枪打英国大使。连日本老百姓都毫不掩饰地说，英国必须从东方滚出去。

因此，英国对华的政策是摇摆不定的。精明的老阎在遥远的山西对我说：“英国不希望强大的日本帝国在亚洲大陆上威胁它自己的利益。她更不希望在中国有强大的苏联影响。如果中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英国也会不高兴。”伦敦城希望所有的大国都成为她的债务国，只要他们有能力还债就行，但不能强大到要对她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九国在布鲁塞尔开会

时，英国帮了日本的忙。主要是由于她施加了影响，联合抵制行动才遭到了搁浅。可是，英国港口香港却是中国战争物资入境的主要口岸；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并可以消耗日本的力量。当张伯伦认为日本确实正在衰退下去时，人们就可能发现英国会在“为了和平”的幌子下企图关闭香港到中国的通道，以及建议张伯伦作为调停人对东京进行“绥靖”。英帝国主义在坐等日本筋疲力尽，以便在“秩序”和“稳定的和平”的口号下建议对中国进行瓜分。这是中国在战争第二阶段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可是张伯伦在这方面的行动可能比他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进行的交易更促使英国人民起来推翻他，因为这些行动为满足伦敦城的阶级利益而牺牲了英国的利益。

希特勒德国比英国更加动摇不定。日本是它的盟国，而中国却是它的市场。大战后，它同中国的贸易迅速发展，超过了美国，接近美、日。<sup>①</sup>一九三四年，有一百名德国军官在中国帮助中国军队并开辟德国的军火市场。如果用德国的工业品来换取中国的原料，希特勒的许多问题也许可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日本在世界市场上用它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便宜的工业品同德国竞争。这样，贸易的利益使德国站在中国一边，可是日本是它反对苏联的军事盟国。

德国的盟国和它的市场之间的战争使它十分恼火。战争既破坏了它在中国的市场，又削弱了它寄予希望的日本军事力量。起初，德国大使曾试图对冲突进行斡旋，以便帮助日本通过外交途径

---

<sup>①</sup> 一九三六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占百分之十九点六，从日本的进口占百分之十六点二六，从德国的进口占百分之十五点九。如果包括冀东的非法进口，日本所占的百分比更高。——作者注

至少部分地实现它对中国的企图，并使它避免在长期战争中消耗自己的力量。谈判失败后，德国就转而帮助中国，它向中国运去了大量军需品，并大大增加了军事顾问和工业顾问——依然试图加强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德国报刊甚至开始赞扬中国人民的英勇事迹。“种族研究委员会”宣布中国人是“雅利安种族”，<sup>①</sup>这是一个荣誉称号，过去在东方人中是专门授于日本人的。可是，一九三八年暮春，日本对援助它的敌人的盟国进行了制裁。那时候，正值德国经济形势困难，它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又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迫切需要任何朋友的支持，因此它顶不住日本的压力；它召回了军事顾问。它甚至谈到要削减军需品的供应；但对这一点，它将根据其所受的压力的程度来决定，因为它只希望在它同苏联发生战争时日本继续成为它的盟国以及中国在战时和战后重建工业时它能获得第一位的贸易。

苏联的政策是鲜明一贯的。它希望和平，希望有一个友好的邻邦；她既不需要领土又不需要市场。她的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都促使她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但避免自己武装介入战争。即使它不介入战争，它东部边境上牢固的防御工事，对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日本计划将来进攻苏联，它就必须保存更多的后备力量。不过，苏联对中国最大的援助，是它努力实现民主力量的集体帮助。它的永久的“和平政策”不是建立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单独的援助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集体行动的基础上。<sup>②</sup>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地球上大多数

---

① 彼得·德拉克，《亚洲杂志》一九三八年八月。——作者注

② 例如，苏联是主张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采取联合制裁、对入侵西班牙的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的主要发言人。——作者注

人民希望和平，赢得和平的方法是隔离侵略者；民主国家的进步人士普遍持这一信念。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的演说最好不过地反映了这个信念。因此，它同张伯伦推行的增强侵略者食欲的“绥靖”政策截然相反，它也不同于美国所谓的“中立法”所代表的观点，这个中立法在不介入的借口下，援助了侵略者。苏联的政策是通过削减对战争制造者的供应，在不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增加对被侵略者的供应，帮助被侵略的国家，帮助世界和平事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帮助中国、加强那些能阻止这一冲突发展成为一场世界大战的世界力量的步骤，其中主要的是她在国际联盟施加外交压力，并促成国际联盟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通过一项决议，敦促所有成员国考虑它们如何尽力对中国作个别的援助，后来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又通过了一项措辞更为强烈的决议，“迫切要求，务请将……中国政府……所提出之要求，亦应切实加以考虑。”这两个决议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够作为国联忠诚的成员国、而不是作为布尔什维克俄国向中国输送军火。这种表面上的遁辞在外交上是重要的，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任何例外的援助都可能被解释为苏联介入冲突，德国和意大利也许会借此增加对日本的援助。出于同样的理由，苏联向中国运去的武器，尽管据说数量很大，却没有广为宣扬。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德军事同盟缔结后，苏联就停止向日本输出铁和其他战争物资。（法国也停止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迅速减少了跟法西斯同盟中三个大国的贸易；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的贸易额只有一九三六年同期的一半。当前这场战争爆发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中国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日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当任何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对该第三国不得提供

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援助。所有这些措施并没有扩大冲突，但却帮助了中国；这些措施减少了对战争制造者的物资供应，并加重了世界对他们的压力。

美国大谈其对中国的同情，其调门比任何国家都高，但它在帮助日本方面却比任何国家都做得多。按说它比其他国家更有义务帮助中国，因为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都是由美国发起签订的。根据这两个公约，日本是违约国，应对其采取行动。如果没有美国石油和废钢铁源源不断的帮助，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就无法继续下去。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它战争物资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sup>①</sup>石油和废钢铁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二，百分之百的飞机用高挥发性汽油和百分之九十的卡车。美国传教士讲述了一批批一望无际乘着美国卡车的日本军队穿越洗劫一空的长江三角洲的情景。如果美国拒绝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日本虽然可以从其他国家买到一些，但它完全依赖美国的供应与其重工业配套的特种钢、机床和润滑油。美国资本家对日本的偏爱超过了对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响应了它的要求。比思尔汉钢铁公司声称，对“新政”中一些和平

---

<sup>①</sup> 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一直对其战争物资进口情况保密，但是，中国经济研究委员会把它们列成细目如下：百分之五十四点四从美利坚合众国进口，百分之十七点五从英帝国进口，百分之七点四从荷属印度群岛进口，百分之三点八从德国进口。法国和苏联没有向日本出口。在具体商品方面，美国提供了百分之九十一·二的汽车和部件，百分之六十·五的汽油（一百号高挥发性汽油），百分之五十九·七的废钢铁，百分之四十一·六的铁，百分之四十八·五的机器和发动机。

如果美、英停止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美国每年损失贸易二亿一千零八千美元，占它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六点三，英国每年损失贸易六千七百六十八万三千美元，占它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点三（1937年统计数字）。——作者注

建设项目所需的钢材，他们无法降价；而他们卖给日本的钢材却降价七点五美元至十美元。①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日本连续十六天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死亡人数达一万人），它的野蛮行为遭到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抗议。可是，空袭时，飞行员是日本国防部派遣的，而在大屠杀中使用的炸弹、飞机、高挥发性汽油、润滑油、强棉药和化学品却都是美国提供的。无怪乎日本在回答美国国务院的抗议时蛮横地说：“日本将加强空袭——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密苏里参议员克拉克说：“我们一方面继续出售制造炸弹的原料和使用炸弹的机械，一方面对使用炸弹表示遗憾，这是十足的虚伪。”甚至墨索里尼控制的意大利报刊都发表评论，讽刺美国的抗议和美国实际行动之间的悬殊差别。

许多热爱和平的美国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援引中立法来阻止向远东输出战争物资。他们不知道，这个法并不中立；如果把它援用到远东冲突中去，将对日本更有利。它禁止输出军火，但却不禁止输出原料；因此它总是对力量强大的侵略者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购买原料生产各种武器。对当前这个冲突虽然还没有实施中立法，但实行中立原则的结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政府关于禁止政府资助的船只装运“武器”的命令，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十九架运往中国的飞机从“威切塔号”货轮上挪下来。可是当码头装卸工人为反对向驶往日本的船只装运废钢铁而屡次向政府提出抗议时，得到的答复是，从技术上说，废钢铁不是“军火”，因此可以装运，甚至连政府拥有的船只也可以装运。

---

① 保尔·麦克曼纳斯，“美国控制日本”，《新群众》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作者注

许多美国公民为他们的国人帮助日本对华战争而感到羞耻，他们组织起来联合抵制从日本进口商品，以减少日本进行战争所必须的资金。他们特别呼吁抵制一切丝织品，尤其是丝袜，因为美国市场上的丝织品几乎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丝织品是日本从美国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抵制运动效果显著。美国从日本进口总值从一九三七年头五个月的九千二百三十八万六千美元下降到一九三八年头五个月的四千七百八十六万八千美元。后几个月，由于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抵制，下降的幅度最大；五月份只有七百零二万美元，比上个月的一千八百二十四万美元下降了百分之六十。由于进行了抵制，日本的购买力下降了千万美元，这无疑挽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日本在美国的购货量也在不断减少，<sup>①</sup>虽然减少的速度没有它销售量减少的速度快。它现在正在用它在国外的财富储备来购买战争物资。这些储备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在战争第一年，它们从四亿美元减少到三千五百万美元；结果，它在世界各地除菲律宾以外<sup>②</sup>的船坞都停业了。联合抵制的主张越来越得人心。<sup>③</sup>

① 一九三七年购买货物总值二亿八千八百万美元，据估计，其中二亿一千零三十九万八千美元用于购买战争物资。一九三八年头五个月一共购物七千三百万美元，全部用于战争物资。而中国在一九三七年购买的货物，包括非军事物资在内，总共才不到五千万美元，一九三八年头五个月才一千七百万左右美元。两个数字成鲜明对照。中国在获取信贷和运输方面也面临着困难。——作者注

② 哈勒特·阿本达，《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九日。——作者注

③ 一九三七年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抵制的人占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三八年二月幸运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的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二；一九三八年八月国民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的人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九。——作者注



个人的行动代替不了政府明确的政策。除非美国政府制定一贯的计划,通过对战争贩子的隔离来支持世界和平,否则美国商人就会使他们的国家变成每一次世界性侵略中的主要同伙。一项争取远东和平、实现美国繁荣的全面规划不仅包括抵制日本进口和禁止向日本销售战争物资,并且还包括美国支援中国内地诸省和平地实现工业化。中国内地矿藏和农产品十分丰富,人口众多,人民勤劳;迅速发展这个地区就能拯救中国民族。美国对此给予援助或许也能拯救美国,因为这将使我们的工厂一连忙上几年,我们几乎连续不断的萧条就能得到缓和。中国战争伟大的第二阶段就可以缩短,中国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的危险就可以减少。在太平洋彼岸就会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国家,从而加强世界和平。

所有中国领导人都知道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这个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并对此表示不满。蒋夫人写信对我说:“我们是民主国家软弱无力的牺牲品。”她接着警告说:“破坏国际法的行为会象现在伤害中国一样伤害其他国家。”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末公开说:“如果美、英、法和俄等国联合起来,态度坚决,团结一致,那么不用采取武力手段就可以制止日本侵略中国。”我在中国遇到的每一个美国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他们说:“中国在为我们而打仗。如果日本将它制服,并利用它庞大的人力资源来实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计划,这将意味着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一切都将遭到彻底崩溃。如果中国维护了独立,它的发展将巩固世界繁荣、民主与和平。”

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汉口对我说:“美国应该考虑一下它自己的面子。美国倡议了九国公约并在公约上签了字,它怎么能对日本破坏公约的行为保持中立态度?国际协定不是由那一个国家制定的,不能由她通过一个国内法来废除它。即使美国忘记了她对中

国承担的诺言，她怎么能看不到对她本身的威胁？日本发展海军是针对谁的？不会是针对中国的；它是针对菲律宾、夏威夷、阿拉斯加的。我们只是日本练习射击的靶子。美国的‘中立’既害了中国，又害了美国，甚至也害了日本人民，因为它扼杀了日本国内一切温和派的论点。青年军官们会回答：‘你们谈论什么九国公约和国联；我们把这些都砸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旦这些青年军官在日本掌权——即使他们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那就当心世界的命运吧！制止日美战争最好的地方当前就在中国。只要你们让我们拿到武器，我们就会替你们打仗。可是——愚蠢得令人惊愕——你们非但不帮助我们，反而在帮助日本！”

当美国在远东最活跃时期，国务卿约翰·海曾说过：“世界和平取决于中国，谁了解中国……谁就支配着今后五个世纪的世界政治。”在我们这个愈来愈辽阔的地球上，仅有三四个国家人口如此众多，如此生气勃勃，如此团结一致；因此，他们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北美洲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为苏联；第三个是中国。英联邦只要继续团结一致，也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可是不列颠群岛却不是。欧洲如果联合起来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欧洲目前四分五裂。

在人类历史中，中国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过去，她是其周围国家文明的源泉。欧洲发现她时，她成了所有帝国主义者的百宝箱。她的前途掌握在她的人民手中，他们在四千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民族。热爱人类自由的人们谁也不敢对那个前途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五分之一人类的解放是本世纪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因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赢得自由之时，世界解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中国人征服中国



# 前言——关于白皮书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历史上著名的自供状之一：《美国与中国关系》，通常称之为白皮书。我把这份白皮书同我这本书的清样放在一起读过之后，对外交官们能得到这样好的情况汇报十分羡慕。早在几年之前，他们就掌握了有关中国的一切必要情况。

他们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就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富有生气的力量”，“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由于得到人民的赞许和支持，由于人民全心全意地同他们在一起战斗”，“其基础是一场温和而民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外交官们还知道“普通老百姓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些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如果哪一个政府剥夺他们刚刚获得的这些利益，人民必将继续同它进行斗争”。他们也知道“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什么来自莫斯科的物质援助”，尽管两者“目标一致并有意识地相互接近”。

国务院从大量报告中获悉，蒋的政府“不再代表这个

国家”，而是“士气低落，不得人心的……反动派，同过去的军阀没有多大区别”。在对日作战方面，它也谈不上是一个可靠的同盟，连雅尔塔协定也不得不对重庆隐瞒，不然“日本人立即就能得到情报。”他们知道蒋的封建政府无法同华北的符合时代精神的生气勃勃的政府长期共存”。

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就知道蒋企图发动内战，而“共产党必将赢得胜利”。正因如此，马歇尔将军才前去中国“帮助国民政府在尽可能广阔的地区内建立政权”。一九四七年马歇尔撤回美国时曾告诫蒋：他的“军事行动将会遭到失败……并最后毁灭国民政府”。

这些情况华盛顿当局全都了解，但却让美国人民负担“中国政府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达四年之久。他们派出巴大维少将率领一个美军顾问团，传授美国军事技术，为蒋打气，企图挽救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但是，蒋之所以吃败仗并不是“由于缺少武器弹药”，而是由于缺乏“战斗意志”。国务卿艾奇逊就是这样说的。

一个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例子是：“中国空军……尽管拥有五千余名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飞行员，却没有作出什么成绩……中国空军对于杀害没有空军支援的共产党本来就十分不满”。我的话没有一句能抵得上巴大维将军的这个报告。我的任何结论也不如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发出的电报那样具有说服力：“两个月前，美国人亲眼看到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天津，他们用的几乎全都是美式配备。……在满洲的国民党军队实际上没有作战就拱手让出……。有过这种不愉快经历的美国人对于国会考虑提供又一笔十五亿贷款感到惊讶”。

最后，约翰·司徒雷登大使不得不这样报告：“我们的援华计划受到了谴责，连它的直接受益者也指责这一计划是延长内战的因素。……我们支持了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帮助他们继续掌权，

而这个政府并没有把本国的利益放在心上，我们对此负有责任……我们受到了责备。”

华盛顿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自取灭亡的政策？又为什么要坚持下去？白皮书说明不多，但却很重要。

请听杜鲁门总统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发表的哀伤的讲话：“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不愿意在中国政府中或其他国家政府中看到有任何共产党人。”再看魏德迈中将所做的坦白的军方声明——难怪他一九四七年的报告一直扣压到现在才发表——他说共产党控制中国的结果将“拒绝向我们提供用于发动进攻的重要的空军基地”。而华盛顿所要的中国是要它“不仅提供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在人力方面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盟国”。

我们的外交官掌握了情况，而我们的将军们则加以利用。现在应该由美国人民掌握它，用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了。这本书是为美国人民写的，不是使用外交官的语言，而是通过故事、图片和谈话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新的领导人的目标以及他们赖以取得胜利并开始重建自己国家的各项政策。因为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相似的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国人民的利益在于友好、和平、贸易、对各自人民负责的政府，以及在于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种稳定的、不断发展的富裕的生活。



# 一、回忆涌上心头

黄昏时分，风向变了。船工们脸上露出了笑容。现在他们可以利用风帆快速地驶向大河对岸了。“我们的毛泽东为我们借了东风。这是一个好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夜晚，炮弹越过等候过江的人们的头顶，飞入远方对岸的敌军阵地。烈火划破了夜空。一颗信号弹打响了。成千上万艘小船鼓起白帆，乘大好东风，快速地穿过敌人的炮火，越过炮弹掀起的水柱，奋勇前进。

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江南的村子里追击蒋介石的士兵了。老妈妈们端着开水说，“我们盼望了多时，你们终于过江了。”

百万战士驾着小船，经过三天的战斗。在长达千余里的战线上，令人不可置信地渡过了长江，动摇了亚洲古老的秩序。

炮弹击中了四艘英国军舰。这是中国人遇到的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但是，即使伦敦也无法提出抗议。一

百多年来，武装的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现在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人民正在接管自己的国家。

江边码头、城市和碉堡，象成熟的梅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掉进了农民的篮子里。第四天，攻占了南京。在上海，市内的邮递员走出市区为他们引路。征服者们到来了，他们在十字路口做上了通向城市的标记。他们谢绝了赠送给他们的礼品、食物甚至开水。“因为不希望打扰老百姓”。他们睡在中国银行附近的人行道上，但不进入银行。“里面有钱，如果我们进去了可能会引起麻烦”。这是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最强大的军队。他们对卑贱者表现谦虚，对趾高气扬者表现傲慢。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纪律的农民。

许多美国人不寒而栗。“是莫斯科的势力进来了吗？”但是胜利者却是带着美国的枪支来的。他们在电台兴奋地宣告：“中国人民的力量比最先进的美国武器还要强大，我们已经缴获了这些送来反对我们的武器。”他们自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一百年来不靠外国顾问而取得胜利的第一批中国人。

毛泽东发布了“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命令，还为船民借了东风。这位毛泽东是谁？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从来没有出过国。他在大学学过中国古文和现代西方学说，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他把这种分析运用于中国情况和中国人民面临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他是一位大师。他在中国农村的中心地区被封锁了二十多年，从贫瘠的西北的一个窑洞里运筹帷幄，组织领导了今天的胜利。他自称他进行的这场革命始于孙中山。他正在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毛说，这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纲领是“相互一致”的。

这场革命真的同以孙中山为国父的“国民革命”一样吗？真的是被蒋介石、日本和美国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大革命”吗？很显然，大多数中国人是这样看的。几亿农民说，“我们终于有了土地了。”几百万工人在工厂正在以一个集体的声音说话，他们从一开始就进行了这样的革命。小商人说，“他们不会比蒋匪帮更坏。共产党是允许自由企业的。”

那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呢？几千年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就取决于这些学者的认可。许多人早就偷偷地越过战线，加入了新政权。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前进的旗帜之下，学习管理城市。他们特别把这场革命看作是把中国从外国控制之下解放出来的“国民革命”。民主同盟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北平广播说，“整个亚洲的解放已经开始了”。

从印度到日本，到印度尼西亚，亚洲各国人民都在注视着。因为整个亚洲都在经历着一场“人民革命”的阵痛，而新亚洲的第一个新生儿就在这里。

我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隔着一个大陆和一个大洋注视着，渴望能够置身中国。当时我曾说，“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大革命’。这是一个普通人的世纪，他们在亚洲唤醒了占人类半数的东亚和南亚亿万人民。他们曾经是落后、饥饿和没有文化的人，现在他们正在勇往直前。中国创造了一种模式。中国是他们的最新又最近的模型。中国同时还是太平洋上一支新的力量，一支能够对世界和平起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这或许意味着制止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力量增强了。”

回忆起二十多年来我在中国看到的变化，往事一齐涌上了心头。

首先是香港著名的大罢工。当时有十万名中国工人离开城

市，在沿海组织纠察线，阻止同英国的港口作生意。香港一天要损失一百万美元，因而向伦敦求援。美国领事对我说，“你知道当淘金热过去以后那些西部的象鬼一样的城市吗？我怕在东方的这个最大的港口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府。军阀们统治着一些县和省，把中国零零碎碎地卖给外国以换得他们的支持。北平是外交官们的学都，因为这里对于外国列强比较方便。范妮·鲍罗廷曾在北平对我说，“到广东来吧！那才是现代的中国。我可以给你搞一张许可证。”我是这样才知道她的丈夫米契尔·鲍罗廷的。鲍罗廷由孙中山从俄国请来担任他的新的“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当时除俄国以外，根本没有别的国家愿意同孙中山打交道。

英国轮船停泊在广州城外离沙面不远的地方。一艘中国的摩托艇从岸边驶来，艇上挂着一面迅速传遍全中国的新的旗帜——青天白日旗。范妮·鲍罗廷坐在船尾，当我快步踏上小艇时，她显然松了一口气。“我怕你带别人下船。罢工的工人只允许下来一人。几个星期以来还是第一次允许去接一艘英国船。他们想要你去看一看他们在广州的新的国民政府。”

那就是国民党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的合作——一种不稳定的联合。穿绸长衫的政府官员们害怕这些工人的粗鲁，却又利用工人的罢工来反对他们的英国对手香港。罢工工人对穿绸衣的官员们怒目而视，而对其反对“帝国主义”则声言支持。广州摩擦之声时有所闻，但广州是有力量的。在罢工工人的严格控制下，我参加了一次有二千名女工参加的群众集会。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接管自己国家的力量。

两年以后，我在扬子江上看到了这个政权的分裂。有外国炮

舰巡逻的奔腾不息的扬子江把中国分成两半，只有人民的大团结，才能越过这一屏障。蒋介石因为同上海的资本家和外国列强达成妥协，才取得对南京的控制。但他的中央委员会中的三分之二仍然在内地，处于“红色汉口”的统治之下。鲍罗廷在把我介绍给一位中国领导人时说得很妙：“斯特朗小姐革命的运气不好，对俄国革命来说，她来得太晚，而现在到中国又来得太早了。”

我恼怒地回敬了他一句：“我年纪还轻，可以呆在这里，亲眼观察这次革命的过程。”我哪里知道那时已是他作为“高级顾问”进行最后挣扎的一个月，并且很快就要逃往北方去了。我不知道中国革命会延续多久，更想不到当它到来的时候，我却错过了。

当时在湖南，“人民政权”的兴起何等迅速。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有多快！他们针对当时需要采取的行动是多么准确和切中要害：以“人民粮食”的名义实行稻米控制；通过“人民法庭”审判大流氓恶霸；为穷人兴办“人民学校”等。凡是见到过华南“人民政权”的人，那怕是象我那样只看到它的残余的人，也不会把它忘记。

毛泽东在“人民政权”处于高潮时期看到了它并把未来的政策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当时没有人知道毛。事隔二十二年之后，我在莫斯科整理老的档案资料，找出了几封旧信的留底，希望把它带到中国去，让人们看一看，早在一九二七年，我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判断就同毛泽东是一致的。我只是写到了这一点，而他不但看到了而且为此进行了筹划和奋斗。

在汉口的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季，人们端坐不动也要汗流浹背，代表十四个省、四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这些翻身工人的脸上显示出了多大的力量！他们穿过战争的封锁线来到这里，为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而组织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有来自上海的鼓动家、运输工人俞（译音）；有

来自广州的老印刷工人马(译音)；还有来自湖南的至今仍以朝代计算时间的老矿工。瘦削的、年仅十几岁的纺织工人们开玩笑似地讨论着如何在归途逃避折磨和死亡，如同大学女生们讨论如何逃避老师一样。

那些工人们涌入中国心脏地区扬子江沿岸的由外国人统治的孤岛——外国租界，并以中国人民的非武装力量把它们收回。汉口的达官贵人因此惊恐万状。他们想把租界交回去。但是权力不在他们手里。他们被人民支持的强大力量吓怕了。汉口就这样陷落了。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力量处于分裂状态。其最强大的一部分潜藏在地下。我总以为有朝一日它一定会重新崛起并坚持下去。在湖南农民运动以后，我感到这就是新的力量。它是各民族交响乐中一个新的乐章。一个古老、智慧而宽容的人民，其创造力从此获得新生。

我从来不去注意蒋介石在南京的统治。它是对伟大而诚实的人民力量的严重歪曲。当十年之后的一九三八年我再去中国时，日本的侵略迫使中国形成一种局部的团结。蒋的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在上海和南京被击溃，他把汉口定为他的临时首都。他的那些中国大资本家在香港积蓄着自己的个人财产；美国、英国、法国，他的那些外国保护人正在向日本出售废铁，并从南部对中国进行了封锁。只有俄国经大沙漠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提供援助。蒋被迫以中国人民为后盾。

那是蒋的时机。所有爱国者都团结在他的周围。他在没有人警卫的情况下骑着自行车在汉口到处转。他家的一位妇女告诉我：“他只要权力。现在他还需要声望。当他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并受到人们欢迎时，他感到很高兴。”这是蒋统一中国并以中国救世主的地位载入史册的机会。他仍然是一个同大商业结合的军阀，但同时又是怀仇记恨的军阀。他的时机错过了。

我乘坐阎锡山将军的专列前往北方战区访问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由共产党人朱德将军领导的八路军。这支军队在日军敌后正广泛开展袭击活动。私人专列是战区式的，很不舒服。餐车的窗玻璃打破了，户外气温零度。我往餐车桌子上我的肥皂盒里倒了一点水，看会怎么样，结果在四十分钟内结成了冰。我们在卧铺包厢里放了炭盆取暖，直到一个男人被烟熏昏为止。晚上你无法在通道走路，因为阎的警卫在过道上横七竖八地睡觉，到处都是他们的胳膊、腿和身体。

由于阎是第二战区的司令官，因此从技术上说，朱德的共产党军队是在他的管辖之下。阎说他们是“服从的”。“在我的战区里，所有的军队都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相信它。其实，阎是一位年长的封建领主，军事上并不在行。即使他曾经发布过任何明白无误的军事命令（这一点我是有怀疑的），他也不可能跑到山上去督战。他高谈阔论社会改革的哲学，对乌托邦的讨论远比单调乏味的对日战争更感兴趣。在火车上，我曾经同他作过多次交谈。他对共产主义礼赞备至，但却因其幼稚而不予采用。当时他的理论是通过消灭货币来实现社会改革。但是他接受单一税论和休伊·朗的“财产均分论”。他镇定沉着，说话慢条斯理，手势富有表情，具有舞蹈家的节奏感。他用手势能建立和消灭一些国家，能丈量时间和空间，能安抚城市和农村。阎是山西的独裁者，虽然已被赶出省会，但他仍然自认为是上帝。

阎也有自己的时机。当他搬进山西的一个窑洞，而不是到北平去当日本的傀儡的时候，他在爱国人士当中争得了很大的面子。

那是一个非常雅致的窑洞，里面有套房和高级地毯，也是一个很好的防空洞。如果阎能在战区死去，或者活着，但能不用会做手势的手去干预人民的命运，他可能成为一位光荣的祖先。但结果是，山西农民恨阎更甚于恨蒋。中国有一句谚语：“你不可能说服老鼠相信狮子比猫更可怕。”蒋是距离遥远的狮子，而阎却是本地的随时可能扑来的猫。以阎为首的各种乌托邦进行的勒索更甚于普通军阀的掠夺。阎一九四九年再次被赶出本省。这次是被他自己的人民赶走的。在异乡广州，他成为逃亡政府的最后的象征。

火车上有一个人应予纪念。他就是刚从蒋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性格开朗的李公朴教授。他同六百名学生一起北上，准备在阎的管辖之下开办一所国民革命大学。“我们已经有一千五百人报名了，”他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出身有闲阶级，喜欢平静而安逸的生活。而在这里他们却象疯子一样争着上前线。他们象普通士兵一样乘坐的是装货的棚车。他们知道在山西要挨冻受饿，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对这一切都不在乎。他们唯一的担心是不知道这所大学到底会办成什么样子，是不是真能有益于国家。”他笑了起来。“你能指责他们吗？即使我这个筹备开办这所大学的也不知道阎会允许我们做什么。我知道我们必须唤起民众，组织他们，训练他们和武装他们，在政府中输入新的血液。我认为守住作为煤铁中心的山西山区比浪费许多军队企图守住上海要重要得多。”

李公朴豪迈地进入山区。他的国民革命大学失败了。在阎的统治之下，你又能干得出什么呢？后来，李花了两年时间在敌后共产党统治区办了教育。当一九四〇年我同他在重庆再度会面时，他冒着巨大危险给我带来一叠传单。由于传单印色很差，已经消褪，但对我仍十分珍贵。李后来在昆明被蒋的爪牙暗害。他是作



为一位优秀的民主同盟盟员而死去的。他将永远活在中国大学生的心里。

这次伟大的抗战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机会，不论是蒋、阎或李；也不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共产党以大无畏的精神发挥了人民的力量，而蒋介石却压制人民。从此，共产党人开始非法活动，进而取得胜利。

在抗日战争第一个年头实现的任何一点民族团结，在一九四〇年都遭到了破坏。当时我从莫斯科经新疆沙漠飞往重庆，是走这条新航线的第一个外国人。这时候，蒋正以他最好的部队封锁共产党，并把美国供应的给养保存起来为日后内战使用。在战区，大约有五十名蒋的将领投向日本方面，而重庆并不加追究，因为他们打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这叫做“曲线御敌法”。到处流传着一个一针见血的笑话：“日本人只是中国身上的虱子，而共产主义却是心腹之患。”

共产党的外交代表周恩来，住在重庆的一个简陋小屋里，处于半地下状态，但还比较安全，因为他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他花了好几个晚上向我长篇介绍了蒋的将军们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两年来斗争不断加剧，但双方都仍然封锁消息。“等我通知你时再发表”，周告诉我，“我们不愿过早透露这些冲突使磨擦加剧。但如果蒋进一步发动更严重的进攻，我怕蒋会这样做的，我们希望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的材料能够在国外发表。”

就在这一个月，蒋的将军们屠杀了上万名新四军，其中包括军官家属、医院里的伤病员和整个后方警卫部队。当时我正在前往旧金山的船上。在纽约我接到通知：“现在可以发表你掌握的材料了！”就这样，在重庆被封锁了两年之久的关于这场隐蔽战争的消

息，在纽约公开发表了。

当时在重庆还有一件事，其意义我是很久以后才了解的。李公朴向我通报了北方农民抗战情况的消息，邀请我参加一次知识分子头面人物的会议。出席的有来自教育、商界和福利组织的知名人士大约二十人。他们的情况很不相同，但都渴望有言论自由，以反对蒋的日益加剧的压迫，同时又都对如何组织政党一无所知。他们竟向我这个到处漫游的新闻记者征求意见。我把它看作是礼貌的表示，便客气地介绍了一点有关党派联盟技术方面的形式，它是由我们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州团体联合会制订的。他们似乎从中发现了新的东西。我以为他们是——上帝宽恕我——一批文雅而不成大事的人。六年之后一位被蒋介石警察局到处追捕的高级人士在上海问我：“你认为你帮助我们建立的那个团体怎么样？”

“什么团体？”

“你在重庆见到过的我们那一批人，后来又开了几次会议就成立了民主同盟。”是的，这就是许多政治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一九四六年，我再度回到中国。等待了二十年的机会来到了。在对日战争和蒋介石封锁的铁幕后面，北方的那些被世界称之为“共产党”区域即他们自称的“解放区”日益壮大。有少数几个大胆的记者已经到过延安，但其他的更大的区域则还没有人到过。现在突然之间，通过我们所说的“马歇尔停战”，这些地区突然开放了。在北平成立了一个超政府机构，名为“军调部”，由美国人任主席。美国的军用飞机可以从北平飞往华北和东北的近四十个点，每个点都设有“停战小组”，也由美国人任主席。这样，美国空军就可以进入全中国，一直可以到达苏联边境。对于有时间也有愿望进入解放区的记者来说，门也打开了。

机会既难得又短暂，我抓住了它。我在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为这本书收集了基本资料。一九四七年三月，内战逼近延安，军调部连同飞机和停战小组一起撤走了。

是毛泽东告诉我，必须搭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延安。“不然，恐怕得在两年之后我们才能把你送出去，使你重返世界。你已经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看到了我们的解放区，把这些消息带出去，以后你还可以再回来。”这时候延安正在遭受轰炸，已经差不多撤空了。毛本人住在几英里之外的山里。

我要求留下和他们一起进山，因为他们是非常友好的人民，因为他们正在创造世界历史。在被孤立、被围困的延安，我感到了一种一生之中从未有过的对建设世界的人们的亲近感。李敦白留下了。这个北卡罗莱纳州的小伙子是按照我的建议，步行三十天走到延安的。他把沿途收集到的材料都给了我。康纳尔的农场专家恩斯特<sup>①</sup>也留下了。他北上内蒙古，向人们讲授如何保护牲畜，为工厂设计简易农具以便春季制造。教友会的救护队也留下了。他们同民用医院一起转移。他们都是中国人需要的、有专业知识的年青人。

我知道自己不能留下来，我赶不上他们行军的步伐。

他们十分有礼貌地说：“你现在是唯一掌握我们地区情况的人。一切过去出的书都过时了。那些书只写了延安地区的事情，而现在它只是解放区中最小的一部分。那些书只写了对日作战的情况，当时美国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要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蒋企图在美国援助下消灭我们。这就改变了所有的政策，我们的土改政策，我们的战略。所以，现在你掌握的材料

---

① 即今天仍留在中国的阳早。——译者注

是独一无二的，你要出的书是绝无仅有的。把它带往美国，告诉全世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当我们重新和世界取得联系时，你再回来。”

这是一种很好的“不丢面子的说法”，同时也是真实的。

美国对此不感兴趣。我在上海坐下来进行写作，把一大堆材料送往美国。我打电报给书籍出版商和演讲组织者以及朋友们，告诉他们我将带着我的稿件回来。他们的回答是：“中国已经没有意思了，共产党搞不下去了。你通过俄国和欧洲回来吧，现在我们对这些地区有兴趣。”

但是印度人、日本人还有来自南洋的人们对中国感兴趣。有些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人来看我，对我说，“大家都要了解这些地区。”我给了他们一份我的手稿。后来我听说孟买和加尔各答都在争夺出版我写的有关中国书籍的权利。

一位日本人把我的手稿翻印了六份，全书已有四百页之多。他说：“我们不知道麦克阿瑟能让我出版多少。具有各种政治观点的日本人都对中共很感兴趣，他们是唯一能击退日本武装力量的中国人。”

这些亚洲人特别要得到我所有的毛泽东著作，任何片言只语都要。当时共有六、七篇他早期有关文学、财经、政府、战略方面的讲话，翻译和复印的质量都很差，是在延安向记者散发材料时用的。记者都没有拿。现在这些复印件只有历史价值，已经难以辨认了。但印度人对这些材料印了又印，目的是广为散发。

“我们只收到两本毛的著作。”一位印度人说，“但是我们懂得，对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是重要的，而且也要学毛主义。”

“难道毛已经成为一种‘主义’了吗？”我笑着问。他说当然是。

“因为毛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决亚洲的问题，运用得最好。”

于是我暂时放弃去纽约的打算，经莫斯科返回欧洲，沿途一直为中国作宣传。北朝鲜对我的书事先没有看过，他们渴望了解的是新闻。我没多余的副本，后来才寄了一份给他们。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收到没有。东欧也特别感兴趣。毛泽东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比他们运用这一理论要早四年。布拉格的哥特瓦尔德总理和布达佩斯的拉科西副总理都想了解有关中国的事情。我的书很快在全欧洲传开了。书到捷克斯洛伐克花了一个星期，到匈牙利花了四十八小时，到法国只需一个周末的时间。以后柏林也拿到了，华沙和罗马接着也收到了。

一切处于变动的阵痛之中的国家都渴望了解中国，只有美国除外。

出版商和演讲组织者说，“如果你写关于俄国的问题，我们好办，但有关中国的事情卖不出去。”

“会卖出去的”，我竭力劝说他们，“不出半年之内，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将成为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但直到巨大的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他们并没有被说服。

在巴黎，我遇见了解放区的三位代表，他们是刚刚从我已离开的华北和满洲来的。他们比我更有信心。他们告诉我，经满洲回中国的时机已到，可以就走他们来的那条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帮助我办好必要的批准手续。后来他们从中国得到消息，确认了对我的邀请。当他们得知我已持有可以到达莫斯科的签证时，似乎以为余下的都好办了。他们说，“走得越快越好，伟大的事件越来越近了。”他们给了我从满洲入境的介绍信。

在莫斯科我按规定申请出境许可证。我等着。在莫斯科的一

间公寓里，我等了四个月。我用一架十分破旧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拿下了济南、长春、沈阳、徐州、天津和北平。中国朋友一个个都走了，而我的出境许可证却仍无音讯。后来，中国代表到了，我相信他是有权为我作出安排的。正值此时，俄国人逮捕了我，并通过波兰把我遣送回国。我在监狱里待了五天，一直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至今仍想知道。

这是我的中国朋友唯一向我发出的一次邀请，又是我唯一不能成行的一次。这就是我等待了二十多年的“大革命”，而当它到来之际，我却没有见到。

也许我已经看得不少了。并非所有希望看到胜利的人都能亲眼看到它的到来。那个被激怒的政府在行将灭亡的最后三天里，在上海处决了六百名中国学生和工人，唯恐他们会向胜利者发出欢呼。这些人期待的时间比我更长，遭受的牺牲比我更大得多。

因为我还可以隔着大洋进行观察并理解我看到的一切。不是通过空洞的理论，而是通过一幅幅清晰的画面：那皮肤黝黑的农民老李，他坐在我过去住过的延安窑洞里，一面从衣服上捉虱子，一面称赞“新社会”；那个东北姑娘，她“清算”了一个拥有一百名武装匪徒的土匪头子；那些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穿过封锁线来到迅速组织起来的“大学”，在那里他们睡在地铺上学习如何“管理城市”以及在延安同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谈话。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一切从我住在延安窑洞里的那些友好的日子开始吧！

## 二、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

### 窑洞之城

那些迅速攻占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些什么样的人？是谁宣布“新民主主义”，允许自由企业而又自称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们是落后国家的土地改革者吗？他们是有觉悟、有组织的中国人民的政权呢还是莫斯科的政权？

让这本书的以下部分来回答这些问题吧！因为最后的答案不在于我的判断，而在于他们言和行的全部记录。我们可以从延安开始。它不是象今天那样远离战争和荣誉的一个“贫瘠地区”的一座小城，而是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作为共产党首府和十二年实验站的延安，在高潮时期创造了历史，后来又成为历史陈迹的延安。这样的延安人们再也见不到了。胜利如同失败一样，也消灭了过去。

我们的飞机从北平向西飞行，在三小时航程中，山峰变得越来越陡，山谷越来越窄，光秃秃的山坡如同月球上的山脉一样。从天空看不到什么居民点，因为人们住在

峭壁的窑洞里。许多山头被削平，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平顶已成为耕地。这里的土地大多为不毛之地。蒙古的沙漠距离这里不远。

飞机急转直下，惊险地在石山之间穿行，最后在凹凸不平的草地上着陆。草地上有哨兵站岗。两辆卡车和几辆吉普车出现在旷野。一辆卡车来自共产党的军事总部，另一辆来自美军联络组。在对日作战期间，史迪威将军在延安设立了这个联络组。我将住在“美军大院”，它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供外国人使用的宾馆。

我们的汽车在一条浅河之上的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着，眼前是一个城市的废墟。延安以前曾经是一座城池，是中国防御沙漠的一个西部前哨。它建于三处山谷的交叉点，远远就可以看到山上的一座高塔。当日本人丢完炸弹之后，所有的建筑物都已荡然无存，只有那座宝塔还屹立着。人们不管那些残砖碎瓦，便在陡壁悬崖的黄土上挖起了窑洞，就象本地农民祖祖辈辈居住的窑洞一样。

延安的居民消失在方圆十多英里具有自然景色的参差不齐的山峰之中。不同高度窑洞的洞口都敞开着。从火炉烟筒里冒出的炊烟袅袅于群山之间。在每一个山谷，人们都可以看到穿着蓝裤子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中国农村妇女也穿长裤）越过水沟，蹚过小河，按他们自己踩过的脚印爬上陡坡回家。

我们的卡车在延河的河床上驶过，在美军大院里把我们放了下来。这里周围是一道土墙，里面有几所房子。最大的叫惠特塞厅，为纪念美国空军中尉惠特塞而建。在我们共同对日作战中，他战死华北。这所房子里有一个交谊厅和食堂。还有一长排半窑洞，部分深入于峭壁之中。这里过去是军官宿舍，现在也作客房使用。一架电台同北平的军调部保持联系，一台发电机为照明供电。



这个可供二十人使用的美军大院，在对日作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曾经是美军收集全华北军事情报的中心；它安置过被日本人击落、但被共产党游击队搭救起来的一百多名美国空军人员。现在大院几乎全空了。一位孤独的美军少校作为观察员在这里值班。他抱怨他的报告得不到重视。

“我最后一次去北平时，发现军调部官方地图上标明延安有一支由二十架飞机组成的空军！他们为什么要从南京弄来那玩意儿而不去问问自己的观察员？如果问我，我可以告诉他们，延安从来没有过什么空军，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只有一架从蒋介石那里叛逃出来的飞机供展览，而且没有汽油。难道军调部不想了解这些情况吗？”

这位军官不久就被调离了。派往延安的美军观察员更换频繁——我在那里的几个月里就换了六名——或许是因为他们很快就开始喜欢中共，或许是因为他们从未发现要他们去寻找的“同俄国的联系”。周围仅有的俄国人是两名医生。他们是早期俄国人还在满洲时经蒋介石批准随同红十字会供应的物资一起从满洲飞来的。这两位医生现在留下来，同莫斯科没有联系而且也没有回家的希望。他们不谈政治，只忙于医疗工作。好客的中国人给了他们一台收音机。有时他们想收听莫斯科的节目，但他们有时间收听的好节目是在晚上九点半，这正是美国人关闭发电机的时候。好几次我坐在他们房间里，当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和乌克兰的爱情歌曲被突然切断时，亲耳听到过他们因想家而发出的叹息。如果俄国人提出要求，有些美国观察员也会好心地放宽这档半小时节目的时间。但俄国人不大好意思提。

延安还有其他外国人：教友会救护队的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来的一名捷克牙医；偶而来访的记者以及

一些自由志愿人员等。这些人比俄国人的运气要好。他们可以使用美国飞机与外部世界沟通。在我以后访问的解放区各地，美军及美军给予优待的各国平民同外界的联系都比俄国人好。这种联系的最后中断，责任不在中共，而在于美军的命令。

我最初住的窑洞很大，约二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成拱形，象座半圆形的活动房屋。洞内的土墙是用白粉刷过的，地上铺着粗劣的自制的砖头。窑洞正面装上带格子的木框，木框里安了门窗。轻巧的窗框上糊着白纸，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进洞内。美军大院里的窑洞还多了两块奢侈的玻璃窗。房间里没有一片金属，连一根钉子也没有。

窑洞的好处是造价便宜。在中国农村，金属是少见的，而由于封锁，金属又进不了延安。炸弹丢下后，人们就收集废金属。木料也是罕见的。中国西北的山头由于水土流失早就没有森林。峭壁上都是又干燥又坚实的土，可以很容易地挖成窑洞。一所住房只需要几根木条、几张纸和一些白粉就可以建成。挖一个延安的窑洞除本人的劳动力以外，花费还不到十个美元。一个农民告诉我，他买了一处有两间窑洞的住房，花了五个蒲式耳<sup>①</sup>的谷子。比较讲究的窑洞是用沙岩砌墙或从沙岩中挖成的，稍许贵一些。但延安的住户认为不值得。人们认为沙岩窑洞冬天比较冷，没有严实的土墙挡风。

延安的窑洞形式多样，地点各异，如同外部世界的住房一样。多数窑洞以炭盆取暖。冬天穿棉衣的中国人，并不去享西方室内高温的福。美军大院的铁火炉可以保持又高又适宜的温度，不过灰尘很多。少数一级窑洞在地下面有一个取暖系统，就象朝鲜的

---

<sup>①</sup> 美制容量单位，相当于 35.238 升。——译者注

“暖地”一样。这种取暖我最感愉快。你可以坐在俄国医生的窑洞里，让门敞开着户外是一派雪景，而在室内仍可感到地上散发出来的暖热。有了延安的一级窑洞，我什么都不要了。

因此，娇生惯养的美国人别瞧不起以窑洞为住房。它们以土相隔所以冬暖夏凉。在经历过上海和北平的炎夏酷暑之后，我住进我的延安窑洞。在五天时间里，我除了睡觉没有做什么事。我盖着毯子，在凉爽清新的窑洞里，睡得很香。

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用的是井水，最好煮开再喝。除少数几户人家靠美国发电机供电外，照明靠蜡烛或小煤油灯。中国农民认为蜡烛和煤油太贵，把家庭自制的菜油装入小碟，放上一根棉花搓成的灯芯点燃使用。这种有三千年历史的照明方法足以使人们在房间里不致跌交。延安公共场所的照明则靠天花板上吊着的大油灯。这些油灯很亮，但光线跳动，有时灯花开放，把大家都逗乐了。

延安窑洞成群地分布在大约四十个山谷里。旧城已成为废墟，因而不是市中心，只是一种障碍。新市场、边区政府以及银行、宾馆位于旧城以南，这些是较大的建筑物而不是窑洞。再过去是延安大学的窑洞，都挖在岩石的突出部分。几英里之外是实验农场。美军大院位于城北，河对岸低洼处是军事总部，高处是清凉山。再向北有几条崎岖的山路，穿过几个山谷，可以去党校和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可以去加利福尼亚人民捐献的洛杉矶托儿所和孙夫人的中国福利会捐赠的国际和平医院，还可以去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窑洞群。

从城北枣园朱德总司令居住的窑洞到城南实验农场至少有十英里。医生和一些干部骑马。美国人和共产党的军事总部只有少量卡车和吉普车。绝大多数人步行。生活的节奏很慢，人们都住

在他们工作的地方。

在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延河造成的不便是典型的。延河把延安分成两半。冬季河面结冰，它成为行驶大车和吉普车的最好的公路。当第一辆吉普车压碎冰面下陷时春天到了。夏天的延河喜怒无常，每次下雨河水就要猛涨。延河的正常深度为几英寸，吉普车、马和人都要溅着泥浆走。高处峡谷的一阵暴雨可以泻下一场五英尺高的山洪，足以掀翻一辆卡车。当你看到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不可逾越的洪流时，不由会胆战心惊地想到咆哮的黄河。黄河是由几百条延河之水汇集而成的。在春秋两季，河上架起简陋的桥，但在河水高涨的季节到来之前又拆掉了，不然他们的宝贵的木料就会被冲走。

在延安没有忙碌之感。这里所感到的是时代、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和缓慢的季节更替，广阔而艰难的中国大地和天上转动的太阳，这一切又带来播种和收成。在窑洞生活，一出洞口就是天，落雨、下雪、月缺月圆，人们都清清楚楚。即使在冬季战役中，敌人袭击边境时，人们也对第一次下雪感到高兴，说“瑞雪兆丰年”。

尽管在打仗，延安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和平、安全的地方。我的健康状况比以前好了。由于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月，我认为可以长寿。来自南京、上海、北平的中国人也有松一口气的感觉。我记得在南京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在一次谈判中断后回到延安，把一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留在机场，自己却到窑洞里睡觉去了，一睡就是大半天。北平军调部人员黄华，在一年紧张而没有成果的谈判以后抵达延安时，感到身体不适。一星期后他说：“真是奇迹，我觉得舒服极了。吃得那么多，睡得那么香！”当时延安还遭受轰炸。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陆定一，在重庆和南京待了五个月以后，回到延安休假。在二个月的假期中，他对我说：

“一个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待五个月比在这里待五年还容易老。”

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但维持生存的食物却很少。到了冬季，每天减为两餐，主要吃小米和瓜菜。他们在寒冷的窑洞里工作，坐在木凳或长凳上，点的是昏暗的小油灯。即使在敌人进犯即将来临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也不显得紧张。这部分是由于他们过着一种接近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部分是由于相互间同志式的社交生活。但首先是由于在延安的十二年中，他们已使自己的全部理论通过实际的检验，使之适合于原始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在老百姓家中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来来去去，无忧无虑。

即使在窑洞居住区，共产党也添置了一些现代设备。他们有六辆吉普车和卡车，用的是本地油井和炼油厂出产的低级汽油。一部野战电话越过延河通往许多重要地点。还有一张报纸和一部电台把他们同外界联结起来。

清凉山的生活是一种原始与现代生活的奇怪的结合。在山崖底部一个很深的窑洞内，一架印刷机印出了延安《解放日报》。报纸是一种又厚又黄的纸张，是以本地生长的草为原料，用手工制成的。向上经过一段又陡又滑（阴雨时）的路，爬高五百英尺，便是电台和报社人员的住处。他们住在一个挨着一个的山坡上；电台的天线从山顶上直入云霄。他们的窑洞很小，只有十二英尺长，六英尺宽。靠简陋的炭盆取暖，小油灯照明。

在这些昏暗的窑洞里，来自各地的受过良好教育、懂得多种语言的年青人抄收着国际新闻。一位青年坐在这里，头戴耳机，正在抄收美联社的消息；在他的旁边，另一位青年在微弱的灯光下，收的是合众社新闻稿。蒋介石的官方通讯社南京中央社的消息，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在监听。在《解放日报》有限的篇幅里，这类消息

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刊登，但经过整理后全部均可供中央及想了解情况的人使用。在延安我得到的消息比在北京时要多。发电机非常宝贵，只为电台以及同各解放区地方政府和广泛分散的野战军指挥员的电讯联络服务。电台工作人员的窑洞，甚至是毛泽东主席的窑洞都不能用它作照明之用。

同清凉山的人们在一起很有意思。它对知识分子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每人都有一段反映自己个性的历史。廖编辑<sup>①</sup>曾经是南方一座城市八路军的一位算是享有个人豁免权的外交代表，有一天蒋的政治警察署的一位官员对他说，“委员长有请”。他就这样被监禁达数年之久。余编辑<sup>②</sup>是一位有铁路管理学位的工程师，后来终于被送往东北管理铁路去了。英语广播由六名青年担任。他们来自香港、新加坡、爪哇甚至美国，为了抗日救国，他们终于抵达延安。他们当中有举止斯文的、来自爪哇的陈龙。我们管他叫The Dragon，因为这是他的英译名字。

清凉山由于山高路陡，所以成了延安中心的一个偏僻地区。在有月光的晚上，俯视脚下的三条山谷令人心惊胆战。在漆黑的夜晚，清凉山是根本上不去的，甚至是危险的。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冬天的夜晚，廖编辑的爱犬跑出窑洞不见了。后来听到它叫了几声。一会儿就被狼叼走了。一年之后，当我读到蒋军哨兵于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延安中心清凉山的荒坡上失踪的消息时，我才回想起了这件事。

社交生活既友好又不拘礼节。通常的娱乐是聚餐、舞会、打牌、看戏，但却带有延安自己的特色。聚餐一般是在食堂里，五、六

---

① 指廖承志，他当时任新华社社长。——译者注

② 指余光生，当时任新华社总编辑。——译者注

十人围在几张圆桌旁就座。人们可以说许多笑话，大家也笑得很开心。喝的是一种叫做“白干”的烈性酒，但量极少。少数人打桥牌，但更多的人喜欢打“百分”。这种有两张王牌的打法比桥牌更带劲。朱德将军酷爱打百分，而且象孩子般地想赢。我在延安时期的一件憾事，就是他彬彬有礼地请我作他的搭档同他合作打牌，我却因缺乏经验而总是使他输掉。

剧场有专业演员演出，精心制作的服装可以同北平比美。我们看过反映历朝故事的中国古典戏曲，也看过短小精悍的秧歌剧和三幕话剧。美军也为延安的文娱活动作出过贡献。由于中国方面邀请美军观察员参加过聚餐和舞会，为了答谢便把送给美军观看的好莱坞电影拿出来放映。当时美国戏剧电影界流行一些反映心灵上受到创伤的妇女的心理描写。延安的重要人物看到了美国人的不可捉摸的感情特色。

在以上这些场合都没有人打扮，也没有人换衣服。男女穿的都是一律由政府发的结实的蓝布服装。由于延安没有好的染料，随着穿着时间的长短和户外的日晒雨淋，这些衣服都褪成深浅不同的蓝灰色。冬天就换成一套同样质量的棉衣。袜子和绒线衫的颜色则各有不同，男女都会打毛衣织袜子。我们院子里的哨兵就为我织过一双袜子。脚上穿的是老布鞋，冬天穿棉鞋，鞋底是用本地产的麻线纳的。

一周的主要社交活动是星期六晚上的舞会。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来参加。朱德几乎每周必到。毛泽东大约每月两次。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混合演奏，象古老的“老黑乔”等也成为人们喜爱的伴舞乐曲。有圆舞曲，也有二步舞、一步舞和一种四步的秧歌舞曲，它同狐步舞很相似，只是摆动要大一些。人们自由自在地跳着，愿意把脚步放重的就重重地跳，愿意滑动的就轻轻地滑步。剧院里

的一些专业舞蹈演员给舞会带来欢快的气氛。外界称之为苦力的担任勤杂工的“小鬼们”此刻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间快活地旋转着。我笑了起来。试想，如果在蒋的南京或者在华盛顿会是怎样的情景？我们可能已经知道在杰克逊<sup>①</sup>时代的一些情况了。

尽管物质条件很差，但人们相互之间的情谊却使这种艰苦成为乐趣。舞厅的窗子即使在冬天也是敞开着的，因为人们都穿着棉衣跳舞。有一次为了减少尘土，在地上洒了一些水，结果靠窗口的地面结了冰，人们在这里滑倒时，逗得大伙儿都乐了。另一次分花生吃，但同时叫大家：“把花生壳扔到座椅背后去，不要丢在舞池里！”晚会最后通常是大家围成一圈扭秧歌，越扭越快，直到最后尽欢而散。

现在来看一看看在延安舞会上出现的四位共产党领导人吧！从南京回来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跳舞具有外交家风度。他的华尔兹跳得完美无缺，有时好得过于拘谨。同他跳完以后，你会想同扭秧歌的演员或俄国医生奥尔洛夫跳上一曲。这位俄国医生喜欢哥萨克式地跺脚。然后人们还是会回到周恩来那里，因为他是第一流的舞蹈家。他跳舞时掌握的分寸和优雅自如的风度，使人想象到这正是他在南京谈判时所具有的素质。

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二加二等于四。在开始跳过似乎有点拘泥于算术式的步子之后，便会来几下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向高级数学迈进，大约跳三次舞当中便有一次这样的表现。这

---

<sup>①</sup> 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美国总统(1828—1836)，民主党人，任内推行灭绝印第安人的政策，拥护奴隶制。——译者注



同他写的文章那样，在精练而准确的散文中，偶尔也使用一些鲜明的比喻。

朱德总司令跳起舞来象进行闻名的长征。不管乐队演奏什么曲子，他总是固定不变地跳他的一步舞。当乐队演奏迷人的华尔兹舞曲时，如果你正好是朱德的舞伴，你就可能会贪婪地注视着完美无缺的舞蹈家周恩来，他同同样完美的舞伴正轻盈地移动着舞步。但等到晚会最后，当你累得既不能走又不能站时，却仍可以同朱德跳舞。因为他的节奏具有一种耐力性，既不费劲又能持久，比静坐不动还自在。

领袖毛泽东在舞会上多数时间是坐着。有很多人想同他聊天。当他跳舞时，既轻松又坚定，好象为乐队规定了“党的路线”。有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他有一种他自己的坚定而微妙的节奏感，同音乐保持着最友好的联系，却又不盲目服从。作为他的舞伴，你必须密切注意，小心服从，随着微小的暗示而移动。如果你懂得他的节奏，他就会同你跳到结束。从几个方面看，同毛主席跳舞是一种喜悦。

我在整个延安生活中最有意义的是谈话。延安的谈话都很令人满意。每次采访时间都很宽裕。由于交通困难和缺少时钟，每次约见都没有准确的时间，而是一个半天，即：“上午”或“下午”。会见常常还包括一顿超出通常小米加青菜标准的午晚餐招待。通过在延安的采访，你才真正能对人民有所了解。宣传部长陆定一曾经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向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刘少奇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向我概括地介绍了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只是勤务员端午餐来时才中断了一下。

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要提到世

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口号的含义似乎比口号本身深刻得多。它们好象表达了一种永恒的爱和一种最终的信念。

朱德将军是个军人，自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到现在的三十五年戎马生涯证明了这一点。但当他身穿褪色的蓝布军装，坐在我的窑洞前讨论内战问题时，他预测未来的依据并不是武器，而是“人民”。

“蒋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他们将不断奋起直到获得民主。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部镇压下去……。我们中国人民如同大海，而蒋的党国民党却象一支船。船来了，转弯了同时把水也分开了。然后船开走了，水又象以前一样合到了一起……。我们共产党人如同大海之中的鱼。我们生活在这里。”

后来，在一个月光宁静地照耀着崇山峻岭的晚上，他在枣园的四眼窑洞的家里又重新拾起这个话题。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由专制君主统治着。但是现在整个华北的人民已经尝到了民主的滋味，专制君主不可能再回来了。”

朱德在自己窑洞里过着和平的生活。在南京广为传播的关于他本人在这一战区或那一战区出现的谣言纯属传奇。他有电台同前方联系，但延安并无飞机或快速运输手段。这里不是搞狂呼乱动的中心。关于执行的细节及多数地方性的行动都由各县及各条战线的领导人去作出决定。延安是他们缓慢并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的政策的源泉，是他们思想力量的源泉。

过去多年来，也许我一生中从未感觉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象延安的那些谈话那样敏锐，有那么大的发展。我一生经历过两大制度。我是在美国生活方式下长大的。几百年来我国人民都是这

样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参加过其中的一些斗争：争取妇女选举权、争取更好的民主形式如公民的创制权、公民投票权、罢免权以及罗斯福的新政等。后来我了解苏维埃制度。几乎在俄国革命初期，我就到了俄国，在那里结了婚，办了一家日报，周游各地并进行了多年报道。我认为我对两大制度已有透彻的了解，懂得了每种制度得以持续存在的原因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而中国却与两者都不相同。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的新生。

延安人民是新生事物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他们头脑敏锐，思想深邃，眼界开阔。他们愿意花费很多时间进行解释和讨论。在美国或俄国不会有人这样做。现在他们在中国既然要忙于管理国家，我想可能也不会有时间这样做了。在延安有的是时间和空间，思想也很开阔。它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如同“黎明的霹雳声跨过海湾而来”，如同青春重返。

## 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人对延安并没有幻想。他们对于我对这里的热情报之一笑。一位年青人挖苦我说，你能乘吉普车当然很好，但象我只能蹚水过延河，却希望水暖和一些。他是南方的城里人。

到延安来的大多数共产党人本都是南方人。他们把延安这一块贫瘠地方当作暂时的栖身之处，同时又把它建成为一个实验站和根据地。原来人们从日益扩大的解放区来到这里请示和汇报工作，路上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如同过去美国人骑马从缅因州到华盛顿一样。因此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作短期访问，而是要进行长时间的研究讨论，或者长达数月的学习。在这里他们总结回顾历史，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随时准备承认错误。他们不属于那种自以为一贯正确的政客。一九三七年有一次共产党军队的副司令员彭德怀在汉口参加鲁特主教的家宴。这位和气的圣公会领导人同彭开玩笑，说江西的共产党曾经在几年前对几位传教士进行过“绑架”。我们都知道这位主教早已将此事置之脑后，因为这些传教士并没有受到虐待，他们之所以被扣是为了照顾伤员，后来就释放了。我们本以为他会以伤员的需要为理由来为他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甚至可以说这些传教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这位驰名中外的战略家却象孩子一样地涨红了脸，可怜连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我们当时没有经验，而且头脑发热。”他的这种认错的态度使人对这位粗壮的汉子感到十分可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今天之所以能够幸运地得到澄清是由于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期间，他们在各部队就过去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当时，这些部队同日本人每天都要交火，因此，学习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他们对过去的成功、失败、错误和未来的计划得出了某些共同的结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并作出了决定。

我是从斯文的宣传部长陆定一那里得到关于中共党史的最详尽的分析的。在我的窑洞前的平地上，他用流利的英语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不急不忙地详细叙述着。

陆定一把党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从国共合作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为止的“大革命”时期；从土地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西安事变”时期；和建立“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统一战线从一九三九年起因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而受到损害，到我在延安进行这次谈话时终于破裂。目前的国内战争是第四个时期，自蒋一九四六年七月

发动全面进攻时起，迄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胜利时止。在各个不同时期里，领导、指导思想和政策都改变过。陆定一说“共产党一向英勇，但许多错误是由于领导缺乏经验而犯的。这些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得到了教训，以后不致再重犯这些错误。”

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席卷全世界的革命动乱中诞生的。在战争的危难及随后俄国革命的影响之下，首先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在一九一九年由北平学生发动的这场运动推翻了卖国政府，阻止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接着中国第一个工会成立，然后第一个农会也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三年之后，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的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接受中共党员为国民党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孙中山之所以同意联合共产党是由于多年来失败的痛苦教训使他懂得，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他的由爱国商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党不可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共产党之所以同意联合是由于他们也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求得民族解放。就国内来说，要推翻封建统治也需要进步的工商界的帮助。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持有同样观点。

有着各种不同解释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当代中国各种运动的圣经。在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非常详细而激进的规定，并辅之以“三大政策”，即：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国共合作和组织工农。

只要保持合作，就能取得巨大成就。这一模式即使在今天依然有效。为祖国而战的爱国者云集广州，如同一九四九年聚集在

北平一样。一九二六年由蒋介石将军率领的革命联军北上时，各省的地方军阀顷刻土崩瓦解，当时的情形和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中，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极其相似。在上述两次革命中，都是由共产党迅速组织起来的工农铺平了胜利的道路。当年单单在湖南省一地就有四十万农会会员为北伐军担任情报、向导、劳务等工作。这同一九四八年的后期东北有一百多万农民组织起来，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形势就不好比了。在淮海战役中，推着小车为人民解放军送粮的，有上千万农民。

早期“大革命”的胜利在全国燃起了希望。上海的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共产党员周恩来的领导下没有打仗就赶走了地方军阀，并把这座城市交给了蒋。对蒋来说，上海是一块肥肉。依靠这个港口他可以独立于任何党派。蒋取得了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他付出的代价是对奉上这座城市的工人进行了血洗。仅在上海一个地方他就屠杀了五千人。他抛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以个人独裁为中心改组了国民党。然后，在外国的支持下，他开始铲除异己，特别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军阀间的政治游戏又重新开始。早期的北伐和当今共产党的胜利有一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这类叛卖行为今后还会再发生吗？

共产党说不会。他们仍然把一九二四年制定的联合的原则当作“近期纲领”。他们仍然认为政府应该包括“一切革命阶级”。这就意味着包括目前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爱国工商界人士。不同之处在于联合政府的领导权已经由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此外，共产党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

在延安的座谈中，陆定一并没有花多少口舌就早期的革命失败对蒋进行指责。他分析当时共产党本应采取一种“正确的政策”。

他说，在早期，他们过于屈服。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他是北平的一位有名的教授，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任党的书记。陆定一说，“陈独秀的错误在于投降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向以蒋政权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投降。

陆解释说，蒋对共产党的清洗在上海大屠杀之前一年就已经开始了。一九二六年三月蒋逮捕了在一艘兵舰上担任指挥官的共产党员，并宣布在军队中担任高级军官职务的所有共产党员必须全部撤换。共产党现在认为，当时应该是他们表明自己立场的时机。他们为组织联合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蒋的四个军中有三个军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陈独秀屈服于蒋的清洗政策是为了“搞好关系”。

陆定一说，“这种投降主义使我们在蒋以后的血腥屠杀面前处于没有准备的状态，因而无法进行抵抗。我们应该懂得同资产阶级在哪些方面进行联合，哪些方面进行斗争，而陈独秀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所以资产阶级利用我们达到了目的，而我们的目标则未能达到。

另一个错误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的南下。国民党在南昌的军队的一部分举行起义，转向共产党，并南下广州。目前的结论是：“我们在南昌有强大的力量，应该固守南昌或在附近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但是我们缺乏经验和信心。于是出于一种打回老家的想法，而开始南下广州。我们的军队因在汕头附近被击败而溃不成军。剩下的只有一千人，在朱德的率领下第二年春天转移到湖南。

中国人民为这次大分裂付出的代价是十年内战。霍奇教授在《亚细亚杂志》上撰文说，一九三四年中国有六千五百万农民无家可归。这一数字为美国人口的一半。蒋在反共战争的借口下对一

切要求民主的人实行监禁、拷打和暗杀。

共产党保存下来了。但在蒋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党员人数从五万降为一万。陈独秀受到批判，领导职务也被撤去。人们痛苦地聚集在新领导人的周围。陆定一说，“这些新领导人又犯了另一个方向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多年”。

第一次“左倾”的错误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冬季蒋夺取政权后在一个个孤立的的城市发动起义。首先发难的是广州公社的起义。这次起义只维持了三天就被淹没在血泊之中，居然还认为是合理的，说需要利用这类尝试“向人民宣布我们的纲领”，陆说。这次起义失败后，人们应该清楚，在蒋警卫森严的城市以后发动的其他起义只能是浪费宝贵的生命。换句话说，共产党并不是为打仗而打仗，只能在确有胜利的机会时才去战斗。

在远离城市的华南山区，一位新领袖毛泽东却领导着一个十分成功的运动。

当时刚刚三十出头的毛是湖南一个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在城市遭到血腥镇压，他就转向湖南作农民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春，他的农民自卫队同朱德将军领导下的革命军残部会师，并在七个县成立了一个“苏维埃边区”。有一个兵工厂和一所军事学校。他们的军队有三千人。但毛泽东已有了新的想法。

毛泽东认为：在象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动荡不安而交通又十分不便的国家，人们不能指望立即在全国范围发动“民主革命”。在两省交界、不同军阀的势力互相交错的山区最便于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毛已经离开了欧洲的革命模式，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的。在欧洲，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是有重兵把守的，新政权没有存在的余地。而在封建的中国农村，一个地方军阀的力量在首府之外便削弱了。在军阀与军阀



之间的无人地带最便于农民建立自卫武装。给农民以土地、民主政府和防御手段的武装根据地可以在整个“革命低潮”时期坚持下来，并能在以后扩大到全国。

到一九三〇年，共产党拥有十个这样的“边区”。其中有一些一直坚持到今天才归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管辖之下。这一事实表明毛的理论是何等正确！

革命初步胜利，冲昏了某些领导人的头脑，一九三〇年又出现了所谓的“李立三路线”。李立三是作为上海的劳工组织者参加党的。他认为乡村政权过于遥远、无足轻重。他说，夺取大城市的时机来到了。共产党夺取了湖南的首府长沙，他们还谈论过攻打武汉三镇并准备在上海和南京举行起义。要苏联红军出兵东三省，这样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他们夸大了自己的力量，结果吃了亏。几个月之后，这一政策才得到纠正。这时外国政府纷纷鼓动蒋镇压共产党。他们向他提供军火和军事顾问。从一九三〇年秋到一九三一年秋的一年时间内，蒋向共产党最大的江西根据地，即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下的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围剿”。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不再在不成熟的情况下夺取城市，这样只会引起外国的注意和干涉。后来他们一直坚守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直到拥有压倒优势的力量为止。

毛泽东的农村政权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保卫了自己，创造了一种农民的民主形式。一九三四年举行了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各个边远和分散的地区共选出了七百多位代表。各个地方政府就土地分配、灌溉、学校和卫生作了报告。有一个报告提到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个合作社。在蒋对这些地区进行的五次“围剿”中，前四次都遭到了全面的失败。许多贫农出身的蒋的士兵投奔了共产党。

当时新的错误使共产党遭到削弱。一批今天被称为“教条主

义者”的人从一九三一年起断断续续地掌握了制订政策的权力。他们旁征博引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无知却带来了灾难。在这些人的领导之下，共产党终于丢失了江西根据地。

陆定一解释说，“福建的蔡廷锴将军建议同我们结成联盟。他是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的抗日英雄。他反对蒋的对日绥靖政策，愿意同我们实行合作。而我们的一本正经的教条主义却不愿同‘那个资产阶级’握手。这样我们就失去了胜利的机会。”陆说话时的口气是缓和的。福建是一个出海口，如果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建成这样一个抗日联盟，有可能缩短甚至制止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共产党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现在蔡将军已经参加联合政府。

由于他们在一九三四年没有能够结成联盟，蔡的军队被蒋消灭，然后蒋又包围了共产党。为了反对共产党，他动员了近一百万军队并派遣四十万人对江西根据地实行围剿。他采取是一种封锁、包围的政策，并日益缩小包围圈达一年之久。据国民党估计，有一百万农民被打死或饿死。

共产党军队的主力有九万人。他们最后突出重围，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长征。他们带着妇女儿童途经世界上最艰难险阻的地区走了八千英里。他们首先折往南部和西部然后绕了一个大圈子向北行进，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大地。他们翻过十八座大山，越过二十四条大河，在历时一年有余的征途上，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其中有许多打的是硬仗。除打败或躲过蒋军的追击外，他们还击溃十个省地方军阀的军队并夺取了六十二个城市。他们穿越了六个少数民族的地界，有的地方几十年来中国军队从来没有到过。他们英勇奋战，立下了令人不可置信的功

绩。例如在强渡大渡河时，三十名勇士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用手拉着铁索桥的铁链到达对岸，猛攻敌人机关枪阵地，最后铺上了桥板，让大军过了河。①

今天在中共党内没有人会说长征是一次错误路线的结果。它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英雄史诗。但是，他们会告诉你，长征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在江西革命高潮的年代，共产党员和军队的人数曾经达到三十万，长征结束时却下降到四万人。他们会说，如果在江西采取正确的策略，“可能会避免”这场沉重的代价。陆定一说，“教条主义者过于相信阵地战。用我们现在的“分散”战术，我们可以一直渗透到蒋的堡垒的周围。”他说，在长征开始的时候，用的是大规模直线进军的灾难性战略，空中有飞机狂轰乱炸。如果不更换领导人，最后必将是悲惨的结局。

在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举行了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奉行僵硬理论几乎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领导人由毛泽东代替了。更换领导人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陆定一说，“毛泽东的领导使长征成为一个军事上的奇迹，并把我们带到延安。”

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遭受沉重的损失以后取得的严峻的教训。在此之后，他们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来到沙漠的边缘陕北地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重新开始建设。对于他们来说，那种每年可以生长两季农作物的肥沃而湿润的南方土地再也不见了。这里只有“荒山”，土质贫瘠，气候干旱，农民过着痛苦的生活。在刚刚过去的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的大饥荒中，有三百万到六百万人

---

①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版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作者注

死亡，留下的只是荒地和盗匪。就是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新来者把他们的政策付诸实施，在可能是最艰苦的条件下接受考验。

他们使陕北兴旺发达起来了。在十年之中，他们把耕地扩大了一倍，农作物的产量也增加了一倍。他们兴办了小工厂和合作社，并把小学增加了十七倍。他们在这个没有文化只有巫医的地区，创立了第一所中学，第一所大学和第一座医院。他们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制订了一种投票制度。由于本身的迫切需要，他们还创建了独一无二的半自给的政府和军队。

以上成就是在无休止地同沙漠开仗的过程中取得的；是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因不断遭到失败而变得麻木不仁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蒋介石进行封锁并不时遭到蒋、日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取得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了他们自己新的生活方式和政府形式。

共产党在延安立足一年之后，发生了“西安事变”，从而宣告了九年内战的结束。当时全中国已经点燃了抗日的热切希望和要求，而蒋介石却跑到西安，强迫他的将军们去发动又一次反共高潮，因而被他自己的军官所扣留。直到各方面人士参与协商并进行劝说以后，蒋才得到释放。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去西安敦促释蒋。共产党对释放蒋介石一事并不感到后悔，直到后来蒋的炸弹落在延安也毫无后悔之意。因为“西安事变”直接导致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大团结。促成了全国范围抗日运动的兴起，而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在那些年代里，在边远而原始的延安和敌后新建的解放区内，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政策同中国人民的需要完全结合起来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发挥得更充分了。在延安的平静的窑洞里，他撰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

在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的第十年，日本投降的四个月之前，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他们称这次大会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虽然同国民党的团结正在日益削弱，而抗战的最后胜利尚未到来。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他们对党的历史和今后应实行的政策已经讨论了两年之久。陆定一说，“当时团结和胜利的意识非常强烈。因为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为数一百多万的同志们对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道路已经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和共同的估计。”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当选为党的主席。实际上他被公认为领袖已经有好多年了。

## 毛泽东

在国际会议上，如果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出冷嘲热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并可能使一些政客的象牙之塔陷于土崩瓦解。可以举一个例子。一次他在提到在南京举行的“和平谈判”时说道，“他们嘴上大声地念着共产党的八项条件，双手却捂着战犯；他们的双眼盯着美国，双脚则走向广州。”对于那些以和平建议为拖延战略，争取时间寻求美国援助以便发动内战的人，是一幅多么尖锐的讽刺画。

毛的机智常常使我措手不及。一次我谈到延安的悠闲生活，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要我注意蒋介石和朱德的差别。“两人都刚庆祝过六十寿辰，蒋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而朱德的头上只有几根白发。”

“但是朱德在战场上过的是一种艰苦的生活，蒋却是舒舒服服地安坐南京。”我把他的话当真了。

“我认为他坐得并不那么安稳”。他眨眨眼睛对我进行反驳。

另一次我赞扬毛说，他“挑的地方”气候很好。我喜欢干燥的天气。他立即答道，“这个地方不是我们选的。”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共产党是在经过闻名的长征，“发动全中国起来抗日”之后，在一种胜利的气氛之下来到延安的。历史学家可以这样说，而且言之有理。他们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生存下来并突破蒋军和十个省地方军阀的重重包围，这当然是胜利。此外，在长征途中他们也的确尽自己所能做了大量的“发动”工作。但毛并没有作诸如此类的辩解。他的说法是：他们来到延安是因为他们被赶出了南方的鱼米之乡；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尘土飞扬的盆地安身是因为这里很穷，又十分遥远。毛从不对胜利夸大其辞。

毛和在延安的其他人一样也住在一个窑洞里。他常常更换住所。也许是为了与一些人在一起，便于研究有关战略、土改和财政等问题；也许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头号人物，恐怕遇到危险。一九四六年八月，在我刚到延安不久，蒋在那里投掷的第一批炸弹就落在两周前毛曾居住过的窑洞不远处。延安有许多人认为轰炸的是对准毛主席的。除了偶尔变换住处以外，毛随意走动，无拘无束。

我同他的第一次会晤，由于早晨一场大雨，延河涨水而被推迟了。第二天，河水退了，我和翻译乘卡车前往毛的住处。卡车滑下陡峭的河岸，一颠一簸地越过河底的鹅卵石，从一个危险的角度爬上对岸，驶过杨家岭的大门，党中央就坐落在这个狭窄的深谷之内。我们在峡谷不远处下车，从一条两旁布满玉米和番茄藤的陡峭山道爬上去，来到一处挖有二十来个窑洞的山壁。

其中有四个窑洞彼此挨着就是毛主席的家。看到陆定一来当我们谈话的正式翻译，我很高兴。

毛泽东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缓慢、有力而从容，很象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则显得生动而幽默。在蓬密的黑发之下，宽阔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很难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注意。在一种深邃而机敏的理智的驱使下，他周身充满活力。

他身穿一套普通的蓝青布衣。态度从容不迫，沉着而友好。

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平台上，这时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使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的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客人，好奇心战胜了羞怯。

在谈话开始不久，我注意到在毛的窑洞上方五十英尺的山间草丛处有响动。我问：“谁在上面？”心想要是一枚炸弹扔下平台该是多么容易，不知道主席的家是否有警卫加以保护。

毛回答说，“是另外一家人家。他们的孩子们对我的外国客人感到好奇。”

我很少看到一个人自己如此愉快而随和地习惯于他的环境。多数知识分子因工作而需要一种不受打扰的私人生活，而毛却象一个农民，根本没有什么私人生活的要求。他需要的那种私人生活已经从周围邻居对他的尊敬之中得到满足。上面的孩子们向下窥看，但并没有发出声音。在会见时，毛的小女儿对自己该做什么也很有节制。当他集中思想进行我们之间的谈话时，她依偎在爸爸的身边安静地玩着，一点也不闹。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陆定一翻译得既迅速又自然，几乎使我感觉不到语言的隔阂。毛的思想轻松地囊括了全世界，他的观点涉及许多国家和许多时代。他首先询问我有关美国的情况。我发

现他对许多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我还了解。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与外界接触过。但是他有计划地获取情报知识，其用心程度不下于对军事战略。清凉山上那些小收音机通过监听新闻为他收集到那么全面的情报，实在使人感到意外。他还利用同军调部飞机短暂接触的机会带进了许多国家的书籍和小册子。许多近期出版的美国的书籍已被全文翻译或摘译。外国来访者来到延安时总要求他们介绍本国情况。

毛认为，美苏战争宣传——指一九四六下半年，冷战已进行了一年——主要是“反动派放出的一种烟幕，用以掩盖更为直接的许多矛盾”。战争也许最终会发生，但他认为可以防止。他认为苏联当然不要战争，只有“美国垄断资本的右翼”才要战争。关于战争的谈论以及掀起的反苏恐惧情绪只有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一个借口来向美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民权进攻，同时也找到一种武器，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毛说，但是要同苏联开战并不容易。不可能直接发动这一类战争。“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法和中国来发动。”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毛笑着把桌子上的茶杯和白色小酒杯摆来摆去，表明“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不但有“美国人民”的障碍，而且在它和苏联之间还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地带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卷入战争。他把火柴盒和香烟也放进了这个行列，风趣地说明它们各自代表什么国家。他说，如果很好地唤醒人民，“各国人民的合作”是会强大得足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他认为这种合作能够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我们准备的晚餐是可口的。有番茄、洋葱、青豆和辣椒，都是山坡菜园里种的。毛是湖南人，爱吃辣椒。点心是“八宝饭”，这是一种由八样果品配制的甜饭。这次只有四种：花生、胡桃、毛的



菜园里的梅子和延河上游枣园里的枣子。

毛说，“延安县并不产稻米，但我们在靠近黄河的边区却种植了水稻。十二年以前，我们南方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北方的小米很难下咽，非常想念家乡的大米。最后终于在一处地势较低、气温较暖的山谷找到了一块地方，在那里种植水稻可以获得成功。

我们重新沏上茶继续谈话。毛的小女儿被带进隔壁的另一间窑洞里，让她上床睡觉。毛的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意的描述使他的这次谈话成为我所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比喻如此贴切而充满诗意。

谈到从蒋的部队缴获的美国武器时，他称之为“输血——从美国到蒋，从蒋到我们”。说到“美帝国主义”时，他说，“它变得孤独了。它的朋友中有那么多人已经死亡或病倒，即使盘尼西林也不能治好他们。说到“反动统治者”时，他说，“他们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烂了。

“纸老虎”几个字似乎打动了。他停下来问我是否真正明白了它的准确含意。陆定一开始把它译成“稻草人”。毛让他停下来叫我解释什么是稻草人。他听后不同意用这个词。他说纸老虎不是插在一块田里的死的东西，它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它做得看起来象一头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只是纸糊的，一遇潮就软了。

毛解释后接下去就用英语说出“纸老虎”这个词，并对自己的发音感到好笑。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上去强大而可怕，但一场二月的雨就把它冲走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

毛笑着用英语说，“蒋介石——纸老虎”。

“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我能够报道说毛泽东称蒋是一只纸

老虎吗？”我打断了他的谈话。

毛答道，“不要只是那么说，”他仍然笑着回答。然后象一个力求把话说得十分准确而恰当的孩子一样慢条斯理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叛人民并向人民发动战争——这一点他现在正在做——他就是一只纸老虎，雨水也会把它冲走。（以后在毛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纸老虎”的比喻。我感到有许多这类比喻是他在谈话时发现的，以后再加以发展使用。）

尽管毛泽东对蒋介石嘲笑一番之后，并不想对自己的胜利进行预测。其他共产党人已经在估计需要多久才能取得胜利。毛说，“我们已经打了二十年的仗，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打二十年。一九四六年他在延安时已经预见到出现大规模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推翻蒋并不困难，但是在蒋的背后有外国势力。自从英国通过鸦片战争于一八四二年把洋货强加于中国后，这些外国势力就一直在阻止中国取得完全的独立。他不会说需要多久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取决于许多国家，取决于世界范围内“民主力量”的发展。

“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它之所以有力量只是由于人民还没有觉悟。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力量不在于炸药、油田或原子弹，而在掌握这些东西的人，而这些人还有待于进行教育……。”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在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最后将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比蒋的飞机加大炮更为强大。”

我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回答说，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可能再次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炸毁灭了它自己。全世界人民都反对它”。无论如何，原

子弹并不能最后解决问题。他说话时笑声中带有一种冷峻的表情：“即使在比基尼<sup>①</sup>他们也没有能够杀死所有的猪”。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原子弹的诞生是美帝国主义死亡的开始。因为他们从此只考虑原子弹而不考虑人民。归根到底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要消灭原子弹。”

当毛主席送我下山时，已经接近午夜了。山路不平，他打着一盏马灯为我照明。我们来到停靠卡车的小路旁，相互告别。他站在小山上，注视着汽车颠簸着向下开入延河的河床，四周溅起了水花。在荒凉漆黑的延安山丘的上空，星星显得特别明亮。

关于毛泽东的传说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地区，流传到全中国。在没有文化的农民中，人们把他的名字同朱德连在一起，甚至以为他们是一个人——“朱毛”。蒋常常从重庆前来著名的峨嵋山避暑。有一次，那里的农民把他们隐藏的步枪拿出来给一位他们信得过的美国朋友看，说道，“一旦时机到来，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在朱毛领导之下，生活一定会更好。”这些人当中没有共产党，没有人到这里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不论何地，只要农民对地主、军阀的压迫感到不能忍受时，寄希望于“朱毛”的传说就会不胫而走。

毛泽东一八九三年生于中国华南心脏地区湖南省的一个农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贫苦农民，当了多年兵。在毛的童年时代居然能够买下两英亩半<sup>②</sup>土地。以后，他进一步富裕起来并能供养儿子接受教育。他的家庭保守，而且信佛。

---

① 比基尼岛为位于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中最北端的一个珊瑚岛，一九四六年美国曾在该岛进行核试验。——译者注

② 一英亩等于六点零七亩。——译者注

毛在学校作学生的时候曾经看到过省会长沙饥民的暴动。这次暴动后来遭到镇压，领导人被斩首示众。以后在毛的家乡的县城又发生过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武装冲突，法庭帮助地主镇压了农民的斗争。这种人民的暴动对年轻的毛的成长是有影响的。

在一段时间里，他曾有过知识分子具有的看不起工农的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高于一切”，其地位是任何地方也不能比拟的。毛后来在延安举行的一次作家代表大会<sup>①</sup>上承认，当他用一根竹扁担挑着行李来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时，感到多么狼狈。他感到自己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学生，这一点使他很不高兴。“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以后，毛由于同工农生活在一起，思想起了变化，感觉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sup>②</sup>今天毛能够招待一位身上有虱子的农民在家里过夜，不会有半点犹豫。他向作家们介绍了自己的体验。

毛二十七岁时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北平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次运动就是一九一九年著名的五四运动。有一段时间，他做过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以此作为生活来源。近三十年之后，当他的军队进入北平时，他发现当年领导过他的那位图书管理人员仍然在职。毛于一九二〇年结婚。他打破了旧传统，拒绝了父母为他选定的妻子，却找到了一位同学做自己的新娘。这次自由选择和以后十年的婚姻生活被一些湖南的青年激进分子誉之

---

① 此处是指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译者注

② 原文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27,528页）。——译者注

为“理想的浪漫史”。

在他经历个人浪漫史的那些年代，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从毛在国共两党同时担任的工作就可以看出当时两党之间的政治联盟多么紧密。他在一九二一年参加了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又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国民党选他为上海市党部委员，以后又担任《政治周刊》编辑，再以后则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主管训练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很明显，从一开始毛就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政治组织才能的人。

一九二七年初，他写出了第一篇重要的政治分析文章，第一次批评了共产党早期的领导。当年一月，他被派往湖南，对夺取政权后的农会进行调查。他考察了五个县，写出了一篇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刊载在两期不为人注意的内部通报上。当时党的书记陈独秀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今天这篇报告已成为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毛为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花费的三十二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比蒋介石几个月后在南京的篡权更为深远。

在那里毛看到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他写道，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不顾许多人，甚至党的领袖陈独秀的批评，他们认为农民走得“太远了”，毛根本不把这种批评当一回事。他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sup>①</sup>

<sup>①</sup> 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者注

<sup>②</sup> 原文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译者注

这篇报告反映出毛泽东具有一种担任领袖的气质：他对农民能作出迅速反应；他能顽强地坚持说服并善于使用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缺少的一种生动的比喻。由此而来还反映出他的另一种重要的品质：毛具有一种既能找出适当的方法证明自己有理，又不破坏党的团结的才能，虽然党的领导人是反对他的。当陈独秀称毛“头脑发热”并把他撤出湖南的时候，毛却立即被选为全国农会的主席。党内对这一组织并无争议，而他在这一组织之中却能发挥其全部积极性。

此时毛和他年轻的妻子不论在个人生活方面或事业成就方面，本已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以后发生了国共大分裂。毛以非法的身份领导着一支农民的武装队伍，当时对他入头的赏金是二十五万美元。由于毛的关系，毛的妻子和妹妹在一九三〇年被湖南的一个军阀所杀害。现在的夫人是他的第三个妻子。

作一个外人称之为“共匪”的领导人，毛泽东具有的地位是由于他已经显示出来的品质：他熟悉中国和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具有分析所见事物的天才；他能够用简单明瞭、丰富多采和铿锵有力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他顽强地进行说服并懂得如何在党内坚持自己的信念。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冬季，正值共产党实行城市暴动政策——均遭到失败——之时，毛离开城市，前往敌人不能进入的地区，建立起农民政权，因而得以幸存。一九三〇年，实行冒险主义的李立三嘲笑农村政权“微不足道”，并在他的影响之下，党中央发布了注定要失败的攻打长沙的命令，这时候毛却作为江西乡村政府的主席发展了以后广为流传的活动形式。

他是政治斗争中的一名坚强战士，并以此闻名。他在延安的一位朋友说，“他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一九四五年举行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两年来对过去历史的讨论,许多前任领导人已经名誉扫地,看来他们下台后将永远不能抬头。这时候最后当选为主席的毛泽东却亲自进行了干预,为他从前的对手讲情。

他说,“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论错误有多严重,造成多大损失,只要他们老实地承认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并从中汲取教训;比那些没有经过考验的领导同志更好。”

这就是一位领袖所说的话。他懂得如何在一批因不同观点而进行斗争的强人中创建一个团结的党。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分析是引路的指南。但是,作为一位人民的领袖,他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他能掌握人民的基本需要,并具有一种能决定首先采取何种步骤的艺术,而且还在于他具有一种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知识和纲领的能力。他的鲜明的比喻使马克思主义熠熠生辉,他的语句则成为格言。

比如延安有一些防空洞,即通过坑道同山丘相连的窑洞。在延安生活的人在防空洞里都感到有一股冷风。一次毛在谈到“党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象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sup>①</sup>听到的人都笑了。

在一次对教条主义进行的著名演说中,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比作箭,“必须用弓去射中国革命之的”。<sup>②</sup>

我们必须“有的放矢……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

---

① 原文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8页)。  
——译者注

② 见同上第496页。——译者注

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象能够驱鬼的魔法。它既不好看，也不神秘，但却非常有用。……还有不少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连牛屎都不如，因为牛屎还能当肥料，而教条却不能。”

上面一些话，是针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人说的，正打中了他们的要害；而下面一些话，是针对那些通常自高自大的中国学生说的，同样也打中了要害。

“书没有长腿，可以随意开阖。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烧饭或杀猪方便得多。因为捉猪猪会跑；杀猪它会叫；而放在桌子上的书，既不会跑也不会叫，可以由你随意摆布……所以我希望那些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更谦虚一些。”

毛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知识渊博，能与学者论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并偏爱中国戏剧。他可以随时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同可以随时引用农民的谚语一样。他也可以轻松自如地谈论西方的哲学家，从早期的希腊直到当代的哲学家。毛在采用卡尔·马克思的方法以前，曾经在北平的大学里学习过多年。

毛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虽然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发挥这方面的才华。一九四五年，他乘坐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飞机去重



庆。这是他二十年来第一次走出他被封锁的地区。在飞机上，他做了一首关于中国的诗词。<sup>①</sup> 这首词后来轰动了中国陪都的知识界。他们原以为他是一个来自西北窑洞的土宣传家，可是遇见的却是一个在哲学修养和文学风格方面都远远胜过他们自己的人。

毛作为一个诗人、精通各种哲学的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对语言文字的特殊敏感，因而能够回答其他共产党人所不能回答的各种问题。经常为毛担任翻译工作的余编辑告诉我，有一个美国人从老远跑到延安想向毛证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他曾经在南京同周恩来和其他人对此进行过争论。他们对他说，“不，共产主义是科学”。他对此颇不满意，因而溯本寻源，来到延安。

当汽车颠簸着开过延河的时候，这位教徒对余夸口说，“你将会看到我是怎样说服你们的主席的。”

这次对毛的“说服”只花了十五分钟。来访者在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后，停下来换了一口气。毛并没有同他进行争论，却回答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宗教——为人民服务的宗教。”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人说这样的话，毛本人在党内辩论时也不会用这样的字眼。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就定义进行争论是有益的，什么时候是无益的。他懂得一个单词具有的多种有人情味的含义。这位教徒带着毛的崭新的口号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毛使用了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向他指明了一个目标。

毛的这种天才，有助于毛在不仅有共产党，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中发挥作用。

毛泽东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分析和对中国人民的悠

---

<sup>①</sup> 指《沁园春·雪》一词。——译者注

久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获得了一种关于中国人民的知识，并把它带进了这样的联合政府。他还带来了对中国人民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启发的革命觉悟具有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他带来了指引航向的能力，分清轻重缓急的能力和估计什么矛盾占了首位的能力。他总是把他的党放在中国和世界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

我从未做到使他说出中国共产党将赢得胜利的话。他们总是说中国人民将赢得胜利，只要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成功。他认为，各个政党只要为人民服务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他懂得应该按这样的标准来对他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

## 他指引航向

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同毛泽东争论说，“如果中共不把自己称之为‘共产党’就不会引起恐俄病，他们就不会在美国受到这样多的误解。如果美国人知道你主张的是民主，他们一定会支持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名字来自找麻烦呢？”

毛回答说，并不是名字带来麻烦。“一百多年来，在不牵涉到俄国人或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下，西方列强总是支持中国的反民主的统治者。”

他指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西方列强向满清皇帝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农民进行镇压，屠杀了几千万人。从一九〇〇—一九一七年，当时并无“恐俄病”，西方列强再次向反动军阀提供金钱和武器援助，反对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国。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当国民党的北伐军在中国南方推翻军阀时，西方列强一直反对国民党，直到蒋介石对一切民主组

织进行镇压并屠杀工农群众以后，他们才给予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

毛在结束讲话时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来，被帝国主义镇压下去的解放运动有多少次？”

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进行的斗争是这一长期斗争的继续，而这一次他们决定夺取胜利。他们既不指望外援，也不指望通过暴动一下子取得成功，而是把希望建立在对政治力量的源泉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上。他们问道，一个国家的力量表现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使象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国家，走上独立、繁荣和富强之路？强有力的领导从何而来？这样的领导应该依靠哪些阶级？为了赢得这些阶级的支持，必须做些什么？应该经过哪几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运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他们找到的西方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来解决本国的问题，中国人特别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方法。准确地说，他们对我是这样讲的：“我们使用的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俄国人使用的也是这种思想方法。由于中国人面临的条件不同，他们的答案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不同的。前一章提到的在几个省交界处成立边区的方式，其根据就是毛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是有创造性的，不是抄袭他人的。这种创造性的品质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毛引起党外注意的第一部著作是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分析《论持久战》。这是在中国抗战时期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当时许多中国人已经陷入绝望，而蒋介石则等待美、法、苏等国参战并决定其命运。毛宣称，只要紧密团结，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赶走侵略者。毛把抗战分为三个阶

段,即:日军深入进攻阶段、相持阶段和胜利反攻阶段。这一分析连外国的一些军事专家也鹦鹉学舌地加以模仿,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分析的来源是什么。这一著作的基本理论后来也被运用于中共同蒋的内战之中。在殖民地人民反对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的各种战争中也得到了运用。

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中国爱国者吹响的又一次响亮的号角。当时由于许多将军的叛卖和来自重庆的压迫,正蔓延着一种悲观情绪,这一著作就是为回答这种悲观情绪而写的。中国亡国了吗?毛答道,不,中国没有亡,即使国民党全部叛变,在中国人民之中仍然会有某些力量保存下来。他们将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中取得胜利。毛分析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以及领导人民取得胜利并在战后使国家富强的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府不是一党专政,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不是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不是象在苏联实行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制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阶级”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参加的一种联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也包括在内。

《新民主主义论》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转折点,并对全世界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影响。莫斯科把它翻译成英文和俄文出版并誉之为“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认为,对于以后在东欧建立非常类似的政府是产生过影响的。这一理论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解放区经过五年的试验以后,毛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把它进一步发展了。报告发表时题为《论联合政府》。当时毛泽东声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在几十年内”都将是有效的。

这三本著作是发行得十分广泛的共产党的经典著作,是为中

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制订的明确无误的爱国主义的纲领。在接踵而来的内战中，这三本书曾经是国民党被俘军官的必读课本。在阅读之后，不止一个军官流着泪说道，“早知道有这样的治理中国的思想，我们也不会同共产党打仗了。”

毛于一九三九年撰写的另一篇著作，直到最近才公诸于世。十年来它只在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秘密传阅。这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中国历史和历史上的多次农民革命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而且还论述了共产党现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读了这本书，对其推迟发表的原因也就明白了。这篇著作坦率地估计了共产党人寻求与之结盟的不同“盟友”，以及对这些盟友能够依靠的程度。既然认为中国的各党各派都在抗御日本侵略者，那么公开判断哪些盟友可能退出抗战，这在政治上当然是不策略的。

现在发表的这篇著作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纲领以及在毛看来中国各个阶级要做的事，作出了明确的估计。

毛作为共产党的一位领袖对党内其他高级人员直截了当地说，争取民族独立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斗争，中国的各个阶级只要老老实实地为此而斗争，就将成为长期共存的盟友。他写道，“实行民族革命，推翻帝国主义是首要的任务”。第二个“现阶段任务”是推翻封建阶级，即军阀与地主。这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也是当前的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由于两个敌人中帝国主义更为强大，其压迫也更为严重，因此帝国主义是第一号敌人。

毛说，中国一切其他的矛盾都是居于第二位的。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矛盾在其他国家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是第二位的。居于第一位的是为国家的独立而战。

毛泽东胞弟的牺牲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原则的献身

精神。一九三八年，拥有大沙漠的新疆省的独裁者盛<sup>①</sup>邀请中共派专家去他的省帮助实行现代化。他的货币毫无价值；他的灌溉系统已经遭到破坏；他还经常面临着当地部族的骚乱。共产党知道盛是一个独裁者，也知道他已明令禁止在他的省内宣传民主。但他们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盛当时是抗日的，而且新疆是战略要地。一个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胞弟毛泽民为领导的包括约四十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新疆。他们进行了货币改革；把四十种税收减为十种；建立了四个模范县政府，并把它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增加了灌溉。此外还建立了第一所中学和第一所大学。他们实行的政策也平息了当地部族的骚乱。后来在蒋的压力之下，这些共产党人同新疆的各种各样相信进步的大约五万人一起被监禁。毛的弟弟同另两位领导人一起在监狱中被杀害。那些活下来的人在一九四六年短期停战时才返回延安。由于盛抗日，所以准备对这位独裁者给予帮助，这是我从毛的已故弟弟的夫人那里了解到的。这位夫人在监牢里还生了一个孩子。

在确定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作为中国的首要任务这一原则之后，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反对外国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的哪些阶级是可以信赖的？谁是敌人？谁是盟友？这些盟友可靠程度如何？

在向党员回答这些问题时，毛把中国人民划分成五个主要的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前两个阶级是敌人，后三个阶级是“革命的力量”。

使人眼花缭乱的是毛接着举出了许多例外。他把每个阶级又

---

<sup>①</sup> 此处指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一九三三年任新疆边防督办，曾伪装革命，同共产党人合作，一九四二年反共投蒋，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译者注

分成几个阶层,并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可能是“敌人”,但并不是每一个地主分子都是。大地主特别容易成为投靠日本或其他侵略者的汉奸;某些小地主特别是他们在大学读书并具有爱国思想的子女则可能成为为中国独立而斗争的忠诚战士。毛说,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应该予以合作”。

“大资产阶级”也并非一概都是敌人。在中国,大多数大资产阶级带有买办性,他们是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为了自己的利润他们会出卖祖国。但由于他们是为不同的国家服务的,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可以同其中的一部分进行合作。当日本进攻时,亲美的“大资产阶级”将为中国而战。毛说,可以同他们进行合作,但要提防他们,因为以后他们会把中国的利益出卖给美国。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较好的盟友”。他们多数不是大资本家。因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初刚刚开始,而且必须同更为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同所有的资本家一样,都要剥削工人,榨取利润,但为了企业的生存,就得争取国家的独立。他们还要努力增加生产,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毛认为工人不应提出使这些资本家破产的要求,而应该帮助他们获得利润并分享一部分利益。但他警告说,要提防他们,不然他们会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并出卖国家利益。

“革命力量”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业主),农民和工人阶级。这些人都受到压迫,并将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而斗争。毛对这些阶级的详尽分析在以后的章节里还要提到。占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是“最强大的力量”,而人数少得多的无产阶级却被毛称之为“领导力量”。人数远较农民为少、教育程度又远较资产阶级为低的无产阶级何以必须领导并能够进行领导呢?毛的回答是:中国的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封建地

主的“三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有一种非常坚决的意志。他还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历史长久并更为成熟”，因为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在外国企业里工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决意志、它的“成熟”和它同农民的亲密联盟，这就是它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原因。

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一种什么革命呢？是俄国式的革命还是一种早期产生的西方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革命？毛的两种说法初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现阶段的革命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就此接着说：“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sup>①</sup>毛说，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怎样取得胜利呢？在以后《自由企业》一节里将作较详细的探讨。

毛对其他领导人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当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再进一步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纲领同孙中山的纲领是“一致”的，但在第二阶段则将超过它。

任何一个对毛讲的道理认为不太好理解的人都会感到，在他的手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由一位社会分析大师掌握着的非常灵活的武器。他和他的中国同志们都对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这里应该补充提一下，我曾在延安同刘少奇进行的一次激动人心的谈话。他花了一整天阐述了他称之为“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

---

<sup>①</sup> 原文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39页，338页，342页）。——译者注



刘说，在“民族、农民、战略、文学艺术、财政经济、工作方法、哲学等”各种问题上，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有“新的发展”。

刘说，即便“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也有一种新的涵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革命应由产业工人来领导……但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少……因此毛泽东就对另一种人——军队中的农民和贫农——进行训练。这些人同样有着产业工人所具有的守纪律和献身精神的品质。他们甚至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献出了生命。他们现在正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一旦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到来，他们也会随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

刘说，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是“毛的一个创造”。过去历史上的农民暴动由于缺乏纪律性和连续性因而遭到失败。在人民解放军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却表现出团结和献身精神，从而克服了这一缺点。这些农民不但是战士，而且也是土地改革和乡村进步的组织者。

“今天，我们允许资本主义，甚至通过政府贷款的方式给予鼓励。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甚至提倡劳资合作。这一点马克思是从未说过的。列宁说过一次，但也只是为了谴责这种行为。在一些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合作对工人的利益是一种背叛，而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人和本国的资本家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方面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我国的民族工业中，工人应该增加生产，资本家应该改善工人的条件。只有这样，我国的民族工业才能够同外国的竞争中生存。这一政策适用于三种工业：公有制工业、合作制工业、和私营工业。”

刘列举的一些“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还有：军事战略，由于运用这一战略，共产党的军队在二十一年的战斗中，从三千人发展壮大为三百万人；变工队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使农业增产；生产自给

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甚至在大幅度减税情况下,也能使被严密封锁的“抗日根据地”发展成为强大的解放区。所有这些方法以前在其他任何国家从来也没有使用过。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它们将成为主题。

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过斗争,经历失败和胜利而得到发展的。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拥有三百多万党员的党了。

我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是莫斯科的随从。还是西方所说的民主主义者?答案似乎是:他们两者都不是。他们是中国人的。

他们采用的是俄国人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在新的条件下,答案是不同的。他们取得了西方赖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但他们说,一个不同的领导将把这场革命引向社会主义。

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从莫斯科得到指示,即使向莫斯科征询意见也很少。苏联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第一个政府,向他们派出过顾问,但在一九二七年就撤离了。后来苏联只同它承认的蒋的政府打交道,而同中共的直接接触很少。中共在江西期间及在延安的初期,共产国际曾经派来一名代表,但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总是不同意,最后他离开了。我在一九三八年访问朱德的司令部时,有两名塔斯社记者也来作短暂访问,而该社却有十名记者在蒋的前线进行访问。很清楚,这两个俄国人还是朱德手下的大多数士兵第一次见到的俄国人。

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权并取得胜利之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曾经向中共提供过武器援助。马歇尔将军在接受采访时曾经两次提到这一点。他的飞机和停战小组人员遍布全中国,直到苏

联边境,因而他是拥有掌握情况的各种手段的。在满洲,我问一位军官,他是否见到过俄国的武器。他回答说没有,然后他想起了什么又笑着说,“俄国人在抗战早期曾经有一些步枪送给蒋,蒋后来用这些步枪打我们,被我们缴获了。这就是我见到过的俄国武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掌握政权并不是依靠外援,而是因为,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发自中国的报道中所承认的那样:“他们成功地使自己的运动适应了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同时也因为,引用一下最近发表的白皮书中一九四四年致国务院的一份正式报告:“普通老百姓第一次有了一些奋斗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思考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每当我向极为谦逊的中国共产党人询问莫斯科对土改或战略的某些方面有何看法时,他会惊讶地回答:“我们从不向莫斯科问这些事情。我们只管怎么办对我们自己有利。”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特别同苏联共产党有着一种十分亲密的关系。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毛泽东亲自肯定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些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①</sup>他还说,三十多年前俄国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醒了中国,中国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毛以十分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国际忠诚问题。这些语言使得艾奇逊国务卿作出这样的痛苦的推论:“中国共产党已断然放弃中国的传统,并公开声明屈从于一个外国”。让我们查一查毛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积二十八年的经验,懂得了两件

---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5页)。  
——译者注

事：第一，“唤起民众”，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宣称，“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sup>①</sup>毛列举的使“中国人民的胜利”成为可能的那些国际革命力量包括苏联的存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欧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以及“美国……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sup>②</sup>

毛声明，“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sup>③</sup>

这些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很简单的话，在今后若干年内，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将加以分析和讨论。自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解决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的问题之后，各国马克思主义之间最严重的争论在未来的十年之内将是新建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国家保持独立和主权的程度有多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服从取代国家的新国际形式？如果有某种国际新形式，它将怎样进行治理？在当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所有国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这都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答案还没有找到，但为寻求这一答案而进行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不，毛泽东并没有宣布过艾奇逊国务卿所说的那种拙劣意义

---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0页）。——译者注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0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681页。——译者注

的“屈从”。他并没有称苏联为必须经常追随的“领袖”，更没有把它称之为发号施令的“总参谋部”。但是，他讲话的意思包含着一种比仅仅对一位盟友更为深沉而持久的忠诚。他所说的“以苏联为首的反帝阵线”的话，也不是就要建立一支严密的军队，而是要组成一个阵营，在这个阵营之中，用一句自相矛盾但很能说明问题的话来说，苏联至少是“排行第一”。他所说的不是顺从，但的确有一种深切的尊敬和忠诚——不是为着一个“外国民族”，而是为着全世界范围共同的事业。

关于双方在实际行动和外交关系方面的格局尚未决定。进行调整和讨论可能需要若干年。这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何意义，其实际问题应留待本书最后一章加以阐述。

### 他们如何打到沿海地区？

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攻占华北和满洲的机会。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因为日本人曾经说过，他们来到中国是为了把中国从共产党的手中拯救出来。以后，美国向蒋介石提供援助，也是为了把中国从共产党手中拯救出来，而这些援助却装备了人民解放军，使它迅速地攻占了中国的其他各地，成为亚洲东部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军队。毛泽东的最富有讽刺性的嘲笑也没有象这些事情那样有讽刺意义。

抗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仅在西北有一块不毛之地，面积三万三千平方英里，人口一百五十万，首府在延安。而当抗战结束时，他们的土地面积已超过八十万平方英里，人口已有一亿四千万。土地扩大了二十倍，而人口则增长了近一百倍。他们是在组织人民抗战的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一九三七年日本深入侵略中国时，中国各党派在抗击侵略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朱德将军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改组为国民政府的第八路军。他们接到开赴山西北部前线的命令。蒋派他们潜入敌后，在他的正规军溃逃出来的地区对日本人进行袭击。他原指望以此来消灭共产党，让他们为国捐躯，然后再由蒋出来实行统一。这也是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共产党占领的地区越打越大。

日本在中国的第一次失败是败在山西北部平型关的八路军手里。尽管蒋对此从不相信，但这次战役的确解救了对南京的过早的包围并为蒋保留了退往内地之路。战争初期，日本的战略是通过沿南北向三条大铁路干线南下，直达长江三角洲，同时占领上海，并进而拿下装入口袋的南京。当侵略者进军山西高原时，以快攻出名的八路军小伙子们从山崖上对敌人进行了突然袭击。日本人在这里的失败迫使从平汉路南下的日本军队改向，转而去山西为日军解围。这样，汉口才有可能据守一年，使之成为南京最后陷落时蒋政府的一个基地。

对华北农民来说，平型关的胜利之所以重要，还有其他原因。从这里他们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如果你们打得正确”，可怕的侵略者是能够被打败的。一位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农民在很久以后向李敦白讲了这次战斗的经过。

“当日本人来到我们地区时，我和我的朋友讨论决定必须加以抵抗。但什么武器也没有，怎么办呢？我们碰到了一位八路军战士，便一起进入树林进行交谈。不久我们看到一个日本军官带领七个日本兵从草地搜索着走过来了。我和我的朋友吓得浑身发抖。这位八路军说，不要慌，你们跑也跑不了。注意观察，看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等着，日本人一直朝我们走过来了。这位八路军战士说，

‘我们到那间草棚里去吧’。于是我们就走进了附近的一间空屋，透过破窗纸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我的朋友低声地说，‘老天爷，他们朝这边走过来了。我们完蛋了。我们从后门逃走吧，我们当中总有人能逃出去的。’

“这位战士说，‘沉住气，不要动’。

“他从腰带上取下一颗手榴弹，拧开了盖子，但用大拇指揪住了保险。我想，‘他大概要我们同归于尽，以免受辱’。当时我们以为必死无疑。他却说，‘保持安静，看我怎么打’。突然间日本军官来到门口，后面跟着七个日本兵。这位八路军战士从门里向外扔出了手榴弹，正好在他们的脚下爆炸。轰的一声，我们缴获了七条新步枪。

“有了这些枪，我的朋友和我，还有我们村里的五个人一起跟随八路军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农民们发现他们能够打败侵略者。正是这种激动的心情使共产党从延安打到了沿海地区。

一九三八年一月，朱德在山西他的司令部里对我说，“我们认为拯救中国的希望，主要在于华北的游击部队。我们将对日军进行骚扰，使之不能集中兵力，不能利用华北作为进攻中国其他地区的基地。”

当时抗战已经开始七个月，朱德的军队就收复了过去蒋介石正规军丢失给日本人的几十个县城，重建了这些县城的地方政权。来自敌后根据地的三个师的指挥员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明确了下一步进军的方针。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独眼将军”刘伯承向东开辟晋东南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已发展为一个位于华北心脏、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大解放区。留着黑胡须、性格开朗的贺龙挥师北上，建立了晋绥解放区，遏制了日本通往战略要地

新疆的道路。林彪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其外貌颇象一个害羞的中学生，他据守在晋东北的一个抗日根据地，以后他由此向北直取满洲。

这些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一个秩序安定的地区平稳地成长起来的，而是在侵略军和土匪蹂躏下战祸连年的省份里发展壮大起来的。一支人数不多但纪律严明的部队带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卓有成效的作战方法深入这些地区，从而迅速地把它扩大为原来面积的许多倍。

举一个小例子。政委李清玉在战争开始时带了一支八百人的军队被派往冀南地区。一年之内，这支军队发展到二万人，并在三十个县里赶走了日军指定的伪政府，而代之以由农民和部队推举产生的中国政府。

这位李政委是如何创造这一奇迹的？几年之后他在延安才告诉我。

“我发现有五种军队在互相作战：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军队、新成立的伪军、少量日军、少量土匪以及一些农民为保卫家乡而组织起来的地方自卫队。我们首先着手解决这种混战状态。我们派出代表同除公开投敌以外的一切军队联系，如果他们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我们便提供训练，并使之编入我们的部队。有些拒绝了我们的纲领，投向伪军，并从日军获得武器，我们就用武力解除他们的武装。

政治纲领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纲领。李政委解释说，“单单动员人们抗日是不够的。那些雇农和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交租的佃农只关心吃饭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李手下的组织工作者深入雇农睡觉的草棚，访贫问苦。这些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为东家守夜，一年下来工资只有二三百磅谷



子。一个人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养家糊口。李鼓励他们成立了雇农协会，由军队进行保护。工资提高到八百磅谷子，够养活夫妻两人了。雇农们还签订了集体合同。合同规定他们有时可以有一天假期去赶集，在进城掏粪积肥时还“有酒犒劳”。这些家庭生活的改善，使他们有了一些奋斗的目标。佃农协会也同样得到了减租的好处。

这些农民很快就建立起“人民政权”，为了保卫这一政权，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朱德的军队有了成倍的增长，由他们用这种方法解放和领导抗日的地区有几十个，李的三十个县只是其中之一。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不断扩大之时，一支类似的军队——新四军在长江下游宣告成立，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最早委任。新四军的任务特别危险，因为他们活动的地区处于侵华日军最为集中的地带。它的战绩辉煌，他们经常在沪宁线上袭击日本人；一九三八年秋，在一个日军的飞机场升起了一面中国旗，连上海也看得见。华东农民称之为：“天字第一号军队”和“神兵”。

一九四〇年底，即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整整一年之前，原来在日本侵略军的汪洋大海中进行抵抗的华北和华东解放区开始时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孤岛，这时已经从延安到沿海连成一片。他们袭击日本人控制的铁路，把守卫在城市的日军孤立起来。日本人占据着战略据点，但他们无法巩固对整个地区的控制并加以开发利用。中国人运用如此微弱的战争手段却取得了这样引人注目的成就。看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的一段话是对的：如果数量更大、装备更为精良的蒋的中央军能够也用这种方法把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单靠中国本身就能够打败日本，这样就可以防止日本在珍珠港袭击美国。

蒋的将领们根本没有仿效这些方法，而是声嘶力竭地反对共产党的“肆意扩大地盘”。他们想方设法解散或削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样，一种三边战争便开始了。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总部和后方警卫部队的残杀，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国内冲突的第一个信号。一九四三年蒋下令解散共产党。一九四四年他又下令把共产党军队削减为原有规模的十分之一。他已经很久没有象战争开始的第一年那样向第一批共产党军队发军饷和弹药了。但是共产党现在可以从广大的解放区征税，并在本地兵工厂制造武器弹药或从敌人手里缴获军火。

共产党并没有遵照蒋的命令解散。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尖锐地问道，“如果没有解放区和解放区的军队，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哪里？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根据大会前几个月的数字，共产党声称已经重建了五百九十一一个县的县政权，占蒋的正规军丢失给日本人的七百九十一一个县的百分之八十二。他们声称，他们的军队牵制了在华五十六万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拥有更多资源和外国援助的蒋的正规军却很少作为。

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正因如此，美对华军援司令约瑟夫·史迪威上校<sup>①</sup>曾要求把武器送往解放区，并在解放区建立空军基地，他还要求中国所有的军队，统一在一个能代表各党派的战争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他特别要求提供给蒋的用以抗日的美国武器不得囤积起来留作以后打中国人之用。蒋要求召

---

<sup>①</sup> 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一八八三——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陆军将领，曾指挥在中国、缅甸和印度境内的全部美军。  
——译者注

回史迪威，并获得同意。在新大使赫尔利和新的司令官魏德迈的主持下，美国的政策经历了一个急剧的转变。一九四五年春，蒋使用美国武器进攻中国共产党，这时候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

日本的投降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意外。蒋介石在日本人最后几次进攻的逼迫下，节节败退，只好龟缩在西南一隅。在他和大洋之间横隔着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对他持敌对态度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他根本就出不来。要不是有外国对他的支持，他的处境比一个内地的军阀好不了多少。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处在随时可以接管日军占领区的有利地位。这些地区主要包括铁路沿线和日军守备的城市，这些都是处于解放区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孤岛。

朱德从延安发布命令：“夺取城市，夺取铁路，解除日军武装。”

解放区的农民军队在日本投降的鼓舞下，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奋勇进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最后十天里，他们夺取了八十五座县城和山东省的五个港口。九月份，他们把“解放”了的县城数目翻了一番。他们获得的区域面积并不大，因为大多数乡村地区早已被他们占领，但获得的城市却很多。上海和南京正等着他们去解放，而他们完全可以占领这些城市。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免得跟美国人发生冲突。

蒋的政策即美国的政策是制止共产党立刻取得胜利。蒋命令朱德的军队原地驻防。毛泽东鉴于过去的历史经验，没有同意。与此同时，蒋还同已经投靠日本的五十二名国民党将官取得联系，这些人的部队都驻扎在相互争夺地区之内。蒋介石命令他们打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三日签署的补充和平条款中，规定日军必须守住阵地，等候蒋的中央军接管，并重新为蒋占领丢给“非正规军”的阵地。因此日军在正式投降后，在一个时期内还在加强对华北的

进攻。日本人宣布，他们现在是根据蒋和美国的命令作战的。这决不会提高蒋在华北的声望，也不会提高美国的威信。

美国把轮船和飞机都置于蒋的支配之下，把他的军队紧急运往华北和满洲各地，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大的空运”。美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三亿美元的巨资。它使华北农民不得不相信——以后在讨论军队时还要提到——蒋在迎接胜利时并不想同他们合作，而是想利用美援对他们进行遏制。

“蒋和伪政权、美国人和日本人一齐勾结起来，打‘人民的军队’”，这就是华北农民的说法。

美国作为伟大的盟友在中国一直享有的威望，由于在疯狂的空运中出现的各种事件而发生动摇。烟台市长曾经告诉我一个关于美国人企图占领他的港口而没有成功的故事。我答应过要作有选择的报道。毫无疑问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但从他所说的可以看出一位中国市长的看法。他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美国军舰开进了烟台港，要求中国地方当局投降并交出城市。这一要求当即遭到拒绝，中国当局表示，他们已经赶走日本人，全市秩序良好，对此美国人可以进行参观，但“一个盟国从一支中国军队手中夺取一个中国港口恐不相宜”。在以后几天的讨论中，双方使用的言词愈来愈剧烈。最后市长宣称，“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从烟台开始打起来将非常遗憾！”后来美国人回到他们的军舰上去了，他们要求中国人第二天一早登舰举行“重要会议”。

当天午夜，满载着不久前投靠日本的伪军的二百艘汽艇从美国占领的天津驶来，登上了烟台口外二英里的一个无人岛。海口的哨兵向烟台的部队作了汇报。凌晨四时，他们乘帆船抵达该岛，趁入侵者熟睡之际将其揪出俘获。几小时以后，美国军舰不等举行“重要会议”便不辞而别。烟台人一致认为这次伪军的进攻是

美国人的计谋，其目的在于以“调解人”的身份接管这一港口。

为了解决这类冲突，赫尔利大使飞赴延安，在美国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接来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十月十日签订了双十协议。共产党从某些地区撤出了他们的部队，主要是长江以南以及广州和上海附近地区。象以前一样，蒋同意停止敌对行动，给予平民自由，宣布一切政党合法，改组一切部队为统一的国家军队。由于蒋拒绝承认解放区选出的地方政府，又不肯确定共产党军队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合并的比例，毛保留在全国联合政府成立以前保卫解放区的权利。

在协议签订期间及签订前后，战斗始终没有停止。协议签订前四天，蒋在华中地区向共产党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协议签订后两天，他向他的将领们印发了“剿灭共匪”的手谕。就连根据协议撤出长江以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在撤退时也遭到了袭击。十一月，蒋派出了三个军进入河南，绕过许多日本人占领的城市，目的在于清除平汉线上的共军。这些国民党军队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其中一个军加入了共产党军队。

显然，蒋要想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对共产党进行遏制，但军队不足，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办法。

这种新办法是“美国造”的。赫尔利大使被召回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名字是同内战连在一起的。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了。他声称自己是调停人，是带来和平的人。莫斯科外长会议刚刚闭幕，据悉他是前来执行这次会议通过的三大国的政策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杜鲁门总统重申这一政策是：在各政党一致同意下，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在此之后一切外国军队包括美国人和俄国人将撤出中国。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签署了停战令。停战令上除签署了蒋共

双方的名字外还加了马歇尔的名字。在全国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的军事位置冻结在一月十三日的位置上。后来又签署了一个关于满洲的停战令。

根据各项协议的规定，解放区的范围包括从上海对面的长江口直到北方的黑龙江，从蒙古的沙漠直到海边。这一地区的面积等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人口等于全美国的人口。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就这样在抗日战争中扩大了二十倍。

全中国又燃起了希望——和平的希望。

一月十日举行了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蒋担任会议主席。当蒋把当天上午签署的停战令向大家宣布时，与会代表都非常高兴。他没有说受到马歇尔何种压力，也没有说他签署停战令时是多么不愿意。在开幕词中，他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证给予中国进步人士要求的各种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各政党平等的合法权利；同意成立地方自治政府和普选；释放政治犯。在三个星期内，代表们就中国未来政府的五个基本问题作出了决定。他们同意了在过渡时期内按固定比例进行的联合；以和平方式重新改组国家的方法；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必须考虑的制订宪法的形式；以及对军队的改组，这种改组将通过裁减现有各种军队并将其合并成为一个不是由政党控制而是由民主联合政府控制的统一军队来实现。

这些决议的每一项都是在蒋介石担任主席的情况下一致通过的，就连国民党中最臭名昭著的反动派也出席了会议并投票赞成这些决议。

全中国人民都很高兴。许多人食不果腹，许多人衣不蔽体，成百万人死亡，成千万人无家可归，但是和平已经成为定局。中国的各个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群众集会，欢呼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决

议。这是将近二十年以来出现的希望的最高潮。

秘密警察不高兴。他们将失去权力，不能再贪污了。许多高级将领不高兴，他们将失去军事统治带来的好处。一位战区司令官自嘲说，“如果我同共产党打仗，我可能失掉我的半个省的地盘，但和平一来我将失去一切。”在一个战区里，所有的文武官员都是这个战区的军阀指定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些不义之财的。

正因如此，那些欢呼通过一致决议的充满希望的群众集会将被蒋的警察冲散了。欢迎“和平天使”马歇尔的学生大游行被上海警备部队打散了。一九四六年二月，反动派通过制造骚乱来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三月，他们通过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谴责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本党代表的行为并采取单方面行动使独裁合法化。四月一日，蒋亲自宣布不接受政治协商会议同意的宪法的形式，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满洲”。他没有提到三天以前他签订的关于满洲的停战令。

现在中国人的眼睛都看着马歇尔。蒋常常背弃他自己的诺言，人们对这些诺言不会认真相信了。但是这次停战令上有马歇尔的名字，除了蒋介石，美国也介入了。卷入此事的还不止美国，因为马歇尔执行的是三强外长会议的决议。因此，中国人期待着马歇尔设法给他们带来和平。

华北到处都是冲突点。双方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蒋在美国空运的帮助下占领了绝大部分以前由日本人占领的据点。他占领了几十个孤立的都市，四周被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所包围。他占据了部分铁路，但却通不了车，因为共产党占据了铁路经过的部分地区。多数蒋占区的代表就是多年来一直为日本人效劳的将军们。当地的爱国人士从来没有屈服过，现在也不会向这些将军们屈服，即使蒋介石把他们重新梳妆打扮过了。

为了解决这些冲突，马歇尔在北平成立了军调部，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了。以美国人为主席的国共双方的同等数目的代表在这里进行工作。在三、四十个动乱的中心，都设有以美国军官为主席的停战小组，他们通过谈判防止冲突。历史上很少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一个外国派出的代表进行的指导给予过如此的信任。

对于马歇尔停战小组的第一次大的和平考验来自中原解放区。该区位于汉口以北，是一片地域广阔但防守并不严密的地区。它包括五个省的部分地区，一度有四千五百万人口，但根据双十协定南部已经移交给蒋，北部则因遭到蒋军的袭击而分裂成许多孤岛。一月十日的停战令并没有给这里的战斗带来任何变化。国民党军队正在对这一地区进行分割蚕食。因此，一个停战小组飞赴中原解放区边界上的罗山县城并签订了一个特别协定。

“人民军队”举行游行庆祝这一协定的签订，他们举的标语写着“和为贵”。他们把一篮篮的水果送给蒋的士兵，但蒋的军官不准士兵接近他们。共产党根据协定拆毁了碉堡，而国民党军队不但不拆，反而还修了新的碉堡。作为执行部分马歇尔“军队改组计划”，共产党复员了一万五千名人。当这些人带着停战小组发的通行证回家到达国民党军队控制区时，这些现在已经脱下军装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在途中被活活打死。

共产党建议，只要使他们留下的六万名军队能安全到达更北面一些的其他解放区，而且能够尊重当地选出的村、镇政府，他们愿意放弃这一地区。蒋拒绝了。他认为他一定能占领这一地区。他想消灭这六万名军队。几个月来，由于发生特别紧急情况，停战小组曾多次来到这里，因而使蒋的全面进攻推迟了。到六月底，大约有五十万中央军从四面八方这一地区进攻，并已得手。但六万名共产党士兵却采取分散战术得以脱险。关于分散战术下面还要



进一步阐述。

蒋得到了这块原本不需要打仗就准备给他的解放区。他有一点丢面子，因为他原来的目的是要消灭这六万名军队而结果并没有做到。下一步他的军队从中原解放区向东进入苏北，向北进入晋南。内战扩大了，后来变成了一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

这次内战的第一个结果是马歇尔停战谈判带来的和平之梦的破灭。全中国人民都醒悟了，他们看到停战小组并没有带来和平。中国报纸，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开始是试探性的，后来就用比较坚定的语气开始分析马歇尔的方法。上海的《周报》评论说，“当国民党进展顺利时，美国人就让仗打下去；当国民党失败时，美国人就开始调解。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原解放区时，马歇尔不加制止，但当李将军<sup>①</sup>（从中原解放区转移的共产党人）突围后接近四川时，一个停战小组急忙乘飞机跑去对他进行阻拦。当马歇尔从美国回来时，他只是对战争处于高潮的满洲看了一眼。直到国民党第一四八师哗变从而使蒋进军哈尔滨的行动受阻时，他才又积极起来。”

在马歇尔停战计划下发生的战斗比赫尔利“战争政策”产生的战斗规模更大，流血更多。事情很清楚，在赫尔利时代，蒋只能动员一百万人进攻解放区；现在他进攻时用了二百万人。在赫尔利时期，蒋有二十个美式装备师抗日；现在他有五十九个美式装备师反共。在赫尔利阶段，蒋只能打到解放区的边缘，用的主要是日、伪军队，而在“马歇尔停战”的名义下，他却能深入解放区，用的是他“嫡系”部队中最好的师，他们都是受过美国训练和由美国的

---

<sup>①</sup> 指李先念同志。——译者注

武器装备起来的。

全中国人民都在讨论马歇尔的“诚意”问题。这是新闻记者和中国的高层人士吃饭时最喜欢议论的话题。他们说，马歇尔一定知道他自己干了些什么。他不象赫尔利那样蠢。难道他不是用一种聪明的办法来彻底推行美国的既定政策吗？

停战令的全部效果八月份在延安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当时无线电广播在蒋开始全面内战的六星期以后，美国给了蒋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剩余物资<sup>①</sup>。人们用一种辛辣的嘲讽语气对我说，“这是马歇尔的成功，一位特使总该取得一些效果吧。”其含义是马歇尔的“停战”已经使美国平静下来并使单方面援蒋发动内战成为可能。

当我问彭德怀对马歇尔的诚意有何看法时，这位副总司令耸耸肩回答说，“我不懂心理学，我是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军人，我注意到的是：马歇尔装备了蒋的部队，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并把他们运送到最适宜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各个据点。他用停战令的方法比其他任何方法更为有效。”

尽管对“马歇尔停战”作出的这种判断是令人痛苦的，但七个多月来，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军调部的飞机飞赴他们的解放区。同世界的接触对他们也是有用的。我使用了这一运输工具——它对新闻记者都是开放的——详细考察了新中国的生活，访问了许多地区，有时正好在它同外界的最后联系中断之前。因为正是在蒋发动进攻的前夕停战小组才撤出来的。停战小组亲眼看到的是蒋的军队把共产党的“省会”一个一个地拿下来了：淮阴、承德、张家口、临沂和延安。

---

<sup>①</sup> 后来发表的数字是价值八亿美元，但标准是什么呢？——作者注

共产党并没有依靠这些省会。他们在自己继续控制并进行组织工作的广大农村照样过日子。

## 三、政治战略

### “你们会长虱子的”

“现在就要下定决心，你们会长虱子的。你们要到农村去，不是去同地主、富农住在一起，而是要同雇农和佃农住在一起。你们对主人也不可自高自大，而是要去接近他们。所以，没有办法，你们会长虱子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仅次于毛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刘少奇正在向一百名青年发表讲话，告诉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学生，来到这里“为人民服务”。他们都很讲究个人清洁卫生，现在将要出发去组织土改。他们的导师给他们的第一个警告是：“你们会长虱子的”。

刘毫不留情地接着说，“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是从延安来的，是带着指挥棒来向农民发号施令的。你们的工作是了解人民的需要并帮助他们去实现它。要唤起人民的自觉性，然后加以组织。你们的方针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些指示提出了政治方面的基本问题，以及人们解

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东南亚有十亿人口。他们忍饥挨饿，没有文化，耕作方法落后，千百万人死于疾病、无知和遭受压迫。他们能够成为那种最灿烂文明的继承人吗？他们能够在本世纪内成为普通人的平等统治者吗？如果能够，如何才能实现？

近几十年来，“到群众中去”的热情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这种热情并不是由共产党所掀起，而是早在共产党之前就已存在。它始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爱国学生的伟大觉醒。这场运动从北平各大学扩大到直至推翻卖国的安福系。<sup>①</sup>学生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大概是唯一的一次。但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把饱学之士尊为领袖。那些学生非常渴望唤起同胞们去抵抗日本的侵略，连懒散的农民也被他们鼓动了起来。于是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只有当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站立起来的时候，中国才会得到自由，才能强大起来。

从此，中国的知识青年就在一再发生的民族危机中献身于人民的爱国事业。蒋介石政权发现学生们的这种不受约束的热情并没有什么用处，因而加强了对他们的镇压。所以共产党接受了他们，不但认为他们有用，而且找到了一种政治理论来指导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人民革命”将一事无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动摇性和个人主义，必须“在人民群众中通过长期的斗争来加以克服。”

“人民革命”是毛为代替“民主”二字创立的具有活力的名词。它要求从学校里出来的最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同最落后的种田人紧密结合起来。城里人不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四千年来农民也不能解

---

<sup>①</sup> 指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客集团。——译者注

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最有活力的思想家必须在深入交往中同人民相结合，他们必须在农民当中生根、开花、结果。只有这样，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的新的更伟大的领导人才能涌现并茁壮成长。

第一个附带的考验就是虱子。在中国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著名外科医生伊洛塞尔对我说，“百分之八十的人是长虱子的”。我不知道谁提供的百分比，但这大概是正确的。中世纪的圣徒知道同“上帝的穷人”生活在一起将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作为一种牺牲，奉献了自己，忍受了虱子。现在的改革者更加爱挑剔了。当我向延安领导人提出，要求他们允许我同他们一起撤退到山里去时，陆定一警告我说，可能会有几天没有饭吃。我回答说，“我不怕一天不吃饭，也不怕可能，呃，长虱子”。

陆笑着叫道，“可能？应该说肯定。”

从延安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学生的经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年轻的追随者在这方面的要求显得多么严格。她出身于江苏省的一个富有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工厂主。她离开家庭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准备当一位教师。她被派往一个从来没有过学校的乡村去办冬学。在农民的窑洞里过了一夜后就哭着回来了。

“样样都脏，我要长虱子了。他们根本不想要学校。”

她的教员一面安慰她，一面警告她说，“你说来到这里是为‘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现在就不干了，那你就完了。”

“我想帮他们打扫一下，他们也不肯。我一动手老大娘就生气。”

“你有什么资格对老大娘的家说三道四呢？”教员批评说，“你是年纪最小的小辈。你是客人。要象客人那样行事，这样才能赢得主人的尊敬。”

这位姑娘羞愧地回到农民漆黑的窑洞里去了。他们留下了她，但并不热情。她同老祖母和两个龅龅的孩子睡在一个炕上。第二天一早她的头发里就长了虱子。她吃窝窝头——北方农民吃蒸窝窝头——时，竟发现窝窝头里也有一只虱子。由于礼貌，她没有把它扔掉，她的主人都在看着她。她连虱子也一起吃下去了。不然他们会认为她大惊小怪。这种举动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sup>①</sup>——以外是不会有人赞成的。

邈邈的妻子很快就允许她抱小孩了。她给孩子洗了头，清除了虱子。因为头不痒了，孩子显得很舒服，不再焦躁不安了。以后这位大娘就常常要这位城里的姑娘帮她照看孩子。

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她了，但她仍然是年纪最小的小辈。她发现由于卫生条件差，孩子容易得病。陕西的婴儿出生后头几个月里，死亡率达十分之六。母亲们并不重视她的想法，因为她还未结婚。有一天她怀着不使婴儿被随意致死的急迫心情说到家里“自己的孩子”。其实是她姐姐的孩子，她帮助照顾。她哄他们说，她的丈夫在部队里当兵，靠他的收入来养活一个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就比较自然地交流起关于带孩子的经验来了。他们问她，据说延安的那个叫医院的新鲜玩意儿，不用护身符驱鬼就能把大多数婴儿救活，她知道吗？她当然知道。

很快她就教他们识一些简单的中国方块字。她告诉他们一些世界大事。她对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稻谷和轮船的人讲了南方如何种稻以及长江上的轮船的故事。这些好象是神话，但他们爱听。当

---

<sup>①</sup> 圣弗朗西斯（1181—1226），天主教主教，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区的阿西西，出身富有家庭，对穷人抱有强烈的同情，曾长期同穷教徒住在一起。  
——译者注

乡长发现村里的妇女已经接受她为教师，就借了一大间房子交给她使用。她很愿意办好一期冬学来提高声望。男人们也来了，开头是听故事来的，后来就以“识字”为光荣。中国人学习如何读书就叫“识字”。

因此，她获得了成功。到了三月春播时，冬学结束，农民们都向她赠送了礼物。在此之前，她的唯一薪水就是管她吃饭。开头她拒绝收礼，最后她收下了妇女们用碎布缝制的四双布鞋。这些就是她整个冬季所得的工资。除此之外，后来当她到前线当护士时还接到四封信，她对此十分珍视。四个孩子出世了。母亲们非常感谢她向她们灌输的新思想。在生下的那么多孩子中，他们的孩子都能活下来，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必须按农民的标准去赢得尊敬。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来到蒙古沙漠的边缘地带教冬学。他的学生很少，因为住处分散，气候寒冷。一天晚上放学时下雪了。一个男孩家住三英里之外，因为怕狼不敢回家，这位青年教师便送他回家。在返回途中迷了路，并且掉进了一道深沟。因为受了伤，他只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慢慢地走回学校。事迹传开后，他的学生就多起来了。这位年轻人的献身精神和“接受挑战”的能力使固执的农民们相信学习是值得的。

当播种季节来到，冬学结束时，农民们不肯放这位教师走。

他告诉他们，“我必须服从上级的指示。”

“但是你们的上级必须服从人民。人民就是我们！”关于“民主”的宣传，农民们并没有白听。这位年轻人受到了感动，经过安排后留下来开办了一所正规学校，成了一名合格的人民的“领导者”。

同农民相结合并赢得他们的赞许，不仅要求从学校毕业出来的青年学生能做到，而且也是一切未来政治领袖们必须具备的基



本功。毛泽东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做群众的主人，那末，不管你有多大才能，群众也不会需要你。”

作家陈学昭小姐说，“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未同人民有过如此密切的联系，也从未使文化如此深入人民，直至最底层的中国农民之中。”

陈小姐来延安之前在法国呆过九年。她住在文化协会的一个窑洞里，靠近悬崖的顶端，通往那些窑洞的路又陡又滑。她不是共产党员，可是她认为共产党已经给了她发挥作用的机会。多年以前，现在似乎已经隔了一个世纪，她曾经是上海附近一个丝绸商人的女儿。她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参加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的女权运动。当蒋攫取了政权，开始屠杀她的朋友时，她逃亡国外，成为一个幻想破灭的青年女子。她在法国住了九年，在一家中国报馆当记者。一九三五年回国参加抗日。但是，她的所见所闻使她感到震惊。

“就连你说要抗日，蒋的警察也要逮捕你。我原以为一九二七年时的压迫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却更变本加厉了。我的一句话就可能给家庭和朋友带来灾难。在法国经历了一段较自由的生活之后，我对此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前往南昌，后来又到了重庆。但是，直到我来延安之前，到处都没有自由。”

陈小姐接着说，“我认为毛泽东对文学的见解非常正确。过去，我们这些作家模仿中国的古典作品。后来接触西方，又试图仿效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毛号召我们去了解我国人民，到他们中间去，描写他们的生活。我们到农村去有双重好处：我们可以去传授一些关于卫生的知识，进行一般性的启蒙工作。同时我们自己则可以进一步熟悉我国的农村生活。我特别需要去农村，因为我在国外

住了这么多年。我们这些作家多数来自上层，对中国农民都缺乏了解。

她的结论是：“作家比大多数人更需要精神食粮。在这里，作家的生活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我环顾了一下这位体态匀称的年约四十岁的女子所居住的这间浅浅的窑洞。硬梆梆的泥地高低不平，四周用白粉刷过的墙成拱形同天花板相接，有十英尺高。窑洞底部有一张用凳子搭起的木板床，床上铺着一条平整的草垫子，上面放着鼓鼓囊囊的枕头和仔细折叠好的被子。一个没油漆过的小梳妆台上放着一只铁皮面盆。在纸糊的窗子下面有一张写字台，再加两张凳子，这就是窑洞的全部家具。陈小姐把衣服放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书和报纸都堆在窗台上。她从一个筐子里取出木炭，加到靠门的火盆里。

这就是一位成功的作家的家，当然是延安式的。陈指出，这间窑洞是根据“一位作家的需要”来挖的。这里的窗子比农民窑洞的窗子大得多。我向纸窗扫了一眼，发现有几处已经破了，外面零度的冷空气钻了进来。她看到了我注意窗子，便笑着说，“有点风。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喜欢充足的光线和新鲜空气。但这样一来就需要多烧木炭了。农民买不起木炭，只能烧野草，窗户很少，以保持室内温度。我们作家的生活水平还是比他们高一些。”

陈小姐对虱子有她自己的看法。她用肯定的语气对我说，“并不是每一个农民都长虱子。他们并不比你更喜欢虱子。一旦他们能买得起肥皂并有换洗的内衣，就会把虱子清除掉。”由于陈小姐不是搞土改的，而是一位自愿当冬学教师的作家，所以不要求她同雇农、佃农住在一起。她住在中农或更富裕一些农民的家里，她发现这些农民都很好客。她已经掌握了同农民家庭接近的方法。

她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一些鼓舞和少许知识，同时我们也

注意不增加他们的负担。我们自带小米并帮助妇女做饭。我们还帮助妇女做家务：扫地、喂牲口，推磨。所以他们很高兴我们来。”

“但是，我想推磨时用的是驴子。我拍过一张照片，一头蒙上眼睛的驴子，拉着沉重的磨盘，一圈一圈地走着。”

“那是有钱人家，”陈小姐以超出常人的知识笑着说，“大多数人家是农民自己或他的妻子推磨——通常是妻子干。这个工作很辛苦，使人头昏脑涨。”当陈小姐写关于农民家庭的题材时，她会写出如何推磨的体会。

这位精力充沛的作家已经熟知许多省份的乡村生活。她访问过蒋统治下的四川农村。“人们饥饿，衣不蔽体，连种子粮也没有。那儿虱子多得很。”抗战刚结束，她从延安走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回到延安，来回徒步走了一年，目的是沿途收集材料写一本书。她发现这些农民“思想十分活跃，充满生产和学习的热情，同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民完全不同。”

陈小姐已经彻底同中国农村居民相结合。她找到了一种满意的生活。

出身上层阶级而“走向人民一边”的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着各自的特殊问题。每一个人作为个人在旧社会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利害关系，即使他认为已不能忍受压迫。许多人不得不化名出逃，唯恐家庭受累。在山东一所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装备起来的医院里，有一位医生，得知他的父母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因为要“教训人们不要为共产党工作。”

但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断涌来。在抗战时期，他们取道西安。蒋的军队在那里设立了一个集中营用来关押那些企图穿越这条线路的缺乏警惕的民主人士。后来，北平的知识分子装作去西山作夏季旅行，就比较容易地从北平跑到张家口。在上海的人们则过

江去苏北，或搭船去山东的一些港口。这几条线路都很危险，但人们都使用得很多。在内战持续期间，知识分子投奔共产党的热潮越来越高。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间，人民解放军攻占大城市时，许多知识分子留在这些城市或来到这些城市，以便等待新政权的诞生。北平各大学的大部分师生都留下来了。

并不是所有“越过封锁线”而来的都是共产党员。多数人仅仅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感到蒋介石正在把国家出卖给中国的贪官污吏和外国列强；他们已经看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够“完成国民革命”，就能够使中国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就能够使国家繁荣、富强。

我在延安的最后几天里，来了一位知名人士陈瑾昆法官就是这样的人。他并不是一个激进派，而是一位著名的法官。在中国他写的法典比谁都多。他曾经担任过最高法院的法官，又是朝阳大学的法学教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来到北平的时候，拜访过他，征求他“对政府的意见”。这里我可以引用陈五小姐的比较生动而夸张的原话：“我父亲告诉他，那个政府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蒋答应要重新考虑一下。”显然，陈法官是一位要人。

这位法官是在北平召开的一次庆祝蒋允许“四大自由”的群众集会上开始参加革命的。这次大会被蒋手下的专搞秘密活动的暴徒破坏了。陈法官是讲台上的主要发言人，遭到了一块石头的袭击。他捡起了这块石头喊道，“我这个人并不是一块石头就能打倒的。”

如果你在任何人的家里碰到他，你都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表现。他是一个有尊严人，谈话时总是彬彬有礼。他肯定是经过内心的革命才决定同共产党合作的。一九四六年夏，他第一次飞往延安去同毛泽东进行谈话。这件事在军调部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

的风波，因为他是设法乘他们的飞机去的。由于他出身封建地主阶级，他有问题要同毛商量。但是他还是作出了决定。夏季快结束时，他不见了，走的是西山这条路。在人们尚未发觉他离开之前，他的家属也跟着来了。我第一次遇见他们是在张家口。一天早晨六点钟我从睡梦中被吵醒，外面的声音好象在踢足球。后来知道是隔壁邻居陈家在相互问候。他们不敢在一起走，现在所有的人都平安抵达，大家都高兴极了。后来他们乘骡车出发去延安。

陈五小姐为使自己适应“人民”的需要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她是一位来自北平的活跃的少女，一生中从未见过农民。她才十六岁，又瘦又小，面部富有表情，“说得一口银铃般的极好的北平话”。她没有同全家一起走，却留下来访问了山里的华北大学。后来参加了李敦白一组赶路以便追上他们。在山口的顶部，他们来到一个名叫小塔的小村庄。他们停下来休息，请一位乡村妇女烧点开水给他们喝。在这里他们听到的是粗哑而带鼻音的山西土话。

当他们在院子里喝开水时，这位好客的老大娘好奇地看着他们。陈五小姐指着李敦白问道，“你知道他是谁吗？”老大娘回答说，她不知道。

“他是中国人吗？”五小姐还问下去。

“当然是。”

“不，他是一个外国人。”

“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外国人，”老大娘说。

“从他说的话你能听得出来吗？”

“你们说的话都很古怪，”老大娘说，“你说话比他还奇怪”。

五小姐气极了。她声明：“我说的话是真正的国语。”她讲的是最纯正的北京官话！

老大娘笑了，“我从未听到过什么国语，这里的人讲话同你们

不一样。”

五小姐换了一个话题，指着院子里的一堆玉米很有礼貌地问这堆玉米卖了准备买什么。

老大娘回答，“我不知道，我们从来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是自己种自己吃。”

五小姐竭力想证明，他们是他们“一伙中的一个”。她对老大娘说“她的”大学——她在那里仅呆了三天——里的学生如何下乡帮助农民收割。”国民党的学生从来不帮助人民，但是我们解放区的学生不再脱离人民了”，她断然下结论说。她到解放区来已经快一个月了！她最后说，“我们真喜欢干农活”。老大娘看着她，笑了。

那天晚上他们徒步赶路一直走到凌晨三时。五小姐本来可以搭行李车，但农民老大娘的笑刺痛了她。她想表现她是多么坚强，“改造”得多么好，因此一直同男人们一起走。第二天上午，她一步也不能移动了；她的双腿扎上了绑带。

他们在“宾馆”追上了陈法官和家人。这是一所为“人民的客人准备的一种荣誉的“老人休养所”。里面大多数是在国民党时期或以前各种军阀手下长期担任高级职务而现在又已“投奔人民”的人。人民要他们干什么呢？并不是每一个自愿效忠的人都能派用场的。他们中大多数只知道如何管理一种现在已不再需要的政府。当然，他们的名字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所以他们便被请到山里的这个休养所来，这里有从张家口撤退出来的受过法国人训练的厨师，以及精致的蓝色地毯和丝绸被子，吃的比解放区的将军或省长还好。这大概是共产党中国最奢侈的生活了。

当然，陈法官是属于另一类的。如果新社会需要一部能够被最高层通过的法典或宪法，他就能发挥长处。同时他还会演讲，而且也作了演讲。他沿途几乎每天晚上都演讲。年青人走了一天或

者在硬板凳的车子上坐了一天都很累了，可是年长的陈法官总是出来演讲。在村子里，在镇上，在部队营房里，他对所有的人都发表演讲。

他的最拿手的演讲题目是“蒋和美帝国主义在回光返照中”，证明在这个普通人的世纪中，帝国主义行将灭亡。他用夸张的说法谈自己的过去，列举自己得过多少学位，开了多少次庭，写过多少法典，直到决定脱离国民党时又积攒了多少万家产。最后说，“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危机中，即使象我这样有钱的人也不能容忍独断专行、发动内战、出卖国家的蒋介石政权。”

作为一个农村鼓动者，陈法官是有局限性的。他的演讲学识渊博，但不易为老百姓理解，农民听起来很吃力。但人们还是领会了他的精神，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演说完毕，一位农民站起来宣布：“象陈法官这样的人也走到人民一边来，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太太同他一起赶路。她是贵妇人类的人物。她乘的是一辆骡车，有一次她曾被甩出车外，跌倒在路上。我不敢问从纽约来的艾斯特太太，更不敢问陈太太他们是怎样对付虱子的。我毫不怀疑她一定有过。这位法官和他的太太在封建社会的卵翼下已经舒舒服服地生活了六十年，现在站起来自己走路了。

陈的一家是一个大家庭，在延安占据了整整一排窑洞。有时他们到美军大院来看电影，在看好莱坞提供的影片时显得很有尊严。据了解，陈法官有时在起草一些政策声明，我认为我已经觉察出其中表现出来的他的法律方面的风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毛泽东的春节宴会上。他同毛及共产党几位领导人同坐在一个圆桌。

法官说，象他这样继承了保守传统的人竟然来“同共产党携起

手来”该多奇怪！

毛不以为然：“那算不了什么，我小时候还信佛教哩！”

后来法官开始谈到立法问题。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蒋介石和他的总参谋部人员都必须列为战犯。”大家都笑了起来。法官看来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愉快。作为对“共匪”称号的回报，后来共产党向南京提出了“战犯”的强烈指控。我怀疑这一主张就是当时在那里由这位老资格的陈法官首先提出来的。

爱国知识分子同农民紧密结合的结果，就在人民内部产生出一种更为朴实而稳健的领导人员：农村里的“劳动英雄”、部队里有纪律的雇农和农民等。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另一种领导人员也在成长，那就是在蒋的大城市里建立地下组织的产业工人阶级。新的农村领导层从出世起就决心同他们相结合。

但是，在结合的时机成熟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

## 碗中豆

延安县里不识字的劳动英雄杨步浩，同我谈到他称之为“新社会”带来的变化时说，“最大的变化是旧社会没有选举，现在每一个人都有选举权。”

我问，“你怎么投票？”因为我知道杨不大识字，不会在选票上作记号。

“我把豆放在碗里，他们在窑洞外面把豆子给我，于是我走进窑洞，碗就放在那里，一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选完后我们都看着他们数豆子。

“是秘密投票，还是人家能看得见你投谁的票？”

起初杨坚持说“投票是秘密的，因为委员会和其他选民都在外



面，我独自一人进入窑洞。”我再问他怎样区别那些不同的碗，他回答说那些碗都写有候选人的姓名，窑洞里有一人告诉他哪个碗是哪个人。我指出这个人破坏了投票的秘密。杨激动地坚持认为这个人不过是为了选民的方便，是必要的。“我们选他干这件事是因为他又识字又公正。他告诉我们哪个是王的碗，哪个是贾的碗，但并没有叫我们选谁。我选王是因为他精力充沛，而且人也很老实。”

“这样说来，有两个候选人了。”我评论说。

“这次是两个。去年有四个。两年以前有八九个。”

“那么，你已经投过三次票了？”

“我已经用豆子三次投票选举过村长。我还投票选举过县人民代表和边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此之前，我还在一次会议上用举手的方式进行过选举。把豆子放在碗里的办法比较好。”

显然，劳动英雄杨是一位投票专家。碗中豆从技术上看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对杨来说，已经够好了。他的态度使人毫不怀疑，象我这种从外面来的人，是不可能告诉他怎样去进行投票的。

碗中豆的投票方法从延安传遍各地，为那些不识字的人所采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当然知道还有更为先进的方法。在延安、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多数城市用的都是印制好的选票。教育运动要求选民至少要认识候选人的名字。与此同时，投票的方法则根据选民的具体情况而定。上千万的中国人已通过碗中豆的方法表达了他们政治上的选择。按照美国或欧洲的制度，这些人是根本不可能去投票的。为选举而进行的识字测验，在西方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亚洲这样做就将有五分之四的人被剥夺了选举权。更糟的是，这种办法将使选举局限在上层。所以，西方的办法在中国农民看来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在中国，最早尝试采用成年人每人一票的普选办法的是共产党。二十年来，他们在自己的地区内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实践。他们认为第一步并不是选举，而是唤起人民对选举的兴趣。只有当人民意识到自己有权，而且通过投票能有所得的时候，才会有大批的人出来投票。

共产党每到一个新区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用鼓动的口号唤起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口号是：“打倒日本和汉奸卖国贼”和“减租”。以后他们就集中宣传“耕者有其田”。他们发展了这样的观点：“人民”有权撤换贪官污吏、实行减租、惩办战犯，甚至可以没收土地。他们早在成立政府之前就组织了农会、妇女会、工会以及商会。在所有组织中，他们要求做到使过去一直没有发言权的比较贫穷的人能占明显的优势。如果以前的地方政府还存在并表示愿意合作，共产党将通过这些“群众组织”施加压力，使之“民主化”。如果前政府逃掉，他们就先从群众组织中产生代表成立临时政府，然后就准备进行选举。在这样的选举中，新组织内的活跃分子自然会得票。

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战略是根据对农村地区的各种成份从政治上的忠诚程度及其经济地位来进行分析的。毛说，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到，自然是敌对分子。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不应采取敌视他们的政策。他们的态度“将决定革命能否成功”。但是，真正依靠的积极力量则是贫雇农。据毛分析，这些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首先组织贫农会，并由他们来帮助制订政策组织更为广泛的农会。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政府，自然是非常忠于共产党的。这是一种聪明的战术，但也可以说它在实质上是民主的。使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改善生活，然后再以这一多数为基础成立政府，这在任何地方都是

一种健全的政治。

采用这种方法首先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具有一些领导经验的“负责人员”恰恰是脱离群众的。我常常听到北平的美国传教士们攻击那些“共产党扶上台的不负责任的人。”这些批评有些是由于偏见，有些则是有根据的。在任何地区有能力的村长或县长都不多。但是一旦共产党取得多数，他们就会劝说更多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参加进来。即使是地主或以前做过地主的，只要有对国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表现就可以参加政府。因此，行善的老地主安文钦，虽然过去领导过反共运动，后来却成为延安边区政府的副主席。<sup>①</sup>他支持分了他家土地的土改。他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长此以往，中国不可能繁荣富强。”各国都有这样的爱国者。

新中国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有关选举组织得不好和政府腐化的批评，说这种政府“人民并没有充分参加”。一本名叫《小二黑结婚》的读来使人感到愉快的小说用深刻的文学，描写了村里的两名土匪在新政权下依然在台上。金旺和兴旺是两兄弟，由于过去同土匪搞在一起，阔了起来。他们引路绑票，讲价赎人。他们在“解放”之后仍然掌握村政权。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里都成立了村公所、各界救国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刘家峻却除了县里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sup>②</sup>

因此在选举以后金旺被选为村长，兴旺成为武委会主任。“由

---

① 原文有误，安文钦当时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译者注

②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引自《文选和写作》第七册第18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译者注

于村民不想阻止愿意参与政治的人”，从此这两名土匪“更加胡作非为”了。他们把民兵当作自己的私人奴仆，随意抢劫粮食、钱财和妇女。最后，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个年轻的劳动英雄，一男一女关进了牢房。结果是在一次斗争会上，“人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们被撤职了。

这样，新中国充分地也是带有讽刺意味地认识到：通向好的政府的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而“永远保持警惕才是自由的代价”。

为了反映“人民的意志”，已经试验过许多不同的方法。

在延安举行的第一次选举采用的是在公开会议上举手的方法。十八岁以上的所有男子和妇女都有选举权。这类会议通常男子有三分之二参加，而妇女占的比例很小。相互竞争的候选人很多，并经过认真的讨论。这类会议选举村长，其他的类似会议则选举县和边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当时解放区的范围已经从延安扩大到海边，碗中豆的方法得到提倡。我收集了各地的许多不同作法。

在靠近哈尔滨的左木村，被提名为村长的十名候选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各人的帽子放在身后，选举人排成一行走到候选人的背后往帽子里丢豆子。然后，被选出的村长同邻近十一个村的村长组成一个较大的单位，即区委员会。区委员会主席王森是一个充满活力，深孚众望的人。当我问他以前是否参加过政府时，他笑了。

“我过去是一个雇农。土改前，连饭都吃不上，怎么可能参加政府呢？”

李敦白同我讲了湖北省北部一个村子里第一次进行选举的有趣故事。他目睹了从提名到选举的全过程。先是召开大会提名。

有四百人参加，当场举出四名候选人。接下来花了一个星期进行广泛讨论，然后召开最后一次会进行选举。四个候选人坐在主席台上，每人面前放一个深口碗。他们发表最后演说。村里人从来没有听过竞选演说，他们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大多数候选人是这样说的：“我不懂为什么要选我，我叫老王，又傻又笨。这一点你们都知道，但如果你们选我，我就努力搞好灌溉，使每一个人的用水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我还要为实行民主税制而斗争。”（指对庄稼收入较高的人征收累进税，然后村委员会在本村范围内分配税款。）

候选人中有一名小学教师。他演说时好象感到了历史的挑战，“这是两千年来本村居民第一次有机会说出他们对政府的要求！”

然后选民们排成单行走出大厅，经过一张桌子时，选举委员会发给每人一粒白色小石子、三粒黑色小石子，因为这个地区不产豆子。他们再由另一个门走回来。有人通知他们，为了保守投票的秘密，他们应该紧握拳头。依次伸进每一个碗里，把白石子投入他想选举的候选人的碗里。每一个人都按正确的作法做了。他们去投黑子时显得十分秘密。但在投白石子时多数人却高高举起，环顾四周，然后才炫耀地投在碗里。投反对票要保密，这是策略，但投赞成票为什么要隐瞒呢？

李敦白说，“最后的时刻强烈地吸引了每一个人。在提名候选人和一个星期讨论期间，人们对选举是有怀疑的。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真正进行选择时，就变得十分激动了。”

小学教师当选了。他立即召集了会议，对人们在选举中的表现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的人民过去从来没有投过票，所以我们禁不住要炫耀一下。下一次我们必须加以克服，要做到真正

的秘密投票。”大家都表示同意。

关于灌溉用水的争议是本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过去，富有的地主在这个问题上对小农进行了勒索。那些不服的人便告到县长那里，而县长总是袒护最有势力的人。通过新的民主选举，控制水的新方法出现了。由村长（如果争议地区大于一个村则由县长）召集所有因供水成问题而受到影响的人开会，制订了一个不使任何人受到损失的方案，最后经大家投票通过。

在南田村会议上一个农民夸口说，“民主政府就是这样。”

在新中国我每到一处都发现人民为他们的选举而感到自豪。我特别回忆起离延安不远处一座小山上由一些窑洞组成的碎崖村。当我们来到山谷时，村民们从不同高度的地窑洞里走出来，从上面向下看着我们。背景是蓝天，把他们的轮廓异常清楚地衬托了出来，在一块平地上，蒙上眼睛的驴子在碾谷子，它拉着沉重的石滚，一圈一圈地走着。这似乎是一个距离现在极其遥远的人类还处于穴居时代的史前村落。

我就近问人，村长在哪里。他们指给我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有一张精明而和善的脸，正坐在土墩上，在阳光下纺毛线。

我问道，“他是怎样当选为村长的？”

有好几个人告诉我：“我们是去年选他的。”接着有一个人带着挑战的眼光，自告奋勇地说，“我们可以随时罢免他。现在我们有了民主的政府。”

这些人在经济上几乎是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用自己种的黄麻纺成线纳鞋底。因为买不起煤油或蜡烛而用黄麻油点灯。他们夸耀自己有权罢免他们的村长，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就象我们当年在西雅图炫耀最富有活力的民主生活一样。

村、县，以至省政府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投票成立的。在中国，县始终是政府的基层组织。延安县政府就是一个典型。

曹县长是县里的最高官员，他身穿一套普通的蓝布制服，在县政府一间四周是白墙的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县政府设在城外七英里。他出身于一个当地的中农家庭，中学毕业，已任职三年，曾两次当选。他领导着当地政府的财政、法院、教育、警察、地方民兵等各项事务。

他说，“我的主要工作是增加农业生产。光荣首先属于我们的劳动英雄。”他向姓杨的劳动英雄点头致敬。杨过去是雇农，现在正积极耕种他自己的土地。他还是“生产运动”中曹的第一个生产队长，这次生产运动使这个县在三年内增加了一万七千英亩耕地。杨咧开嘴笑了。

当介绍到县政府委员会的另两名成员时，这两人都比较正式地鞠了躬。一位头戴黑色便帽，面带笑容上了年纪的姓张，过去是地主。另一位四十开外，身材矮小结实的姓宋。在旧社会宋曾任县警察局长，现在成了村里剧团的组织者。这两人在共产党来时都曾逃亡在外，但后来又回来握手言和了。就象我问杨一样，我问了他们每一个人，新社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曹说，“最大的变化是，过去当官的是自上而下指定的，现在却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过去是中央政府任命各省省长，省长任命县长，县长再挑选下级官员。如今则是由选民直接选出由四十九人组成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县人代会再选出县长和由十三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

前警察局长宋笑着说，“过去人们买官做，可以从中渔利。我的警察局长职务就是买来的，如同我父亲和祖父一样。我通过向人民收税来赚钱，我还有权给赌场发执照并留下部分费用。现在就

没有人能够靠做官发财了。”

前地主说，“主要的区别是现在有序了。我原是地主，拥有八个村庄的全部三千英亩土地，其中用来耕种的只有八百英亩。人们不能指望好的谷地，因为有盗匪；也不想耕种山地，因为连税也缴不起。我曾两次被绑票，向我索要赎金。生命一直得不到保障。人生在世无非是图个吃穿，图个朋友。”他讲完后很有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

我对那个前地主抱有怀疑，他多么圆滑。他走出大门后，曹县长说，“张很有钱。他把大量银锭投资创办了本地的造纸厂。这是一个很赚钱的工厂，因为共产党要印很多报纸和书籍。只要他做些有益的事，就让他赚钱吧！”

张和宋都想使我相信他们是忠于新社会的，至少他们已经设法适应新社会。人们的猜测是多么真诚。几个月以后在中国农历新年时，我在清凉山碰到了张，他带了很名贵的陈酒作为礼物爬上山来送给廖编辑。延安的《解放日报》是他的最大主顾！

在边区人民代表大会总部的一次鸡粥美餐的餐桌上，林祖涵<sup>①</sup>说，“在过去十二年中，我们的两个最大的成就就是成立民主政府和发展生产。”这些话口气是不小的，但是林祖涵是了解情况的。

白发苍苍的林祖涵是中国争取民主的老战士。他同孙中山有私交，在广州早期国共联合的“国民政府”担任过财政部长。大分裂时，他站到共产党一边。他的尊严、智慧和极好的人品使他成为一个干练的行政长官。当时他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这一职位相当于省长。

---

<sup>①</sup> 即林伯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译者注。



他告诉我，“我们有过三次从基层到边区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便实行‘三三制’。现在在所有的新区都已实行。”

“三三制”是共产党做出的一种保证。即共产党在政府中的职位将限于三分之一。即使在那些他们可以获得全部职位的地区也不例外。林主席解释说，其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在其他地区保持的那种一党专政的状态，同时也为了防止当地过分热心的共产党人，不恰当地对政治上觉悟不高的人起支配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议，这些人可能不敢同共产党竞选。这个制度是以毛泽东对中国现阶段情况的分析为基础的。当前中国需要的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代言人。但是他们认为应该让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甚至那些“开明地主”进入政府。

林主席说，“最好的主张是由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通过讨论提出的。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单独提出全部的好主意。”

因此，新中国建立的各级政府都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和各种宗教人士。哈尔滨市的第一届委员会既包括工人农民，也包括穆斯林和蒙古族以及上层人士。晋西北一九四六年选出的县委员会包括了国共两党成员，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以及信奉孔子的人。

共产党在这一方面的政策是已经确定了的，在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政府时也将继续实行。许多较小的政党将参加政府。代表自由职业者和商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现在已改组成为政党。领导权在共产党，但他们联合的纲领仍然是孙中山的过去的纲领。共产党准备更前进一步，但没有人能预料他们前进的步伐有多快。

这不仅取决于共产党也取决于地球上历史最悠久最精明者之

一的中国人民。他们已经从共产党那里学到了东西，并通过碗中豆懂得了如何发表意见。但是是否能全部说出他们的意见，什么时候说出来，即使最聪明的共产党人也是不知道的。

## 赋税——“人民的负担”

“你们为什么不在延河上架桥？为什么拼命减税？在美国，我们就会将税率保持在百分之十二点三，并利用这些税收来修路造桥。”我有点粗鲁地向范子文<sup>①</sup>提出质问。这位修饰整洁、个头矮小的财政部长来到我在延安住的窑洞是为了向我介绍有关预算的情况的。

范先生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说，“修路造桥都很好，但人民首先要吃饭啊！”

这句话使我震动，想起了亚洲的严酷的经济情况。我一直是按西方的方式思考问题的。对象我这样一个美国人来说，好的道路和桥梁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是进步政府的象征。这次我同范先生的会晤就因延河陡涨而推迟了一天。延河就在共产党的首府，竟没有桥！

范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低税来。他说在军阀统治下的旧政权，赋税曾高达收成的百分之四十五，但新政权却把税率不断降低，先是减到百分之十四点七，后来又减到百分之十二点三，今年收的税只占农民收入的百分之八点三。他对减税的热情使我感到不耐烦了。这种节约将使这一地区长期落后。多么吝啬的农民意识！

---

<sup>①</sup> 原文有误，范当时是延安贸易公司经理。——译者注

我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我问道，“你们有多少粮食？”

范先生从他的统计材料里找出数字，告诉我边区的耕地在一九三六年时只有一百四十万英亩，到一九四六年已经增长了一倍，但最后的数字还没有出来。他还说明，粮食产量总共为一千一百二十万蒲式耳。人口将近一百六十万，每年还要增加大约六万名难民。

只要略为计算一下，马上就可以搞清楚三件事：第一，粮食产量低。每英亩不超过五个蒲式耳。如果可能，首先需要的就是在这些贫瘠土地上增加产量，不然只能节约！

其次，每人每天平均的口粮只有一磅。如果用粮食喂鸡、养牛或把粮食出售买棉花，口粮的配给还得减少。因此牲口必须吃青草、鸡得吃残羹剩饭，衣服则须补了又补。政府的任何一项铺张浪费，诸如抽调农村劳动力去修路，都可能使人民挨饿。这使我想起了共产党到来之前，这一地区的那场惊人的饥荒。

第三，延安边区尽管缺吃少穿，却仍然吸引着邻近一些比它更差地区的难民。这些人穿过蒋军封锁线来到这里是不容易的。他们除了身上穿的破衣烂衫以外必须丢掉一切跑着过来。但人们总是源源不断地来，因为这里有饭吃。延安的医生说，这里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比肥沃的南方地区还要好一些，因为那些地方管理不善，税也太重。人们在延安能够活下来是因为他们能按时吃到饭。

任何一个想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把开支削减到最低限度。在亚洲，对任何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来说，其首要任务不在道路桥梁，而是提高粮食生产，同时使人民有衣穿，有书读，并不要求为此向政府缴多少粮食。范先生为减少赋税而感到自豪。他并非盲目崇拜节约，而是要人民有饭吃！

将要饿死的农民并不太羡慕平整的道路。在中国他们往往痛

恨修建新路，这是有道理的。为了修路，他们的土地被无偿夺走，他们的劳力被无偿征用。而路修好后却不让普通农民使用，因为他们老式的车子上锋利的铁轮会损坏路面。在每一座桥梁的和每一条优质的公路的入口处都挖有很深的沟，这种沟汽车可以通过，而马车就会陷进去。这些好的道路是为当官的下乡收租修的；是为统治阶级而不是为被统治阶级修的。这些事实使我克制了自己这种美国人喜爱公路的感情。我承认：吃饭应当放在第一位。

中国人为赋税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称之为“人民的负担”。他们不胡扯什么为公共福利筹集公共基金。这不过是把额外负担加在已经压弯了腰的人民的背上，用以供养政府官员。四千年来亚洲人民就是这样来看待赋税的。

延安县的前警察局长宋为我列举了过去的几种捐税：军队税、军服税和军队出征税。拥有一头牲口就要交税，赶着牲口穿过县城又要付另外一种税。总共有三、四十种税。鸦片种植税是一个奇特的例子。种鸦片是禁止的，但是当官的需要来自鸦片的税金和罚款，因此不管种不种鸦片农民都得交税。这样人们就非种不可，因为别的作物收入付不起鸦片税。

宋说，“捐税可能超过一个人的全部所得。”他举了一些人变卖一切财产交税的例子。

在蒋的中国，经常发生农民因付不起税而自杀的事。偶尔也有一些有良心的官员自杀。一九四六年夏在上海有人谈论江西的一个姓陈的收粮人自杀了。他接到命令要他在一个月之内收齐一定数量的大米交付蒋军，因为军队需要粮食。农民没有米，就卖掉牛和地以黑市价格买进米来交税。许多农民自杀了。一位老年妇女在家里上吊死了，因为交税她今后不再有家了，这位老实的陈不能忍受这种强迫收税的方法，就跳了洞庭湖。留下遗言是，他做不到

既忠于政府又忠于人民，唯一的道路就是去死。

即使按中国吃粮的低标准计算，共产党也严肃地面临着一个维持一个政府需要多大代价的问题，而且从不否认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早在来延安之前，他们就取消了官员们的高薪，对军队及干部只配给食物和衣服。后来发生了一次危机，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粮食少极了，如果给政府和部队吃，老百姓就要挨饿。

这次危机是一九三九年胡宗南将军的封锁造成的。

延安地区不可能供养许多士兵。军队离开这一地区被派往抗日前线了。一九三九年，日本从北面攻打延安，胡宗南抓住这一机会从南面进攻延安并吞并了五个县。共产党不得不抽回部队保卫延安边区，而且要养活他们。由于丢失了一些土地，养这些军队比以前更困难了。

在这种急需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首创了一种半自给的政府和军队。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一篇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sup>①</sup>的杰出报告中对它的做法进行了阐述。这篇报告现在已经是经典著作了，因为“自给政府”的方法已在解放区推广，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

毛在报告中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sup>②</sup>

有些共产党员提议进一步紧缩部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毛批

---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6页。——译者注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页，850页——译者注

驳说，“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会落后，直到最后我们完全不能生存。”有些人不顾战争的需要，强调政府对人民应施“仁政”，毛批评说，“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另一些人主张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毛说，“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

接着毛分析了战争时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都应该很好地加以考虑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sup>①</sup>

毛建议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开展两种生产运动，“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通过调整赋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提倡组织变工队，其作法后面还要进一步阐述。要求军队和工作人员尽量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这就叫做“自给”运动。本来就生产口粮的人要继续帮助生产口粮。

毛在报告中说，“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sup>②</sup>

这种作法对个人又如何实行呢？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朋友范

---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8—849页。——译者注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9页。——译者注

先生那里来吧。他坐在我的窑洞里谈税收时穿的是一套蓝布服装，看起来比大多数人要新一些，衣袋里插着一支自来水笔，脚上穿的是灰色袜子和一双绒布鞋，这一切使他几乎变成了一个城里人。他是怎样生活的呢？他又从哪儿弄来这些讲究的衣服呢？

我问：“你作为财政部长拿多少工资？”

范先生回答说，他“从人民的负担”即税收里每天可得到十七盎司<sup>①</sup>粮食，每月配给四点二五磅肉，一磅盐，一磅食用油。每年夏天发一套布制服装和内衣内裤，每两年发一套棉衣。这就是他所得的全部！因此，范先生作为一个大的边区的财政部长每月取之于人民的还不到五美元。这点工资对于受过中等教育并从事高级脑力劳动的他来说，真是太少了。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范先生是怎样生活的呢？答案是他属于一个由财政部全体工作人员组成的生产合作社，每一个成员都要出一些劳动力，合作社还有几个专职人员以保持企业的连续性。他们在一块谷地开荒种菜，在另一块谷地养猪。他们开办了一个面粉厂和三家商店。这些厂店为合作社社员服务并有盈利。由于有了这些企业，范先生每月还可多得二磅肉；每天可得一磅蔬菜和一磅煤炭；还可得一些本地产的烟叶供抽烟用。还有诸如肥皂、鞋子、袜子、牙刷等，额外的东西。那些漂亮的绒布鞋，就是在完成财政部长的本职工作之外靠额外劳动得来的。

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同样在公余时间生产粮食和布匹。如果你要拜访一位政府领导人或大学教授，你会发现他要是不在种番茄，就是在纺线。在通往朱德和毛泽东的窑洞的山路两旁堆满了玉米秆和番茄藤。美军大院里的翻译们公余时间在一英里之外的

---

<sup>①</sup> 重量单位，一盎司等于十六分之一磅。——译者注

山上的一块田里劳动。文化协会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农场，有少数人终年在那里生活，但一些著名的作家、雕塑家、音乐家在收获季节也去帮助收割。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样干的。在张家口，我遇到了一位情绪不高的青年，他对延安深感失望。他去那里是为了学习，但感到“除种土豆之外，什么都干过了。”是的，那的确是一种艰苦的生活！但人民为维持一个政府所付的代价的确比较小。前警察局长宋说，“在旧社会，我在这个县手下有一百五十名警察，全部要由人民出钱负担。现在县里只有四十名警察，而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却大部分是自己种的！”

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南泥湾开荒种地、自给自足的军队。当封锁造成危机时，需要一支军队来保卫延安边区，在王震的带领下，有一万名军队开进了南泥湾。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家乡。那里没有房子，没有窑洞，没有粮食，没有农具，没有农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荒地。他们带来少量的粮食，只能充作救灾的口粮。他们挖了一些窑洞，先种菜，很快有了吃的，然后砍倒树木，卖给附近的居民换粮食。在一所破庙里发现一口铁钟，军队里的铁匠就把它做成农具。这些细节说明，由于过去的旱灾和腐败政府，这一地区已倒退到洪荒时代。

几年之内，这支军队在南泥湾开出了三万五千英亩耕地。在部队训练时期以及除战斗打响以外的全部时期，延安边区的军队都能自给。此外，南泥湾还能生产出剩余粮食来养活伤残士兵。

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学校、医院和道路建设等方面的活动不断增加。政府的负担实际上也日益减轻。范先生的税收单上的数字正在逐步下降。税收还进一步采取逐级降低的办法以减轻最穷的人的负担。在旧社会，地主享有免税，但现在却是最穷的农民才



能免税。那些比最穷的稍好一些的人交收成的百分之二，中农平均交百分之八点一，富农交百分之十三点六，少数留下来的地主则交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这样做对个别农民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家庭的情况吧。

我在山谷之上几英里处，访问了一个有两间窑洞的姓王的农民家庭。那时正是秋收季节。屋里堆满了粮食，我不知道他一家人往哪儿住。他告诉我，他们住在他的“另外的家”里。那是远在山里的五间窑洞。过去他们只住在山里，因为那时土匪多，在山谷地带过夜不安全。两年之前，他才买下这两间窑洞安家。因为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耕种谷地。他的妻子和小儿子同他一起住在这里。他的父母和姐姐留在山上的家里放养牲畜。他们有两头牛，一只驴子和一百只羊。

王把生活的改善归功于新社会。“过去我庄稼收上来还不够缴税。在旧社会的最后几年，我应缴的税额达一百银元，为了凑足这个数，我必须卖掉二百五十蒲式耳的粮食，而我的全部收成才一百六十五蒲式耳。我必须借钱来缴税，并每月卖掉几只羊来付利息。我的羊差不多都卖完了，但直到共产党到来之前我还欠一年的税款。现在共产党把欠税一笔勾销，新的税是交粮食，而且税额不高。我不但不需要卖羊，而且每年都可以多养一些羊。今年我必须卖一些羊了，因为现在羊太多了，草却嫌不足。村里正在分草地，各家各户都应该卖掉一些羊。”

王高兴地把自己的收入详细地讲给我听。这一年他打了一百六十五蒲式耳粮食，交税十六点五蒲式耳，全家吃、穿需要五十五个蒲式耳，还贷出了十八个蒲式耳粮食给难民。“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援助难民，这样他们就能很快进行生产，我们边区也会更加强大

起来。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之内打三年的粮食，我完成得比这个还要好，我在一年之内打了两年的粮食！”

“你对收成和税款说得很坦率，”我评论道，“在国民党统治下你能这样说吗？”

王笑着说，“当然不能，我害怕，不敢谈。”

“为什么现在不怕了呢？”

“现在的新风气已有十二年了，人们已经不怕说错话了。”

当“自给”制度扩大到其他解放区时，起初他们的困难比延安大。因为开始时抗日根据地较小，而且差不多每天打仗，但等到敌人被赶走，解放区扩大之后，他们的进度却比延安快，因为土地比较肥沃。

刘少奇对我说，“只有实行自给制度，我们的解放区才有可能保持一支总数达二三百万人的军队和干部，而不致给人民带来过多的负担。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无限期地进行保卫战而无负债，直到取得胜利。”

这种制度的实行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而异。一九四六年在山东，由于该地重大战役较多，干部自给率占百分之四十，军队占百分之三十。为做到这一点，军政人员开办了许多小的合作工厂，提供必需的消费品，例如：油坊、制皂厂、香烟厂、纺织厂、铁厂、印刷厂等。

在满洲，不但不缺少粮食，而且有很多剩余，我看不到政府官员自筹粮食的证据。他们的货币工资仍然极低：哈尔滨市长每月工资只相当于十美元；铁路工人则拿五美元。市长和铁路工人还另发粮食，每月一百磅，足够养家。

随着解放区的日益繁荣，自给的必要性逐步消失，但政府实行

节约的教训仍保留下来。财政部南部长<sup>①</sup>在张家口告诉我，由他掌管财政的这个地区，在抗战期间，从一个山区的小块根据地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和丰富资源的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政府的预算始终是平衡的”。我赞扬这是一个奇迹，他笑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

他承认，“今年将出现赤字，因为去年秋季征税的范围只有一千八百万人口，而现在政府管辖的人口却有三千万。这是解放区突然扩大造成的后果。即使这样，如果没有不断的内战，我们本来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国民党军队蚕食我们解放区，这样军费开支就增大了。”南先生一心寻求平衡，却受到了战争的困扰。

我问：“你们如何弥补赤字呢？靠印发钞票吗？”

他说，“哦，不，我们不认为印钞票是一种办法。等今年最后一二个月税收用完时，我们就从国家银行的结余中借款，这些结余是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利润。等新的税收进行时即偿还借款。这种作法的唯一缺点是有几个月银行将没有资金借给私营企业。但是问题并不严重，因为要等到春季才需要大笔农业贷款。”

我凝视着这位沉着的财政专家，他讲得多么有道理。这使我想起了蒋在南京印发的数以万亿计的钞票，以及他从美国借来的几十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钱用来资助这样一个政权，其资源是南先生管辖地区资源的二十倍。

在陇海铁路以北，地跨四省的解放区内，政府已经转移到山里去了。戎主席<sup>②</sup>告诉我，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即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期间，这个地区也能保持预算平衡，税率只有农民收成

---

① 即南汉宸。——译者注

② 指戎子和同志，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副主席。——译者注

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三。

“今年我们将有赤字，因为我们在一月份编制预算时没有估计到内战。同时，我们现在管辖的地区比我们过去收税的地区要大得多。但是，这不过是暂时的困难。”

当我同这个解放区的政府领导人在一起吃饭时，我问他们拿多少薪水。他们都笑了，回答说直到不久前，他们除各项供给外每月还拿三十元“冀钞”（当地货币名）作为以现金支付的薪水，但“为了在自卫战争的新的紧急情况下，拯救预算”，最近他们决定放弃了这一待遇。

一位领导人笑着说，“也为了节省领钱的时间，因为三十元‘冀钞’现在只够买一盒火柴。”

口粮才是真正的薪水，包括每天两餐米饭或馒头，加两菜一汤。他们每年还可领两套夏季服装——此处较暖——和“每年三分之一套冬装”。

“你想知道三分之一套衣服是什么意思吗？”最高法院的审判员笑着脱下他的棉袄指给我看：“看到里面的那些补丁了吗？这些都是今年发的。但有三分之一的棉花是新的。”他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他们建议让我看一看他们的金库。我们穿过一个有一位农村妇女在烧饭的小院子，来到一个无人看守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只木柜，只有皮箱那么大。“这就是金库。”

我问：“你们的黄金储备呢？”

“哦，不！作为人民币基础的金、银及其他贵重物品，那可重要得多。那些东西由向农民发放贷款的国家银行保存。这里只保存维持本地区政府运行的现金，而这个解放区已有三千万人口了！”

他们笑了，我也笑了。接着我对他们讲，有一位美国朋友争辩

说,人们不能指责国民党贪污。他说,“他们不得不贪污,因为他们的薪水太少了。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我得到的是一个同我预想完全不一样的答案,戎主席说,“这不是他们贪污的原因。国民党官员必须贪污,因为如果他们中有人努力工作,不肯去盗窃人民的钱财,蒋介石就会把他作为共产党抓起来!”戎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说完后笑得更欢了。

## 四、经济政策

### “耕者有其田”

中国共产党把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纲领看作是实现其他所有目标的经济基础。这些目标是：政治民主，自由企业和军事实力。有一次我问毛泽东，他对取得最后胜利是否还有任何怀疑，他甚至没有提到军队，而是回答说：“这得取决于土改进行得如何。蒋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违背了农民的需要。如果我们能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将获胜。”

这番话是当蒋的部队迫近延安时说的。在军事上获得全胜之后，土地依然是个根本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的一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被不时地宣扬了两千年。大约与耶稣基督同时，一位名叫王莽的皇帝，企图通过改善农民的生活来稳定他的皇权统治。他颁布法令，宣布所有土地为国家的财产，并在国家的保护下把土地分给耕田者。在公元二十三年间，有钱有势的人暗杀了他。六百多年以后大唐皇朝李世民把土地“永久性”地给了耕田者，这样就为中国的黄金时代奠

定了基础。尔后宋朝王安石实行“青苗法”以青苗为担保，由国家向农民贷款。但地主用逃避、腐化或武力等手段仍生存下来或卷土重来了。

几个世纪以来，要求得到土地的农民革命连绵不断。

毛泽东列举出其中的十五次<sup>①</sup>革命，从公元前二百年汉朝的伟大革命开始，直至上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为止。毛说这些革命的规模是“世界上空前的”。它们改朝换代，但却没有改变农民的命运。农民革命“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封建制度保存了三千年，基本未变。

在近代，孙中山把“耕者有其田”写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第一个政纲，从而得到农民的拥护，使联合的革命军能够来到长江以北。蒋介石尽管镇压农会并暗杀他们的领袖，却从来不敢正式抛弃这个纲领，只是不执行而已。

几千年来，皇帝和农民革命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又如何能期望取得成功呢？

他们期待成功。第一，因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封建主义已经过时了。机器生产摧毁了它。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已取代了它，而在苏联则已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即使在中国，由于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主义在大城市的存在，现在也只是个半封建的国家了。

第二，共产党人不像皇帝那样只限于颁布法令和恩赐。他们发动农民起来去取得土地并进而夺取政权。他们告诉土改的组织者：“不要犯向农民发放土地的错误。我们共产党是少数，我们没有权力发放土地。只有在所有农民都行动起来的时候，才能成

<sup>①</sup> 一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版。——作者注

功。”

第三，他们对农民革命实行了有纪律的领导，这种领导在过去是没有的。农民是分散的，他们过去的革命是由个别领袖领导的，这些领袖靠农民爬上去，进而取得了个人权力。目前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必须是由农民中的有组织的、最中坚的分子所构成的一个持续不断的阶级，也就是在新型军队受过纪律教育的贫雇农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阶级。

第四，共产党人对农民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农民并不属于一个阶级。他们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各自的利益也不一样。富农是那些可以雇工、有相当数量可供出售的剩余商品，并能出租土地或放债的人。除了参加农田劳动外，他们很象地主。中农是那些靠种田养活自己的人，或许他们有点小小的剩余。贫农没有土地，或土地太少无法依此谋生，因而不得不以部分或全部时间为别人干活，或成为佃农。毛泽东估计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中农约占百分之二十，贫雇农约占百分之八十。

因此，土地革命的方法是：“自下而上的组织起来”，组织贫农协会来满足“农民中大多数人”的要求。然后吸收中农参加。毛说：“必须争取他们……必须对他们让步”。对他们中的“积极分子”要分配政府工作，因为他们比那些更穷苦的人受的教育多些。对本人从事耕作的富农，不应“过早地采取敌对”的态度，以免造成对生产的损害，然而他们是天然的敌人。地主是不从事生产的，一旦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即可剥夺其财产。

最后，共产党人希望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政策”是：（1）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2）没收垄断资本（尤其是四大家族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3）



保护民族工商业，即普通的自由企业。在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为第一条，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只有当他们成为能够购买商品的自由经营的农民时，工业才能得到发展。

这种理论是否合适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中国地主所有制的含义。

关于地主所有制的范围有多大，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在土地改革中，从各个乡村收集了许多数字，但还没有全国的汇总情况。毛泽东估计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为地主和富农所占有。在我访问过的华北农村，地主（不算富农）占一半至四分之三的土地。一九二七年一位德国传教士告诉我说，在华南的一个乡（湖南省永丰），“周围的所有土地由二十户人家占有，他们让佃农耕种这些土地，拿走他们收成的一半，同时把米囤积起来直到那些生产粮食的农民由于饥饿而起来在谷仓门外暴动为止。”

对成千上万的耕田者来说，这可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干革命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能活下去。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年间在陕北和甘肃的饥荒<sup>①</sup>中就有三百万至六百万人死亡。在一个县里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死亡；另一个县死了百分之七十五。如果农民有自己的收成，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在抗日战争中河南的饥荒也造成了类似的损失。

当家里的人一个个地死去，女孩子们被出卖为奴隶的时候，财产权在人民的心目中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于是地主就雇佣武装的走卒来保卫他们的权力。

一九二七年一位教会学校的姑娘告诉我，有关她河南家乡的

---

<sup>①</sup> 见斯坦帕尔博士：“关于西北地区的报道”，一九三五年写于南京。  
——作者注

县里一个地主的情况，这个地主有七十个“武装匪徒”；他们破坏了农民企图要建立农会的计划，杀了三十人。蒋介石建立秩序的办法是让地主来控制县的警察局。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暴力，地主所有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有些地主逼死自己的乡亲，占有他们的土地。在湖南靠近洞庭湖的一个地痞流氓，赶走了一百九十六家农户，占有了三千三百英亩的农田。在这次暴力强占土地的行动中，有三个农民身亡，一名妇女上吊自杀，六十八个家庭被拆散。

在延安除夕的晚上，我询问六位为英语广播撰稿的中国青年，对于新中国来说，他们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工业组织形式？还是内战的时运？

廖编辑的窑洞里点着灯，寂静无声。大家在喝茶、吃花生。这个来自爪哇的“文质彬彬的陈龙”说话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普通人民的生活。过去他们象奴隶，又饿又穷，备受地主残暴的虐待。如今他们自由了，虽然落后，又是文盲，又迷信。他们在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仅仅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农民已经是人了。那是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封建制度被摧毁了。”

“请停一停，”我打断了他的话。“当你说‘残暴地虐待’时，你有多少事实和数字来说明它呢？”

所有的人都笑了。他们都知道“残暴地虐待”的许多事例。其中有一位姑娘出身于北平以北地区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拥有的土地就是骑着马几天也走不完。她的母亲经常用绳子把一些农村妇女绑起来并进行拷打，因为她们没有履行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那些封建性质的义务。因此，她在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希望这些农民能够同她家的“老头子和老婆子”非常彻底地“清算”一下。

陈龙说，“当地主进村时，人们对他们有一种恐惧感。每一个农

民都担心这个地主会到他家去。到时候他得立刻准备最好的饭菜。尽管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尝过肉的滋味，他还得为此杀掉家里最后的一只鸡。在同佃农打交道时，地主自己有一本账。我曾问一个农民，当地主记账时，为什么你连看也不看一眼。他双眼直瞪着我，好象我发了疯似的，“你认为我想掉脑袋吗？”

“亚洲的封建主义是野蛮的封建主义。”一位从新加坡来的青年说。“经过几千年以后现在发生变化了。这一变化发生在农民之中。你们外国作家没有抓住这一点。你们写了关于中国的书，写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军阀——这些书都是不错的。但是你们写过几次农民？而在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你们应认真写一写张三和李四”。然后他笑着解释说：“那就是英语中的‘汤姆、迪克和哈里’。”

我站在窑洞外面凸起的地方，俯视着三个山谷。月亮高高地悬挂在延河的上空，月光覆盖着积雪的山峰。山下靠近市政府的一长排灯笼正照亮着进入明年的“财神”之路。我知道蒋的军队正从西安向我们扑来。电台设备有一半已经撤往山里。尽管他们的城市即将丢失，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但这些年轻人，首先关心的不是延安，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战争，而是把农民的日常生活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认为农民是那么重要的。

那就是毛的价值标准，他们掌握了这个标准。

在过去二十年内，中国共产党曾经试行过三种不同的方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在华南，他们早期的政权曾把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都拿出来分给种田的人。今天，他们批评这种早期的做法是“极左”，因为它根本不允許地主拥有土地，而把最坏的土地分给

富农，这是报复，而不是健全合理的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就不没收土地了，为的是要实行民族团结共同抵抗侵略者。取而代之的是减租的计划。这一计划把国民政府早已批准但从未实行过的法律付诸实施。当干劲十足的农会实行减租时，地主制度变得十分无利可图，这时地主往往愿意接不太苛刻的条件把土地卖给佃户。于是农会便帮助农民用合作信贷的办法购买土地。但是，减租法并不会自动实行，这一点连美国也懂得。凡是被地主统治了几百年的地方，例如在中国，农民往往是不敢表示不满的。而大地主又有日本人做靠山。这种情况激起了农民的仇恨，便触发了革命的土改。

抗日战争结束时，农民主动采用了新的土改办法。当过特务的地主被逮捕，由人民法院审讯，其非法获得的土地，有时连同他们的生命也被剥夺。较小的地主被叫到村民大会上，清算他们过去违反减租法的行径。河南的农民自豪地告诉我：“共产党决定土改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一半了。”冀南的党委书记用不同的语言证实了同样的看法：“当我们看到农民已经干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认定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党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就作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决议。在不同条件下采取过十几种不同的方法，其目的都在要把土地分到种田人的手里。其中起积极作用的不是政府，而是农会，他们得到人民解放军的保护和有来自党、军队和其他机构的组织工作者的帮助。

由延安调研处给我列举的各种方法中有：没收日本人和卖国贼的土地；没收地主为了逃税而没有报告的“黑地”；没收从农民那里非法所得的土地；没收高利贷者非法索取高利息而占有的土地；还没收如满洲国政府和以前皇帝所拥有的特殊的土地。在封

建弊病较少的长期由共产党管辖的地区，则由省政府买下土地，然后以半价出售给农民。两种情况都是以粮食结账，十年付清。还有一种“土地捐献运动”由“开明地主”奉献土地。一位在满洲从事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告诉我：“这种自愿捐献并不是那么十分自愿；地主们认为他们表现友善比被‘清算’能保留更多的东西，这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的典型办法是“清算”大会，也可叫做“斗争大会”。我出席了在靠近张家口的后村举行的这样一次大会。

地里收工后，夜幕就降临了。会场上的口号声在昏暗而高低不平的巷子里回荡着，在一个周围是土墙的院子里，约有五六百名身穿灰蓝色农民衣服的人坐在地上。一群群缠足的妇女聚集在会场的四周。前排有二十来个青年人戴着红臂章，他们是青年先锋队，领着大家呼口号，一遍又一遍的宣读决定。

直到几天前后村才有农会。当时有十来个农民在地里讨论了附近几个村子里完成土改的情况，并认为：“现在是我们也来干的时候了”。他们跟另外二十多人秘密地谈论了这件事，然后派人到张家口去请一位组织者来提供意见。其结果就是我所见到的这次大会。这位从张家口来的组织者没有担任大会的任何职务，而是同群众坐在一起。当地农民轮流当主席。

梅面对农民站着。在日本人时期，他曾担任乡长，是个面目凶恶，作威作福的典型头目。一个瘦瘦的中年农民正向他质问：“是不是你拿走了铁路沿线的公共土地？”（这是一块三十公尺宽一英里长的狭长土地）。

“我是给乡里拿的，”梅声明道。讽刺的笑声四起。“谁是乡？你就是，你要我们去种地，而你只管收。”“收成你已经拿走了。”青年先锋队兴冲冲地喊着。

一个长着胡子的男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把脸猛地冲向这位前乡长，“当日本人要强迫劳工时，一家出一个，你不是没有让你自己的儿子去，而是要我的两个儿子去了吗？”梅稍为停顿了一下，然后承认说：“是的。”“我儿子替你儿子干了活，那你就应该付他工钱！”人们强令他满足这第一个明确的要求。青年先锋队队员们喊道：“他替你干了活，你要付钱！”一位缠足的老妇人蹒跚地走上前来对她从前的乡长说话。她因自己的大胆而发抖，但大会给了她勇气。她颤颤巍巍地说，“你还记得你从我老头子身上榨取的十八块钱吗？在那个时候十八块钱可是我们一年的口粮啊！”

“我记得，”梅承认了。

“那末就付五个蒲式耳的粮食来结账吧，”她要求。

她的羞怯感动了人们。“五个蒲式耳不够；要十个，”有一声音喊道。“十个蒲式耳，”这是青年人的喊声。“要加上按他的办法计算的利息，”另一个人叫道。每一个人都笑了。

在半个小时之内，他们把这位从前的乡长所欠的“帐”都揭发出来了。他认了这些帐，但请求宽恕。

“不改过自新不给宽大，”人群喊道。“如果你想投到人民一边来，就得彻底交待，全部还清欠帐，”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结论。最后，人们叫他想一想。第二天晚上，村里人还准备再一次“斗争他”。

一个由十一人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把已经提出的要求开列成清单。本地的主席解释说，“我们将多次开会对梅进行斗争。他很顽固。”

“如果他继续拒绝，那怎么办呢？”我问。这个人向我保证说，“他为了同周围的人和平相处，会让步的。他不是一个大地主，不能逃到城里去靠别的收入过日子。”

后村的每一个人都对附近的一个名叫和平城的村子所进行的成功“清算”感到钦佩。在那里有个最大的地主姓杨，他拥有一百二十英亩土地。在美国，这只是个家庭农场。但在中国的这个地区，一户人家每口人有半英亩土地，便认为是自耕农了。杨家有三十户佃户，他对所有佃农都行使“封建特权”。例如，每一个春天，佃户们都得无偿地为杨家打扫和修理房屋。

一位妇女在会上作证说，她为杨家九口人白白洗了八年的衣服。另一个妇女为杨的小儿子当了一年的奶妈，原来杨家答应用土地来偿付工钱的，但结果并未实行。这次妇女大会决定对这样的妇女每人给一英亩土地。杨没有抵赖。他几乎立即承认“我即使拿出所有的土地也不够抵偿向我提出的正当要求。”他告诉他的乡亲们，他已经“献出一切”。而他们却“让他保留”了十二英亩。这样他在和平城就比其他的人要富裕两倍。究竟他的这些土地能保持多久还不能肯定，但第二年农民就有权把他的其他土地拿到手了。

在土改前和平城有二十六名地主，占有一千英亩土地，一百六十四名自耕农拥有七百六十六英亩，此外还有二百三十三户佃农和二百个长工。土改以后，地主、佃农和长工都没有了。所有的家庭就成了中农，每户平均拥有三英亩土地。各人所得土地并非完全相同，但每一个家庭都能靠种地过上一般标准的生活。因为庄稼归自己所有，因此每一个家庭都愿自由经营以及对小农具和水利灌溉设施的自由投资。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的土改模式就不单纯是没收了。它是一种运动，它通过购买、捐献、罚款、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社会给予支持的各种方式，把土地分到耕田者手中。在这一阶段并没有试图以绝对平均的方式分配土地。土改的目的在于唤醒农民行动起来，粉碎地主的权势，使广大农民从雇农和佃农上升到中农

的地位。

各种不同的方式经过了一年半的考验。农民发动起来了，地主势力被打垮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上来自所有解放区的代表，通过了一个“土地法大纲”。地主和富农的土地都要加以平均分配，使农村人口每人都能得到一份数目相等的土地。农会被指定作为分配土地的“合法机构”。一旦由各界代表产生的政府成立之后，这个政府就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而农会则是它的助手。

这个大纲同其他各国过去的土地革命有许多重大的差别。地主和富农并没有被剥夺其全部财产，而且和一般农民一样分得了自己的一份。妇女也获得同等的份额，甚至在家里也保留了他们的个人权利。土地不收为国有；农民“有地契”，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土地也可以买卖。允许有较多的灵活性使之适应各地的情况。例如，内蒙古人欣慰地获悉：“平分土地和牲口的做法不适用于牧民。”但如果土地已经分配完毕，即使不完全符合大纲的要求，也不下令重新分配了，“除非是农民提出要求”。

在任何一个地区里，土改都“必须满足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政府“允许并保护农民有批评和控告政府与农会的工作人员侵犯民主权利的行为”。

同以往的土地革命相比，使人感到最显著的差别，体现在规定哪些人有权得到土地的条款中。这些条款在提到农民和军属分配土地的办法之后，接着就是下列令人惊讶的字句：“对于国民党军队中普通士兵的家属、国民党政府的雇员、国民党党员以及那些居住在乡村的敌方其他成员，应按普通农民同样的标准分给土地。”战犯本人无权分得土地，但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不参与他们罪行的”，同其他人一样有权得到相等的土地。这种作法同美国革命时



期对保守派的处理以及俄国革命时期对富农的处理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任弼时对此作了长篇的分析，他说：“即使对那些不够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也必须给予必要的土地和住房，否则他们就会去抢劫，给社会带来不安定。”

在这次新规定的指导下，一九四七年底和一九四八年全年土改变得更为重要了。斗争也更为尖锐了。那些过去把前一阶段看作是一种暂时性调整措施的地主现在知道已经完了。据报道，山东有个地主婆，宁肯烧掉自己的谷仓也不让农民得到粮食。有些地主在面条里放毒，使一个乡村土地分配委员会的十九名成员中毒，其中一人身亡。另外还有一些地主企图加入共产党，或者把女儿嫁给当地的土改组织者，希望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些情况往往在农民集会上被揭露出来。任弼时说：“消灭封建阶级是一场无情的斗争”。

然而，革命也是有节制的。有一个村子把人口中的百分之二十二划为地主和富农，一名县的组织工作者就被派去告诉他们：“这样不行。人口中地主约占百分之三，富农占百分之五。再重算一下。”“重新计算的结果表明，有些人之所以被划为地主，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地主，或者他们本人在抗日战争以前曾经是地主。于是下令重新划分阶级，而且不咎既往。山东有个地主马关生（译音）被迫出卖他的染料公司以满足佃户要求，上级领导便下令把公司归还本人，裁决说：“马作为实业家，不应触犯他的企业；其债务的清理应只限于他作为地主的那一部分财产。”

毛泽东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宣布：“现已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彻底地解决了土改问题。”

尽管取得这样的成功，尽管新法令和新办法已经具体化了，但

是在新解放的地区，土改仍然准备同样要经过几个逐步发展的阶段。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毛发出公告，要求华南的农民不要过早地发动土改或起义，而是要组织农会，等待大军的到来。与此同时他们应在地主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他指出没有强大的农会，土改就不可能完成，而且即使有了农会，第一阶段也可能是减租而不是立即分地主的地。

许多人问：“在减租期间，如果地主出卖田地，并把钱投入工业怎么办？”

任弼时答道：“我们保护而且鼓励这类工业。”

人们从中感觉到中国人民的实际而宽容的精神。他们使人们看到未来，而对改变过去并不超过必要的限度。既不使土地的生产能力白白浪费，也不使人的精力徒劳无益；他们懂得，即使在战争中，也应考虑到未来的和解。

## 新 农 民

土改的最初的成果之一就是许多雇农能够结婚了。山东桑树园的电台在新闻广播中把这件事说得既清楚又有趣。下面我引用中国电台的话——有闺女的父亲说：“我们不再把她们嫁给有钱的老头了，因为靠收租过日子不可靠。不如把她们嫁给年轻而勤劳的庄稼汉，使她们加入到长流不息的种田人的洪流中去。”

用小张的话说：“过去女孩子们对我们这些雇农是不屑一顾的。如今我是自由的人了，可望办喜事了。”他在土改中分得了三分之二英亩的土地！结婚的人多了，必将增加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新中国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一个有待今后去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通过生产竞赛运动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对青年人来说，土地意味着一种结婚的机会，那么对年纪较大的人来说，就意味着能有更多的粮食养家糊口。毛泽东收到晋南中宁村(译音)农民的一封生动的新年来信，信中详细叙述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变化。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都已过上新生活。我们清算了十一户地主和恶霸，夺回了所有我们根犁耕种的全部良田。河边的那一片既平整又肥沃的土地又重新归我们自己所有。通过清算，我们又重新夺回了他们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血汗钱。我们买了牛和毛驴，也有取暖用的燃料。大家的炕上都有了枕头。

年三十这天，几乎每户人家都上市场去买了羊肉回来包饺子；买了红纸写春联；并给孩子们买了布娃娃；我们都买了您的画像！想想过去的新年，我们用钻地洞、爬地道来逃避高利贷，而现在！我们却吃上了羊肉饺子，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过了新年我们就要照您的办法把生产搞上去。

听说蒋贼要攻打您所在的延安。他的计划不会得逞！我们即使掉脑袋，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人们很难从这封信的口气里感到战争正在晋南进行，而象这样的村庄在战争中已经多次易手了。对中国农民来说，战争是他们熟悉的一种灾难，土改却是一种新鲜事。对小张和写这封信的人们来说，有机会娶老婆或能够养家糊口，要比任何战争更令人兴奋。

紧接土改之后的是生产竞赛。它的首要目标是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使种田人家全年都能吃得上饭，其次是依靠妇女的劳动来解决穿衣问题，而无需减少粮食供应。

第一个生产竞赛是在延安边区开展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应

付由国民党封锁造成的紧急局势。封锁大大加剧了这个贫瘠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因此每个人,包括部队和机关干部,都不得不去生产粮食,还要求农民生产储备粮以防干旱之年。对于农业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人们也想了许多办法。

劳动英雄领导的变工队就是这样的一种组织形式。找到好的方法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因为农民墨守成规。为了帮助军属最初试行的组织叫做“互助组”,县里派来了一名干部,来组织互助组,他并成了互助组组长。农民不喜欢这种形式,因为这种“互助组”的名称和方法看来好象是外来的。

毛泽东跟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他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农民所使用的各种劳动办法。有一种在亲戚和邻里间互相换工的传统做法:你今天帮我种地;我明天帮你种地。这种做法有个标准:骡马或牛干一天活等于一个人两天干的活。这样换工的做法比较普遍,但并不稳定,只要发生小争吵,这种形式就会中断。共产党参与了此事,把它稳定下来,并使之得到发展。口号是:“调解争吵!制服饥荒!”他们沿用老的名称,但这种换工的做法,已经扩大为更大的范围。

另一种联合劳动的形式被称作“唐将班子”即唐朝将军的劳动班。一千二百年以前中国的鼎盛时期,有一位皇帝派兵到西安附近去耕地;这些军队以一个班为一个单位,并指定班长,他们每个人耕的地比个体农民还多。这个名称保留了下来,以后凡农业劳动者组成一个班,按一定方式进行劳动的都这样称呼它。农村里的工匠和地不够种的贫苦农民往往组成这样的班,专干季节性的工作。他们的收入大体相等,只有在外揽活的人可以多得一份。如果他也在地里干活还可以再得一份。但是在下雨天没有人雇他们干活时,他必须预支粮食使这个班的人能有饭吃。这种班的形式

很流行，因为他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干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集体劳动的这两种形式证明比单干生产率高。如果姓马的农民有六英亩地，吴家有五英亩，而每一家都有一头牛，各干各，两家谁也不能把自己的地全耕完，如果把两头牛套在一起，两家所有的土地便都能够耕完。事实证明，三至十个人的集体劳动在翻晒干草，耕地和收割等农活方面效率特别高，你追我赶，互相激励。集体劳动还可以安排一个人为大家送饭，如果人人都从地里回家吃饭，就会浪费好几个小时。

集体劳动还在其他方面改善了农村的生活。它使得孩子们更容易上学了。从前小男孩得为家里放羊，现在一个男劳动力把好几家的羊都管了起来，男孩们就可以解放出来，去上学了。变工队所在地成了读报和识字的中心。最好的变工队在报纸上受到表扬，地方官员还设宴招待他们。他们的队长则成了劳动英雄，可以出席大会或被选到县和地区的委员会里，参加政府工作。

“这是从人民中挑选真正的领导人的方法之一，”建设局长对我说。

譬如，王林(译音)是一位年轻的积极分子，他在靠近延安的第三乡组织了一个变工队。他遇到的麻烦事可以写成一本书，叫人读后既伤心又感动。两个队员年纪太大，只能干少量的活；一个年轻人埋怨说，他干得多，得得少。还有一个四十岁的队员，成天灰心丧气，因为还没娶上老婆。在处理这些家庭困难时，王林从大处着眼，对大家说：“只要我们同心同德，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共产党人白手起家，不是在十年内就造就了一个世界了吗？”

幸运的是王林并不仅仅提出动听的口号，而且还对人们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在割麦子时把草也一起割下来。王作为一个组织者，就让他跟一位最好的农民肩并肩

地干活。到秋天这个孩子竟成了一个班的班长。当十七岁的小陈说他干一天的活只算他半天工，因而不想干时，王向他保证说：“只要你做足全日工，你就会得到全天的报酬。”不久小组就表决：陈应得到一个成人的报酬。勤奋但好争吵的李的父亲在十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死亡时，王叫队里的人把他的尸体抬回来，而且举行了一次很体面的葬礼。从此李对大家比以前更友好了。

不久，变工队“劳动起来就象一个家庭”一样。它包括十四户人家，有二十八个男劳动力，十六头牲畜和一百零七英亩土地（当春耕过去时，牲口归一个运输合作社使用，共用四个男劳力）。两个男人为所有家庭挑水，还给地里干活的人送饭。三个男孩为所有的家庭拾柴火。其余的人在地里安稳地干活，他们不仅耕种了所有的一百零七英亩的土地，而且还开垦了五十一英亩荒地。县里发给他们一面名为“最佳变工队”的旗帜。

王林在他的村子里被选为劳动英雄，他就是那些从农民中锻炼成长为新领导人当中的一个。

从一个姓李的农民身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劳动英雄生活中的变化。他坐在延安我的窑洞里，谦虚地、随和地笑着。他非常想看到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正如同我非常想看到一位延安的劳动英雄一样。是朱德总司令派他到我这里来的。前一天晚上他就住在朱德家里。

李移动着瘦小而灵活的身子。他穿着黄褐色带条纹的土布裤子，由于穿着多年已经褪成白色了。他的颧骨高高的，头上缠着一条毛巾，也是尘土的颜色。赤着脚穿着布鞋，鞋看上去本来是黑色的，鞋底是用麻绳纳的。李似乎是一个土生土长、能吃苦耐劳的人。

他不时把手伸进土灰色的棉袄里抓出一只虱子，掐一下扔在地上。他这样做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这是长期养成的

习惯。他对于接受远道而来的美国人的采访，并不感到羞怯。采访者是位妇女倒使他大胆得有点近乎粗鲁了。李咧开嘴笑了。他生活在新世界！他获得了成功！

在旧社会，他，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沿途乞食，逃荒来到延安县。他找到了一家地主，给他们当雇农，住在悬崖边的窑洞里。全家都跟了来——母亲、一个姐姐和四个兄弟，因为他们中没有人能象小李那样找到这么一份好工作。

李给地主干了八年活。后来几年他算是个成人了，每年干活除一天两顿小米饭和蔬菜外，还可拿十块钱，另外，为了遮阳还给了他一条毛巾包头。他哥哥在收割时也给地主帮工，除吃饭外拿一块钱，但只有在干活时才管饭吃。小弟弟为地主放羊，一年到头只给吃饭不给钱。李一年十块钱的工钱用来在淡季时给全家人买粮食，但即使他们在小米里掺了大量的糠，冬天少吃饭多睡觉，粮食也还是不够。每次收成时，李都发现自己总还要欠地主二三元钱的债，相当于一年工钱的四分之一。

这时地主就说：“没关系，给我再干一年嘛。”

起初李不用付钱就可以住在窑洞里。但后来地主雇了两个佃农，并把这个窑洞租给了其中的一个。地主说如果李愿意挖另一个窑洞的话，他可以给他装门窗。李挖了窑洞，但一年过去了门窗根本没有装。因此李一家人就在风吹雨打的窑洞里过了一个冬天，李的母亲病倒了。

地主看到李很勤劳，想把他留住，提出：“如果你给我干十年我给你买个老婆。”李想要老婆，但十年太长了。李说：“五年足够了。”结果没有达成协议。

因此李象以前那样继续为地主干活，直到一九三五年的“革命”才使他分到了土地。对李来说，革命是朴实而仁慈的。从城里

来的工人们说：“应尽你们的能力多种庄稼吧，今后没有一样东西将归地主了。”李种了二十五英亩地，在收成时全都归他自己所有。

我问他：“你怎么会成为劳动英雄的？”

“我村子里的人选了我。后来县劳动英雄大会也选上了我。”

同院的男孩来倒茶。李喝得很有味儿，并发出了呷呷的响声。他接着说：“我种的地比别人都多，施的肥也多，还开了不少荒地。大多数人不种边角地；这些边角地地势陡峭，牛耕不到，因此老鼠和害虫就在那里危害大田。我用铁锹开了这些边角地，种上了庄稼。”他停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我还开沟引水浇灌低地。下雨时，我把雨水储存起来，以后用它浇地。”他满意地坐在椅子上舒展了一下身子。

“这么说是这一切使你成为一个英雄，一个优胜者啰？”

李想了想，摇摇头说：“要成为英雄，单凭自己获得好收成是不够的。我组织了一个变工队。大家都多种地。”李不会连贯地详细叙述，只是零零碎碎地一点一点地说出来。例如：“在征收捐税的会议上，他们说王应该交两个蒲式耳粮。王交不出，因为天气干旱，他的收成不好。我就替王付上了。我有一百袋土豆，拿出二十袋给难民做种子。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帮助这些逃难到我们这里来的外乡人，这样他们就能很快的搞好生产，我们的边区就能强大起来。”

上述情况已经很清楚，李是村里的英雄，因为他生产好并能帮助乡亲们搞好生产。他是一个好公民，他不但为自己、也为村子和边区而工作。他是个文盲，还比较迷信。在他的山沟里有孩子死了，乡亲们搬走了，因为他们认为那里“不吉利”。李却坚持住下去。他开始相信在医院里工作的那个女人的话：那是因为水不好



的缘故。他现在烧开水喝了。

正是这位英雄，他带了十一个蒲式耳粮食，送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他说：“这是一年的粮食。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自己去生产了。”他在毛的窑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在朱将军家里过了一夜。“毛主席送给我米面饼和白糖。朱将军把他园子里种的番茄给了我，还请我吃饭，有六个菜！在旧社会从来没有一个农民能同一位将军同桌吃饭。我们的社会是新社会，这是真的！”他同我说话时眼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后来，我看到他赶着毛驴缓慢地沿着小道走下去；用根长鞭轻轻拍打着牲口，扬起一片尘土。这位曾过着非人生活的雇农，如今，由于他辛勤地生产粮食，成为新社会的一名享有荣誉的公民。

粮食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接着就是穿衣问题。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如果一个妇女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全家有衣穿，而无须去卖掉粮食来买棉织品，那就等于增加了粮食的供应。

这里我们要谈谈工业合作社。这是由澳大利亚人<sup>①</sup>路易·艾黎传入中国的。多年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花了不少钱创办工合小组，却遭到贪得无厌的官员们的种种迫害。一九三九年，路易·艾黎进入延安，设立了一个总部和十个分支，资金总计五百美元。这种思想跟新政策恰好吻合。到一九四五年已办起八百八十二个合作社，拥有社员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七十七人，同整个边区的家庭数目相等。大部分社员甚至从来没听说过工业合作社；那里只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合作社。这些工业合作社即是边区工业的重要组

---

<sup>①</sup> 此处应为新西兰人。——译者注

成部分。

那些办得十分成功而且真正能使当地经济向前发展的合作社，都是从满足社员需要而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某些一心追求高额利润，热衷于投机的合作社，则在抗日战争结束时、随着外地工业品一下子涌进本地市场时垮台了。但是延安南部纺纱合作社以及类似的合作社，却既能抵制通货膨胀，又能抵制通货紧缩。

这个纺纱合作社有二千五百多名社员，占延安南部家庭总数的三分之二。每个社员收进两磅原棉，得交出一磅纺好的纱。就这样，根本没有银钱过手。多余的纱归纺纱的人所有，大约九至十一盎司，依其技术而定。她可以用这些纱来织布，或拿到织布合作社去换成棉织品。这家织布合作社拥有一家小工厂。妇女利用空闲时间在家纺纱，每人每月可以挣到一套布衣服的棉布，六个月就可以为全家挣到夏季的单衣，然后再开始去挣冬天的棉衣。这样，他们根本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也不需要为买衣服而卖粮。家里的男人自然喜欢这样的妻子。这就是共产党说的“提高妇女经济地位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第一步。”

所有这种物物交换的经济以及家庭纺纱，看上去并不象莫斯科宣扬的那一套，而是更象印度的甘地运动。我常常怀疑热衷于大工业的俄国人是否会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它确实很适合中国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延安边区，纺纱和织布继农业之后，很快已发展成为最大的工业。中国自己制造的纺纱车比西方一个世纪之前已经放弃的纺车还粗糙得多。获得原棉是个问题，因为这个地区干燥寒冷。试验农场找到了一种剪枝的办法，可以迫使棉花在冬季到来之前提前开花。适宜种棉花的土地用免税的办法来鼓励种植。在三年的时间里，棉田的面积增加了七倍。政府已经开始的“三年经济计划”，本来可以使这一地区做到棉花自给，所有的

纺纱和织布工作均可在妇女合作社解决。但由于外来的侵略，这一工作被迫停顿下来了，现在大概又恢复了。

当机器制造的产品到来时，这种家庭工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没有人为此而担心。大部分认为家庭工业将会长期维持下去，因为它能使人们空闲时有活可干。另外，机器制造的产品不如家庭制造的产品那样耐用。但如果人们需要工厂的产品，合作社已经有了几家工厂，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工厂。一切取决于人民需要而定；从家庭生产向工厂生产过渡的条件已经有了。过渡起来是不会很困难的。

说到由劳动英雄所造成的乡村生活的变化，我们再把您带到山东以东一千英里的地方去看看。这里名叫海景村，是个非常贫困的地区。所有的良田慢慢地都落到了不在本地的地主手里。七十户中就有四十户人家是“讨饭棍子”。他们每天早晨出去讨饭。每天傍晚，饿着肚皮的妇女和儿童就站在悬崖陡壁上盼着讨饭的男人归来。

海景村的小张是个孤儿，十四岁就当了雇农。他当了八年雇农，吃的是糠和野菜。一九三九年八路军来了，实行减租政策。土地的价格下降了，张才有可能买到三分之一英亩的土地。他开始跟着毛泽东。在海景村没有一个人对变工队感兴趣，唯独张有信心。他把六户人家组织了起来。开始时他干了大部分的工作；他除掉地里的野草并为那些懒得动手的人修好了屋顶。慢慢地他的行动使得他们难为情了，于是其他人也跟着他干起来了，县里来人要他们搞灌溉，海景村的大部分人都说：“没用。”但张的队却在靠近他们土地的地方挖了一口井。天不下雨，十户人家就靠这口井救活了庄稼。在两年之内，海景村共挖了二十二口井。

今天这个讨饭村再也没有要饭的了。在张的领导下，海景村

正在执行一个生产计划。小孩子们组成的小队专门灭蝗虫。“青年英雄”组不但给庄稼地里除草，而且还为乡村教师和军属们挑水。妇女组在纺纱和织布中开展竞赛，所有的家庭都穿上自己家里女人生产出来的新衣裳。

张自己有三英亩土地和一头牛。他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六岁的儿子。这个小孩对毛泽东的了解就象许多美国孩子对圣诞老人的了解一样，把他看作是遥远的给他带来白面馒头的圣人。因为就在一九四二年这一年，张和他的家里人才开始吃上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吃过的真正用粮食做的馒头。

张在二百多个村子里组织了农会。他成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位领导人。

一种激励集体进步的重要组织是劳动英雄大会，在县或省的范围内召开。村里选出英雄。这不是一种政府职务而是一种名誉地位。大会由劳动英雄们自己主持。

我在冀南的武安县出席了这样的一个大会议。这是一次半公开的大会议。为了不使蒋介石的飞机注意，这次大会没有在县城所在地召开，而是移到了一个离县城有几英里的小村子里。一辆卡车把我送出城外，到了一个地方两个男人从路边向我们打招呼。以后我们就徒步走过两个村子，到了第三个村子就看到五彩缤纷的彩旗，这表明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大会开始时，吹起了号角，并在一个露天场地升起了旗子——不是红旗，而是和南京上空飘扬的同样的中国旗。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为了礼貌起见，可以叫做会场。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块用竹竿和席子撑起来以便不受日晒风吹的地方。台上糊着各种颜色的纸张，挂起了毛泽东巨幅肖像，使它显得十分明亮。地上排起了可供一千人坐的小板凳。有十五名到二十名劳动英雄被选出来组

成“主席团”，他们走上台去。他们都是农民，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年轻人穿着蓝布衫，缠足的妇女走起路来很吃力，但十分自豪。

姓孙的、“新涌现出来的”英雄，是位土改领导人。他在本村分配土地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有位战斗英雄姓李，在村子里搞地下工作时，曾经单枪匹马杀死了十二个日本鬼子。这里还有成功地组织了农业生产队的英雄和成立了合作社商店的合作社英雄。一位六十岁的名叫王芝泽的妇女是“纺织女英雄”因为她一天能纺十盎司棉花，而其他入平均只能纺五盎司；她一天能织十六英尺布，而其他入平均只能织十二英尺。她在给较年轻的妇女传授经验。

主席在开幕词中说：“你们这些英雄是新社会的代表。你们是推翻封建主义，改善人民生活的人。第一步是土改，第二步是搞生产。我们一定要开展一次大生产运动。”

这次为期八天的大会是为了制订本县的生产计划。第一天大会是“欢迎英雄们”。接着两天是小组讨论，在讨论会上每一个专业的英雄们——种麦子的，纺纱的或者是在合作社工作的——相互交流经验和讨论技术上的方法。然后有两天是开“大会”，由各个小组向大会作报告。最后他们“好中挑好”，把最好的选出来作县的劳动英雄，并在他们的领导下，通过了第二年的生产计划。

这种生产运动既不是抄袭苏联的国家计划，也不是照搬美国商业俱乐部的市政改良运动，但它兼有两者的成分。县的技术专家们帮助草拟计划，县政府提供贷款和种子这些志愿领导者是经过挑选的。首先根据他们的干劲，其次要得到他们本村的批准，最后要有大会其他代表的推选。他们采纳了生产计划即付诸实施。

劳动英雄是全县经济进步的推动力量。被选出的县的劳动英雄们以后还要出席区的劳动英雄大会，制订更大范围的经济

计划。

“互助合作无边疆”。这是作家沈建图用来说明扩大的集体精神的一句引人注目的话。这种精神是从变工队和劳动英雄大会中发展起来的。

说明农民集体力量的一个惊人事例是，一九四四年河北南部和山西东部“灭蝗运动”。过去农民唯一灭蝗的办法是到庙里烧香，或是擂起大鼓把蝗虫从一块田赶到另一块田里去。但是在这一年蝗虫成灾时，几个县动员起来共同对付蝗虫，每个村子都成立了“灭蝗队”。在地区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工作。每一个县都有一个灭蝗委员会。他们没有现代的设备，但他们照样战斗。孩子们参加竞赛；老人和妇女走向田间，运用各种不同的战术。有的寻找虫卵，其他人在天破晓前就出去灭虫，因为那时露水打在蝗虫的翅膀上，它冷得飞不动。

在三个受灾最严重的县里，有十三万人动员起来成立了“灭蝗队”。他们包围了灾区，用焚烧、扑打的方法把蝗虫装进了布袋。他们使用的是战场上的语言。一个县向另一个县报告：“某处蝗虫很多”于是“讨伐队”便作为“同盟军”开到其他的县里去。在一周的时间里，收集了三千多吨蝗虫，整个地区的虫灾都被清除了。这一地区的人们对蝗虫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一只蝗虫，人们马上就go去搜寻虫卵。

人们以类似的方法对付水、旱灾。一九四六年春，察哈尔南部一场旱灾毁了一百万英亩秧苗，变工队很快就在大部分田里重新播了种。一九四六年苏北有四百万人面临饥荒，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全部被蒋介石的军队扣留了。当地政府就是使用这种新的集体力量抗灾。灾民被组成了小队从事纺纱、捕鱼、榨油和运输等活动。二十万人受雇去疏浚大运河，另有二十多万人去运

盐。解放区的政府发放种子和粮食贷款，在政府保证偿还的情况下，有粮的人家也先把粮食借出来，这些都是已经广泛采用的、立即可以见效的救济方法。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终于送来微不足道的援助物资时，他们发现，原来他们的专家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些最迫切的需要已大部分得到了解决。互助组织使这个地区得救了。

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过长江和南下运动中，农民的互助组织还完成了修筑铁路的巨大工作。华北的大部分地区，铁路已成为碎石地。铁轨和枕木不知去向，路基被夷为平地，并已开垦耕种。只有当地农民才知道原来的铁路线在哪里。蒋军在撤退时又进一步破坏了铁路，炸毁了桥梁，铲平了铁轨。

筑铁路的工人来了，但他们没有铁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就把铁轨藏起来了。他们从沙地里和洞里把它们挖了出来。现在又把铁轨送来了。他们八个人抬一根铁轨，翻山越岭送来了。于是十七万四千根铁轨铺成了一条单轨铁路。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几百英里长的铁轨从中国大地里挖了出来，重新铺设在原来的地方。

农民们确定了铁路的位置。每一个人都知道在自己田里铁路的走向。天津—济南线有六十五英里被埋在地里，但六万名农民，用锄头和手推小车用三天时间就恢复了路基。缺少枕木，他们就给各个村子送去枕木样品，农民就照原样做了出来，用牛车、手推车和驴子驮着送来。政府给他们发了证明，这些证明在秋收时可以代替交税。

中国农民修筑铁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日本人和蒋介石经常抓劳力去干这种活。现在新鲜的是在干活的方地上。修路农民到达时，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有点象美国殖民者当初欢迎铁路修到西部时的那种盛况。如今农民也需要铁路了。从前他们对铁路

毫不关心，甚至采取敌视的态度。因为从前铁路带来的是收税官，而贫苦的农民没钱也不许他们乘火车。现在农民有了土地，有了剩余产品，需要与城市取得联系。同时，作为公民，他们对政府也有了信心，何况事先又拿到了政府发给的证明。

农民就这样成为独立自主的农民。因为从前的农民只是个封建的种田人，以实物付酬并惧怕政府。而独立自主的农民是民主政府和所有自由经营企业的基础。他们是现代世界的一员。

## 自由企业

关于新中国对私营企业和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毛泽东和朱德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所发布的“对中国人民的八点公告”说得很清楚。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命令军队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这个公告有两点是关于工业的：

“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sup>①</sup>

就这样，私人企业包括工业、商业、甚至银行，不但允许存在，而且还保证给予“保护”；而“官僚资本”——即主要由蒋介石上层集团所拥有的垄断资本——将作为新政府的财产而被没收。

毛泽东是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不是作为

---

<sup>①</sup> 原文见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94页。——译者注



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在这个布告上签署的。这一点很有意义，表明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盟友民主同盟和国民党左派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因此，它不单是共产党的纲领，而且也是中国联合政府的纲领。

那末，是不是共产党人在搞资本主义了呢？还是在人们觉察出来以前企图用欺骗的手法走向共产主义呢？我们来看看张家口吧。这是一座在北平西北方的有二十万居民的城市，共产党占领它才一年。他们的初步尝试是安排好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的中等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种植麦子的内地，有同蒙古进行贸易的毛皮和羊皮业，还有一些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小加工业。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过去是养牛场的机坪上。在一间新的接待室里休息时，向我们免费供应了西瓜和茶。我们坐着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小汽车进城，经过了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市场。这里有甘美的葡萄、梨、苹果，价格相当于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北平的四分之一。街上到处是兴高采烈的、喧闹的顾客。修路工竟占据了一条街。在一条大街上，一群小孩子正扭着秧歌，老百姓看了十分高兴。尽管有民族的差异，但它使人感到这里象是美国早期兴起的海伦娜城或斯波坎城，<sup>①</sup>一座刚刚繁荣起来的原始的城市。

“宾馆”是几幢新房子，外面有占地四英亩的花园。从前是日本军事参谋部的所在地。我们吃了一顿法国式的午餐，又吃了一顿中国式的晚餐。这位中国厨师曾在法国学过烹调。

人们易于接近，乐于交谈，比较随便。他们还懂得西方社会的礼节和措词。

---

<sup>①</sup> 海伦娜(Helena)为美国蒙大拿州首府。斯波坎(Spokane)位于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河上源。——译者注

衣着讲究的财政部长南汉宸说：“告诉亨利·华莱士，这里是自由企业仍有其意义的地方。在这里资本主义是年轻的，正从封建主义解脱出来。在这里工业不上税，价格不受控制。”

财政部的南部长能够自由的会见任何西方商人，并可用外语同他们对话。他工作时穿的灰色毛料裤子和蓝色毛料上衣，做工很好，不象延安的衣服那样皱皱巴巴。南不是乡下人，而是城里人。前面已经介绍过他平衡收支上不费力地谋得的效率。他很活跃，好象是一位扶轮社<sup>①</sup>社员。当我叫喊：“工业也不上税吗？”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报纸的标题，而不是科学的声明。需要问问清楚。

他说，“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是打算收工业税的。但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工业，因此我们按需要的程度规定了不同年限的免税期。烟和酒不能免税，我们就收税。对于纺织品、玻璃、农具、钢铁、机器、电器以及酒精、染料和碳等原料的工业，我们给予二至五年的免税期。如果任何人开办上述工厂，我们不但给予免税，并由国家银行给予低息贷款，而且还要在运输方面给予援助，并在意外灾害中予以救济。”

南先生的嘴角露出一丝干巴巴的微笑，然后补充说：“意外的灾害是指对蒋介石的轰炸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交通运输援助是指如果一旦发生入侵，军队运输部门将把工厂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去。”

对这位沉着的南先生来说，战争的巨大动乱也是他要考虑到

---

<sup>①</sup> 扶轮社是一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俱乐部，一九〇五年初创于美国芝加哥城，以服务于社会为宗旨，作风谨慎保守，喜按常规办事。  
——译者注

的另一件事！

宋主席是位仁慈的专业人员。在请我吃饭时，他明确地表示了关于鼓励私营企业的意图。“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生产企业，国营的；合作的和私营的。我们的目的是消除封建主义设置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这样资本主义才能兴旺发展起来。”

宋提出现在可出口六百万蒲式耳粮食。“只要我们告诉牧民出口是可能的，你要多少羊毛，我们就能够提供多少。”他说：土改的结果是开垦了一百七十万英亩的荒地；灌溉了三十七万英亩的旱地。水浇地的产量从每英亩十四蒲式耳提高到三十二蒲式耳。“仅是新灌溉的土地一项，产量就增加了六百万蒲式耳。那就是我们要出口的粮食！那就是我们发展工业和贸易的基地了。”

他说，一般来说，工业的生产比战前提高了，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也有一些行业的产量降低了。小农具的生产正迅速发展。在一年里，在平定县的一个铁工厂就生产了八百万件小农具。“那是土改的结果。现在每个农民的家庭都要买上四至五件农具。”

在以张家口为首府的这个地区——全区有三千万人口——粮食和原棉已能自足。那里需要纺织机器。“如果任何一个美国人愿意在这里开办纱厂，不管是小厂还是一个四万纱锭的工厂都行，我们愿意付大价钱。”

“我问：“拿什么来付？”

“拿麦子、毛货、羊毛或地方货币来付。他的麻烦可能是在货物出海前如何通过那些国民党强盗。”

宋继续说：“这同你们美国商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很了解，你们美国那些将军们和垄断资本家主张和国民党打交道。他们要买我们的港口和领空，花几十亿美国人民的钱来支持打内战。但你们难道就没有一些自由企业的资本家，想跟我们老老实实在地做生意

吗？我们广大的地区就是他们的市场。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出剩余的粮食，他们现在正盼望着能有工业品。”

我发现这里兴旺发达的气氛十分令人吃惊。我已忘记了资本主义是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从封建主义中冲杀出来的。即使在土改的阵痛之中，张家口也已经从农村地区感到了这种蒸蒸日上的活力。私人贸易和私营工业表现十分热情而且毫不掩饰他们自己。他们从国家那里得到贷款。共产党人为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有利可图而感到自豪。后来，我听中国共产党人说：张家口犯了“过于自信的错误”。很可能他们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有点陶醉了。

身穿绸长袍的商会会长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商人。当他向我介绍有关商业的情况时，送来了精美的瓷杯装着的茉莉花香茶。他说：在新政权成立的一年里，商业企业从一千九百八十家发展到三千一百五十家，与此同时，市场的货摊已从二三千家增加到一万三千家。

这里的工商业总共有五十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同业公会。蒙古大草原的毛皮，河北的棉花和丝绸，以及察哈尔的面粉和谷物，这些产品是最重要的。那些资金雄厚、历史悠久的私人大商号仍然在做生意。也有新开的厂商，其中许多是在政府提供资金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的。所有的企业都是商会会员。它们的事务是用民主的方法来办理的。从前是大的商行控制商会，现在则是按一家一票的原则来选出它的执行委员会。他们现在实行一种新的政策，执委会成员三分之一从大企业选出，三分之一来自中型企业，还有三分之一来自过去没发言权的小商贩。看来商人们对共产党的“三三制”很感兴趣，这样就不会由某一种利益集团的人单独进行控制了。

贸易在某些方面仍有中世纪的色彩。穆斯林牲口贩子三月份

把价值两万(金)元的牛群赶到北平的市场去卖,蒋介石的警察却把他们当作“共产党”而关了起来。张家口商会向当时北平的军事长官李宗仁发出呼吁,李希望他的军队有一个稳定的肉食供应,于是便下令释放这些牛贩子。但是政治警察并没有照他说的去做。他们拖延着,申辩说:“如果我们放了他们,他们就会向我们要牛。这些牛我们已经卖了,钱也花光了。”为了掩饰这些警察的盗窃行径,这些不幸的穆斯林仍被关在监牢里。

尽管有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还是盈大于亏。这位商会会长说:“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大部分企业的净利大约为资本额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土地改革搞活了农村的贸易。最近在张家口市场上人们为庆祝中秋节购买的水果,糕点,酒类、肉类和高档食品的营业额达到五十万美元。这是真正地兴旺发达起来了!”

地区主席和穿着绸袍子的商人的讲话同任何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要讲的话一样。工会的处境又将如何呢?所有的早期资本主义都镇压工会,工会经过斗争才慢慢地生存下来。但在这里,光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有四十一万名工人在以张家口为首府的五个省的范围里组织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那作为工会办公用的一幢不整齐的大楼里,我会见了三位领导人。马是一位面孔白净的知识分子,身穿一套黑色的棉布套装,一支钢笔插在衣袋里。他是省劳工联合会的主席。萧明(译音)是一位头发灰白的中年人,身穿斜纹蓝布衣服。他是张家口市劳工委员会的主席。风度潇洒的徐平(译音)身穿咔叽毛料衣服,是铁路工会的主席。这个工会曾引以为自豪地输出干部到其他工会去,它是华北最老的工会。

铁路工会的历史也是华北这一地区劳工运动的历史。从一九

二一年起，铁路工会就开始进行斗争，有时是合法的，更多的时候是非法的，从来没有停止过。它是在一九二一年那次大罢工胜利时的合法产物。一九二三年的罢工失败后，它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席卷全国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掀起的巨浪从千里之外给它带来了新的力量。当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时，张家口的工人运动也再次被迫转入地下。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有许多工会工作者为参加工会活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了一九三三年在冯玉祥将军的管辖下，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民权自由兴起的时期以外，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工会能够合法存在，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张家口时才改变了局势。二十四年的斗争，而且大部分是地下斗争！

当一个地区解放时，工会就活跃起来了。他们解释说：“在某一个工厂里，即使过去从来没有过工会组织，但总有一些老工人，从前曾经作过某处的工会会员。这样他们就会着手组织工会。”工会最先在厂里出现，然后它们加入地区联合会，以后再根据不同的行业，同中心工会联结起来。当时后一部分工作尚未完成，因为由于内战，通讯联络发生困难。

在工会完全组织就绪前，就开始考虑工人的福利问题了。他们说：“我们的新政府通过法令，把所有工人第一个月的工资加一倍，第二个月加百分之三十。工人们正在挨饿，因此要立刻采取措施。到解放后的第三个月，工会已经对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查。我们决定以小米的价格做为工资的基础，一个月调整一次。”就这样在第三个月，他们就拿到了以粮食价格为基础的，他们称之为“合理的工资标准”的工资！

他们说：工资有高有低。一个学徒每月可拿二百五十磅小米，一个非熟练的工人可拿三百磅，一个熟练的技术员或一位经理可

拿到九百磅小米。他们说：“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工人只能挨饿。但是现在，即使是一个非熟练工人也能使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有饭吃有衣穿了。”

我略算一下。一个非熟练工人，每天可得十磅粮食，这在美国算不了什么。但对正在为大米而骚动的上海工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呢？用粮食来计算工资，这是我在中国所见到的最高的工资。他们说：至于衣服，是从工人合作社用低价买来的，而合作社则接受国家或工厂的信贷资助。关于房屋的需求就通过修理破房子或接管日本人空出来的房屋来解决。

每一个工会都为自己的会员办了学校。

马说：“但是，最大的变化是工人地位的提高。这包括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参加集体协商的权利，参与制订生产计划和参加政府的权利。”张家口市政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工会会员。

他们说：这就是工会在公开组织活动的第一年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并不害怕这种“资本主义”会把他们卷走。他们同资本家一样强大，甚至比资本家更强大。因此他们跟资本家合作，并鼓励他们多赚钱，这样大家都能得利。他们参与集体协商，能看资本家的帐本。他们参与制订本行业的生产计划。他们感到他们的工作正在顺利的进行着。

那么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呢？又不完全象迄今为止人们已经知道的那种资本主义，当然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

我到一些工厂去了解工人们的要求。

沙漠肥皂厂是一个位于近郊的小企业，雇佣三十六名工人。该厂属于利华公司，是根据政府倡议开办的，生产各种日用品的公司。私人资本被邀集入股，因为这家公司是一个赚钱的企业。看

来并没有人担心这家公司或它下面所属的任何一家工厂最后是否会变成国营企业或私人企业。他们只希望人们能买到肥皂。这家工厂生产三种优质肥皂：洗衣皂、香皂和药皂。

在大办公室里，我会见了经理和工会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他们的穿着差不多一样。一位刚从合作社买来一套新蓝布服装的普通工人穿得最好。每一个人都十分友好、平易近人。穿着打补丁的蓝色工作服的经理，是位化学师。由于他有技术专长，特别从北平请来的。他回答了几个有关生产业务的问题之后就走了。我留下来同工人们聊天。

工资多少？他们说，少的如学徒工每月二百四十二磅小米，多的如经理每个月八百八十磅小米。大部分的工人是熟练工，他们每月可拿五百磅小米。这样他们就能养活家庭，还有点钱购买衣服。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工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噢，那时物价不断上涨，怎么算得出来呢？对一个熟练工来说，大概是每月六十磅小米。这就永远不够吃的。房屋呢？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我们没有家。夏天我们睡露天，冬天我们睡锅炉房。现在我们修好了几处房屋，每一个家庭都有一间房间了。

工资纠纷不常发生，因为每一个人的收入都比前一年多了好几倍。“有的工人还想多拿钱，但是工会委员会查了一下账本，发现如果我们再多拿，就会把我们的营业搞垮。我们开大会作了解释，大家都满意了。”

他们都坚持认为：最大的好处是“从前你必须闭紧嘴巴，而现在你可以自由说话了。”罢工呢？“当然可以，但为什么一定要罢工呢？罢工只会使你的收入减少。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工资，穿衣和住房等等，你都能够参加讨论加以解决嘛。”

我问：“你们跟老板讨论什么问题呢？”



使我惊讶的是，他们说，他们最近讨论是关于衣服的问题。每一个人人都需要买新衣裳，如果按批发价买进就便宜得多，但是工人合作社没有那么多钱，于是就同经理商量，要求工厂提供借款。双方讨论了关于借款的数目、保证以及归还等具体技术问题。后来借款拿到了，而且也已在三个月内还清了。没有一个工人因为自己有了新衣裳而对老板怀有感恩戴德之情；他们认为合作社做了一笔公平交易。通过类似借款的办法，合作社在秋收以后粮食最便宜的时候，也为工人大量买进了食品。

这家工厂太小了，因此没有一个脱产的工会干部。工会委员会的五名成员都参加生产，只是在业余时间搞工会工作。他们是开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工人们把他们要选的人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大部分工人是识字的，他们能够从黑板上抄下名字。如果他们不会写字，那么有“公平选举委员会”可以帮助他们。工会委员会的分工是：主席一人，组织委员一人，福利工作一人，教育工作二人。似乎教育工作比其他工作要重要二倍的样子。

“每个工人都上课”，他们一边对我介绍，一边又领着我参观了两个大房间。在这里，上午进行学习，晚上则是文娱活动的场所。上午七点钟，当工人们上班前精神比较饱满的时候，上一小时的课。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人，由张家口市劳动局出钱请教师来教。文化水平低的工人，则由本厂请一位工人来上课。他们学习的科目有：阅读，写字，算术，唱歌，工业技术，还学一点有关地理和卫生的常识。对于一些文化水平更高一些的工人，则由经理给他们讲时事，他们再通过交谈，当天就把这些新闻传达给其他的人。

这就是张家口——一座拥有国营，合作社营和私营企业的城市。这里私营企业赚了不少钱，但工会至少也象资本家一样有胆

有识。张家口是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我到了另一个比张家口大得多的城市——满洲的哈尔滨。在这里我访问了一家大的面粉厂和一家百货商店。两家都是私人所有，业主又都不在本地。每一家我都同资方和工人们进行了交谈。

面粉厂的经理说：“十四年来我们第一次又可以自由做买卖了。在日本人统治和继之而来的国民党的短暂统治时期，粮食是由国家垄断的；那时我们的工厂只是被他们雇来磨面粉。但是现在我们又象日本人没来以前一样，可以自由地买进粮食卖出面粉了。”

工会委员会的两名成员说，工人的工资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而且还能分红。看来他们对业务好象同经理一样在行。

东发和百货商店在哈尔滨是一家有几十年历史的著名企业。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就破产了，到苏军和国民党来时仍继续关闭。在现政府管辖下，一些住在这家百货商店院子里的职工决定恢复营业。当时业主住在山东，那里是在战线的另一边。距离哈尔滨有千里之遥。于是工人就同业主的代理人达成了协议。工人们开始时只要有口饭吃就行，现金工资按协议的标准先挂欠，以后可以从营业收入中拨还。他们还可以得到一半以上的利润。这位代理人开始时表示反对，但工人们跟他进行辩论说，店是空的，而且还欠了债，职工们恢复营业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的。后来这位代理人就同意了。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合作商店而要去承认一个已经破了产的业主呢？”

他们回答说，“我们看重他经营二十年的名声。其价值要比欠债多的多了。”

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生意人的回答——早期自由企业的“公

平交易”的道德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呢？又是又不是！现在它是一种混合物，既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又有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还有以公有制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垄断事业、公用事业和主要的工厂企业。正如毛所说的：“新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它也正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终将取得胜利。

目前他们正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自己的工业，并为私营工业的发展而感到自豪。当他们的军队向中国南方挺进时，他们公布了能证明在他们的管辖下私营工业如何得到发展的数字。他们宣称，在洛阳，解放后的第一个月，商店和工业的数目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在潍县五个月里，增加了一倍；在山西中部，地方政府向六十八个小煤矿、三十七家制盐厂以及名酒制造厂商等发放了贷款；在天津，新的市政府给手工业工人贷款帮助它们组织了五百六十二个生产小组。甚至在上海，美国记者们已注意到：“从日益增长的电力消费就可以看出，工业正在积蓄力量准备进一步发展。”

“保护私营企业”的政策并不是用词不当。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西北的一个小城市——集宁时，他们曾通知商人们到被占领的火车站来取货。有些商人住在郊外的小镇上，在他们到达以前，共产党在一项反击战中就丢失了这座城市。他们撤退时让火车拉着商人们的私人货物同他们一起出城，在重新占领这座城市时又把这些货物送回来。他们就是这样拯救了十四名商人，使他们免于破产的。其中一个说：“我双手赞成共产党。”在沿海城市，南下大军发现大部分垄断大企业是蒋的亲戚和其他高级官员所有，就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并被授权制订条例，对黄金、白银和外币进行管理。允许私营银行继续经

营银行的正常业务，如储蓄、贷款、保险等，甚至还允许他们在监督控制之下经营外汇业务。

什么样的工业能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呢？一九四八年五月，在一次由国营工业，私人企业和工会的代表参加的华北工商业会议上制定了政策。“国防工业，其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或带有垄断性的主要工业都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其他所有工商业都可由私人资本经营……在消费品工业方面，一个广阔的领域都留给了他们。“国营工业在稳定物价方面将起主导作用”并“积极帮助那些国家需要的私营工业。”“在市场商品过多时银行及贸易公司予以收购，商品短缺时，则予抛出。”

有一段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话是这样说的：“工会里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不提增加工资的要求，而是为增加生产、降低成本而努力。”一九四八年夏天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华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共产党一旦取得政权就将转而执行进一步镇压的路线——据说这就是满洲李立三所倡导的所谓“莫斯科路线”。但是，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本人发表的声明却表明对私人资本将采取温和的态度。他对中国工人说，一定要允许私人资本获得合理利润，才能使之进行合作，以完成共同的任务。

“劳资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上海市委书记在同该市工业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即占领上海的一个月之后召开的。他告诉他们他十分清楚，必须进口原棉，同时允许出口棉纱和布匹以清偿贷款。

在上海，事情很清楚，政府对国内贸易的限制远比国民党时期为宽，而对外贸易则需加以管制，以便把主要商品留在国内，直到更需要从国外进口某些商品时，再用它们去交换。

充斥上海市场的可口可乐,化妆品,花旗蜜桔和类似的奢侈商品将不予鼓励,而机器或中国本国工业所需原料的进口,则予鼓励。对上述商品,只须收税即可;无须命令禁止。

很明显,中国将为自给自足而努力。美国记者曾经发出消息说,由于上海“百分之六十的大米,全部燃料油和汽油以及绝大部分原棉均来自美国”,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上海一定要垮台。当地的中国报纸对此作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回答。作者说,一个有六百万人口的城市依赖外国的施舍过日子是不健康的。这一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即使现在,事情大概也没有美国人所想的那么糟。大米正在从长江各口岸源源运来上海。同农民之间的美好关系已经恢复。粮价甚至还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过去美国人拼命向上海出售燃料油,现在上海能象以前一样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煤了。虽然某些棉花还必须进口,但许多适宜做较简单产品的粗棉已由中国农民自己进行生产了。作者的结束语说,“看来美国人对上海是否能生存下去比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更担心一些哩!”

因此新中国的政策是建设中国自己的私营和国营工业。俄国人在实行了五年“新经济政策”之后赶走并逮捕了许多私营工商业者。中国实行的是否也是俄国人的那种新经济政策呢?可能不是,因为在中国,私营工商业者并不象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被剥夺选举权和受歧视。他们作为“盟友”参加了中国的新的政府。由民主同盟和其他类似党派代表其利益的私人实业家甚至不需要象共产党员那样必须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大展宏图,扩大自己的营业。

那么,对于从经营小工厂起家的私人资本又如何防止他们扩大成为垄断资本呢?单单依靠法律是不够的。美国人都知道,反对资本主义合并的法律是很容易被打破的。毛泽东靠的是对工业具

有高度控制能力的全民所有制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他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更长，也更加成熟”。当我看到张家口的工人们如何迅速地组织起来，在哈尔滨，他们又如何比老板更好地熟悉业务时，我感到毛的说法是正确的。

会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多久呢？毛泽东说，将持续一个很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他说过“几十年”；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由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比较落后，因此它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将比在今天的欧洲更长。在其他地方，他还说过，改造的步伐可随世界形势的发展而加快。所有这些提法看来都是合理的。在任何地方自由企业家总是要冒风险的。

# 五、建设新社会

## 学校归人民

当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向南方挺进时，蒋介石统治区的学生成百上千地冲破战场封锁线来到华北大学，这所大学在山里的地点是保密的。他们三三两两地来了。年青姑娘们穿着旗袍，烫着头发，男青年穿着外国皮鞋和衬衫，这些都表明他们是新来的人。他们很快地就换上了蓝色的棉制服，棉鞋，戴上鸭舌帽和耳罩。

学校的宿舍长长的一排，他们就睡在这里的铺板上。吃的是小米饭加青菜，一天两顿。他们带着可折叠的小马札去上课或到图书馆去。他们学习的技术工种是不同的，但主要是学习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一起工作，进行不带成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农民在一起并喜欢这种生活。他们在农民家里住上几个星期，帮助他们干农活；也会见工商业者，向他们学习一些初步的工商业知识。他们准备着去接管那些由人民解放军攻打下来的新城市。

他们就是中国的青年，正在很快地学习领导和组织

新中国的本领。而这里仅是许许多多这类大学中的一所。

这种学习运动开始之前好几年，准备工作就在延安贫瘠的山区里，在那些认为读书无用的农民当中做起来了。延安边区的高处长说：“我们要证明：学校能够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延安地区负责中学教育的高云屏处长同我以前见到过的其他教育处长不一样。他那棕色的光脚随便地塞进一双帆布鞋里。高颧骨上的皮肤光滑而黝黑，又黑又硬的头发蓬松着。他的上衣和裤子并不相配，因为裤子是老百姓穿的深蓝色布料，而上衣则是部队穿的浅蓝色的。过去他曾在部队工作，他的上衣至今仍留有领章。但从他那张年青而富有智慧的脸以及上衣口袋里插着的钢笔，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有知识、有教养的人。

他继续说：“当我们一九三五年长征到达这里时，这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识字。在一个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区有八十所小学，但六年制的完全小学只有一所。没有中学，更没有高等学府。一九三七年秋天，我们创办了一所师范学校来培养教师。我们招了二十名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过长征。”

这位处长回顾过去的时候叹了口气。他们曾有过美好的梦想要使这一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一项义务教育法已经通过了。但至今仍是一纸空文。农民并不想学文化。农村的男孩子处在饥饿的边缘，那些难认的中国方块字对他们似乎是浪费时间。他们得去放羊和砍柴。至于对农村的女孩子，任何学文化的想法都是不道德的。

农民的第一需要是提高生产。老师们承认这一点。他们一定要证明，学校是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帮助的。

有关陶老师的故事说明了人们对一位小学教师的期望。她被



选为“教育女英雄”。她的事迹作为一位教师的行为的范例已被印成材料广为散发。

陶老师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一个懒惰的小姑娘，因每天起床太晚，上学前没能帮助干家务，陶老师就跟她开展竞赛。这样，这个小姑娘早晨五点钟就笑嘻嘻的起床了。一个名叫文的男孩不论在家里或学校里都叫人讨厌，有时他象个演员那样画了个大花脸站在桌子上大嚷大叫，有时脱了裤子在院子里四处跑，尽管孩子的父亲对陶老师说：“严格要求他，惩罚他。”但陶老师却抱着这孩子，给他洗脸，帮他从衣服里捉虱子。就这样，她赢得了他的信任，使他“把心里的话全都告诉了她。”

陶老师到文的家里进行家访，观察他为何游手好闲并问他为什么不帮助干家务。

小文反驳说：“我只喝两碗水，为什么要我去挑两桶水呢？”

这位教师看见小文的姐姐在烧小米饭，就问道：“她吃几碗饭呢？”

小文害羞地承认说：“两碗。”

陶问：“她是否也在为你烧饭呢？”孩子懂得这个道理了，轻声地说：“我一定要改正。”

通过一系列艰苦工作，陶老师显示了无限热爱和真诚，后来小文在家里和学校都表现很好。他的父亲说：“他挑水，喂猪和扫地。那位陶老师是一位真正的教师，她把我的儿子转变为一个好孩子了。”

许多这类通过艰苦工作取得的成绩最后说服了村里的人使们感到教师是有用的。为了支援学校，村民们给了学生三十蒲式耳口粮和由变工队耕种的两英亩土地作学校经费。他们推选陶老师为“模范教师”，并“自愿地送给她肥皂，手帕，鞋子和鸡蛋！”她的

学校得到了发展，“学生人数达到四十人”。

四十个学生！对西方读者来说，陶老师似乎是作出了英雄般的努力只取得了微小的成绩。而亚洲落后乡村的教师们则可能对她的价值作出较公正的判断。她的学校在延安文化界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模范学校。她的“工作方法”由毛泽东及其他人向别的教师进行了推荐。她的那种耐心和无限献身的作风帮助建立了第一批小学。

高处长没有把成绩说得过满。当我在一九四七年同他谈话时，在延安边区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孩子上学，但比十年前在校人数已经增加了十五倍。原来的八十所小学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二所。从前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现在发展到六十六所了。还有七所中学和一所拥有五个系的大学。在十年里能有这样的发展已是很不错了。

凡是有小学的地方都要求教师为成人至少组织一个冬学班。这种冬学不仅是教人读书写字或按中国人的说法叫“识字”，而且也教农民如何选种和简单的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并向妇女讲授有关家庭卫生和儿童保育的方法。这种课程甚至对那些还不识字的人们也可以讲授，在从来没有小学的地方这种冬学也可以办起来。从延安来的一千位“文化工作者”——作家，音乐家，雕刻家，护士——每年冬天都自愿到落后的农村去办三个月这样的冬学。

在另一端是最高学府延安大学或称“延大”。它的大礼堂建在可以俯瞰延河的高地；教室和宿舍就在峭壁突出部分的一排窑洞里。经过不规则的泥土台阶，我爬上又高又陡的山岩突出部并会见了几位教授、学生和校长。

在我访问时，延大的校长是一位民盟的成员。他曾是西安的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因为他具有民主观点，蒋介石的党徒对他进

行了绑架和殴打，在昏死过去后就把他扔在乡村的小沟里。好心的农民发现了，把他救活，并帮助他逃到延安。

他告诉我说，延大现在比从前小得多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曾是共产党的主要大学，有一千二百名学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已有三千多名毕业生出去帮助组织人民抵抗运动和新的地方政府。后来，新政权扩展到沿海地区，延大的大部分师生又到其他地区去建立新的大学了。例如医学院和艺术学院就转移到了张家口，后来又回到山西北部的山区成为新的华北大学的一部分。

因此，延大再不是从前那种学生来自中国各省的著名的中央一级的大学了。它只是一所地方大学，为地方的需要服务。它的三百五十名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延安边区的农民家庭。他们准备参加政府或各级的组织工作。他们打算去做地方行政官员，审判员，军事指挥员，报纸编辑和中学教师。他们中大多数过去当过小学教师或基层干部。这些人来到延大是为了使理论和他们过去的实践相结合。大学里的所有设备，以及学生吃的穿的，都由边区政府供给。其他额外待遇，如毛巾、牙刷和额外的蔬菜则是学生合作社提供的。

根据教授所述，延大的教育目标是使得学生能够“思想活跃”。在上课前，教授先写出他准备讲的有关主题并推荐有关参考书籍。每一个班级分成许多学习小组，每一小组有一名组长。教授通过这些组长可以了解到学生提出的许多问题。最后全班上课一整天。上午是讲课和提问题；下午由学生们就已经读过的书进行讨论，这种讨论经常持续到夜晚，一整天集中在一个问题上，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时间，“从各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学生一周上五节这样的课，但一位教授只有二节课。他的其他时间花在编写教材上，这些教材是在学生所提问题的基础

上,根据边区的经验编写并由学校油印出来。

延大的学生同他们将去工作的各级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学习法律的学生不但可以出庭,而且允许他们参加立法机关关于制订新法律的讨论。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经常来延大作报告。

学生的事务由学生自己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都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中讨论得最热烈的是婚姻问题。大部分的学生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因而大家很不满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总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双方互不相爱,又尚未完婚,这样的婚姻应予解除。但是如果已经完婚则应“努力维持”。这样,他们通过讨论,形成了远比延大的圈子更为广阔的正常的现代观点。但是同一些不那么勤奋的学校的学生相比,延大学生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大家都同意:在大学期间,他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业上,而不是去谈情说爱。

现在再也不象以前在延安边区办学校那么艰难了。随着解放已扩大到沿海地区以至全中国,他们来到了生产更加发达因而更加进步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延安带来的办法很快就能见效。一九四七年在山东解放区一百五十万儿童很快就能上学。在我访问的陇海铁路北部的几个省里也招收了同样数目的学生。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村子都可以看到读书活动和夜校。每一个这样的大区都有中学,学生人数达到几十万人。他们还以惊人的速度创办大学,课程有森林学,工程学和铁路管理等。

儿童们懂事的程度使人难忘。在齐齐哈尔的一个公园里,我参观了有一万名学生参加的体育大检阅。有一个班的学生——信不信由你——唱了一首欢迎我的歌,而我这个美国客人是头一天晚上刚刚到达的。他们是在凌晨二点钟创作并排练这首歌的。这

些孩子特别为他们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并认为他们有资格涌向检阅台来同我握手。

体育表演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益的。男孩子穿着白衬衣戴着白帽子。女孩子手持大纸花或用红玫瑰装饰起来的棍棒。操练，唱歌，列队前进——全世界的学生们在国庆节日时都会这样做。我特别注意那些人像，歌曲和标语口号，因为它们将表明学校教孩子们信仰什么，敬仰哪种英雄人物。这里没有马克思、列宁或斯大林的画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之下，人们本以为会出现这些画像的。这是国庆节，只有中国人，没有突出外国人。

孙逸仙博士是位伟大的英雄，他的画像在人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和鲜花做成的五角星里闪跃着。他的画像象征着他的名字和他的传统。两个小孩抬着一个用鲜花簇拥着孙逸仙画像的大五角星，并把它放在面向主席台的地方。其他青年带来了一些较小的五角星，把它们放在大五角星的脚下。这些小星上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这表明他们是尊敬孙逸仙的。此外还有非共产党人的画像，但没有蒋介石的画像。

对于蒋介石，这些满洲孩子们这样唱道：

“东洋鬼子来入侵，  
蒋介石把我们卖给了日本兵。  
共产党把人民来组织，  
英雄的东北义勇军！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人们欢呼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救星。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提

到苏联。

他们歌颂了毛泽东：  
“自从来了个毛泽东，  
就有了太阳，  
有了民主，  
有了人民的当家作主。”

从学校的庆祝活动出来以后，我赶忙出城到一个村子去参加了十几项庆祝活动。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已是午夜时分了。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两个代表团都在我的住处等着我，他们要我——不，是坚决要求我在第二天上午到他们的学校去，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第三个代表团是由学校当局组成的，他们告诉我，学生们因我没看完他们所有的体育表演节目而感到失望。学生们要为我再表演一次那些我没能看到的节目。学校当局作出让步，邀请我去看那些得奖小组的特别表演。时间安排在第二天上午七点钟！

我觉得又困又冷，就把皮大衣拉紧一些。我迎着风坐在一张长凳上观看那些身体柔软的孩子穿着短衣短裤所进行的军事操练。小学生们趴在地上带着刺刀“跟踪敌人”的景象使我深受感动。那庄严而又活泼的花舞和藤圈舞，以及在我面前展现的那飘扬着红旗和转动着马达的两艘军舰模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被他们唱的歌曲所打动：

蒋介石，黑心肠，  
双手把东北出卖给小东洋。  
人民决心保卫解放区。

如果有人胆敢来抢粮，  
我们将战斗到底，不是胜利就  
是死亡！”

就在这个地方，我当即认定蒋介石将永远得不到满洲。他也永远征服不了齐齐哈尔的学生！

正规学校仅仅是对人们进行教育的机器的一个部分。每一个单位都有学习小组。在延安的小地毯厂里，在张家口的肥皂厂里，在哈尔滨的大面粉厂里，所有的工人每天都参加学习。学习通常安排在上午上班前一个小时。在部队里每一个连队都有类似的学习小组。在延安和张家口的监狱里，犯人比别人多学习一个小时，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学习中文是件难事。它没有字母，而有着成千上万的方块字，由于方块字又多又复杂，因此过去多少年以来只有少数有钱人才有空闲的时间去学习。书面文字已成了上层阶级的“秘密文字”，从而加深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今天在新中国，“识字”几乎已成了一项全民性的运动。如果你学习三年，就可认得一千或一千五百个字，这样就可以阅读“简易报纸”了，但读书还不行。

一个著名的“识字”运动是由一位住在黄河岸边的名叫任黄华(译音)的农民发起的。十年以前他就感到有必要对乡亲们进行教育。他说服附近的每一个村子派一个人到他家里来上课。这些人每十天才来一次，来的时间在晚上，每次学五个字，然后回到村里去再教别的小组的人。这种连锁方法坚持了十年，任的学生达到一万人，他的这种办学习班的方法超出了一个县的范围。他的进步最快的学生能识五千到六千个字。

一种新的“识字”方法由一位年轻的名叫张玉泽(译音)的战士

发明的。他是从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和失败之后摸索出这种新方法的。他九岁放牛，十二岁开始种地，从没有想到过要识字。参加八路军以后，他的无知使他感到非常难受。一位同志大声读报，他得知敌人向他家乡的老百姓开了枪。他想给家里写信，但他一个字不识，又羞于向别人请教，唯恐他们认为他在想家。不久，他在城门口站岗，有四名商人出示一张通行证，他非常焦急，因为他看不懂通行证上写的究竟是几个人，他担心自己可能把敌特放进城来。于是他跟这四个商人大吵了一场，想要拘留他们。

张参加了连队里组织的学习班。没有课本，教师就自编了一本叫做“一千个难认的字”的小本子。这个小本子非常枯燥无味，大部分学生都退了学。但张坚持学习了两年，把一千个字都记住了，并取得了“优秀”成绩。后来报纸和小册子开始送到部队里来了，但张失望地发现，他看不懂这些出版物，因为他所学的字过于复杂，因而用处不大。

白费了两年时间！大部分人是会因此而泄气的，但张是个有毅力的青年。他创造了自己的学习方法。他从报纸上选出几条新闻，逐字逐字地学习，并向每一个认得这些字的人请教，问他们每个字的意思和发音。很快地就掌握了足够的字汇并对新闻的内容产生了兴趣。他开始给家里写信了，他向每一个会写字的人求教他想用的字。 he 可以从每一封信里学会三十多个生字。

当张感到他已经“站在有文化的门槛上”时，他就着手帮助别人了。他决不再犯他的老师过去所犯的错误。他教的都是人们需要的常用字。他变成了一名在学习方面富有天才的宣传员。他拿出一张新币钞票对养马的老王说：“五十张新币值一千元旧币。”王立刻抱怨说，过去他老是受骗上当，因为他不识钞票上的数字。张就教他学数。



张的热情对整个连队有很大的感染力。他在“没有受过老师的训练”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进步深深打动了旅政委。他深入了解张的办法,并在部队的报纸上加以宣传。

新思想很快地传遍新中国。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受到教育的人可以看定期出版的报纸。刚学文化的人们中间传看“简易报纸”。读报组经常给大家读报。村口的黑板报上登的是“乡村新闻”,人们也在大声地朗读着。当李敦白徒步在山西北部旅行时,他发现即使在最小的村庄里也有它自己的“报纸”。这些小村子里没有大马车,而是用骡子当运输工具,没有电灯或煤油灯,甚至连蜡烛也没有,而是用家里自制的黄麻油和自制的灯芯点灯。这些“报纸”大部分篇幅是有关本地区的消息:什么创生产新纪录的劳动英雄啦!应该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啦等等,也有关于中国内战的消息和国际新闻。

我来到了河南北部的武安县的“口头广播站”。过去城市里有一种大声宣读告示的人,现在是对这种方式的天才运用。在一条街以外的屋顶上,有一个人在大声叫嚷着,人们停下来站在大街上听他说话。我问他究竟在喊什么,人们告诉我,他刚才说:“今天有一位外国女作家到我们的县城来访问我们的军队和政府。”开始我还以为这是在跟我开玩笑,但后来证明那是事实。我的到来也成了“口头广播”的新闻。

这种广播是地方上主动创办起来的。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象这样的广播在其他地区是否也很普遍。但如果没有,这种方法也一定会推广开来。广播工作由村或镇推举一人担任。他从报上或政府各部门选取材料,然后亲自加以编辑。他的大声广播持续十五分钟。只讲要闻。最后请大家听“读报”,那些愿意多了解一些详细情况的人就留下来听。我被这种广播深深吸引,就收集了这种

“大声广播”的一些例子。

这种广播的内容大部分是地方消息。“喂！喂！大家听着！今天，我们村的李顺源（译音）一个人就开了八分地。因此李上了今天的光荣榜。明天大家来超过他！”当时内战正在这个地区的边缘激烈地进行着，广播里是用非常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的：“我们花了八年时间烧好了一锅饭，现在他们却想把我们在苦难日子里烧好的这锅饭端走。”我听到的第一个广播是用这样令人震惊的喊声结束的：“母亲们！啊，母亲们！狼来了！狼来吃你们的孩子了！小伙子们！起来保卫你们自己的家乡吧！”这是反对蒋介石入侵的一次参军运动的号召。

沿街卖唱的盲人也被要求为教育服务。盲人沿街卖唱是一种旧习惯。他们由小男孩领着到处走，并被人雇去在宴会上演唱招待宾客。他们在乐器的伴奏下说书。乐器有三种，有的能同时使用这三种乐器：用手拉胡琴，用膝盖敲打两块竹板，再用一根小棍子敲打小铜铃。

好的卖唱者到处受人欢迎。在延安边区总共有二百个盲人卖唱。从前他们讲的是有关军阀和鬼怪的故事。自从应邀到延安接受了新政权的思想启发以后，他们开始唱那些传播新思想的新故事了。韩起祥是他们当中著名的一个，他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自编自唱。他的最有名的歌曲就是“刘巧儿告状”，这是关于买卖婚姻的故事——在本书后面还会介绍。

由歌、舞剧相结合的一种独特而大众化的宣传方式——“秧歌”被创造出来了。秧歌原来是一种民间歌舞，由农民在田间表演。在抗战期间，秧歌发展成为抗日宣传的工具。过去以挨打取悦于观众的丑角现在被一个日寇或“傀儡”所代替。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要求作家们学习民间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在

此之后，秧歌的艺术价值就被发现了。一九四六年在延安边区有六百个业余和专业的秧歌队，每十二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扭秧歌”。

秧歌是一种十分灵活的形式。音乐通常有一种象狐步舞一样的节奏，同时还有歌唱和舞蹈，有时还有一些戏剧动作。它既可在露天也可在室内演出，在新中国各地很快就流传开来。

在张家口，我的最初见闻之一就是看到一群小孩子在街上扭秧歌。在延安，我在街上或田间常常看到秧歌剧。在每一个节日里，各种业余和专业的剧团都有演出，人们会立刻围拢来观看。大部分村庄都有自己的剧团，剧本也往往是他们自己写的。

秧歌剧、盲人演歌、冬学以及乡村报纸等都只是传播新思想的形式，而通过这些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国家人民的觉醒。

成千上万的年青人组织起学习小组和歌咏队，老人们在冬学和工厂学习班里“识字”。中国人民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是积极地争取教育。这样到最后他们的新生活就可能与旧生活有所不同。

## 妇女的参与

我见到过的最迷人的青年妇女之一是满洲的一位瘦小而有火一般热情的女青年，她曾亲自“清算”过一个名叫“北霸天”的匪首。她身穿民主联军的蓝色冬季制服。她穿的棉衣也遮不住她的瘦弱。看上去她还不到二十岁，可是她说自己已经二十五岁了。她同刚刚同她结婚的一位青年军官一起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外出旅行。她的脸庞明亮而纯洁，使人感到对这样的人应该给予保护，使她不受世界罪恶的侵扰。但是她在胶东组织土改时对这种罪恶已经见得

很多了。

当这位满洲姑娘李伯中(译音)谈到她的工作时,她的双眼闪耀着一种高度的爱国主义光芒。自从多年以前日本入侵满洲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就开始产生了。她解释说,“当时我还在读小学,不能做什么。一九三七年战争扩大到全国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我自愿参加了爱国活动。我在国民党统治区两年内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爱国活动。一九三九年国民党认为煽动爱国有罪开始抓人,我也被逮捕。后来我逃了出来,便直奔解放区。这时候我已经有许多共产党朋友了。”

这样,李就成了满洲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县的政工人员,这位瘦小的姑娘也就这样同北霸天展开了斗争。在日本统治时期,北霸天是一个拥有二万人口的大乡的乡长。

北霸天姓甘,在日本人手下当了十四年汉奸,发了不少财。他发财的手段很典型。当日本人需要四十名劳力时,甘说他们要八十名,这样他就可以从外加的四十名中收取贿赂,再把他们“免”了。当日本人发放配给的棉织品时,他把最好的分给自己的朋友,而把最差的发给农民。就这样,他原来的一百五十英亩土地变成了九百英亩,还有相当数量的牲口和房子。甘雇长工一年到头也不付工钱。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他的院子里跪着一长串佃户,说他们有什么过错,对他们拳打脚踢。日本打了败仗以后,蒋介石在长春的军事代表给了甘一份任命状,叫他组织一支拥有一百名武装人员的队伍,对农村不断进行骚扰。这支队伍有两次同民主联军发生了交火。但是,甘同这支队伍的关系还鲜为人知。

北霸天的情况是这样发现的:他家一个长工听到这个县的南部已经进行土改的消息,便鼓起勇气向东家讨工钱,而不要土地。

甘说,“这样看来,你已经倾向共产党了。我要向国民党报

告。”

长工反驳说：“我要向农会报告。”

甘拔出了毛瑟枪。长工跑了。他向南跑到铁路边向县委报告了北霸天的情况。当时年轻的李正在这里担任组织工作。

“因此，我要求农会派我到这个地区去从事组织工作，并首先把甘抓起来。”李向我说这番话时似乎这是一件例行公事。

一个瘦弱的一巴掌就能打倒的姑娘难道挥挥手就能把一个拥有一百名武装人员队伍的头子逮捕起来吗？

李解释说，“我带了十个人化装成农民，秘密出发了。我们调查了三天，发现他手下真正的土匪只有十个人，其余九十人都是他的长工。我们在拂晓前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十名匪徒抓了起来，并立即召开大会‘同甘进行清算’。这次大会有二千人参加。人们对甘进行了控诉，他也认了罪。大家要求把甘枪毙，我们照办了。”她说话时脸上闪耀着明亮而纯洁的光芒。

在世界各国以及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象李这样彻底冲破过去传统的姑娘是很少的。中国妇女受到的教育只限于持家。她们有“三从”，即：从父、从夫、以及以后从子。她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买卖婚姻。缠足是一种限制活动的手段。妇女的地位愈高，其从小缠足的方法则愈为残酷。有一种“辣椒足”——只有辣椒一样大小——必须把脚趾硬扳到脚面之下并使脚骨断裂才能做到。有这样小脚的新娘是受欢迎的。中国的诗人就喜欢女人的这种小脚走路的样子，并把它比喻为迎风摇曳的莲花。

同其他国家一样，走向广阔生活的最初步骤是同工业生产一起到来的。工业生产使妇女有了一种新的经济地位，但同时也套上了一个新的奴隶枷锁。一九二七年上海的一群纺织女工向我诉说了妇女受压迫的种种方式。她们一个接着一个，说起来没完。“按

照旧习惯，妇女不许走出家门。婚姻是强迫的，婚后生活十分痛苦。在工厂劳动不但要受工头的压迫，而且一天做工十二小时以后，回家还要干家务。”

随着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到来，爆发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在国共联合的北伐军内，穿着制服的“短发姑娘”宣传妇女平等和“自由婚姻”的权利。这种“自由婚姻”的涵义是妇女有权同自己选择的男人结婚，而不再在家庭包办的婚姻中被出卖。她们组织了妇女协会并以在报上刊登通告的方式实行离婚。这种做法使农村中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大为震惊。当地方军阀在蒋介石手下重新掌权时，仅仅因为剪了短发而被杀害的姑娘和妇女就有几千人。

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城市的上层妇女有选择地参加了一些公共活动。她们加入妇女团体和福利组织。我见到过这些组织中的妇女，她们的观点和态度同美国同类组织中的妇女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妇女进行了通常由妇女承担的各种战时工作：为士兵卷绷带、缝衣服、做鞋子，发售义卖券以及其他各种爱国活动。青年积极分子发动农民救援难民，有的甚至到前线去照顾伤员。但由于国民党逐步走向反动，妇女的积极性以及许多妇女组织都受到了压制。

在农村地区，妇女的觉醒比较缓慢。关于“妇女权利”的谈话对农民影响不大。对姑娘们仍然实行买卖婚姻，他们在丈夫家里的处境比奴隶也好不了多少。丈夫的收入统统要交给父母，除非新媳妇得宠，否则她连给孩子买衣服的钱也没有。如果有好几个已经结婚的儿子住在一起，父母往往喜欢其中的一房媳妇，而对其他媳妇则予以虐待。这样就使家庭生活更加痛苦。

中国共产党一贯承认男女平等和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他们

一向鼓励妇女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甚至军队的领导工作。朱德夫人本名康克清，原来是一个厨娘和放牛娃，一九二七年逃出东家的家庭，组织起妇女先锋队。有三千多名妇女参加了这支队伍，她们是用从菜刀到步枪等各种武器武装起来的。一九二八年朱德来到了她们所在的地区，这些妇女参加了他的队伍。在长征途中，由这些妇女组成的两个营打败了川军的一个旅，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朱德夫人在参军时一字不识，后来成为一位大学教师和一位幼儿园的组织者。

当共产党来到延安时，他们发现这里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农村，人们不但对男女平等一无所知，而且充满了各种迷信，其中包括许多关于分娩方面的迷信。妇女要生孩子的时候不能让丈夫知道，说是他会“把孩子吓回去”。因此，她们生孩子时要躲起来，脐带要用牙齿咬断或用一块小瓷片割断，而不能用剪刀，因为铁器是“不吉利”的。这一地区有二千名巫医，他们在“驱鬼”过程中对妇女进行鞭打，用利器乱戳，常常就这样把她们折磨致死。婴儿死亡率也因此很高。

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通过的婚姻法要求“实现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它规定“男女之间的结合必须自愿”，“禁止强迫婚姻和买卖婚姻”。但即使在共产党统治了十二年之后，买卖婚姻在农村仍然相当普遍。

实行新婚姻法的一个有趣结果是新娘的价格比以前便宜了。到我窑洞来同我讨论新社会的一位姓李的劳动模范告诉我，“革命”使他“得到了一个妻子”，“我娶她只花了十二块大洋，以前我从来不敢指望能娶到老婆。”

为什么革命会使娶老婆便宜起来了呢？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显得有些困惑。他的第一个回答是，“她爸爸知道现在我有地

了。”他想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如果妻子不喜欢丈夫，可以离开他，因此人们不想出大价钱。”

农民对新思想的顽固抵抗最后迫使共产党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作法。妇女运动主席蔡畅女士告诉我，“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发家致富’了。我们过于强调妇女的权利使我们站在农民的对立面，这是一个错误。男女之间的冲突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联合斗争。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也是得不到的。”

根据“拯救婴儿”的口号，对妇女进行了如何带好孩子的教育，这样就强调了妇女工作的重要性。在“发家致富”的口号下，妇女们学习纺线织布，为全家添置衣服，这样就提高了妇女在家中的经济地位。在延安边区有十六万名妇女参加了这一运动，占该区成年妇女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打老婆作为一种压迫方式也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反对。如果妇女协会不能劝阻丈夫使其采取人道态度，她们可以召开“斗争会”，并将其迫害行为在本村公布于众。在村口的黑板报上会出现一张通告：“王某打老婆应立即停止，务必做到。”下面是村妇女协会的签字。

一种新型的家庭在解放区开始得到发展。在一个由父母、几房儿子媳妇和众多的孙男女组成的大家庭中，要取得和谐一致是很难的。在西方看来，这不是家庭而是亲戚，而这样的家庭在中国是很普遍的。把它分成西方式的小家庭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这类大家庭往往成为“民主家庭”。他们召开家庭会议，选举家长，并为每一个家庭成员规定工作任务。凡超额完成的产量在分配时五分之四归生产者本人，五分之一作为家庭基金。这些“民主家庭”在农作物和牲畜增产时甚至还订有“三年计划”。



例如陈德发(译音)一家,上有年老的双亲,中间是三个成年的儿子和三房媳妇,下面还有一大堆小孩子。由于“老父亲”经常不在家,因此由“老母亲”当家。她对媳妇不讲平等,造成相互之间积怨甚多。最后,长子德发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说,“咱家产量低、家境穷是因为争吵太多。”他们决定推举德发为家长。首先他把所有必要的家务劳动作了平均分配。由于分配比较公正,每一房媳妇都有相等的时间从事纺线织布等额外活动。这种额外工作得到的报酬五分之四归己。不久家庭就兴旺起来,争吵也大大减少了。就连原先因失去权力而满腹怨言的“老母亲”也为家中的新的繁荣兴旺景象所折服。

在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妇女同男人们一起参加了抗敌斗争。有的在战斗中甚至表现十分活跃。北平师范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刘亚雄(译音),组织了一支妇女“敢死队”,她自己担任政治指导员。现在她已经是晋东南分区政府的领导人。著名的赵妈妈是北平附近一位游击队指挥员的母亲。这位身穿蓝布衫的朴素的老太太竟然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运送武器。李波(译音)笔下的一位不知其名的“中国母亲”把许多抗日标语藏在脏衣服里。她在村里一条小河边一面安静地洗衣服的时候,一面却用浆糊把标语贴在十分显眼的地方。

在胶东半岛离海军基地青岛不远处有一个五虎谷,该地因在抗日战争期间出了五位英雄而得名。其中的两“虎”是十几岁的姑娘,分别叫宝玉和茉莉(意译)。

宝玉的名字叫孙玉敏(译音),因一次在不到一小时内打死了十八个鬼子而获得“步枪女英雄”的称号。当时她只有十八岁。高高地个儿,长得不太好看,笑起来有点害羞,象个小孩。

她说,“我第一次打靶就很走运。起初,我怕摸枪,心想别打

歪了。我十六岁时就在民兵打靶场看小伙子们打靶。他们打得不好，便开玩笑地叫我也试一试。我打中了靶心，也对他们开玩笑地问‘你们小伙子们能打中这个大目标吗？’小伙子们十分激动，问我敢不敢再试一次。”

这位姑娘端起枪，打了三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民兵都鼓起掌来。从此以后，这位姑娘便常常去“练习”，就连扛着锄头下地时也“象扛枪一样”。她想参加民兵，但未被接受。后来她的哥哥被日本人杀害，她“懂得她必须顶替他的位子”。上午他们埋了她的哥哥，下午她就提着哥哥土制的“烧火棍”走向靶场。这一次他们接受了她。她用土制武器撂倒了两个鬼子，领导上便发给她一支骑兵用的步枪作为奖励。

她打死十八个鬼子的那一年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不久。当时十七个中国当地的埋雷队在埋地雷，五百名尖子射手监视着敌人。玉敏是五百人中的一个，躲在一株大树背后的山坡上。

她是这样说的，“在山的底部有一条路，一条小河在路边流过。一辆日本军用卡车开了过来，并在河边停下。日本兵都跑去洗澡了。这些人一定都是新兵，因为他们把枪都留在卡车上了。这样就给了我多次举枪射击的机会。我撂倒了十八个。他们躲在卡车背后朝我还击。当我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时，还剩下三个日本兵，因此我必须快跑。”

玉敏有一个好朋友，年纪比她稍大一点，人称陈茉莉。她在一九四一年加入了村里的妇女协会。但那些为部队缝衣服、纺线之类的任务在她看来是“太简单了”，因此她组织了一支特别的“姑娘队”，准备做更加有活力的工作。

这样一种朴素的思想就包含着一种天才的发现。每当发生紧急情况时，例如敌人对本地进行袭击，收成不好或村中的某一个小

伙子在战斗中被打死，姑娘队便集合起来讨论：“我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是什么？”村子里的男人们出去打仗了，姑娘们决定，“我们的义务是照顾外出民兵的家庭”。她们就帮助男人不在的家庭挑水、洗衣服、砍柴。以后她们又学习射击。

年纪稍大的妇女们反对她们这样做。批评愈来愈厉害了。姑娘们决定，“我们的责任是弥补这一缺陷”。她们决定，执行军事任务的姑娘们必须通过在她们自己家里进行比以前更为艰苦的工作来抵销人们的批评。“上午，我们努力地完成家务劳动；下午，我们学习；晚上我们在路上执行站岗任务。”这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当她们成立“书信小组”代军属向外出的士兵写信时，她们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茉莉说，“那些不会写字的年纪稍大的妇女对于这种服务特别高兴。没有人再来反对我们了。”

茉莉二十岁上结了婚，不到一年就成了战争中的寡妇。她仍然是这支姑娘队的领导人。类似的姑娘队在整個山东半岛蓬勃地发展起来。她们问自己，“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她们都被称为“茉莉姑娘队”。她们似乎认为姑娘们对一切都有责任，这一点过去在中国很少有人这样想过。

在过去的两年中，由于土地改革的实施，妇女的地位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新土地法规定，每一个农村妇女都可以有一份土地，同男子一样。这种经济独立赋予人们一种新的尊严，不仅少数女权运动的先驱者可以得到，各地妇女都可以得到。妇女们通过积极参加土改已经广泛地进入公众生活。她们参加妇女协会，投入大生产运动，进行选举投票并被选入领导机构。

冀中大城县的李老大妈在一天之内组织起三十八名妇女和七十名男子同本地的地主进行“清算”。据报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内邻近的九个县有三万七千名妇女参加了当地的妇女协会，占全部妇女数字的一半。

过去百分之九十的妇女是文盲，现在在相当大的地区内，大约有半数妇女至少能读简易报纸了。妇女出来参加投票的愈来愈多。百分之八十的妇女参加了延安市的投票选举。在周围的农村地区，参加投票的妇女占百分之六十。在河北，乡一级政府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妇女。女县长、女市长以及人民代表大会的女代表都有了。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立法机构。

当然多数妇女是从参加一些本地活动开始的。我在齐齐哈尔遇到一位充满活力的史大妈。她几乎一字不识，但她是市政委员会的成员，而且也是一位教育事业的热心倡导者。她的这种积极性同新人民法庭对她丈夫一件案子的审理有关。她丈夫是个烧砖瓦的人，雇了四个工人。在日本人统治下，他曾经被迫向当地的一个名叫“王二虎”的恶霸无偿地提供了大量砖头。解放以后，人民法庭迫使王二虎把一大笔砖头款子归还了他。

这位烧砖人说，“我对这次公正的判决十分满意，但是这些钱怎么办呢？人家会说发了政府的财。让我们把它用来修建一所学校吧！”这一决定作出后，一个旧商场就被改建成为有四十间校舍的学校了。史大妈非常乐于从事这一活动的组织工作，并从此积极提倡办教育事业。她成为齐齐哈尔市的一位知名人物、一位有力的演说家。

新中国妇女开始出现在国际会议的舞台上了。她们完全是以自己的行动来作出贡献的。我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来说明这一点是再好不过了。当时中国代表团可能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代表团。她们不象我们美国人那样散漫、常常迟到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个人要求；也不象俄国人那样为世

界妇女制订出一套有组织的纲领。她们举止文静谦虚，对于匈牙利女主人在种种困难下提供的住房、伙食以及会议座位毫不计较，在时间或出头露面方面不提任何特殊要求。

不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她们组织得很好。整个代表团至少分成了五个小组。有一二位中国妇女每次参观访问都去，不管是工厂、农村、学校。她们每天集体参加的活动，至少有五个节目。然后晚上她们就对笔记。与此同时，她们的团长蔡畅女士则同来自印度、越南、印尼、以及美国、俄国、英国和法国的妇女们进行交谈。中国代表团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去告诉世界妇女应该做什么，而是为中国而学习一切能够学到的东西。她们学习别国妇女的经验以及匈牙利“新民主主义”的每一个方面。她们带回去的这些方面的知识可能比其他五个代表团的总和还要多。

在最后一天，匈牙利各县举行了五十个群众大会和招待会。中国代表们在好几个场合都出现了。在每一个地方她们都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在一个城市里，各国代表去参观一个工人俱乐部。一些工人在打乒乓。大多数代表只是用赞许的目光表示已经注意到现在匈牙利工人有乒乓打了。而中国代表却说，“我会打乒乓”，拿起球拍就参加了。匈牙利人都鼓起掌来。

另一个县城为欢迎来访者跳起了扎尔达斯舞。大多数代表为这种欢快而活泼的舞蹈鼓掌，而中国姑娘却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认为会跳秧歌舞的人一定能够学会扎尔达斯舞。她很快就跳起扎尔达斯舞来，并同该市的市长一起一直跳到结束。

在匈牙利东部山区，农民暴动四百年来从未间断过，一直延续到最近实行土改时为止。一位中国的妇女代表在农民的群众集会上介绍了中国的土改。匈牙利妇女们涌到台前拥抱这位发言的人，流着眼泪亲了她的双颊。

匈牙利妇女们没有吻美国妇女，也没有吻俄国和法国妇女。说实在话，这些人似乎也不想那些披着头巾的匈牙利农村妇女去吻她们。她们是女政治家，是在高层次为清除东西方障碍而制订计划的人。但不同种族、口音陌生又远在另一个大陆的中国妇女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障碍，她们把话直截了当地说到了匈牙利人民的心里。

## 新司法

早期中国最高法院的老法官陈瑾昆经西山逃往共产党区域时，沿途曾停留下来研究过新的“民主法庭”。他以略带夸大的方式用远比英语同义词更为丰富的三个中文词汇来表达这里的判决：“他们审理案件是基本的、简单的、极妙的！”<sup>①</sup>

延安最高法院审判员马锡五说得更为简单，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朴素的人。他对我说，“我们的法院同国民党法院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实际的法律条文，而主要在于谁掌握司法权以及司法程序和精神。我们设法使法律接近人民并方便人民。”大家都认为马审判员已经这样做了。

从外表上看，马审判员是到我延安窑洞里来过的衣着最差的官员。他穿一套深蓝色棉布制服，但布料没有染好，已经褪成一条一条地暗灰色。一顶深灰色的帽子没有戴正，下面是一副很大的牛角眼镜。一双暖和的白毛线袜从满是灰尘的棉鞋里松松垮垮地露了出来。这种袜子是对上了六十岁年纪的人的一种照顾。

他为人随和，就象他的老棉鞋一样。但我很少见过一张象马

---

<sup>①</sup> 这是译文，原话不详。——译者注

审判员那样交织着智慧、幽默和权威的脸。我同他一起爬山奔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位于七百英尺的高地上，同监狱隔着一道深谷。爬山时我追不上他。他几乎天天爬山，还多次去农村访问。他在本地区除已建立起二十九个县级法院以外还组织了一个巡回法庭作为最高法院的一个部门，到处奔走，为人民提供方便。由于他作出过关于婚姻的判决，并对因“受强烈压迫”而杀害丈夫的妻子实行过宽大处理，马审判员已经是盲人卖唱和民间戏曲中的传奇人物。

几千年来，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是为地主和官僚服务的。众所周知，普通老百姓总是象躲避瘟疫一样回避法庭，除非他有足够的钱来买通法官。我选了几个过去法院滥用职权进行判决的案子，这些案子直到土改以后才真相大白。

山西有一个地主把粮食借给一个农民。由于高利贷的利滚利，农民已陷入无法还债的绝望地步。这个地主强要了两英亩土地作为抵偿，由于这个农民是文盲，土地的地界又没有清楚地标明，这个地主便叫自己的佣人把农民的全部四英亩土地都耕了，最后完全吞并下来。当农民向法院起诉时，地方法官却支持地主。

在山东，发生了一件地主的猪咬死农民养的一只鸡的事情。这个农民打死了这口到处乱跑的猪并不知道它是谁家养的。于是地主便夺走了农民的半英亩土地作为罚款，使他成为无地可种的人。

在山东有一个姓齐的地主买了一个农民的十一岁女儿作丫头。当她长到十五岁时，他强奸了她。等她怀孕以后竟将她赶出家门。她的父亲去法院告发，齐反而串通地方法官捏造一个罪名说这个农民贩卖鸦片。这种案子从技术上说是要判死罪的。地主贩卖鸦片从来不受惩罚，而这位当父亲的农民却被处死了。女儿也在绝望中上吊死了。在每一个省都有许多类似的案件。

有时甚至整个村子打官司也敌不过一个地主。山东的一个村

子有一口甜水井,为了这口井,双方斗了二十五年。这口井位于乡间的一条街道上原来属于公共所有。一个地主看中了它,买下了街道两旁的土地,然后把井圈起来并派出武装人员把守。在二十五年之内,村民们在省里不同长官的统治之下曾经三次出钱打官司,弄得他们倾家荡产,结果每一次都是地主由于花钱收买赢得了诉讼。直到一九四六年土改之后,村民们才收回这口水井,同时还没收了地主的一半土地,作为对他非法独占村民水井二十五年的罚款。

今天在新中国,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从县政府建筑物的标语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标语上写着:“为人民服务”。

根据马审判员的说法,这一变化还表现在以下方面:审判员的选举;诉讼程序的大大简化;运用调解方法从而免缴诉讼费用;有关土地和债务性质的判决;对妇女杀害丈夫案件的宽大处理以及审判战争罪犯的人民法庭等。他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诉讼程序花钱很多,而且过于复杂,而我们则很简单。我们设法做到打官司不花什么钱。”

使群众打官司既省钱又方便的最新方法,就是运用调解作为诉诸法院的代替手段。调解可以通过村民会议,也可由某一位调解人进行。马审判员就常常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过去农民往往自发地依靠当地的仲裁来解决问题,但法律从来不予承认。马审判员把仲裁的方法加以发展,并使之同整个法院制度结合起来。他认为这样可以对人民进行法律教育。

他说,“刑事案件不能调解。调解只适用于民事纠纷,例如打架、土地纠纷和婚姻问题等。调解以三项原则为基础:必须双方自愿;调解结果必须符合当地习俗和政府法律;如有一方不同意仍可向法院提出上诉。”



有一家人家为绥德附近的一块坟地发生纠纷。侄儿同他的叔父发生争吵，说叔父安放他儿子坟墓的地方“破坏了我的土地的风水”，要求把坟地迁移。这位叔父向当地的一位姓郭的调解员提出申诉。调解员同村里年长的人谈话，得知这个侄儿无非是想气气他的叔父，但已走得太远，要想不失面子地转过弯来很不容易。郭就把双方叫到一起，解释说坟地的位置不会影响“风水”，使侄儿撤回了他的要求。

郭处理的案件中还有一件是有关“懒婆娘”的事情。这个女人因“不照顾公婆叔伯”而受到控告。这家人家的公婆和已结婚的叔伯都住在一起，由于这个女人没有担负起她应做的家务而产生龃龉。一天，丈夫为兄弟挑水，妻子骂了他，说他不该做，小叔子跑出来打了她一记耳光。于是这个女人就在全村到处说这个“残暴的小叔”的坏话。后来郭被请来调解，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开一次村民大会来解决。大会决定双方都需要给一点小小的惩罚：命令小叔修一小段村里的路。对妻子则帮助她制订一个生产计划，要求她在三月份之前纺出五磅毛线。

除了这些好笑的家庭纠纷之外，稍微严肃一些的案件还有地界纠纷。由于土地易手的方式很多，经过几代人传下来的土地通常没有准确的丈量，因而地界纠纷显得十分复杂。当这类案件提交新中国的县级法院审理时，他们一般拿到村民大会上解决。理由是“村里对于这些土地情况的了解远比法院为多”。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桩两个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双方都姓牛，他们拥有的土地是从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在清朝的时候，有三个兄弟分得父亲的土地，一个人一个山头，但没有划清地界。经过几代下来，三兄弟中的一家发展成为二十户人家，而另外两兄弟的后代人口

却没有很大增加。最后在一九四三年大生产运动中，二十户迫切要求土地的人家中有一个名叫牛广(译音)的牵头组织这二十户人家用二十头牛耕了牛阳(译音)的山地。他们宣称，“牛阳根本无力耕种这些土地。”

牛阳是这块山地的所有人。他可能无力耕种，但绝不肯放弃，于是诉诸法院。审判员把这一案件交回村里仲裁。一次村民大会作出决议：为了粮食生产的利益，牛广可以向这位亲戚无偿“借用”十八英亩土地，为期五年。所有的人包括对立双方对此都表同意。五年到期之前，一场具有革命性的土改实行了，土地的分配也更加平均了。在过渡期间，村里作出的调解保持了粮食生产的增长并把矛盾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

实践证明，村民调解制度是很受欢迎的。在延安县，一年之内通过调解解决的案子就有一千九百件。在阜县(译音)也解决了一千一百件。这种方法已经扩大到新中国的其他地区。人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这是为填平多年来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而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

县法院处理的较严肃的案件中，民事案件主要有债务、婚姻和离婚等。马审判员肚子里有说不完的关于婚姻的案件，这些令人好笑的案件大都由于旧的婚姻习俗同新婚姻法的冲突而引起。法律禁止强迫婚姻和买卖婚姻，只承认双方自愿的婚姻。但是在农村地区买卖婚姻甚至抢婚仍普遍存在。

马审判员笑着解释说，“除非有一方提出异议，我们对这种婚姻不能进行干涉。如果双方同意，法院又如何能够在购买一位新娘和交换结婚彩礼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界限呢？而彩礼在各国都是合法的。如果有人提出异议，我们就分别向双方了解是否出于

自愿，只要有一方反对，我们就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

法院还收到了一些非常复杂的买卖新娘的案件。许多狡猾的农民已经把年纪很小留待以后过门的女儿卖出去了，现在却想运用“现代法律”来取消这项买卖，目的是想把目前已经长大的女儿卖一个更高的价钱。这种破坏法律的企图由于它们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而暴露出来。马审判员同我讲了整整一个下午有关这一方面的故事，我只想提其中最简单的几件事。

有一位父亲把他八岁的女儿卖给一个姓马的农民作媳妇（中国话把“新娘”称作“媳妇”因为这种关系很重要）。马付了八块大洋外加一百磅小米作为彩礼。当时考虑这个女孩年纪太小并没有过门。后来，这个父亲搬了家，过了黄河到另外一个省里去了。在那里，他又把已经十一岁的女儿卖给一个寡妇的儿子，交换条件是让那个寡妇本人作他自己的新的妻子。在女儿成亲之前，他家又搬回到延安边区。那个姓马的农民认为他早就买下了这个女孩，因而在半路上就把她抢走了。于是这个女孩的父亲上诉到法院。当证实这个女孩并不愿意跟马，也不愿意留在马家之后，马就以“强迫婚姻”罪被判监禁。

马审判员处理的一桩最有名的婚姻案件，已经编成“刘巧儿告状”的故事，由一位著名的盲人卖唱者配上曲子，在华北各地盲人中到处传唱并成为“买卖婚姻”的传统剧目。

刘是一个农民的独养女，刚出世就同一个贫农的儿子订了亲。长大以后，她成了一位俊俏的姑娘，显然很值钱。父亲对刘说，她的未婚夫不但长得丑，而且还是个驼背，要女儿同他解除婚约。刘同意了。接着父亲又对男孩的父亲说，“我的女儿吃得多，又要穿好衣服，又懒”，男方的父亲也被说服了。于是，婚约废除了。后来，父亲又把刘再一次卖给了一个抽鸦片的地主，“已经是一个四十多

岁的老人了。”(盲人演唱的曲子中有许多说法反映了农村的各种价值标准)。

在亲事订成、钱款付清之后，一次刘在地里走过，遇到一个“又老、又瘦、又丑”的男人，企图对她动手动脚。她进行了反抗。这个男人说，“我是你丈夫”。刘回家后大哭了一场。几天之后，她送水到地里的一个变工队去，队长是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又是一位劳动英雄，她被他吸引了。一个朋友不怀好意地告诉她：“他就是你抛弃的那个男人啊！”

不久，这对青年男女双双私奔了。这位父亲和那个地主丈夫非常生气，告到县法院。县法院根据传统作法判决“女孩归地主买方所有”。但是刘已经爱上那个小伙子，便积极上诉到最高法院。我们的好朋友马锡五撤销了县级法院的判决，竟准许他俩结婚！

当然盲人的说唱明显地带有浪漫色彩。但其依据却是一桩真实的案件。当“刘巧儿告状”在各个村子说唱时，许多农村妇女都哭了。她们非常喜欢这个唱本。观众们往往当场就讨论起“买卖婚姻”和“自由婚姻”来。当然这也就是盲人说唱者想达到的目的。

刑事案件首先由县法院处理，如案情严重，则须上报最高法院处理。据马审判员说，犯罪正在逐步减少。判处死刑必须经过三个步骤：必须由县法院提出；最高法院作出决定；然后由政府主席即省长批准。一般的杀人案件不判死刑，必须是犯有连同其他罪行的谋杀案才判死刑。在当年延安边区判决的六起死刑案件中，有二起是通奸杀人，三起是抢劫杀人，最后一一起是国民党特务在被捕前杀害了好几个人。

监狱被看作是受教育和进行生产劳动的地方。我参观的两个监狱同旧中国监狱里犯人因不卫生、拷打和饥饿而死亡的可怕景象完全不同。延安监狱位于设在高于延河六百英尺的一个山谷里，

靠近最高法院。犯人们居住的窑洞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窑洞位于陡壁悬崖之间的狭窄裂口处，入口的地方装上了一道门。我看到几个杀死丈夫的妇女坐在窑洞外面，一边晒太阳，一边纺纱。在一个拥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一共只关了一百二十四名犯人。这些犯人中包括十八名杀人犯，五十四名小偷和土匪，十五名殴斗犯，十名犯有“破坏婚姻”即绑架妻子罪。他们每天二小时学习，八小时进行生产劳动。为此目的，在山谷里办起了一座小纺织厂。这里是关押罪行较重犯人的区级监狱，刑期都在一年以上。罪行较轻的犯人则留在县里监督劳动，修路或干农活。

张家口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区的首府。监狱就在城外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我走进去的时候，犯人们和看守正在院子里面打乒乓。我问“小山东”在哪里。“小山东”是一个出了名的囚犯。他们说，他“到城里去买工具去了”。真奇怪，囚犯居然也“不在家”。有三分之二的犯人刚来时不识字，现在都能认字了。他们在一间光线明亮的房子里缝制鞋子和衣服。他们接受技术教育、“时事教育”和“个别教育”。所谓“个别教育”，就是让犯人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

“小山东”这个犯人我后来见了一面，他是犯人建筑队的队长。这个拥有六十人的建筑队在监狱的大墙之外做工，只有一个武装看守，在张家口的建设中起了光荣的作用。他之所被称作“小山东”是因为他来自山东省，十二岁就当上了扒手。他在华北各地偷了十年，最后在张家口落网。并被判刑一年。经过四个月的教育之后，他要求“坦白”。他说，“在旧社会，我有时也想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但是，没有出路。当苦力吃不饱肚子，干别的又没有文化。但是在这里，你们对我进行教育，干得好还给我奖赏。如果我现在还不老实，我将终身蒙受耻辱。”现在“小山东”已成为新社会在法制方

面进行宣传的一个范例。

在延安的监狱里，有七名妇女犯有通奸及谋杀丈夫的罪行。但她们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只判了七年刑。为什么对谋杀丈夫的妇女给予特别的宽大？马审判员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她们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一名姓魏的妇女同一个延安的商人相好。他们俩人给她的丈夫下了毒药，把他毒死了。他们只判了八年监禁。审判员说，这是因为“丈夫对妻子的压迫很深，她多次想离婚，但是丈夫采用暴力手段不让离婚。”

如果说新中国的法庭对于谋杀丈夫的案件比较宽大的话，那么对于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则比旧法庭严厉得多。判死刑需要同时得到县级法院、最高法院和省长批准的规定对于主要的战犯不适用。战犯可以受到人民法庭，即在当地官员以及特选代表主持下召开的群众大会的审判。他们可能当场被处决。这类判决只限于罪大恶极的案件。

晋西八路军的张上校向我讲述了一个这种处决的事例。当八路军攻克军阀阎锡山的一个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隰县的时候，来自各村的几千名妇女涌进城，要求把原来的行政长官“交给人民”。这个人曾经活埋过许多农民，罪名是逃避当兵、不缴公粮、帮助八路军。根据他的命令刚刚被活埋不久的六具男人的尸体被挖出来放在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他就站在旁边。然后由群众进行控诉。一位缠足的老太太踉踉跄跄地走上台来哭着说，“你活埋了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因为他没有缴粮食，一个是因为他曾经给八路军带路。还我儿子！如果你还不出，把你的命还来！”她脱下自己的鞋对着这个长官的脸打去。其他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控诉。最后，人们把他拉下台来，把他打死了。

在河北省的一个县城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人民处决”。那里的县长充当日本人的傀儡，曾经把三千名当地的群众交到侵略者的手里处死。从周围各村来了几千人作证。人民法庭的主席最后问道，“对这个人应当怎么办？”农民们纷纷把带来的长刀抽出来，准备按处置罪大恶极的犯人的古老习俗，把他砍成碎片。有三名妇女也带了刀来，她们代表村里一位卧病在床的年老的母亲。这位母亲对她们说，“这个恶鬼把我的两个儿子拷打致死，剮他一块肉带回来给我。”但是，共产党员们跳上台来宣布，不允许用这种方式进行处决，“因为现在的国家是一个有秩序的、文明的国家。”他们建议改用枪毙的办法，当场处决。

这种处决的方法在安定而守法的国家看来会认为是一种暴徒的行动，而在共产党看来却是一种唤醒民众的手段，使这些遭受过极不公正对待的人认识到，人民自己才是正义的最后泉源，人民是有权力的。

我有点犹豫地问马审判员，是否曾有人向他或他认识的人行贿。他并没有认为我冒犯了他。他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没有碰到过。但是我知道这里发生过一起有人企图行贿。一名犯人逃跑了。十天之后他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人把他认出来了。他提出只要这个人同意不报告，他表示愿意给他法币七万元（当时约值三十五美元）。这个人考虑自己一个人无力对他进行逮捕，便假装同他讨价还价。两人在一家餐馆碰头时，犯人把钱拿了出来。这个男人叫喊捉人，人们抓住了他，把他送回监狱。”

这就是马审判员记得的唯一的一件近似行贿的案件。我研究了他坦然的面部表情，感觉到他说的是实情。几百年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就以最诚实的人民之一闻名于世，虽然他们的官僚制度是最腐败的制度之一。由于法院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它们也变得

诚实起来了。

马审判员在延安发展起来的各种审理案件的方式，后来甚至在大城市也推广运用了。人民解放军拿下天津一个月以后，新的民政局报告说，一九四九年二月，民政局处理的八百八十九件案件中，有五百二十六件是调解解决的。另有二百二十五件挂着，只有一百一十八件诉诸法院。甚至例如象小偷这样的小刑事案件也可以调解。某些困难也注意到了。一些仲裁人倾向于把他们的建议当作法庭的判决，要求强制执行，其实这些建议并不是判决。有些县法院的审判人员对于在法庭考虑某些案件之前就进行仲裁感到非常恼火。有些人为了创记录处理案件而过于草率。这些缺点已经注意到，并已作出努力加以改正。

以古老的中国农民传统为基础的审理案件的方法又快又省钱，这对于世界法学的发展，似将是一种贡献，



## 六、军事战略

### 从农民中诞生的军队

二十年来外国军事专家们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胜利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一再被“歼灭”，但总是东山再起，而且比过去更为强大。有人指责这是由于有某些神秘的俄国的援助，但又找不到这种援助的证据。于是专家们就归咎于蒋军的腐败无能。日军是有效率的，但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却迅速扩大了。

这些胜利之所以能够获得是由于这支军队是从农民之中诞生的，而共产党则起了一个有经验的助产士的作用。他们自觉而明智地动员中国人民，并发挥其潜力，从而赢得胜利。这支军队是以特有的相互关联的三种力量为基础的：有组织的非武装农民、地方民兵和在干练的、具有现实主义战略的将军们严格训练下的正规“人民军队”。关于这种技术的全部细节使亚洲其他各国战斗中的人民深感兴趣。

在延安附近的碎崖村，我看到了农民们如何准备对付即将入侵的蒋介石军队的情景。妇女们平静地坐在户

外阳光下，为部队做鞋，用自己种的麻线纳鞋底。男人们已提前交了公粮，“因为我们的军队需要粮食，我们也需要坚壁清野。”他们把其余的粮食已经埋藏起来。

我问他们粮食埋在哪里。他们望了我一会儿却没有回答。当地陪同人员向他们保证我是“一个朋友，不会说出去。”他们的脸上才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并不是我们不信任你，”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人说，“就在我们相互之间也不说。每户人家在不同的夜晚，各埋各的粮食。如果有人被抓去并遭受严刑拷打，他知道的也不多。”他接着说，有一个埋藏地点可以看一看。那个地方最近，距离我只有二十英尺，就在住家和打谷场之间。根据他的指点，我察觉到在一块收过庄稼的田里，有一圈高低不平的地方。但是后来我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说，“这个埋藏点大家都知道。这里的粮食将先吃，是为本村民兵准备的。各家撤离后这些民兵将留下来打仗。”

这个村庄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在埋藏粮食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还没有到来的十二年之前，因为他们进行过一些反抗，当地军阀曾向他们进攻。

他们说，“我们埋藏了粮食，逃进了深山。有些婴儿冻死了。敌人砸烂了门框和所有的木制家具，但并没有找到粮食。这样我们回村后才能再种田，活了下来。”

“你们埋藏了多少时间？”

“一年半。这次时间不会那么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了一支正规军队了。”

这些非武装农民准备在敌人入侵中保存自己。他们如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农民一样，遭受敌人入侵已有几千年之久。这次时间不会那么长，条件也不会那么艰苦。他们有了新的信心和一些新

的方法。延大学生在部队的指挥下，在各个村庄巡回，帮助群众总结经验和方法。这次他们连桌面和门框也埋了起来，把井也填没了。这回他们并不仅仅是逃避。当年老而手无寸铁的男人带着妇女儿童转移到安全地带时，参加村里民兵队伍的男青年却藏在自家附近，协同正规的“人民军队”对敌人进行骚扰。

碎崖村的民兵没有步枪，连自制的鸟枪也没有，只有长矛。他们指望的是从侵略者手中缴获枪支。他们知道全华北的农民都这样干了，他们为什么不呢？他们士气高昂。年纪较大的人们抱着对和平的一线希望忿忿不平地对我说，“美国为什么连续不断地运送飞机、大炮来反对我们？”年青的民兵则兴奋地注视着他们期待的蒋介石伞兵的到来。每一个人都知道缴获一顶降落伞可以做好多件结实的绸衬衫。部队的宣传部门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他们，并已向他们保证，谁俘虏到伞兵，降落伞的绸布就归谁所有。

民兵是一支地方的战斗部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自筹粮食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纳税人简直无需负担。他们是人民政府的武装。早期民兵队员须由农会批准，以后由乡、县政府接受，并承认其有权持有武器。民兵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土匪、地主和企图再起的小军阀，保卫农村地区，但进行大规模战争则不够强大。如果家乡被敌人侵占，他们则可使该地区变成入侵者啃不动的“硬骨头”。后来民兵由正规军直接指导，在特殊情况下他们可以提供巨大的支援。这一点下面还要进一步阐述。

在山东可以看到民兵是如何从农民中诞生的。

冀常胜是一位山东民兵。他还是一个孩子，长着一对天真无邪的眼睛，头上戴着一顶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缴获的毡帽，武装带上挎着一支毛瑟枪。他参加抗日战争时才十七岁，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

他解释说，“过去我们村受苦很深。十英里以外有日军的一个据点。在他们附近有一些部队自称为国民党，我们村的另一面则是赵宝炎的伪军，另外还有普通的土匪。所有这些人都曾到我们村里来抢劫过。一九四一年我父亲组织了二十个人，用土制鸟枪（被称为打火棍）武装起来。这种枪从枪管往里装子弹，装一次打一发。有些土匪前来侵扰，当全村看到我们的抵抗决心时，立刻有五十名乡亲前来支援。我们把从两面来的土匪都抓住了，一个也没能逃脱。”

后来这些农民了解到，在附近的一个县里有一支军队叫八路军，他们愿意帮助训练农民中的民兵。冀说，“我们想接受训练，但我们不敢去，怕他们会象其他军队一样拉我们去当兵。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特别小心。我们只派几个人去了六天（当时一个训练周期是六天），盘算着只有这些人回来之后其他人才能去。后来他们平安地回来了，我们才再派别人去。这次训练持续了两个星期，后来又延长到一个月。人们开始相信八路军了。八路军给了我们一些手榴弹并教我们如何在小规模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枪支。在一年时间里，我们组织了一个县的民兵。农民们还专门划出一块地，用这块地的收成购买武器。

“你们到哪里去买武器呢？”

“从伪军那里买。他们为日本人打仗，但也经常出售日本人的武器。”（后来证明蒋军也同样如此。）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支农民民兵的力量日益壮大。在头两年里，他们只能保卫本村不受征粮队的骚扰。到第三年，他们就开始潜入敌人据点，在城门口埋起地雷来了。城里伪军士气低落，不再到乡下来扫荡了。他们把自己关在城里不出来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买粮食吃。常胜说，“我们迫使他们用武器代付粮款”。由于城

里粮食愈来愈少，伪军家属开始回到乡下的家里，很快，这些人也加入了地方民兵。常胜说，“他们很有用，我们想进入敌人的碉堡，他们可以为我们的指路。”

农村里出现了富有创造发明的天才人物。一位年纪较大的民兵俞华虎(译音)因能设计各种地雷而被称为“铁瓜王”。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乡下人，三十开外，头戴一顶破毡帽。他的嘴不大，曾被子弹打穿过，因为当时缝合技术不好，缝得皱巴巴的。他满口金牙，说起话来，金牙闪闪发光。这些金牙是乡亲们因他那次负伤而送给他的荣誉。

俞开始时用捕鼠器作试验。寻找让地雷爆炸的方法。后来他参加了民兵，有了“引爆”的炸药。山东民兵使用的地雷有四十一一种，其中俞发明的就有十九种。他发明的最厉害的是一种七个地雷连在一起的“连环雷”。只要第一个人碰上，其他地雷也同时爆炸。有一次俞在一个晚上用十八个地雷炸死了四十个日本人。他还走遍山东北部各地，教农民布雷。

但是这位铁瓜王却有着一颗农民的心。他顽强坚持救人而不是杀人。他捉到了一个想暗害他的国民党特务，把他留在自己家里，同他谈了三个晚上。最后这个人承认他是被派来刺杀当地的农民领袖的。俞是第一个。农民们甚至八路军都要求把这个特务处死，而俞却不同意。

他后来解释说，“经过三个晚上的谈话，我对他进行了改造。现在这个人已经参加农会了。”

山东民兵成立的第四年，他们开始攻占小城镇。这样就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派出正规军来增援当地的伪军。这些城镇易手多次。面对这支从中国农民中诞生的不断更新的地方武装力量，日军要固守全部城镇深感兵员不足。

这就是山东的民兵。在山东省靠近烟台的一座山上，树立着一块未获蒋介石资助的巨大的民族纪念碑。碑上刻着在抗日战争中被杀害的当地爱国者三万人的名字，其中一半是正规的八路军，一半是当地民兵。

抗日战争结束时冀常胜已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手下有二千五百名民兵。“常胜”的名字并不是他一生下来就有的，而是在一次庆祝抗日胜利、颁发奖章和授与荣誉称号的民兵大会上获得的。目前，在海阳县，这支民兵共有六千人。他们向县政府提供修桥补路的劳力。他们认为战争已经过去，他们期待的是和平。

山东农民原来并没有过问蒋介石或共产党的事。他们打日本是为了求生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他们的军队，曾帮助他们训练并给过他们武器。蒋则是他们准备接受的遥远的全国领袖。但当蒋把在山东农村进行烧杀抢掠活埋农民的汉奸赵将军任命为“进攻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代表时，山东农民便懂得了应该站在哪一边了。他们不想承认“赵二鬼子”，而且也无此必要。他们已经以自己民兵的力量对他进行过打击。当蒋大举进攻时，县民兵有三分之一自愿报名参加八路军。

一九四七年春，来自上海的编辑维克·施尼尔逊偕电影放映员骑自行车旅行，从烟台出发在山东各地农村放映电影。他发现放映厅里挤满了民兵。他们都有很好的步枪。正规的八路军从反击蒋军的入侵中缴获了大量美国武器，因而便把日本武器给了民兵。

维克对我说，“当时手榴弹和地雷简直是满地滚。并不是他们想制造麻烦。他们仅仅是以公民有权携带武器为自豪。”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因为自古以来人们总是把舞刀弄枪的人视为社会渣滓。

没有武装的农民为了生存的需要，因而组织了民兵，并由民兵产生了正规军。正规军的新兵大部分靠民兵补充，而民兵的武器、训练及全面战略则靠正规军提供。正规军不受地方管辖，受过良好训练并有高度的灵活性。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几乎是在不停地战斗的二十年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这支军队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一九二八年由毛泽东和朱德在湘南组织起来的第一支有三千人的军队称之为中国红军；它在高峰时曾达三十万人，但在长征结束时又下降为四万人。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军队加入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并被称为八路军；开始在长江下游活动的第二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被蒋命名为新四军。这两支军队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蒋的控制，在日本人投降时已达到一百二十万人。另一支在满洲迅速发展的武装力量叫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六年初，按“马歇尔停战协定”的“军队整编方案”，大约有四十万人复员。一九四六年夏，蒋发动全面内战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于吸收新兵而迅速扩大，并改组为人民解放军。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多少新兵就有多少新兵，从没有发生过困难。一九三八年，朱德总司令在他的野战军司令部告诉我，自愿参军的人比他能接受的人数要“多一倍”。受限制的因素主要是武器和粮食。他们让没有武器的人先去参加当地民兵，接受训练，以便日后入伍。一九四六年当内战全面爆发最终必须动员参军时，他们采用的办法是与旧式军队大不相同。

在蒋的中国，抓壮丁是臭名昭著的。在执行按人口制订的征兵法时，有钱人家的孩子要免征只须付一笔钱给负责征兵的官员就可以找一个替身。这笔钱按理应付给替身的家庭，实际上却被当官的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一些穷人则被抓来填补空缺。人们常

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许多壮丁用绳子拴起来排成长队，象奴隶一样送往军队。

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战士都以他们是志愿参军而自豪。如果说有压力的话，有时是一种社会压力。在开大会时，有人发言说，“我们的军队需要补充，我们希望本县有多少人能参军。”共产党员和政府干部都会首先把孩子送去参军。民兵也都会自愿报名，因为他们认为参加正规军是一种提升。大会还常常由于某些自愿参军的人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而被拒绝接受。人们注视着自已邻居中那些没有上述理由的男人们，并认为他们应该去参军。

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来的，一旦名单公布，乡亲们都给予“自愿参军”的光荣称号并向他们祝贺。欢送时象过节一般，参军的人骑着马，戴上大红花。在看木偶戏及秧歌演出时，他们被安排在特别的座位上。对他们的家庭还赠送礼物。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祝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县招募新兵的任务往往总是超额完成的。

负责陇海路以北一个广阔区域里作战行动的梁中(译音)将军说，“我们要求在武安县招一千五百人，却来了二千五百人。我们在高平县只要一千五百人，却招了三千人。看到兵员增加，我们便停止了几个县刚刚开始招兵工作。我们不能把人们刚刚开完庆祝会送来的新兵再送回村里，那样他们在家乡会丢面子的。”

在这一地区的招兵运动是从内战可能持续十年至十五年来考虑的。他们只在七分之一的县进行征兵。“因为战争可能延长，而我们又不会希望在同一个县征第二次兵。”

我问：“那么你们选哪些县呢？”

“第一批是敌人进攻路线两旁的县。在那里劳动力已经转移并



正准备打仗。而位于后方的县则需要劳动力进行生产。”

这种保守的招兵方法“使自愿参军的人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需要。”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把能招到的人统统招进来？”

接着，梁将军透露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原来这一地区正规军的规模是以本地区能够无限期维持给养的能力为限度的。“我们保卫本地区的任务可能要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既要维持我们的正规军，又不能损害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便规定了一个正规军不超过三十万到四十万人的数字。如果蒋实行武装进攻，我们靠这支军队来保卫所有的城市是不够的。蒋不久前刚刚夺去了二十五座县城。我们可以把军队搞得大一点，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地提供给养。因此我们选择把军队的规模确定在既能保卫我们的基本农业生产，最后又能夺回我们的城市。”

在战时，军队要按稳定维持给养的能力来确定规模，这样的政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过。

新兵一入伍就教育他们军队必须“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对中国农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革命的起点。

延安的宣传部长陆定一说，“人民军同封建军队主要有两个原则上的区别。首先，人民军队必须为人民服务；封建军队则是为某一个军阀服务，并向人民发号施令。人民军队从不为某个军阀或集团打仗，而是在各个方面为人民的利益而战。它是人民的武装力量。

“其次，军官必须为士兵服务。在封建军队里，士兵是长官的奴仆，靠打骂来维持纪律。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当然在战斗中士兵必须服从命令。军官说，“死守在这里”，士兵就得照办。正由于在战时军官有这样的权力，所以不打仗时，他就更需要讲民

主。在这个时候，士兵的错误不应靠军官的斥责，而应通过战友们的讨论来加以纠正。他们也可以批评军官的错误。”

这些原则并不是宣传上的陈词滥调，而是付诸实践并成为夺取胜利的有效武器。它们是如何贯彻实行的呢？

对新兵进行的第一个教育是：当部队行军路过农村时必须要有良好行为。“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编成了歌曲，以便让人们记得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特别还有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支名叫“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的歌让大家反复唱，直到做到为止。这种对待人民的态度同旧式军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旧军队从老百姓那里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有人反抗伸手就打。

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如果抵达一个村子被一个儿童团的岗哨拦住，他们就会停下来出示路条。那些从蒋管区新到解放区来的人们莫不为此感到惊奇，因为蒋管区军队一向横冲直撞，从不把老百姓定的规则放在眼里。一位逃出蒋的监狱来到“山东解放区”的民盟成员告诉我，当他在烟台看到两名战士离开队列帮助一位提着篮子的老年妇女爬山时，他是多么感动。

这种习惯的形成靠的并不是军官的命令，而是靠友好的讨论，有时往往靠唱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唱歌的军队。李敦白向我讲述了他在山西山区遇到过的那支唱着歌的队伍。

排长唱：“谁养的鸡比别人多？刘万义养的鸡多。”

于是大家跟着唱道：“刘万义养的鸡多。大家学习刘万义。”由于刘本人就走在行军队伍之中，因此可以想象他养鸡的劲头会更大。

当队伍翻过一座山头向山下走去时，又继续响起了歌声：“谁

过去是二流子，现在学习当先进了？”下面又举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在行军过程中还穿插了一些相互开玩笑的歌曲。

当部队向北平进军时，每一个连队的士兵都展开了这样的讨论：“谁才有资格进入我们的古都、伟大的北平？”战士们自己就不要那些过去曾违犯过纪律这次可能给军队的崇高荣誉抹黑的人。他们提出的标准在任何其他军队看来都会认为过分拘泥于小节了。

一个饿着肚子的士兵在傍晚攻入一座城市时，在一个没有人管的食品架上随手拿了一个冷馒头。立刻后面就有一个人叫着提醒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前面的战士很快就把馒头放回原处。

另外一位战士从农民地里拿了一把花生没有付钱。当晚政治指导员说，“难道为一把花生我们就把名誉卖了？偷一把花生就会传遍全村，就会把我们军队由于多年来纪律严明所获得的好名声败坏。在人民面前你是什么也隐瞒不住的。”

有一个班住在北平一个贫穷地区的一间房间里，晚上宁可摸黑也不肯开电灯，因为老百姓付不起电费。美国读者似乎会认为“小题大作”，如果他这样想的话，就应该请他在亚洲贫困的背景下看这个问题。不久以前蒋介石的士兵也在这里住过，这个院子里的穷苦老百姓是卖掉衣服为他们付电费的！

军队为人民服务的行动并不仅限于克制自己。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河南的大规模抗旱斗争中，军队帮助挖了差不多一万眼井，并积极参加了修建防洪堤坝的工作。他们用一部分军队牵制日本人，其余的人统统帮助建设。春播时节到来时，军队就帮助恢复被毁坏的农业。每一名战士种六分之五英亩的土地，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同时留三分之一英亩供救灾。此外，在一九四八年围困长春时，人民解放军借了许多马匹和大车给农民运送收下

来的粮食，他们自己则在同敌人交火的地区为农民收割粮食。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在同女人的关系方面可能是世界上或许是最能够自我控制的部队了。一个外国人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是很困难的。但是埃德加·斯诺经过调查在《西行漫记》中报道说，军队年青士兵中保持童贞的百分比非常高。部分原因是由于膳食的清苦——每天两餐小米或大米饭加蔬菜，几乎吃不到肉；部分原因是由于精力已专注于一种事业。同时这也必须归功于军队的自觉纪律，这支军队只有严格尊重中国农村的家庭观念才能生存下去。

新四军有一个青年士兵因强奸罪被军事法庭处死，一位了解本案情况的外国人抗议说，“这件事不是什么强奸，而是姑娘对男的采取了主动行动”。为了这样的事情竟毁了一个好端端的青年，真是太可惜了。

严峻的回答是：“姑娘干了什么没有关系。如果一位当农民的父亲认为他女儿的名声被我们军队的一名战士所败坏，我们就必须消除这个根源。除非农民能信任我们，让我们的部队睡在他们家里，感到他们家中的女眷是安全的，否则我们的军队就不能生存。”

农民经常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子弟兵”。军队对人民的一片忠诚换来了千百万纯朴群众对军队的报答。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对中原地区发动进攻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政府秘书的面前，当时这位秘书正同李敦白走在一起。这个孩子看上去只有十岁却自称十四岁。他正发着烧，但咬紧牙关走过来行礼说，“报告！”他说几个星期以前，他在西面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蒋的军队占领了那个地方，杀死了一些病人，逮捕并拷打了另一些人。“因为我小，所以被关进了监狱。”这个在

监狱里几乎要饿死的孩子后来碰上了好心的人，给了他吃的，还帮助他逃了出来。他藏在一户富裕农民的家里，这家人家没有儿子，想收他为养子。

“我有了吃的，身体养好了，马上就跑到这里来报到了。”

秘书问：“你为什么不留在那个能养活你又能照顾你的人家那里？”

这个孩子因病仍然有些神情恍惚，却回答他必须前来“报到”。他说，“我不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我要和新四军在一起。”他们把他送进一所医院，一周后他出院了，身穿新制服，高兴极了。

陆定一在延安对我说，“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我们自己的将军也感到同战士建立新的民主的关系是很难的。对于象国民党这样的封建军队的军官们说来，那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

“但是，只有民主的人民军队才能摆脱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只有这样一支军队才能运用我们的新战略。这样一支同人民紧密相连的军队，即使遇上强大的敌人也决不会被消灭。”

## 对付优势兵力

面对欧美优势兵力的亚洲各国奋起反抗的人民，目前正在积极研究毛泽东创造的对付优势兵力的战略。这种战略非常适合这些人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必须战胜，而且已经战胜了优势兵力。他们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不仅是由于他们军队的素质，而且由于他们采取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战略。

这种被普通老百姓迅速掌握的战略却使外国军事专家迷惑不解。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当蒋占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城市，特

别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延安陷落时，全世界的军事专家就不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了。但是，就在延安撤退的时刻，这个城市的小孩子也懂得“城市无关紧要”。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军队”。他们热心地计算着被消灭的蒋介石军队的每一个旅，就象美国孩子们计算世界棒球锦标赛输赢的场次一样。与此同时，这些孩子们还若无其事地随同他们的母亲转移到山里去。

几千年来，人们使用的战略都是立足于占领城市和要地，再从这里控制被动的农村地区。毛的战略却立足于坚固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能够化整为零地吃掉敌人的军队，从而遏制城市和要地。朱德将军对我说，“我们让他们深入到我们的腹地。他们驻扎在城里。当他们派出小部队出城买粮时，我们就把他们干掉。等消灭到一定程度，我们再收复城市。这种作法听起来很原始，似乎做不到，但却很奏效！”

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将领试图向世界解释他们的作法。后来攻占上海的华东野战军的陈毅说，“按正统的军事战略，我们应当部署最好的部队来保卫我们的首都，并要考虑我们能守多久。但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能歼灭多少蒋军，他们遭到重创之后，将于什么时候撤退，以及如何在他们的军队进一步后撤时将其消灭之。我们决不会犯蒋在一九三七年犯过的那种错误。当时他把所有的最好的部队都用来保卫上海和南京。在这些城市被占领后，他的军队也垮了。”

指挥陇海铁路以北各省的儒将刘伯承在描绘这一战略时引用了一首小诗：

“得人失地，  
地可夺回。”

得地失人，  
人地两空。”

他又说，“我现在已用十七座空城换得六万蒋军。据说蒋喜欢这个买卖，打算继续做下去。我是愿意的。”

刘伯承的部队在不断让出县城时还一直说“胜利”，最初我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有些恼火。他的作战部长梁中将军解释说，“蒋出动了近五十万军队进攻我们这个地区。我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十万人左右，装备也差得多。因此，当他逼近时，我们就撤出城市，带走一切值钱的东西。蒋占领城市后必须派兵驻守，而我们的地区则由地方民兵守卫。我们的正规军可以随时进行机动作战。为了守卫所占城市，目前蒋军已被牵制了二十万兵力，在战斗中又丧失了六万人。所以，在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和蒋军的数目相当。我们反攻的准备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他们已经进行了反攻，不但夺回了城市，而且一直打过了长江。

这堂小小的算术课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我从未丢失过。从此我懂得了人民解放军正在打胜仗，也开始明白他们是如何取得胜利的。

对世界新闻界来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蒋介石似乎是胜利了。他把整个华北各地的共产党大城市以及一百六十多座城市都占了。你可以看地图——地图上标有城市的名字——就会发现他获得了多少土地。甚至一九四七年夏在莫斯科，我也遇到了这种公式化的说法：“太糟了，中国共产党没法取胜，因为他们没有重工业。”以后这种说法又传入巴尔干各国，使我在那里的一個中国朋友也感到困惑。我在莫斯科向高级外交学院的一些学生坚持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打胜仗，他们却肯定地回答说，“不，他们的城

市都丢光了。”

同年八月，在苏军机关报《红星报》上，发表了一篇由一位俄国上校撰写的带权威性的占有三栏篇幅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的一年内战》。文章说，“尽管中国共产党坚守其首都延安达三个月之久，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它。”这位上校想的是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当时有几万人死于这个城市的保卫战。他并不了解毛的战略。那三个月我正好在延安，曾目睹做得极好的撤退工作。甚至银行的玻璃窗和硬木桌面都小心地埋藏起来了，所谓的“坚守”连十分钟也未曾有过。一九四七年对中国共产党战略的估计不足，以及一年后莫斯科对胜利的到来感到明显的惊讶，这些似乎都表明俄国专家同中国共产党总参谋部并没有什么联系。

毛泽东和所有了解其战略的人对城市的失守十分沉着。蒋得到的是被摧毁的楼房和美国报刊的头条新闻，失去的是军队。他因占领共产党在山东的首府临沂而赢得威望，而共产党却视之为“又一座空城”。蒋为此失去六万军队以及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胶济铁路的控制。当他占领共产党最著名的首都延安时，他赢得了更多的头条新闻，但牵制在那里的军队从此再也不能脱身。蒋派去占领延安的将军先是丧失了军队，以后连他自己驻防的城市也丢了。

在世界各国新闻界制造的“胜利”一年之后，蒋在整个华北没有打通过一条铁路。蒋占了许许多多的火车站，而共产党却控制着路段，并把铁轨运进了山里！

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必须日益壮大而敌人的军队则必须不断缩小。他们坚持这一目标，直到取得战争的胜利。

共产党的战略具有高度自觉性，其细节由中国最能干的将军



们制定，这些将军从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研究战争并付诸实践达二十年之久。朱德的战争实践已经历了四十年。他在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时是一名军官。他告诉我他对中国古代战争的了解大多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名著。他还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战例，并曾同参加作战的人一起研究这些战例。这些将军都信仰毛泽东为他们的战略制定的基本理论。关于这种战略他也写过几本书。

如同所有长期的战略一样，这种战略包括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首先要对敌方的所有资源——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作一番清醒的估计。敌人有更多的人力，更多更好的武器和国外的援助。人民解放军只有一个优势：即有可能获得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能赢得这种支持，它就完了。如果赢得这种支持，它还必须懂得如何组织这种支援，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陆定一在延安同我谈话时讲的不是宣传而是军事战略。他说，“我们的生存、成功和发展必须完全依靠人民的力量”。这里包括两个信念：相信自己的政策能够赢得人民的积极支持；相信广大地区的人民能够成功地抵御技术上强大的敌人。根据后一信念，人民解放军便能演出各种有声有色的戏剧。我仅举少量几项：迅速穿过“敌”区、“疏散”的技术、采用“突然包围”的方法逐步“消灭”蒋军，以及对俘虏的群众性改造等。

王震的“双长征”从来未成为世界新闻。它被战争的面纱隐藏起来了。一九四四年日军象快刀切牛油一样直下华中时，蒋的五十万军队被打垮了，敌人因而得以进逼美国在西南的空军基地。共产党派遣王震赴敌后各地组织农民进行反抗并保护和巩固粤汉铁路线。他从延安一直跑到香港然后再回来，到处进行农村游击队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他带了三千人，包括非战斗成员文工队员和

秧歌队员。这是为唤醒农民而组织的一支完整的队伍。

一开始王的运气很好。黄河结了很厚的冰，他可以从冰上过河。由于黄河几乎从不结冰，这次却向所有的农民证明王是“有魔法”的人。除此之外，王的行程同常人并无区别。当他来到宽阔的长江边时，所有的渡口均被日本人占领。王坐在岸边同一位老渔民谈了两天。后来在一个无人的江岸来了一支小船船队，趁黑夜把他的部队送过了江。最后一条船过江时日本人的一艘巡逻艇曾叫它停下来，但听到渔民懒洋洋的答话声以后，日本人并没靠近搜查。

由于幸运和机智以及“充分依靠人民”，王震完成了“双长征”的任务，沿途把抗日游击队组织了起来。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使用“疏散”的方法。当人民解放军整个师被占优势的敌人包围时，他们能够化整为零地分成许多班组甚至分散为个人，穿过敌人的阵线，在数百英里以外的指定地点重新集合。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中原地区。一九四六年六月，全面内战开始时，蒋派出五十多万军队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对湖北北部的六万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包围。从军事数学来看，共产党是完了。

进攻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担任先头部队的蒋军的一个团投向了共产党。难道蒋自己的军队也对他的胜利产生怀疑了吗？包围会最终置人以死地吗？

共产党分成许多小队突破了包围并在农村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看不到他们，他们的朋友也看不到他们。停战小组的飞机没有能够找到他们。在二、三个星期内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死是活。然后远在东北方的江苏，一支小分队出现了并且加入了当地的共产党军队。一个星期之后这支部队的主力远在西部的陕南山区重新

集合了，又一个新的解放区诞生了。两个月之后，王震的部队作为被包围的六万军队的一部分，在西北兜了一圈以后又回到延安。全中国的共产党军队都为“孩子们都回到家里”而感到高兴。

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一次坦率地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打’。”<sup>①</sup>

当拥有优势武器的敌人侵犯他们的土地时，他们并不想把它赶走。他们告诉我，“这样做对我们是一个损失。因为它在补充弹药以后还可以回来，而我们却耗尽了弹药。只有当我们能出其不意地对敌人进行包围并俘虏其人员、缴获其军火时，才能称之为胜利。每打一仗我们都必须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兵员和武器。”

因此，他们允许敌人进入自己的地区，但是他们帮助撤退非战斗人员及其财物。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则隐蔽到敌人无法发现的地方。根据来自农民的消息，部队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进行出击。选择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机，发动突然袭击，就能对一股敌人进行包围并加以歼灭。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削弱敌人的优势。只有在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之后，共产党的军队才进入反攻，收复城市和土地。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蒋介石手里夺回华北采用的就是“突然包围”这一典型战略。这一战略的运用是建立在正规军和民兵之间密切而灵活的合作基础之上的。

一九四六年底在山西南部“消灭”蒋军第一师的解放军某部队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5页。——译者注

参谋长张泽江上校向我提供了一个突然包围的实例。蒋军最能干的将军之一胡宗南沿铁路向该省推进已有六个月了。正规的人民解放军撤退了，把铁轨也挖起带走了。同年秋天，胡将军已占领相当一部分没有铁轨的铁路。他很想抓住这支难以捉摸的共产党军队并一劳永逸地把它消灭。共产党便传出消息说他们的主力驻在东北七十英里左右的安泽。

胡将军派出三个师聚集在安泽。但是就在距司令部只有十五英里的地方，他失去了第一师。这个师可是美式装备的一支精华！

共产党正规军的驻扎地却比安泽还要近。他们在紧挨着胡将军的司令部埋伏下来，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就在第一师在外扎营的第一夜，由地方民兵迅速增援的共产党主力就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把它包围起来。一师师长黄将军与蒋介石有私交，曾通过无线电向胡的司令部求援。但援军并未到来，因为所有可能被派去支援的蒋军都同时遭到了地方民兵的袭击，援军因而受阻并被拖住。孤立无援的第一师在激战二十四小时以后投降了。死伤一万六千人，被俘五千七百人。

五千七百名俘虏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向北走着。他们身穿美军制服，头戴华而不实的美军船形帽。当他们经过时，农民们嘲笑说，“大家来看美国造的帽子啊！看看这些来杀中国人的美国养的士兵吧！”到了晚上，这些士兵把船形帽都扔掉了。他们竟要求戴上人民解放军的既实用又不显眼的军帽！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五分之四的人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为新兵。

最大的包围是在山东。一九四七年初在那里进行的三次突然包围，使蒋损失将近十万人。在一次战役后不久，美国记者贝蒂·格

莱姆到达现场，对目睹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美国的装备堆积如山”，来自几十个村子的“趾高气扬的青年民兵”背着武器满载而归；“几万名俘虏”排成长队向后方走去。

在延安，参谋长在评论外国专家对中共战略的看法时说，“这不是游击战。在只进行了三天的战斗中就俘虏了五万七千人，这难道是游击战吗？这是具有很高素质正规军所进行的运动战。”

到底选择敌人的哪些师来进行包围呢？人民解放军打算专拣那些装备最好的。它不想打山西的老军阀阎锡山，因为他的军队装备很差，“缴获那些装备没有好处”。它的目标首先是有美国装备的师。刘伯承下属的军人曾开展竞赛看哪一支部队缴获的美国武器最多。香港一家报纸曾报道，一位前国民党军官说，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把靠近他的两个美式装备师缴了械之后向他的师寄了一张贺年片：“不要担心，你们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你们没有美式装备。”

由于人民解放军缴获了更多更好的武器，因而作战的方式也改变了。早期在山东包围战中缴获的武器立即被用于猛攻山东的一些筑有城墙的城市。陈赓在山西把蒋的五个旅缴了械之后，就有可能对五座有城墙的城市开展强攻，利用大炮的火力来摧毁城墙。

人民解放军华东方面的司令员陈毅说，“我们研究自己有哪些武器，以便最有效地加以利用。我们研究过可能以步枪取胜的各种方法。既然现在有了美国坦克、榴弹炮和反坦克火箭炮，我们就研究用这些武器来取得胜利。如果我们只有匕首，我们就应该研究如何用匕首取得胜利。我们不会在战场上用匕首来对付现代化装备。但是敌人迟早会分成小组进村，那时我们就要使用匕首。”

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话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战略和战术的

灵活性了。

人民解放军在 frontline 战斗中，不仅找到了武器的主要补充来源，而且也找到了人员的主要补充来源。其战略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改造被俘士兵的策略。这些人被缴了械但并不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不称他们为“俘虏”，而叫做“放下武器的人”。当蒋在满洲的拥有最好美式配备的几个师被俘后送往哈尔滨时，迎接他们的是一条巨大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放下武器的官兵！”

被俘后，军官立即同士兵分开，被送往后方的一所专门的军官学校。人民解放军不大欢迎他们，因为“转变一个封建军官的思想实在太难了。”在内战的不同时期，这些人被允准分批回家。只要“他们有一段时间呆在我们这里，蒋就再也不信任他们了。”

对于一般的被俘士兵则由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他们被邀参加群众大会，会上进行各种宣传。有几个以前的俘虏谈起了“诉苦会”，他们在会上诉说了自己的悲惨身世。颇象救世军的公开的戏剧性的忏悔。他们哭着诉说地主如何对他们进行压迫，国民党军队又如何“把他们抓走”。在他们激动时大家都哭了。

被俘后的两星期内，就要他们在回家和参加人民解放军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回家者发给少量“路费”。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宁愿留下。有的是因为自己是贫农，被这支新型军队的纲领所吸引，有的则是因为离家太远，怕在回家的路上重新被他们所属的部队抓回去。

梁将军告诉我，“我们的军队讲民主，士兵可以同军官自由谈话，这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大多数是贫农，我们的土改使他们深受感动。我们把他们同其他士兵编在一起，并请有经验的战士给予他们特别照顾，使他们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例如，他们之中如果有人战斗中负伤，战友们就把他们抬到后方去。他们

很受感动,因为在封建的军队里,没有人会珍惜士兵的生命。他们好象是在一个新的世界中觉醒过来的人。”

我同在刘伯承司令部里工作的两名前俘虏进行了交谈。一位是警卫员,另一位是炊事员,两人都是几年前被蒋军抓来的。两人都曾为蒋介石卖命并都在战斗中被俘。他们没有逃跑。被俘后给他们机会回家,但他们愿意加入这支新的队伍。

李荣智(译音)原来是一个小城镇的商人,四十六岁,其貌不扬。一九四〇年在去附近城镇收账途中被蒋军抓走,已经有七年未能有机会同家里通信。他说许多人都是用绳子绑起来拉走的,而他因为保证不逃跑才没有受到捆绑的侮辱。“我说我是一个诚实的买卖人,说话算数。”他曾经被军官打过多次。他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军官可以随意打士兵。”在一个漆黑的九月的夜晚,他和其他上千人在一次伏击中被俘。“我满脑子以为共产党会杀了我。我们的长官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

在“休息”了几天之后,人们问李想不想回家。他没有回家,要求在后方给他一个工作。他说,“我年纪太大,不能打仗了。”这样,他就在司令部担任了炊事员工作。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回答说,“我家远在四川,国民党会在路上把我重新抓回去的。等和平了我再回家。”

另一个前战俘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名叫李德(译音),他更为强调他从事的新的事业。他在十四岁当印刷学徒时被抓走,后在蒋的三十军当勤务兵。他经常挨长官的骂有时还挨打。但他主要的苦恼是军官拒绝替他写家信将他的情况告诉父母。李说,“我不会写信,再说我也没有邮票。”

李的部队被包围后战斗了四十八个小时,然后投降了。这孩子受了重伤。俘虏他的人让他住进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使他深为

感动。当问到他是否想回家时，他坚定地回答说，“不，我要呆在这里跟随毛泽东。”他成了刘伯承司令部里的一名哨兵，并为此感到自豪。

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们告诉我，他们的部队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是由这些过去的战俘组成。这些新兵实际上提高了部队的质量。“他们懂得现代武器，也很忠诚。他们对于封建军队的压迫比解放区的农民更有切身体会。”

这些过去的战俘在促使敌军投降方面往往极为有效。对于那些对一场徒劳的战争感到厌倦的士兵来说——绝大部分蒋军都属这一范畴——一位以前在一起的人作出“如果你投降”对方“将给予优待”的保证会产生惊人的效果。

一九四六年八月的一天，正值共产党内战最困难的时刻之一，有消息传到延安说，美国已向蒋介石提供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毛泽东对我说，“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依靠蒋的士兵。我们损失了兵力，但也俘虏了当兵的。这些人都过来了。我们就是这样前进的。”他用深邃的目光看着我，又说，“你认为这样做也许是太慢了？”

我回答说，“我认为代价很大。”

“代价大？是的，但我们对此又有什么办法？我们对美国政府又没有影响。”

我说了一些关于联合国或三大国调停内战的蠢话。毛摇摇头说，“他们不可靠。只有蒋军士兵才是可靠的。”他掠过一丝微笑接着说，“蒋军的士兵是非常好的士兵，他们只需要稍加政治训练就行。”

毛的战略就是要有信心。因为即使在那些前来企图置他于死地的军队身上，他也看到了中国长期受压迫的农民不会永远做他



的敌人。他的战略的基础是：避开具有优势武装的来敌；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部队，并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加以包围，然后就是对已经缴械投降的士兵进行思想改造。

## 政府如何转入地下

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防御方法。使用了这种方法，一个政府连原子弹也可以不放在眼里。政府采用了一种被称为“疏散”的方法转入地下，来到人民中间，受到忠诚的人民的保护。敌机发现不了他们，即使发现并遭到轰炸，伤亡也将是有限的。

这种方法始于抗日战争时期。起初只是简单地在县一级政府的规模上进行。当县政府所在地遭到袭击时，县长和县政府就迁往邻村。这样的政府都能得到农民的承认和保护。县政府的这种转移，后来已经习以为常了。当李敦白到达山西原平县时，高个子的年青农民县长对李说，“我们马上就要撤离这个城市了，因为阎锡山的军队即将发动进攻，而我们的部队又距离很远。”

李敦白问：“那你们怎么办呢？”

县长似乎非常无所谓。他回答说，“就象对付日本人一样。我们将同农民在一起待一二个星期，等候我们的部队前来重新夺回原平。”事实证明他的预计非常准确。原平的失而复得只花了三个星期。这个县遭到了一些抢劫，但老百姓在隐藏值钱的东西方面很有经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长在地里的粮食，部队开过并未受到损失。任何一个得到农民支持的县政府撤出及返回原平都是比较容易的。

一个大的省政府疏散起来就复杂得多了。我在张家口见过这

种疏散。这个城市约有二十万人口，曾经是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的首府，面积和人口与波兰相近。它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中心，有着日益发展的商业和许多新的工业。后来一颗炸弹爆炸了。该市西部一百英里处的一个小镇出人意外地被蒋的地方部队傅作义的军队占领了。

负责本地区外事工作的蔡将军极为坦率地说：“我们在西部地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现在他们要对张家口开展全面进攻了。”他接着说：“你必须坐飞机走，我们已经开始疏散。”

在飞机到达前的三天内，我看到了“疏散”的景象，看到了在没有防空部队反击敌人现代化飞机的情况下，如何保护人民的各种社会事业机构。满载着人员、给养、行李和设备的卡车和大车不断撤离市区。华北大学早在一个月以前就走了，这样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秋季班已经在南部山区相当于两个星期行程的地方开学。医院也转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四名工作人员也在中国人的欢呼声中同他们一起走了。

一切都按部就班，十分平静。我已向印刷厂订制了一些上端印有姓名地址的信笺。厂长说，“如果有必要，我们能印出来。但最好的英文铅字已经打包待运。”我还以相当于北京三分之一的价格定做了一件皮大衣。蔡将军跑来告诉我，“裁缝今晚就走。如果你的飞机不来，我们就把你从陆路送走，再派一个裁缝去满足你的需要。不然，就到北平去买一件大衣吧！”在出版社，人们正在把书籍打包。他们对我说，“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吧！”于是我就拿了二百本，后来寄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时纪念图书馆，成为该馆收藏的唯一的解放区文献。

在“宾馆”里，我看到他们卷起美丽的蓝色地毯和丝绸的床罩，打好包同成袋的粮食一起装上卡车。这批人准备在南部山区开设

新的“宾馆”，许多作家同他们一起走。卡车开动时，他们笑着同人们挥手告别，然后就放声唱起八路军的歌曲。宾馆经理，最好的译员，一名服务员和受过法国训练的最好的厨师，遵照蔡将军的决定留了下来。他对他们说，“你们把外宾送上最后一架飞机之后立刻来找我，我送你们走。”

疏散期间，工会举行了一次告别聚会。先是在铁路工人俱乐部宴请，大家为实现再见的愿望干杯了多次。然后是跳舞、杂技和短剧演出。演员都是热心的业余演员。演出地点在工会大厅，一周之后这个大厅已夷为平地。李敦白说，“同国内老的工会集会完全一样。”李曾经在卡罗来纳从事过产联的组织工作。工会主席建议，应该利用来自美国和法国两位记者到会的机会向世界工会组织特别是美国的产联发一份电报。大家都欢呼表示同意。象这样的电报他们已经发过好几次，但从来未得到答复。

“或许蒋干涉了我们的电报。也可能我们在美国的兄弟不相信我们还存在。”

电报是由一个委员会起草的。同各国工会工作者发出的电文没有什么两样。“在炸弹威胁下的张家口，我们代表本地区四十一万有组织的工人举行集会向你们致敬。”他们在列举工会组织取得的成就以后接着说，“所有这些成就都受到了美国工人生产的炸弹、枪炮和飞机的威胁。”他们最后呼吁实现世界和平与民主。

集会很快结束。许多卡车和大车等在门外。许多人当晚就走，要一直走到天亮。他们等着同人们告别。

第二天早晨，在通往机场的漫长的路上，尘土飞扬。我们遇上了一百多辆大车，都装着大卷的新闻纸。他们正把“半个日报”搬进山里去。在张家口仍然维持一张缩小了版面的报纸。“如果这里被炸，我们将在新的基地不受干扰地继续出报。”

警卫搬开了设在机场的障碍物，让最后一架美国飞机起飞。蔡将军同我握手告别：“我们的生气勃勃的、繁荣兴旺的张家口现在只能留在你的记忆里了，我们的疏散工作即将完成。张家口将成为一个战场。”

李敦白留在张家口了解最后阶段的情况。后来他在延安向我作了转述。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内，有数万居民撤往山区。小型工厂、学校和政府各部门都先派出人员准备好地方，然后再迁往新的地点。除各机构有组织地疏散以外，大约有五万名居民自动去农村住在亲戚家或其他地方。他们并没有坐等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在最后阶段，所有的撤退都安排在夜晚，因为蒋的飞机在白天要进行轰炸和扫射。李敦白最后乘上一部老式的装载机器的卡车撤离。车上有偶然碰上的三十名乘客。卡车在平地行驶时，他们乘车；上山时，他们帮助推车。

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他经历了三十天的旅程，穿越田野，前往延安。沿途看到张家口的陷落对于以它为首府的农村地区的生活和政权究竟有多大——或多少的影响。他途中没有带钱，也不需要钱。他只带了张家口当局出的一封介绍信，要求沿途各个县政府给予协助。这封信到处都受到尊重。他可以买到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凭着这张纸，他得到了食物、住宿、向导和驮东西的牲口。鞋子破了可以有鞋子，缺钱用可以有本地货币。他还拿到了作为战利品的美国食品罐头。这封介绍信是由一座已经陷落的城市开出的，签发这封信的政府当局，在外部世界看来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这三十天里，他始终生活在爱好和平、秩序井然、勤劳好客的人民中间。他只是在第一天的轰炸声中离开张家口时看到过战争。对于这一地区的三千万人民来说，他们的政府并没有垮台。它只是从张家口搬进了山里，回到了在抗日战争中诞生并哺育它成长

的地方。它不是流亡政府，因为它并没有流亡他处，而是搬进了人民家庭之中。在城镇乡村依然流通着张家口的货币，而不是蒋的货币。各个县政府仍然执行着逮捕罪犯、土地和婚姻登记任务。农村民兵仍然用“晋察冀解放区”的名义，在村口巡逻。

几个星期以前从张家口撤出的华北联大的一千多名学生目前居住在五六个村子里。他们上午上课，下午帮助农民收割，作为对好心主人的报答。李敦白再往前走就来到“宾馆”，蓝色的地毯和丝质的床罩还在。这里过去是享有声誉的“敬老院”，现在供那些已经“投向人民”但尚未立即分配工作的年长的著名人士使用。一个星期以后给他派了一名武装警卫，带他绕过壁垒森严的大同市，这里仍由蒋军占据但已被围困。有一二天必须小心翼翼，到每个村都要打听清楚。警卫说，“有时国民党匪帮会从大同出来进行骚扰。”

在黄河渡口，他碰到一个学生带着年迈又缠了足的母亲去哈尔滨。在所有的省府都刚刚被蒋军占领的情况下，他们在北方的严冬里竟徒步走了四个月！

“在哈尔滨我有工作要做。我们可以不离开解放区一直走到目的地，”这位学生平静地说。

张家口附近的内战结束后，我朝南飞向另一个大解放区。那里管辖着四省边区 3000 万人民的政府不久前疏散到山里去了。我去是想看一看这样一个隐蔽起来的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日本投降后的一年，邯郸曾经是这一地区的首府。这里是久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着五万人口的城市。当蒋开始攻打各解放区的首府时，刘伯承将军决定不在邯郸等候敌人的进攻，而是事先转移到农村的一个隐蔽点去。这时候邯郸还留有一个停战小组同解放区的政府保持着某种联系。我通过适当的渠道通知

他们，我准备乘飞机到邯郸来碰碰运气。

飞机到达时，有五六辆卡车和吉普车迎上前来。停战小组的美方主席、个子高高的亚历山大上校是来取他的一个星期一次的邮件的。一位瘦小的中国妇女，穿着黑颜色的衣服，满身尘土，后来知道她是解放区卫生部的朱医生。她是来接红十字会送来的一些物品的，但却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怀疑她可能也是为接我而来。当我正在犹豫是否要接受上校的邀请在停战小组下榻时，一个紧靠在我身边的不引人注目的男人平静地说，“您也许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吧。”

我对他这种不讲清自己来历的作法感到意外，便问道，“你们是谁？”

“共产党人”，他回答说。

我转身进入他的老式汽车，远远地向亚历山大上校说了一句：当晚我可能到他那里去吃晚饭。我错了。我在此时此地离开他的视线以后，足足有一个星期没有再露过面。

我的新陪同名叫李棣华。作为向导和负责生活接待。陪同我一个星期以后，我才了解到他原来是一位上校。此处远离大城市，懂英语的人很少，李上校能说一点英语，他们出于对客人的礼貌，不惜派一位上校来陪同一个外国人。

我们带上朱医生和另一位官员颠簸着向北开去。石子路上尘土飞扬。车上的弹簧门坏了，前车门是用绳子捆住的。当晚我们在武安县县政府的几间办公室里过夜。人们给我们送来热水和毛巾，我们把满脸的灰尘着实地擦洗了一番。房间里放的是木板床。朱医生好客地为我找来一张老式行军床，上面铺了略有下陷的弹簧软垫。这大概是这个县里唯一的“西方床”了。第二天，我们带着这张床上路，以便在山区的司令部里安排一间“西式卧室”。

第二天夜晚，我们来到一个村子，通向村子的路我简直记不住。这个村子有几百户人家，房子都是用天然岩石砌成的。这些房子顺着石山建造，一个紧挨一个。在一堆拥挤不堪的石头房子里，我住了一间。这里有漆得光光的桌子和很整齐的炕——用砖砌成的平板床——表明这家主人是一个富裕的家庭。这座房子是向一个地主“借”来作为招待所使用的。这个地主已经不在家乡，只有他的儿媳——家里最没有地位的——留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房门让阳光射入室内，看见院子里有五六个年青人捧着一大碗香喷喷的黄色小米粥就咸菜吃。他们很有兴趣地盯着我看，但等我拿出照相机时又象害羞的小鹿一样散开了。他们回来以后告诉我：“我们是书店的人，路过这里前往设在一个村子里的新的出版中心去，那里距离此地有七英里。”

在招待所过夜的客人常常有三十人之多。有一天晚上，我上次曾经在延安见过的妇女组织的领导人蔡畅带着一批人骑着毛驴来到这里。他们沿途在妇女中举行会议，路上有时步行，有时骑毛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同本地领导人会见之后，他们准备去山东和满洲，还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我很羡慕他们有这样好的体力。

两天来，李上校在我的房间里为我安排了一些采访。我会见了本地区民兵的负责人以及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第三天，我的体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便走出居室前去参观，了解设在这一原始地区的军队和政府建制的具体情况。

部队政委薄一波将军，身材高大，看上去很能干。他解释说，“领导一个大区的集体生活需要有三种类型的组织。”这些组织是：文职政府、军队司令部和自愿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如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团、合作社、共产党等。这些组织的高层领导人可以减少到六百人左右，他们都住在距离这里不到二英里的村子里。

“军队司令部就在本村。二英里以外是政府。另一方向的二英里以外住着民间团体的负责人。书店、报社、电台和其他类似重要机构则设在其他村子里。遇有普遍性问题，如土改或地区防务事宜，我们就召集军、政、民各部门领导人开会，由各系统分工负责，完成全区的任务。我们可以从这里指挥军队、政府和民间团体，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

关于这种建制的细节，我后来才有进一步的了解。

我住的那条街过去几户人家就是军队司令部。即使去过两次之后，没有人带路我还是找不到。围墙、石子路的街道和大门，看上去都一个样。大门里面站着一名岗哨，在进大门之前你是看不到他的。他手持插上刺刀的步枪拦住你。过了他这一关，你便来到一个院子，里面有许多房间，门都敞开着。于是你走进其中的一间。

在一间二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的房间里，有六个人围坐在长桌旁，身上穿的军服沾满灰尘。背后墙上挂满了地图，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板。四个角落里放了四张小台子，每张台子旁都坐着一个秘书。

薄一波政委说，“这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

他介绍长桌上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参谋长。”“这位是我们的秘书长。”我认出他是陶将军，从邯郸同我们一起来的。“这几位是一、二和四部的部长。我是政委，三部部长今天不在，不然的话，我们除刘伯承司令员以外都到齐了。他在前线，随时都可以用电话同我们保持联系。”

他指着一张小台子上的电话机，这个室内唯一的现代化工具说，“这只电话机联通长达一万英里的线路，同一千只电话机保持联系，包括各个前线、后勤部门、所有重要城镇以及政府的各个



部门。我们从日本人那里一点一点地缴获设备。现在我们正在缴获美国的电话设备。他们的比日本人的好，可以通话，也可以发报。

他们给我看了缴获的美国武器，一支恩德伍德牌的卡宾枪和一支雷明顿牌的手枪。他们说，“这是拿来研究的样品。大部分缴获武器都留在前线使用。我们还缴获到重型大炮、坦克和反坦克火箭炮。”

他们指着墙上的地图说，“这些是我们地区的详图，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他们绘制的地图很好。我们用长条棉布裱起来，这样就能很方便地取下、卷起或重新挂上。”

随着一声命令，一个勤务员从密件档案柜里取出几个小箱子，各种各样的文件物品在铁盒子和军用皮背包里放得井井有条。薄一波说，“我们的司令部可以在半小时内整装就绪，用两头骡子或几个人背着就可以运走。我们去任何地方，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又可以把司令部设立起来。”

“在邯郸市工作有其方便之处，它有较好的房屋和电灯照明。但在农村工作也有好处，干扰比较少。城市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而这里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安安静静地工作。”

他介绍了参谋部每天的工作日程。他们六时起床，首先是两小时自学。薄一波政委说，“我本人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土改的指示以及我们地区农村的报告。在理论学习方面，我有一部分时间在学列宁的《两种策略》。”八点钟吃早饭，米饭和两个菜，然后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三小时联合办公。然后各部门的负责人回到他们各自的办公室——一部、二部，等等，指导其下属进行工作。四点钟吃第二餐，即最后一餐，有蒸馒头和两个菜并有茶。饭后有一小时散步或文娱活动。晚上则用于处理各项零星事务。

薄一波最后说，“不算警卫员和勤务员，我们司令部有二百人。我们这里包括作战、情报、军纪和训练、军事行政、人事和通讯部门。给养、运输、医疗、武器、弹药等后勤部门不在这里，而是设在便于工作的地点，可以通过通讯员、电话和无线电联系，甚至可以不在同一个县之内。”

就是这个参谋部，指挥着刘伯承的三、四十万大军在面积与法国相仿的四五个省份的几条战线上作战。

我走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穿过起伏的田野，来到该地区政府所在的村庄。小毛驴从我身边走过，上面驮着运往市场的棉花，送往部队的鞋子，还有成捆的送往发行站的报纸。“政府村”就在一座山的陡坡下面。

这里的气氛比较斯文，节奏比较缓慢，同军队司令部相比要随便得多。政府秘书长是一位态度温和的妇女，名叫孙文淑。在我访问期间，这个政府管辖的地区包括一百九十三个县，三千万人口。她的办公室地面是石块铺起来的，大约十英尺宽，二十英尺长。窗子是纸糊的，可以透亮。她说她工作的各个部门占了十三间办公室。政府工作人员中有百分之十是妇女。

政府的二百名主要负责人都住在本村，房子都是乡里分配的。这些人的住房和办公室占了一百五十间房子。孙女士承认，“我们使农民住得挤了一些。但他们认为政府设在这里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带来了有知识的人，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等等，这样可以使学校和医院得以改进工作。”

我随孙女士去参观了政府各部门的办公室。财政部门的负责人有一间十英尺宽二十四英尺长的办公室。文件资料都整齐地夹在靠墙的袋子里。档案负责人的房间是泥地但天花板很高，可以有较大的堆放文件的空间。他的油印机或许是村里第一次看到的。

他的文件资料都装在便于运输的铁箱里。

政府的邮局是一间泥地土墙的房子。靠门处放了两张大木桌，用于对邮件进行分类。房间的后半部有一张邮局工作人员的木板床。两旁墙壁上挂着一块块厚布，上面缝了许多口袋，标着：“人民委员会”、“公安”、“农业部”、“公路”、“邯郸市政府”等名称。地上堆放着许多有待捆扎的印刷品。孙女士解释说：“一边墙上的口袋是寄进来的邮件，另一边是寄出去的邮件。我们的邮局可以在半小时内收拾好驮在驴背上运走。”

我们看了村里的合作社。这是一间未加修饰的房子，农民正在这里卖棉花，买盐、煤油、纸张和香烟。经理说，本村合作社有二百名社员，本区各个村庄都有类似的合作社。

四点钟在孙女士办公室吃饭。一同进餐的有戎主席和十几位各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部分有大学学位。审判员贾潜有北平朝阳大学的法学学位，建设部门的负责人范若一有东京大学的经济学学位，民政负责人袁致和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其他的人均上过国内外类似的学校。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生活水平相当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精神十分饱满，对自己的地区感到自豪。戎主席说，“我们的地区是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地区。我们吃饭自给有余，穿衣也自给有余。我们有粮食、棉花、水果、果仁、胡椒、烟草。我们有煤也有铁。除了和平以外，我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

当我在这些村庄来往行走时，不论从地面或空中都很难发现它们同其他成千上万的村庄有什么两样。如果敌人的侦察机低飞俯冲，他们能看到什么呢？这里没有部队，只有几名村里的哨兵，这里谈不上运输，只有农民的大车和驮东西的毛驴。偶尔有一个骑自

行车的通讯员，一听到飞机声马上就会隐蔽起来。要过很长时间才会开过来一辆老式卡车。

但是，不论你从哪条路走近一个村子，都会发现一个小男孩坐在石头上或在路边玩耍。他会突然跳起来查问你：“请拿出路条来”，如果没有，你就走不成。

一个大约十一岁的村里的小哨兵向陪同我的三个人要路条。我问他，“你怎么拦得住我们呢？我们是四个大人。我们可以就这样从你身边走过去，你毫无办法。”

孩子说，“当然有办法。我可以大声喊叫，民兵马上就可以跑过来。”

村里的民兵可以处理任何一个普通的闯进这个村子的陌生人。万一强大的敌军冲破正规军的防线或敌机掌握我们驻地情况前来轰炸，那么整个地区的政府、军队参谋部以及工会、农会和其他民间团体的负责人都能在一小时之内行动起来转移到其他的村子里照常工作。

在这个地区之内，他们可以转移到任何地方，到处都得到人民的承认并受到人民的保护。

这些与外界隔绝、生活条件非常原始、但精神却很愉快的少数人难道真的可能拥有统辖五万五千平方英里、三千万人口这样一个地区的政府权力吗？关于政府的概念通常都是同庄严的建筑物和人数众多的办公室联系在一起的。我怀疑用这样非正式的形式能够行使真正的权力。

在回邯郸的路上，我在几个村子停留了一下。我参加了一次县里的劳动英雄大会，他们正在制订生产计划。我还在武安县城外看了一次民兵检阅。很清楚，不管到什么地方，当地的领导人都承认我访问过的那个隐蔽在山里的区政府。这个政府是由他们选

出来的。他们对其执行政府职能表示信任。同样清楚的是，区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协调而不是就具体事务发号施令。区政府只要少量精干的工作人员就能行使职务，因为大量的公务都是由县政府或各种民间团体自己去处理的。我想起美国在过去分散经济时期的一句古老的格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民兵检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场地上有四千人，制服并不齐全，但各村在某些方面均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有些人打的是绿色绑腿，有些人是棕色的，有些人则扎起特别的皮带或戴上特别的帽子。全部都有步枪，许多人还专门为这次检阅在枪上装饰了色彩鲜艳的纸花。他们动作敏捷、精神抖擞地进行了简单的演习，然后盘腿坐在地上听许多人的简短讲话。有十几个民兵要求讲话。他们都讲得很好。

我的出席似乎特别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县政府邀请我登上检阅台，群众呼起了友好的口号：“美中人民友好万岁！”然后他们立即通过决议，要求“从青岛撤出美国海军”。有一个人问“美国记者”是否有办法转一封信给当时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我回答说，我即将飞往北平，可以从那里发一封航空信。于是他们再次欢呼起来，并当场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但辞意贴切的决议。

他们开头这样说：“武安县三十三万人民致联合国，谨向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各个国家表示敬意。”接着，他们提到了“漫长的八年抗战”以及当前“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的背信弃义的进攻”，他们要求“有效地制止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干涉”，要求“美国承担联合国成员国的义务”，并要求联合国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公正处理美国对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

决议是举手通过的，多数人的手中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他们是民兵，是一群态度强硬、具有独立思想的民众。这份决议是他们

自己推举的委员会起草的，不受外界操纵，也没有别人帮助。显然，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政府意识，这种政府不仅是县或区的政府，而是世界性的政府。

在这个地区，有一百万这样的民兵捍卫着那个隐蔽在山里的政府。

有了访问这个隐蔽政府的经验，当六个月之后我见到延安撤退时就不再担惊受怕了。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之间的三个月的冬季里，西安胡宗南将军的军队曾对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的前沿进行袭击。在此期间，延安的多数活动已“分散”进行。作家、音乐家、雕塑家和文化协会的其他成员都到各个地区去组织土改或办冬学去了。延大的学生则到各个村子去根据前线的消息协调农民的撤退工作。妇女和儿童迁往北面的深山。报纸和电台各撤出一半以便在别处建立基地。

在孙中山夫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资助之下，以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的名义建立的著名的国际和平医院，几天前刚刚庆祝了它成立的七周年。现在病人和刚生孩子的产妇们被人们用担架从高处的九个窑洞抬下来，后面跟着医生和护士。婴幼儿用羊皮袄裹着，放在驴背的篮子里，一边一个。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捷克牙医罗碧澈回想起“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引起的混乱和不满”，并对这里进行的“任何一个首府所能做到的最有秩序的撤退”感到惊讶。她说，“白天我还在牙科门诊所为孩子们修补牙齿，第二天一早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是在夜里撤退的，晚上他们整理行装时又唱又笑。我同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谈了话，他的母亲也在同一天撤退，而他则准备同幼儿园一起走。我问他为什么不同妈妈一起走。他回答：‘她同我不在一个组’，这样懂事的孩子我从来没见过。”

好心的罗碧澈对自己的行李有点感到害臊。她认为她已经把行李削减到户外野营的最低标准了。后来她目睹了医院的撤退。她说，“这些人都是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七年的医生，其中有许多重要的专家，一位外科医生，一位眼科专家，一位细菌学家。他们除了背包里的随身衣服和一个小包袱外什么也没有带，就这样步行出发到山里去了。”

最后，“美国飞机”来了。在一个多星期内，它们不断俯冲侦察。这时候毛泽东对我说，现在是我该走的时候了。我应该乘军调部最后一批飞机走，“不然的话，我们大概要等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把你送出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延安已不再是他们活动的唯一基地，甚至连最重要的基地也不是。他们的路线已经在全华北和整个满洲得到贯彻；成千的城镇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家庭都准备欢迎毛泽东。他们的思想已经传遍全中国，甚至对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运动也已产生影响。人们不再主要依靠这些位于西北的原始的窑洞了。

当然，人们对延安是怀有某种感情的，不过我只遇到过一次。一位寻根究底的记者飞到延安来想核实一下所谓延安的“最后的日子”。陆定一被刺痛了。他大声喊道，“延安过去是什么样子？饥饿、鸦片、梅毒、盗匪！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既没有人偷盗也没有人挨饿的地方。而现在我们必须离开。本星期之内将有三千名儿童在冬天的夜晚动身。因为有飞机，他们不能在白天走。许多孩子将会受风寒而死去。”这次我听到了人们对延安动了感情。他的妻子和孩子已在前一天晚上撤离。

多数共产党人对延安并没有动感情。延安曾经是他们的后方和基地。现在他们的地区已经扩大了，延安已不再具有军事和经

济价值了。撤离延安甚至还有战略上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让胡宗南进入延安并对他进行就地包围，还可以用较少的代价消灭胡宗南的军队。

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同我讨论延安的战略时说，“如果蒋占领延安，那就是他垮台的开始。他把兵力和军火都放在一个贫穷而偏僻的地方，什么好处也得不到。这里既无粮食，又无财富及战略价值，只是名声好听而已。如果他为名声而消耗部队，他就完了。”彭预计，按照当时包围和消灭蒋军的速度，人民解放军在秋天就能挫败蒋军的进攻并开始转入反攻。后来证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

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晚上，我同毛泽东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为了准备撤离延安进一步北上，这时他已经在距居民点大约十英里之外。傍晚，一辆大客车把中央委员们带进城里（由于飞机空袭，白天活动尽量减少）观看一出有关土改的新戏。随后，我同毛和其他一二人走进一间窑洞（各个窑洞都一样）。年轻的勤务员拿来了烤火的炭盆、照明的蜡烛，还有茶、瓜子和糖花生，算是告别宴会了。

我同毛谈起了延安的失守问题。因为他的话将是负责的、最后的结论。

他说，“如果你要问到底是失掉这个城市好还是守住它好，那么当然是守住它好。但是如果我们失掉它也没有关系。为谋求生存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一场人民战争并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

我把上一架飞机带来的一位纽约朋友的来信给他看。这封信反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而困苦的时代。进步人士并不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们必须为保全自身而奋



斗。我希望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将采取的行动不要抱有幻想。”

毛泽东笑了。不，他不抱幻想。但他认为美国进步人士倾向于过高估计美国反动派的力量，而对民主力量则估计不足。他说，这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进步人士心理上的一个弱点。

“美国反动派有一个沉重的包袱，他必须支撑全世界的反动派。如果他不支持他们，他们的房子就会倒坍。这是一座只有一根支柱的房子。就象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美国反动派将证明只不过是纸老虎。而美国人民则是强大而具有持久威力的。”

午夜时分，友好的勤务员把新沏的茶和未点过的蜡烛送进窑洞。对毛泽东来说，这里不过是他行军途中停留一个夜晚的临时驻地。烛光照亮的室内情景使我永远难忘：那拱形的白色天花板，那灰暗的石板地，那粗陋的凳子和桌子，以及当毛谈论世界前途时他那轻松而自信的面容。

# 七、中国人征服中国

## 满洲根据地

当毛泽东放弃延安时，他知道他将从满洲根据地向前推进，通过占领农村最终占领全中国。他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按照习惯的保留作法，他原估计五年，但最后几乎不到二年就完成了。他不知道首先会失去什么，在一次谈话中，他曾经提到可能丢掉哈尔滨，实际上并未丢掉。他懂得力量的源泉来自两个基本因素：他得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支持；以及满洲的剩余粮食。

满洲的重要性是如此的明显，以致在外国人当中有谣传说，延安陷落后，毛本人正在向满洲转移。连没有政治头脑的人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本人的猜想是在重新拿下延安的诺言实现之前，毛因感到有负于陕北农民而会同他们待在一起。但在此之后他可能胜利转移到华北的一个更好的中心。后来果真如此。在全国都已觉醒的伟大的中国，不会把满洲视为它的中心，也不会这样看台湾，满洲是武器和粮食供应的源泉。

如果蒋介石具有共产党那样的政治意识，他可能已

经获得满洲了。俄国人为他赶走了日本人，把蒋指定的人安置在满洲的各个城市，保护他们达八个月之久并给了他们组织政府的机会。美国为蒋运来了八个军，本来也足够了。起初满洲人是需要他的。后来发生的事可以用齐齐哈尔一位妇女以粗鲁语言同我讲的话来表述？

“由于受过日本人十四年的奴役，我们已经忘记那个姓蒋的一九三一年是怎样把我们出卖的了。我们也忘记了他的国民党的腐败。我们只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打日本人。我们渴望中央政府派人来。后来他们派军队到我们城市里来作威作福，这些人同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却同日本人的傀儡相互勾结，偷走的牛比日本人还多。现在，如果我能用自己的双手抓住那个姓蒋的，我要用自己的两颗大门牙咬断他的喉咙管。”

一个幻想破灭的人说出了心里的仇恨。

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得到满洲的？俄国又给过什么帮助？

带着这些问题，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前往遥远的满洲解放区。当时蒋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下，依然控制着满洲的东南部沈阳一带以及直至长春的铁路沿线。我搭乘向停战小组供应物资的美国飞机。飞越战线前往哈尔滨。后来又沿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管理的铁路去齐齐哈尔。美国指定其驻长春的代表在蒋占领哈尔滨时前往哈市。他告诉我他原以为铁路不通，实际上却畅通无阻。

哈尔滨是美国军官们的购物天堂。他们纷纷从长春飞来买酒。我乘飞机那天，有好几个军官乘一个来回，带回好多箱战前陈酒和伏特加。他们夸耀说，每瓶酒才四十美分。哈尔滨市场上充斥着以讨价还价方式成交的食品：黄油二十五美分一磅，肉八美分一磅，鸡蛋二十一美分好买一打。民主联军宾馆的友好接待、粉红色的又大又厚的火腿片，用黄油涂抹并浸过好酒的鸡胸脯，这些都是

值得写信告诉家里的事。他们还供应印有宾馆名称的上好信笺给你写信哩！

在美国人当中关于哈尔滨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美国军用飞机驾驶员在机场问中国警卫，“你准备把我的飞机打下来吗？”

被吓坏了的中国人叫道，“不，不！我正守卫着它。”

这位美国人反驳说，“真糟糕，如果你打下我的飞机，我可以在哈尔滨待一个星期。”

粮食过剩成为满洲人的一个负担。在堆积如山的粮食和大豆中，农民却光着身子挨冻。一吨谷物只够买六码棉织品，一匹四十码的布要十吨大豆。号称世界粮仓的满洲却不能把作物送往市场。它的三面边界被苏联封锁，第四面则是蒋的防线。

我在满洲第一件感到意外的事就是苏联关闭了边界。哈尔滨的商人说，“连偷运也不可能。比蒋的防线还严。”他们就派出车队到蒋管区，用粮食换棉织品。做一趟生意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而美国军官乘飞机做生意只要一个小时。这样干代价很大，也很危险，沿途得向蒋军行贿，但在一九四八年底之前，这是唯一的贸易途径。

在哈尔滨，要想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拿下满洲的故事是很容易的。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时，产业工人中就有共产党。他们到农村去组织了满洲义勇军。就在美国向日本出售废钢铁、蒋介石禁止满洲人民抗日的年月里，共产党领导的小分队却奋起抗击了侵略者。经过多年的战斗，大多数抗日领袖都被杀害了，幸存者则成了满洲的领导人（一位领导朝鲜人在满洲的山里进行抗战的年青的朝鲜战友后来成了北朝鲜的主席，他就是金日成）。

以哈尔滨为省会的那个省的主席冯仲云向我叙述了他的严酷的战斗生涯。

“人们在雪地里打仗，在雪地里睡觉。雪深过膝，跺跺脚甩掉雪然后睡觉。夜复一夜、年复一年，就这么过来的。人们食草为生，我自己就能识别五十种可以食用的野草。”

“难道满洲没有粮食吗？”我惊讶地问。

他冷冷地回答，“满洲有日本人。起初我们的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有五六万军队。日本人放火烧掉了农民的村庄，企图摧毁我们的经济基地。但是农民即使住在窝棚里也向我们提供食物，我们壮大了。因此，日本人就用铁丝网把农民围起来，象关进集中营一样。我们的队伍仍藏在森林里，农民就把食物放在田里让我们去找来吃。但日本人通过地主控制了收成，农民中任何人有向非法者提供食物嫌疑的都会遭到枪决。我们只有少数人能活下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在一次闪电式的激战中赶走了日本人，满洲义勇军又重新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在农村和小城镇击败了日本人，而俄国人则占领铁路和主要城市。与此同时，原来就在南满地区活动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支队向北挺进并最终与满洲义勇军会合。延安派林彪将军把这些中国武装人员联合起来，使之成为一支战斗的部队。在我访问期间，他的部队有一半人来自华北，另一半是当地的满洲人。这支满洲的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彪这次北上旅程的第一阶段搭乘的是美国飞机。延安的美军联络组乘这些飞机去接运在华北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应延安中国方面的要求，其中一架有林彪搭乘。美国人是否知道这位瘦小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有多么重要？

“你们从俄国人那里得到过什么援助？”我问林彪。

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顾问，什么也没有。所有随苏军进入满洲的人员和武器在苏军离开时都回去了。所有他们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武器和给养，他们都带回俄国

或就地销毁了。”

我向满洲其他了解情况的人进行了核实。人们甚至根本不把俄国援助的说法当一回事。他们说，“那不过是蒋的宣传。”大家一致认为，俄国人已经完成了赶走日本人的主要任务。这次俄国人进一步占领铁路和主要城市，有助于鼓励胆大的满洲人解除农村及小城镇日军及其傀儡的武装。各种各样的满洲人，都参加了解除敌人的武装。据说，在苏军进入沈阳时，沈阳的中国人就在俄国守卫的眼皮底下，从日本人成堆的军需品中拿走了武器。但我没有听说过俄国人直接给过中国共产党什么武器。

与此相反，满洲人认为俄国人实际上帮助的是蒋介石，他们说，苏军保护了在满洲各城市中由蒋任命的人员，时间长达好几个月，地区远至北方的齐齐哈尔。后来苏联在远东的一位少校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当我们把共产党赶出沈阳并把蒋的人扶起来时，中国共产党非常恼火。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先进去的。但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同蒋订有条约。”

同蒋签订的那个条约必定已使俄国人感到为难。蒋一方面正式要求他们延长逗留时间，以便争取时间运进更多的军队，另一方面他的秘密警察又煽动中国人游行示威，谴责“赤色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留下来了。美国报刊随声附和，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却开进了满洲。同时，蒋的政府又从苏联保护下的城市向满洲的农民进攻。蒋组织政府的方法是，同那些为日本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地主取得联系，让这些人充当他的代理人，成立反共的“光复军”。一位哈尔滨的知名人士在俄国占领的第一阶段曾出任市长，当蒋委派的人员到达时，他辞职了。但就在这个处于苏联保护下的政权的第二阶段，他却被国民党匪徒杀害了。

满洲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责怪俄国人。他们在复杂的战争中已

经变得老于世故了。我曾问过哈尔滨一家工厂的工会委员会主席，他对此有何想法，他考虑了一下回答说，“蒋是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期的盟友，大家都承认他。当他发动内战时，俄国人就走了。”

俄国人并没有以此作为撤离的理由。他们的理由是充分的，因为当蒋的部队从俄国人手中接管长春时，他们煽动暴乱，反对苏联公民和苏联领事馆，并有俄国人在暴乱中遭到杀害。后来莫斯科宣布，苏军将不等蒋介石军队到达就撤离满洲。他们根据蒋的请求，把他派往北方城市的行政官员带走，因为这些人很怕在满洲人面前没有人保护他们。俄国人救了他们，并把他们经西伯利亚送回南京。如果蒋的将军们能同把长春移交给他们的俄国人体面地打交道，这对中国共产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想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如果这些军阀具有政治头脑的话，事情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会是另一种景象了。

俄国人在撤离以后就把边界关闭了。他们本来是可以利用满洲的剩余粮食来供应他们的远东地区或他们在朝鲜的占领区的，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缺粮。关于他们为什么要关闭边界，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对我说，因为“我们不承认这个政权，”接着他又说，“我本人并不是作为莫斯科的领事人员留下来的，而是作为满洲一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留下来的。这里有五万名俄罗斯人，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这当然是一种外交辞令，但他认为表明这样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俄国人从以前被称为中东铁路的撤退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例。这条铁路是俄国人在将近五十年以前修建的，而且至今仍然享受条约规定的权利。我沿这条铁路乘火车从哈尔滨去齐齐哈尔。火车跑得很英勇，也很糟糕。每一站都要停车半小时，以便使发动机和车轴冷却。没有润滑油，只有自制豆油，用一种特别的草来代替

棉纱回丝；用一块块树皮来代替用坏了的橡皮垫圈。这些都能顶用，因为无限忠诚的中国铁路工人会把火车停下来，塞进一些新的树皮，并保证什么也不损坏。

在齐齐哈尔举行了一次铁路工人的庆祝大会。有四千人席地而坐，三百六十个衣襟上佩带大红花的“英雄们”登上了荣誉席。这些人创造了使铁路正常运行的新方法并正在举行一次改进铁路工作的会议。日本人和俄国人都走了，这些人就是代替他们的未来的技术人员。

铁路上的郭指挥在讲到他们如何抢修机车车辆和火车头时说，“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管理，可以维持一二年，但以后就将面临新的、更加严重的短缺。到那时我们希望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其他方法。”

“你们不会用满洲的粮食去换苏联的润滑油和零件吗？”我问他。

“我们没有提出要求。我们知道他们会拒绝的。”

“但是根据俄国人同蒋签订的条约，他们享有铁路的财产权并有权共同经营这条铁路啊！”我抗议道。

郭答道，“我们在打仗，俄国人不愿卷进来。”

就这样，满洲解放区从一开始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个辽阔的地区，同外界没有联系，却拥有三千万人口。随着共产党占领地区的扩大，人口将逐渐增长到五千万。他们是如何把这些满洲人从蒋的手里争取过来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在两个村子里发生的事吧！

哈尔滨附近的左木村（意译）有五十四户人家，其中三十户以前在姓苏的地主家里当雇农或佃农。日本人让苏作代理人，买卖粮食，管理配给物品，征集强迫劳动力，并发放“良民奖”。在这些活



动中，苏用欺骗的手法大发横财。他越来越富，也更加使人憎恨。

农民说，“苏比日本人还坏。”

由俄国人帮助在哈尔滨建立的蒋政府，继续任命苏为代理人，叫他建立一支反共的武装力量。苏的九十名武装人员靠掠夺过日子，他们称霸城镇，比过去更加飞扬跋扈。一九四六年六月，苏军撤离哈尔滨，林彪的民主联军来了。左木村村民要求援助他们反对“苏匪”。苏逃之夭夭。村里进行了选举接着又实行了土地改革。一旦有了土地。苏手下的大多数土匪也都高兴地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了。

齐齐哈尔附近的王家庄(意译)情况类似，只是没有地主。日本人夺去了全部土地，把农民当作奴隶。他们说，“我们吃的既不是小麦也不是小米，而是橡子磨成的粉，许多人便血而死。”

日本人走后，蒋的一支“还乡团”抢走了村里的马。接着蒋任命的齐齐哈尔官员声称那里的农田是齐齐哈尔市的财产，并采用拍卖的方法出租土地的使用权，使用期为一年。只有二十户人家有钱承租，其余二百户就成了佃农。在播种季节之前，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他们对农民说，土地是农民自己的，他们应通过村民会议分地而不需向任何人交租。他们迅速照办了，基本上按人头每人一英亩。到收获季节每一个人都吃上了好的小麦。从衣着来看，许多人还是贫穷的。我亲眼看到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严冬一丝不挂地在几座房子之间跑来跑去。但是有了白面馒头，不再中毒便血了，农民们还是认为生活有了好转。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在满洲各地农村，由蒋赋予权力，并由地主领导的“还乡团”到处都靠强征硬讨过活，农民视之为掠夺。齐齐哈尔的于省主席告诉我，这些“还乡团”在庆兴县抢走了一万零五百头牲口，在康南县抢走一

万四千三百头，在龙江县抢走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五头，等等。如果没有共产党，农民身上将总是压着封建政府的这副重担。当共产党鼓励他们抗击“国民党匪帮”时，他们自然高高兴兴地去做了。

蒋慷慨地把许多武装队伍的领袖封为“将军”，很快这些队伍就沦为土匪，这一点也使蒋名誉扫地。近期俘获的十一名这类“将军”已供认他们准备举行叛乱。法庭上揭出的关于这些人的事情在全哈尔滨已传为笑柄。

在这些“将军”中最生动的故事要算拥有一大群“娘娘”作为大小老婆的“活佛”了。他在法庭上供认，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以“金线大教”的名义，在华北通过传递“玉帝真言”的方式为日本人反对八路军充当间谍。日本人投降后，他与蒋的一些将军取得联系（他说出了这些将军的名字），并被派到满洲来继续工作。为了领取津贴，他虚报有三千名军队。在法庭，他承认他的军队“没有那么多”。

他的虚幻的宗教不过是他的秘密军事组织的一件外衣。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宣称，“我自称是能够消除一切灾难的‘活佛’。任何一个人如果要参加传教都要这样说，不然就不能入教。”入教需要点上蜡烛单独一个人跪一夜来表示“诚意”。他说，“我用这种方法诱奸了十名处女。”并兼用诱奸和向父亲进行恐吓的方法得到了一批“娘娘”。他说，“但是，我真正的目的是占领哈尔滨”。他解释了他准备一条街一条街地夺取这个城市的计划，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叛乱活动，但是他连一条街也没有守住！如此“国民党将军”只能使蒋被人耻笑。

满洲最高的行政官员林枫主席告诉我，在日本投降以后的第一年，土匪活动非常猖獗。当时伪军刚刚溃散，许多武装人员参加了“还乡团”，有的就成为一般的土匪，各自进行抢劫。这些强盗有一、二万人，分股进行活动，每一股可以大到一千人。在我访问时，

人数已经下降到总共二、三千人，每股不超过二百人。

在火车开出哈尔滨几小时以后我本人也经历过一次同土匪的战斗。当时我作为林彪将军的一位客人乘上了一列“军车”，虽然林彪本人不在场，但他为我配了一名翻译，并有一名警卫员为我拿毯子和枕头，使我旅途舒适。火车在一片空地上停了半个小时。他们告诉我，“铁路警备部队在前面同一些红胡子打起来了。我们要等路轨清除障碍以后才能过去。”

“红胡子就是土匪。”一位姓李的漂亮的年青妇女向我解释。关于她的故事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红胡子的来历是因为从前的土匪曾经戴过红胡子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今天红胡子是一种混合体，包括普通土匪和以前日本人的傀儡。一些持有蒋的委任状的地主是他们的头头。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俘虏这些人的同时也缴获了那些委任状。此外，他们以前还夸耀过他们的关系，不过现在已经断了。”

等到传话过来说可以走了，我们才缓慢地前进。我们在战斗区域走了一个小时。我们看到农民分散成一小批一小批地躲避，把牲口藏在小山包后面。李解释说，“他们懂得分散可以减少损失。”到底是农民向共产党学到这一点的还是共产党向农民学来的？也许是相互学习的吧。

武装警卫人员站在一个村子的房顶上，巡视着远方。一次，我们听到前面有机枪的声音，车厢里的军人便把车窗开大，每一个人都把步枪伸出窗外准备射击。他们注意的是远方的一批一批骑在马上的人。

“那是红胡子吗？”我指着其中一批人问。

“不，他们是农民。”李的丈夫一边说，一边把枪放了下来。

“这么远你怎么看得出来？”

“你没有看到他们附近有人走动吗？要是红胡子，人们早就

要逃避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铁路警备部队已经打垮了一股红胡子，有二百人，还俘虏了許多人。李解释说，“他们现在不大袭击铁路了。他们在袭击一个村子，民兵便来铁路警备部队报告并要求援助。由于我们的地区正在组织起来，这类袭击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了。

林枫主席告诉我，满洲盗匪减少有三个原因：“我们的部队打垮了他们；农民组织了自卫队；土改使过去的无地农民得以谋生，不当土匪了。”

蒋企图从地主和将军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则鼓励农民从最贫穷的人开始，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其结果是引起政治生活的大变动，人们一天比一天更有信心了。

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组织了工会，商人们在政府贷款的帮助下，越过蒋的防线做生意，热心教育的人则开办了学校。哈尔滨最穷的贫民区居民成立了贫民住房协会。为了实行清理贫民区的计划，市政府还提供了一些日本人返日后留下的一些房屋。我亲眼看到他们已经搬出的漏雨的破房子，院子积满了脏水和垃圾。我也看到了他们的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新居，一户一间，几乎不需交付租金。而在蒋统治下的长春，官员们因对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分赃不均而争吵不休，只能让它们空着。

原先由农民、工人、商人建立起来的组织当时已变成了政府。各省首先建立的临时政府是由农会、工会、商会和部队的代表组成的，后来则为选举产生的政府所取代。但选举方法开始并不一致。一九四六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一年，满洲各省联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纲领，并建立了一个联合行政委员会来执行这一纲领。

允许每一个省制订自己的宪法。这种权利过去蒋是一贯反对的。但是某些原则则各省必须遵守。这些原则反映了以后新中国的政府将实行的政策。

- 1、迅速举行普选；
- 2、日本人和汉奸的土地分给农民；
- 3、政府对私营工业进行帮助并给予合理利润；
- 4、在部队中实行民主教育；
- 5、扩大并改善普通教育；
- 6、汉族、蒙古族、穆斯林、朝鲜族各民族平等；
- 7、保证人身、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旅行和选择职业的自由。

为执行这一纲领而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满洲的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全是共产党员，而是包括二十多年来为本国自由而战的最著名的满洲当地人，其中有前国民党领袖、民盟成员，甚至还有旧军阀时代的满洲爱国者。

林枫主席是满洲本地人。自一九二五年起就活跃于“救国”运动及类似的组织之中。他的第一副主席张学思是满洲一个著名的军阀的儿子，并是同样有名的“少帅”的兄弟。这位“少帅”因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直到一九四九年仍然被蒋介石关押在台湾。委员会其他成员有：高崇民，他在满洲已经生活了五十五年，曾经在军阀统治下官居高位，后来成为孙中山的主要追随者；六十一岁的宁武，他曾经担任过孙中山派驻满洲的私人代表；满洲出生的吕正操将军，他是老军阀张作霖手下唯一的一名军官，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了名；吉林人韩幽桐女士是一位编辑和教授，自一九二五年以来就领导女权运动，同时也是民盟的一个成员。

林枫主席列举了当前的纲领：第一项是土改，一半以上的农民

没有土地；第二项是实行统一税制，它将占农民收成的十分之一。有了这两条措施，我们才有可能扩大学校教育，目前挨饿的雇农的孩子还不能上学。所有这些都做到了，我们才会有真正的选举。我们在各地都以某种形式进行了选举，但只有在采取上述各项措施唤起人民的政治信仰之后，真正的选举才会到来。

到一九四八年夏，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控制了满洲的百分之八十七的地区，占领了这个多次毁于战争的地方。他们没有去过问这些地方曾经为日本生产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最近一二年来为自己生产了些什么，现在又准备做些什么。下面是林枫的报告：

土改完成百分之七十；一年内开荒一百一十三点九万英亩；两次丰收；铁路准点正常运行；电报电话已在各市之间畅通；一千名煤矿工人被选出担任行政职务；原煤人均产量比日本人统治时期提高百分之六十七；电力生产比一年前增加一倍；哈尔滨工业产量是三年前的三倍；安东的船厂已生产出渡船；齐齐哈尔车辆厂八个月内车辆产量增加一倍。在满洲各地还大量生产镰刀、耕犁、锄头和其他农具，军火生产也比前一年增长一倍多。

大约有一百三十万农民组成了志愿支前队，他们已做好充分准备，一旦收割完毕，就会在即将到来的大举进攻中为林彪的部队担任运输工作。蒋军可能乘坐美国的轮船、卡车和飞机，但是满洲人有四十六万匹马，十二万辆大车和十七万副担架。有的农民只带一根扁担或一条马鞭，却坚信他们会为满洲的部队带回美国的最新装备，并为本村民兵带来美制步枪和冲锋枪。

满洲根据地已准备就绪，可以在全国大举进攻了。

## 农民占领大城市

姓张的年青战士同连里的炊事员说，“我们就要进大城市了！你出去买柴回来要迷路了。除了门牌号码以外，房子全是一个样，你又不识阿拉伯字。”

炊事员焦急地问：“认阿拉伯字难吗？”

“很容易。”张很大方地提出要教他，于是炊事员学认字了，不仅有阿拉伯字还有如“木”、“水”、“火”等简单的汉字，为进入大城市作准备。

一位姓刘的战士的战友们大笑着拚命要刘的妻子学用电话。“那玩意儿说起话来了。”她吓得象碰见了鬼。“我又看不见说话的人，为什么要学呢？”她抗议道。

“如果没有电话，在大城市里你别想找到我。”她丈夫说。于是，刘的农民妻子学会了使用电话。

到一九四八年，中国的内战变成了对城市的包围。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著名领袖孙中山的遗孀孙夫人就预见到了这一点。她说，“那将是城市同农村的对抗，城市将要挨饿。”她了解国内正在斗争的各种力量。

我们的司徒雷登大使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尽管他生于中国而且后来一直担任北平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初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同他在一起度过了七个小时。当时共产党刚刚开始反攻。蒋占领共产党的城市已经有一年，现在他们打回来了。司徒雷登大使已经看出，蒋的胜利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牢靠。

他痛苦而焦急地希望和谈。我想他的希望是，不仅要在中国兴办一些教育事业，而且还要赠送给中国最高贵的礼物——和平，以

此圆满地结束他的一生。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是  
以蒋的统治为条件看待和平的，而共产党则应该是一个安静的少数  
派。他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共产党没有武装，蒋就会屠杀他  
们。我在解放区看到的一切，他都不感兴趣。他只有一个话题：“我  
们不能让他们来南京进行和谈吗？”他无法同共产党接触。美国人  
已经撤走了他们的军事联络组，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上山了，见不  
到了。

最后我问他：“是什么样的和谈呢？和谈期间是继续打仗呢还  
是停火？”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我要坚持在谈判期间实行停  
战。”

我问：“就在此刻，共产党第一次向前推进的时刻停战吗？你认  
为他们会同意吗？蒋是否愿意做出让步？”他承认蒋不会愿意。我  
继续问道，“此外，停战又如何实现呢？在一百多个城市里，蒋  
的军队已经处于农民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这些农民是同共产  
党站在一起的。在停战期间蒋的军队是挨饿呢还是要吃东西？如  
果要吃，是你用飞机向他们运送食品呢还是由他们从农村取得粮  
食？农民会给呢还是不给？在这种情况下，战争连十分钟也停不  
下来。”

他说，“我们已经无法把那些部队全部撤回来了。”接着他又  
说，为了把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空运到目前的据点，美国已经花了  
三亿美元了。

我说，“那么共产党要俘虏他们了。当然他们不会按过去的条  
件解决问题。”

他又回过头来谈“停战”，他说应该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西线那样，在会谈时，双方战士放下武器，在 frontline 战壕之间准备握



手言和。中国的内战与此大不相同。这种情况是美国造成的，因为是美国把蒋的部队空运到华北所有要塞城市的。

农民同城市之间的冲突早已存在。几千年来，那些筑有城墙的城市一直是封建地主对付农民的基地，后来又相继成为日本人和蒋的据点。如果蒋让农民为了祖国的利益去占领城市，并从而让他们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他们一定会拥护蒋的。当蒋企图通过那些为日本人充当汉奸的卖国将军去统治他们时，农民就不能接受了。农民已经懂得不能再向那些做为据点的城市屈膝投降了。

一九四八年秋，人民解放军已准备攻占城市。满洲的收成很好。突然的包围使蒋军一蹶不振，最精良的美式武器为胜利者唾手所得。被农民封锁的城市陷入饥饿。战役开始了。

第一个目标是济南！它是山东省的省会，一个有八十万人口的城市，一个黄河边上的强大堡垒，也是南京到天津的南北向铁路与通往海边的东西向铁路的枢纽。十年来，山东的农民一直在抵抗来自济南的侵扰，先是日本人后来则是蒋的将军王耀武。他们抢劫粮食，强奸妇女，拉壮丁。济南固若金汤。南面有水流湍急的大河，北面是巍巍高耸的泰山。为了使古老的城墙更加坚固，他们又修筑了上千座钢筋水泥工事，架起了带刺的铁丝网，挖了壕沟，盖了碉堡。但济南挨饿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当粟裕的部队向济南进军时，有几十万男女农民参加。他们转动磨盘，为部队碾米磨面。行军的部队穿过扎起的牌坊，村里彩灯高挂，农民齐声高呼：“打进济南城！活捉王耀武！”许多新郎官也离开结婚的宴席加入到行军的行列里去。“我们要先拿下济南，然后再庆祝。”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这个有着高高的城墙和上千个堡垒的济南被攻克了。一年之前王耀武曾经夸口说“我已经消灭了山东

的共产党部队”，这次他却装扮成一个生病的商人，躺在一辆大车上准备逃出城外，但被警觉的农民民兵抓获了。

人们立刻可以看出，胜利者已为组织政府做好周密准备。早在进攻开始之前三个月，就有七千名经过挑选的人员在一个小镇集中，学习管理济南这个他们还没有拿下的城市。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是济南的居民，有些人只有在小城市的市政府工作的经验。在战斗打响以前两个月，他们今后的工作任务就分配好了。市里的各个部门已经建立，骨干人员也已选好，并制订了工作条例。人们对市区地图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七千个未来的领导人都学习了各自本职业务和对城市的总的政策。

管好一个城市有三个要素：正确的政策，训练有素的人员和人民的合作。

电台事先广播了“正确的政策”：“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守法的外国领馆和侨民。保护私人工商业，他们可照常营业。学校与教育机构应继续工作。属于蒋政府的企业将由人民政府接管，接管前由原经理继续经营。遵章照办者有奖，怠工破坏者受罚。除主要战犯及武装抵抗者外，政府官员一律不予逮捕。他们可继续工作并保护好机关财产和文件，人民政府将酌情分配工作。”

怎样才能把这一政策传达给济南人民呢？这里不是农村，不能靠召集一次会议来解决。办法是张贴公告，公告，公告！当第一支部队穿过攻破的城墙，爬上瓦砾堆的时候，他们一手拿着步枪，另一只手拿的就是一卷公告。一个战士咧着嘴笑着说，“一边射击，一边张贴公告，又射又贴”。每一堵墙上都贴上了公告，人们都围着看。歌舞团也来了。在为群众举行的音乐晚会上演出的节目包括一个二百人的大合唱，演唱的歌曲是著名的“黄河颂”。

新的济南贸易公司迁来了。他们带来二十万蒲式耳小麦，实行廉价出售以压低粮价。凡参加清除街道垃圾、平整路障和掩埋尸体的人都付给粮食。所有非熟练的失业人员都请来参加这项工作。设立了二十个登记处，凡要求为新政权工作的政府雇员、教师、警察、工程师等人都给予登记入册。那些不愿为新政权工作的人可以离开，往往还为他们开友好的欢送会。

征服者聪明地把官方电台给美国传教士使用，让他们向家里传递消息。一份发往费城戴维斯的电报说，“亲爱的兄弟，战斗结束。城市平静。我安然无恙。”济南长老会电告美国总部：“我们均平安地在自己家中。战斗出人意外地短暂。解放军士气高昂，待人友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保护教堂、学校，宣布宗教自由。星期日我们举行领圣餐仪式时，没有受到阻挠。”

济南以北八百英里处的长春是第二个被林彪的满洲军队攻克的城市。日本人曾经为他们的这个“东亚首府”设计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和高大的政府建筑物。一九四六年底，我看到的长春还是马歇尔将军军调部的前哨站，当时它已经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城市了。那时，这里还没有受到共产党军队的威胁。但农民已经同长春保持距离。他们的抵制持续了一年，后来发展成了对城市的包围。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冬，林彪的军队包围并逼近长春。饥饿使这个城市更加削弱了。

拿下长春的过程是缓慢的，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战斗。有二十万平民悄悄地越过防线，溜到城外来暂时安家。林彪的军队在郊区收割庄稼，并把三千辆大车借给包围长春的农民，让他们把粮食运走，没有一粒粮食流进城市。蒋用飞机为他的部队空投粮食，却引起了磨擦。由想家的云南士兵组成的六十军说，大部分粮食都给了蒋的“嫡系”部队——美式装备的第七军。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局

势已经没有希望，但却害怕投降，因为军官们曾经警告说，“共产党是要杀俘虏的。”

林彪的军队开始了“喊话战术”。他们的喇叭筒叫道，“弟兄们，过来吧！我们送你们回家！跟我们一起解放你们的家乡吧！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唐班长带着七个人过来了。长春的军官说，“他们被活埋了。”但是当天晚上唐班长就喊开了话：“弟兄们，他们给了我吃的。”很快在被包围者和包围者之间就交换起信件和礼物来了，在长春被包围的一个军人写道，“感谢你们送来大饼。但是我们南方人想吃大米。找一个南方人来给我们喊话吧，我们听不清你们的口音。”

想家的云南人首先投降。这是蒋自己造成的。蒋命令他们从长春突围，打开一条路，穿过长达一百五十英里由敌对农民据守的地带，打到沈阳去。云南籍的将领宁可向林彪投降。这样，围城者便进入东城地区。蒋的另外一些将军派来调停人同他们联系。当他们还在商量时，普通士兵就开始跑了。他们说，“不要相信那个将军，是我们要投降的。”当高级指挥部投降时，部队里的人已经跑光了。

接着沈阳也攻下了。这里人口近二百万，是满洲最大的城市，南满铁路的枢纽。它还是强大的工业中心，但现在已大部毁于战火；日本人进行破坏；苏联人拆迁日本军的兵工厂；国民党大肆搜刮和掠夺。蒋三次飞抵沈阳，为的是拯救这个城市。但每次使士气更加低落。沈阳是在经过许多初步战斗和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被攻克的。蒋军五十九师孟师长投降后广播说，“我一天之内收到五个互相矛盾的命令。一个说，‘撤退’；第二个说，‘守住’；接着是，‘朝东打过河去’。以后又说，‘往南逃吧！’当我们南逃时遇到了我们自己的主力部队。他们叫喊：‘向北突围！’就这样，我最后的三个营

也跑了。”由美国人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的三个军就这样被歼灭在沈阳以西。大量武器被缴获，成为战利品。

十一月二日，林彪的部队攻克沈阳。全世界舆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打了胜仗。往南一千英里，已经拿下济南的华东人民解放军向徐州进发，并于十二月二日攻占该城。徐州是蒋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通往南京的门户。在较远的内地，刘伯承南下汉口，所向披靡。在最远处，陕西的农民在彭德怀率领下向西安挺进。

在整个华北，从沿海到一千英里的内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队向蒋占据的城市大举进攻。与此同时，林彪的满洲军在长春和沈阳打了胜仗以后来不及休整，就用国民党的投降士兵扩大了自己的部队，用缴获的美国武器增强了自己的火力，挥师南下，直驱北平和天津，这两个著名的城市，一个是美丽的古都，一个是大商港。

他们身背装备，在二十天内徒步行军六百英里。他们赶着农民的牛车和骡车，驾驶着美国的卡车，拖着在满洲缴获的大炮前进。他们用手榴弹开路，越过开始结冰的江河，穿过荒山沙漠和长城的关隘，勇往直前。当他们进入河北平原时，有几千辆农民的大车等着他们，并带着粮食和饲料随大部队前进。为了通行卡车，单在冀东一个县，就有五万农民冒着风雪严寒在三十六小时内修好了一百八十英里的公路。

当最后还剩七十英里时，林彪的步兵突然甩掉周围的农民，以急行军的速度，在二十四小时内走完这一路程。他们不吃饭，不休息，立即投入战斗。一举把北平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击溃。

当人民解放军抵达北平郊区两所著名的大学清华和燕京时正值圣诞节。他们受到等候在那里的两校师生的欢迎。但最后拿下北京城和天津港则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了。共产党提出了投降的

条件,以免城市遭到毁坏。天津市政府曾就此进行过磋商,但城里的蒋军进行了抵抗。经过二十七个小时的猛攻,一月十五日占领了天津。

北平成了“和平占领”的范例。守北平的是蒋手下的地方将领傅作义。他已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将在人民法庭受审并可能被判死刑,没收其非法所得。共产党在北平把他团团围住。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能够占领这个城市的。大家也知道,如果有人毁坏了这个美丽的都城,一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指责。因此,共产党告诉傅,如果他能把北平完整无损交出来,他和他的军官们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而且还可以保住财产。共产党认为他们的财产是从人民那里掠夺来的,但以此为代价换取北平还是便宜的。

傅作义将军屈服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占领事宜。其中三人由傅委派,四人由共产党委派。傅的军队退往郊区,改组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国民党军官愿意回家的,发给三个月薪水,他们本人、家属及财产的交通运输也得照顾,并颁发参加“和平解放北平”证书。

当人民军队进城时,世界各地的记者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军队新的威力。单单机械化部队就花了二个小时才走完。有钢制装甲车,还有几百辆拖着野战炮和高射炮装备的道奇卡车。没有一样是俄国人给的,全是缴获的美国货。在城门之内两英里长的路上,男女儿童和工人们爬上卡车向胜利者欢呼。战士们挥舞着群众送的纸旗。有些人的背上用粉笔写着“朋友,欢迎你”。

北平迅速地成为组织新中国的中心。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代表战线两边已经组织起来的一百多万大中学生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会议。首先由学生举行集会是非常适宜的。三十年前的一九一九年,学生们就在这个城市发起了革命的五四运动。三

月五日，民主同盟委员会抵达北平。他们因在蒋管区遭到镇压自一九四七年十月起就流亡香港。在蒋统治下朝不保夕的所有九个政党都把总部迁来北平。连蒋本人派到北平商谈和平条件的一些代表也决定留下来不走了。

中华全国妇女大会于三月二十五日在故宫的一个豪华的殿堂里召开。过去这里老百姓是不能进去的，现在那些从前最不受重视的女性竖起了彩旗，使这里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了。他们中有的来自前线，有的带着世界妇女的祝愿从欧洲归来。

就在三月二十五日同一天，毛泽东也住下来了。现在他的总部不再是延安的窑洞，而是中国的故都。中共中央的许多成员也随同他一起到来了。他们刚刚开完一次中央全会，讨论的是因胜利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因此，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城市。毛在这次全会上宣称，“……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sup>①</sup>

关于华北的消息通过许多记者，通过回去的代表，以及通过贸易很容易地就传到了南方。由于中国的许多轮船公司已经越过了蒋政府的控制，天津和上海之间通过直接交易方法很快就恢复了贸易关系。

显然，这次并不是新的军阀式的征服，也不是寻求外国援助和承认的临时政权。它是一个已经站稳脚根政府。在中国，不论是蒋介石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建立这样的政府。这一点人们可以从新领导人有条不紊地接管城市、银行和大工厂的坚定性看出

---

<sup>①</sup>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54页。——译者注

来,也可以从粮食供应、贸易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看出来。从农民、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和旧公务员对政府的帮助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享有人们普遍效忠的政府已经来到了中国。

早在解放军南下北平时,就有上千个村庄的农民准备向这个必定解放的城市供应粮食。农民们肩挑背驮,用大车和独轮车把谷物、食油和其他农产品运过群山,跨过河北平原运到北平。农民的这次行动有他们自己的运输系统、道路标识、医疗服务和纠察。三万吨粮食早已储备就绪,等待北平的解放。一方面,这是政府计划降低粮价的准备;另一方面,这也是农民和商人之间进行的自由贸易,他们相信新政府会诚实无欺地对待市场。

最令人感动的是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对他们称之为“国家财富”的财产的保护。在烟台,发电厂的工人们几天不吃饭,坚守岗位,保护工厂不受破坏。在济南自来水管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们在厂内垒起路障加以防守,从而阻止了国民党在最后一分钟企图进行的破坏。在天津,中国最大的一家造纸厂因该厂工人的抢救而保存下来,国民党撤退的军队企图炸厂没有得逞。他们首先封了仓库,派出岗哨防止散兵抢劫。当国民党军队向纸厂发射燃烧弹时,三百名工人在厂里坚守了三天三夜,他们用沙袋遮盖易燃物品,把容易损坏的机器的主要部件搬到安全地区,还扑灭了房顶上已经烧着的火。经过战斗,他们使工厂几乎保持完好无损。

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能自发地这样做的。这也需要领导。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消息承认,当第一批散兵开始抢劫北平某一家工厂时,一些工人也参加了进去,想偷一点东西回去养家,等待好日子的到来。于是,有一百名工人立即秘密组织起来张贴通告,提醒人们将来是否有工作就看能不能把工厂完好地保存下来。在此之后,工人们就有组织地“偷”了起来。他们把主要零件藏在自



己家里，使得别人把机器偷去也没有用。以后他们再把零件送回厂里。

铁路工人在保卫设备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他们中有十六人随部队从哈尔滨来到沈阳。他们发现这条大铁路的车站到处是地雷，通电的电线和倒下的电线杆，而且没有电灯。国民党还在放冷枪。有一千一百节车厢躺在夜幕之中，天一亮就将成为蒋军飞机袭击的目标。他们在零度的气温下，摸黑找到了两台机车，又找到了油和水，在刹车不灵和没有铁路信号的情况下，把列车拉出了车站。他们干了一夜，把列车统统疏散到没有投弹危险的地方。以后铁路工人利用废旧物资开始检修机车和车厢，建造成“天津专列”和“北平专列”，把粮食运往新解放城镇。

靠近沈旧的抚顺煤矿受到煤矿工人的精心保护。它是远东最大的煤矿，中国未来工业化的宝贵基地，下面有二十个工厂。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由于内部相互矛盾煤矿生产几乎陷于停顿。但三万六千名煤矿工人和产业工人还在。各矿和各工厂都举行了秘密会议，建立了“保卫委员会”。大发电厂的工人用手榴弹阻止了破坏分子，煤矿工人把运煤列车上的主要零件拆下来，使煤拉不出去。在沈阳激战时，他们为新政权开采了一千吨煤。

看来新政府是有理智并能作出决定的。天津有一件最头痛的事，就是出现在街头的二万名国民党散兵游勇。这些人从沈阳逃到天津，而国民党地方当局不给口粮，任其沿街乞讨或抢劫。他们吓得许多店铺关了门。新政权贴出通告设立了接待站。两个星期之内，他们处理了一万八千名军人，有的被接受下来进行训练或住院治病，有的发给铁路通行证让他们回家。

在天津，头三个月内有四百件劳资纠纷案件得到了调解。资方得到通知要支付生活费，为此政府还给以帮助。工人则要求他

们不要使企业破产。例如在开滦煤矿，由于几百万吨挖好的煤运不出去，资方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双方都向华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提出了请求。工业部叫他们进行协商。经过四天的谈判，资方同意立即支付拖欠工资，还接受了矿工提出的某些有关劳动安全方面的建议。政府提供了一笔贷款，安排从满洲运来一百七十万根坑木作为安全措施。原煤出口税降低百分之五十，并关照铁路每天为他们拉一万节车皮的煤。

眼见北方采取的这些行动，仍然在蒋统治下的上海《商报》注意到新政权：1)准备保存现有的组织形式及工业活动；2)迅速恢复公用事业；3)谨慎地对待“接管”这一困难任务，事先做好准备；4)宣称将以“空前速度”增加生产。《商报》说，“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这是在蒋家警察的眼皮底下保护其客观性的说法。后来《商报》的代表到了北平帮助筹划建立新的联合政府。上海的商界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不是作为共匪，而是作为可能比以前更好的新的当局而接受下来。

这一切表明，一个在全中国人民忠诚支持下能够进行指挥并能在大地建立秩序政府即将诞生了。

毛泽东三月份曾对他的共产党人说，“胜利只是第一步。只有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改造成为一个拥有发达工业、经济独立的国家，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中央委员会的任弼时作了详细的补充。他说，修复遭到破坏的工厂需要三至五年。即便到了那时，工业生产也只占全国生产的百分之十，其余部分是农业和手工业。他建议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增建工业企业，使之能占国家财富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多数外国专家认为，单单恢复遭到破坏的满洲，就需要十年或

更多的时间。毛泽东可能比他们更了解中国人民。他说，“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即将出现。”这一自信的根据是：“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sup>①</sup>

中国强调，它作为一个国家，其独立性仍然是初步的。完全独立还是将来的事，需要一个经济基础。任提供的数字为何那么灵活不定？因为外国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还不能肯定。

在沈阳举行的五一节阅兵式上，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批飞机从人们的头顶轰鸣而过。它们是美国给蒋介石的P-51型战斗机和B-25式轰炸机，由那些已转向新政权的飞行员驾驶。

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消息灵通人士”开始表示，可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如果它履行国际义务的话。”难道美国还准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支付它给蒋的那些飞机的价款吗？

## 美国在中国的机会

来自香港的第一批轮船开抵新的天津，以润滑油、纸张和卡车，换取猪鬃、大豆和原煤时，他们宣称有几次航程利润达到百分之百。第一艘美国轮船“菲尔摩尔”号的船员在卸完货从“已经解放的天津”回到旧金山后对人们说，他们没有看到乞丐，没有人溜到船上来偷东西。在亚洲的港口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回。第二艘美国轮船“中国胜利”号接到美国军事情报局的警告，叫他们不要乱说。

在天津，英国侨民梦想同一个更加诚实的中国作大生意。两

---

<sup>①</sup>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61页。——译者注

年以前我曾听到他们表示过这样的希望：由于美国过于迁就蒋介石，已丧失了机会。英国总有一天会得到好的机会。美国在天津的商人举行会议表示抗议：“我们的国务院为何不同这个新政权打交道？我们会失去中国贸易的。”

美国国务院的首脑们有比美国同一个港口作生意更深的忧虑。他们同高级将领们一起，已经失去了中国。他们还可能失去亚洲。四十亿——六十亿美元的“对华援助”比浪费还要糟得多。这些援助装备了东亚从未有过的最强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由称美国为“帝国主义”的共产党所领导。这还不算最糟的。世界上曾经有一种观点：把共产主义遏制在苏联境内，它的四周统统被美国空军基地包围，从格陵兰到沙特阿拉伯起飞的飞机立即可以把它炸得粉碎。现在这种观点已经被摧毁了。共产主义已经在五亿中国人口中流传开来。谁能知道它会在哪里停下来？如今即使为储存原子弹作出最勤奋的努力也不能置共产主义于死地，除非毁灭全世界。必须找出一些新的办法来。

毋庸置疑，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看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愿意同这个新中国打交道吗？会吗？他们想消灭它呢还是对它进行遏制？能做到吗？即使美国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这些中国人究竟想干什么？

其实早在整整一年之前，中国人已以一种巧妙的方法告诉他们了。一九四八年农历新年，天津的一些外国商行收到了一张贺年片。当时天津的外国侨民还以为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在郊区切断铁路或袭击军火仓库的游击队而已。市政府曾经花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在城市的四周修了高高的土墙，并挖了壕沟，阻止捣乱的人们进城。但是共产党给外国商行的贺年片还是进去了。

“我们祝你们长寿，祝你们生意兴隆。如果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攻克这个城市，请不要惊慌。我们将迅速恢复秩序并欢迎你们继续营业。”

天津的外国侨民一阵哄堂大笑。但是人民解放军正好在一年之内就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迅速恢复了秩序。他们欢迎做生意。大多数外国商行都留下了。或许他们并没有注意到那张措辞委婉的贺年片的全部涵意。做生意是欢迎的，但是中国人一定要占领这个城市。是他们，而不是外国人来恢复秩序，这种秩序必须是中国的秩序。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港口和领土并不完全属于中国人。在那些年代里，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享有各种权利。英国首先强迫中国输入鸦片，并通过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向中国强行输出廉价工业品。上海、天津、和长江各口岸到处都有由外国法律统治和外国军队保护的“外国租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些外国人丧失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但是某些特殊外国人的特殊权利还是保留下来了。直到日本打了败仗，日本在中国某些特定地区的特权才算完结。后来美国也获得了特权，付出的代价是对蒋提供贷款。这些特权现在也结束了。大多数善良的美国人好心好意地认为我们给蒋介石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援助”。同样，一九四〇年时讲究礼貌、向人鞠躬的日本人也对我说，他们在财政上作出的牺牲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姊妹国家满洲国”。他们也是真诚的。中国人的看法则并不相同。现在中国已经赢得了发言权。

这些新领导人说了些什么？他们说，首先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要求外国“迅速”把军队撤出中国。外国的军队呆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有一百年了。

他们所说的“主权”，涵意是什么？这一点他们已通过自己每

天的行动表明了。他们拒绝承认那些尚未承认他们的国家的领事官员和大使。苏联明白了这一点，在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关闭了领事馆，听候上级领导解决两国关系。我们美国人则把领事馆留下作为“监听站”。由于没有受到委任就不能接近政府，我们对此感到烦恼不安。在没有委任书的情况下“监听”了六个月之后，领事馆竟被称之为“间谍”，我们发怒了。白人在亚洲行事的习惯和同债务国打交道时的特殊地位把我们美国人宠坏了。我们还需要学会尊重别国人民的政府。这些新的中国人是要面子的。

他们的尊严和主权也表现在要求“在对日和约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其理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四年来，麦克阿瑟将军单方面决定了日本的命运，并使俄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接受了他的决定。而这些新的中国人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同意他的行动。美国人可以讥笑中国，把他们的声明说成不过是“宣传”，日本人却没有笑。他们知道，这个被新中国拒绝的和约是无效的。

这就是在中国的一个政府在国际方面的表态。这个政府的“国民性”是那个号称“国民党”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这个政府表现出了站立在本国土地之上、面对全世界的中国人民的尊严。

这个政府愿意向美国提供什么呢？它愿意建立友好关系，愿意做生意。他们已正式声明：“我们愿同所有国家建立平等友好关系，包括美国在内。我们愿意保护所有在中国的外侨的合法权益，包括美国的侨民。”

在天津，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是欢迎做生意的。这一点不但可以从香港航运商所获得的第一笔巨额利润看出来，当然这可能是暂时的，也可以从新的官员们已能适应的对人彬彬有礼、办事迅速看出来。他们制订的第一项规定只允许作易货交易。只有他们

得到保证能把同样好的东西弄进来，他们才会把好的东西送出去，这种作法看来是合理的。外国商行谴责这种作法是“回到黑暗世纪”。当中国共产党人邀请外国商人就改进贸易方法问题提出建议时，他们都感惊讶。

在上海，新政权显示出他们已从天津三个月的实践中迅速取得了经验。外国商人称，这些规定“避免了蒋所犯的错误”。对于在国外拥有外汇的人并不象蒋那样下命令强迫他们把外汇交给政府，他们可以使用这些外汇在国外购买设备和原料。一些商行在国外出售货物并不一定都要进行易货贸易，他们可以领到在市场流通的票据。有十二家中国的银行和九家外商银行被授权经营外汇业务，其中包括三家美商银行，它们是：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和美国商业银行。原来规定进港船舶的吨位税比战前高一倍，在外国轮船公司出示外国港口税率证明并声称这样下去外轮将不再进港时，吨位税立即下降一半。

总之，新政权看来很重实际。美国人和英国人表示，对他们“处事得当，富有见识，迅速果断，感到又惊讶，又满意。”

有一个使那些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共产党的人感到意外的事例，是他们对上海电力公司的处理。下面就是他们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明白无误的事例。这家美国公司为上海提供照明和电力，用的是进口燃料油。当时正值该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成为一个巨大的电力垄断集团的前夕，这个集团将囊括整个沪宁杭三角地带，它们都是位于中国最大的河流河口的城市。资本来自美国的纳税人，是通过蒋介石根据一九四八年七月签订的中美双边协定转弯抹角地进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地反映美国战后政策的协定，实行这一政策，美国纳税人将使美国私人垄断集团在外国发财致富。中国的爱国者说这个双边协定“比日本的奴役性条约更

坏”，说它把“中国的主权扔在美国的脚下”。如果有哪一家外国垄断集团在掌握纽约的电力供应之后又扩张到波士顿和费城，美国人也会点他们的名的。

许多人以为刚进城的共产党政权会象日本人在对日战争时期一样没收“帝国主义”的公司。当共产党到来时，电力公司的存油已下降到只够供应两个星期使用的水平。但是新政权并没有没收存油或财产，而是拿出价值十万美元的金条作为无息贷款供给公司向国外购买燃料油。为什么？因为上海需要电力，而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这些共产党人面对现实，处理有方。他们是否也很精明并以贷款从电力公司得到什么让步作为报答呢？这是他们的秘密。大债主都是这样干的。后来有一条消息报道说，该电力公司使用进口燃料油的锅炉正在改装为烧中国煤。这家公司正在进行调整，使之适应中国的情况。

这样的交易毛泽东在一篇谈话中已经阐明了。他说中国在经济独立之前不会有完全的主权。当一家外国垄断资本能够把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电力供应切断时显然是谈不上完全的主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闭眼不看本国的弱点，也没有象国民党官员那样用大话来对弱点加以掩饰。他们面对这些弱点，加以分析并就他们可以接受的条件达成协议。他们并不想把弱点保持下去。

美国企业到哪儿能找到象觉醒了的中国这样一个市场？那些只有饥饿的农民和贪官污吏的封建国家并不是好的市场。在勤劳勇敢并主宰着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一天已大亮的现实面前，过去的“四亿顾客”买廉价美国货的旧梦变得黯然失色了。他们今天将格外努力耕作，明天就可能驯服长江。这里是美国生产资料的市场，可以把美国的经济萧条推迟许多年。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国家，它有自立更生的人民，正在努力发展自己，可以成为我们致力世界



和平的伙伴。

我们的商人们了解这个市场。他们曾经通过蒋寻求这个市场。他们曾想通过美国垄断集团控制中国的经济生活来获得这个市场，并企图根据美国的要求迫使中国成为反对苏联的战场。这就是杜鲁门主义的实质，也是白皮书透露出来的魏德迈一九四七年报告的秘密所在。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持敌对态度”，因为它将“不会让我们建立用于发动空中袭击的重要的空军基地”；而一个反共的中国则不仅在空军基地问题上而且“从人力……的观点”上都将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盟国”。再也不可能以那样的条件来获得中国了。

如果我们需要中国的友谊或它的市场，我们美国人首先要还一笔债。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实行的对华政策已经摧毁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友好感情。

四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美国的。对中国人来说，美国是很久以前通过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而取得独立的国家；是没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也没有索取“外国租界”的国家；是把义和团庚子赔款中美国的份额用于对中国青年进行教育的国家。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他们抗日的盟国。

饱经世故的中国人懂得，美国人是各种各样的。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一位名叫塔诺尔的海军准将进入中国实行炮舰外交，他对中国的海岸进行了攻击，并在天津设立了“美租界”。但是林肯总统把租界又归还了中国。后来，美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既不允许中国门户开放也不允许关闭，而是坚持认为倘若任何国家能够在中国开办任何事业，美也应该能够开办。欧文·拉铁摩尔干脆把它称之为“免费搭车的帝国主义”或“也有我一份”的政策。庚子赔款的运用也并非出于利他主义而是有远见的交易。它已经

创造出中国的一个热衷于美国思想方法的知识阶级。美国同日本打仗也不是为了中国。它是当它自己的港口遭到袭击时才作战的。后来证明它是一个能够在东亚战场力挽狂澜的强大的盟国。

正因如此，中国的农民为了援救在中国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在靠近香港的岸边，甚至一个小男孩也能一次又一次地潜越日军岗哨为隐藏起来的美国人送饭，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区。在河北有一位中国母亲在一个防空洞里把自己的孩子闷死，因为怕啼哭声把隐藏着的美军飞行员暴露给在头顶走过的日本人。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独立战争”的盟国美国的忠诚。

所有这些忠实的友好感情在过去的四年中都被破坏了。

对孩子们来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吓人的字眼。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善良的牙科医生罗碧澈在撤离延安前，去一个托儿所为孩子们治牙。她的白皮肤引起了恐慌。“美国人！美国人！”孩子们尖叫着，冲向寒冷的室外。由于老师保证这位医生并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一个捷克人，他们才最后平静下来。他们从未听说过捷克人，但是这个字眼是中性的。可怕的美人并没有来。

那些六岁的孩子们对美国有怎样的了解呢？他们了解的是：他们跑进防空洞是为了躲避“美国飞机”；他们了解的是：他们的父亲已经同他们告别，自己却要同母亲一起出发到一无所知的山里去过冬。他们了解的是：他们必须在夜间走路，因为“美国飞机”白天将低飞扫射。所有这些恐怖和损失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都是同“美国”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让外交官和军火商们去解释那些飞机是“对中国的援助”吧！中国的儿童和农民知道它们来自美国，他们知道这些飞机是来杀人的。

他们杀死了正在乡村集市购物的妇女，因为集市的群众是“目

标”。农民们站成长长的一排，准备修补堤坝，抢救庄稼——他们也成为“目标”。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苏北人民开办了一所民用医院。这里的人民比大多数日占区人民受的苦更深，而且各种疾病都很猖獗，十分缺医少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医院的位置正式通知了蒋的军队，以便得到保护。飞机来了，它们从低空掠过，进行了识别。第二天又来了，用联总医生的话来说，进行了“仔细而又有计划的扫射”。在所有这些问题中，美国是伙伴，而它的飞机则是工具。

山东的农民有一个关于美国人的笑话是无情的。由于他们十分靠近美国在青岛的海空军基地，飞机就是在美国教官的指导下从这里起飞向农村进行扫射的，所以他们特别遭罪。山东有几千英亩平坦的土地因为农民无法躲避飞机而不能耕种。而住在山村的农民则有可以存放几十头牛的大防空洞。这些农民说，美国人在青岛的训练有一个好处：美国人“遵守吃饭时间”，人们可以算好种田的时间，那就是“上午九点以前，下午五点以后，中午十二点到二点”。在这个笑话里，昔日对美国的友好感情已经所剩无几了。

反对美国的不仅是农民。九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救国会以及其他国外很少了解的小党派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理当引起美国报刊重视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按适当的法律格式草拟的，它呼吁联合国帮助反对“美国侵略”以及“美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九个党派宣称，美国向蒋政府提供的巨额款项对中国并无好处，不是用于内战就是养肥了腐败的官僚。他们指控美国提供巨款的目的在于从蒋那里获得某些“压迫中国”的条约。

文件列举了九个这样的条约，其中包括“备忘录”。它们正式的

名称都很好听：友好通商航运条约、教育基金与文化合作协定或中美双边协定等等。九个党派宣称，通过这些条约，中国的财政金融、货币、贸易、经济生活、原料、海陆军、教育事业甚至土改的方法都将依赖美国。中国人把这些协定统统合在一起，称之为“卖国条约”。

这就是美国向中国寻求友谊和进行贸易时面临的负债。然而美国也有资产。

美国的第一项资产是它的工业实力。美国是唯一能使中国按其意愿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国人对这一点很清楚。俄国人也明白。一九四九年初，一个俄国人在莫斯科对我说，“中国人必须从美国获得工业化，我们做不到。”他想了一下又说，“可能他们首先要独立，宁愿放慢工业化的速度，这要看美国的条件如何。”

美国的第二项资产包括一大批在美国学校留学过的中国人。他们会说英语并了解美国的许多方面。他们的人数比会说俄语或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中国人的比例是几百比一。即使俄国人似乎也承认这种天然的“势力范围”。我注意到一个小的例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布达佩斯举行过一次强烈亲俄的国际民主妇女大会，朝鲜人和蒙古人的住房同俄国人分在一处，而中国人却分进美国人住的旅馆，好象他们属于美国代表团一样。

第三项资产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人通过在中国各地进行传教和贸易所获得的广泛的知识。普通的美国人认为，由于共产党的胜利，俄国人对中国的渗透已经很深了，这种假定并没有为事实所证明。俄国人对南至旅顺口的北满有特殊的了解，因为他们修了铁路而且俄国人在那里定居也有五十年了。在中国的其他各地，美国的记者、传教士、商人甚至美国陆军同中国人都有着比俄国人时间更长更有连续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在蒋管区有，在共产党统治区

也有。

莫斯科远远不是中国共产党获胜的总司令部。他们对这一胜利的到来似乎同美国国务院一样感到意外。怎么不是这样呢？攻克满洲的林彪后来亲自向中华全国学生大会作报告说，“胜利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如果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感到意外，莫斯科当然不会不这样想。特别在讨论战略问题时我们已经看到，当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从那么多城市撤退时，至少有一些俄国的军事专家认为他们已经打输了。

表明这种意外的一个迹象是，一九四八年底，莫斯科的报刊对中国的巨大胜利几乎完全保持沉默。攻克沈阳的新闻成为报刊上的通栏大标题，犹如熊熊烈火燃遍全世界。但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却只在最后一页登了六行字。在此之后的一个月里，报上不再登载中国的消息。打下徐州的时候才又登了六行字：“据陕北电台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最强大的军事基地徐州。”就是这么一些！蒋丢了他在华北最强大的重镇，这样的消息在这里既无标题也没有登在第一版上，更没有社论！

在莫斯科，人们对那不可思议的沉默议论纷纷。评论各不相同。外国外交官们，希望这个新的“有可能独立的”共产党国家也许会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沮丧”；俄国工厂的工人们则就这条仅有六行字的消息举行热情集会，表现十分激动。我听到莫斯科的一位编辑欢欣鼓舞地打电话给发行人说，“他们打赢了！这不是证明了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究竟俄国人对毛的理论一直默不作声地想些什么，他就几乎愤怒地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应该留在延安！你应该发出消息，使全世界相信，丢掉延安并不是失败！”最精辟的似乎是一位俄国朋友的评价：“看来由于这些胜利，高层领导正在重新考虑我们对中国的评价，与此同

时,我们的报纸却毫无动静。”等到人民解放军拿下北平,俄国的评论员才跟上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作了长篇大论的学究式的分析。

今天,俄国人是从小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内部联系,也没有什么特殊了解的情况下起步的。但是,由于他们在三十多年前归还“特权”后,一直把中国当作平等、主权的国家对待,他们不干预中国的内战,并且撤出了自己的军队,所以在中国赢得了极好的声誉。这些事实,连同俄中两国均由共产党统治的事实可能不久会使俄国获得内部联系的渠道。

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因为如果她真想寻求友谊并在中国做生意,那么美国的第四项奇怪的资产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的性格。尽管中国共产党谴责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政策,他们还是教导中国人民把“美帝国主义”同美国人民严格地区别开来。

在新中国我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况。碎崖村的农民知道我是一个美国人以后这样安慰我:“美国人有好有坏,就象中国人有好有坏一样。但是你们的这个美国政府和我们的蒋介石都不好。”河南有一个县民兵检阅时先是有礼貌地欢呼“中美人民友谊万岁!”,然后又通过坚定的决议,要求我把我们驻在青岛的军舰撤走。在华东医院,伤员们躺在床上讨论着使他们受伤的“美国武器”。我听到一位战士是这样解释的:“制造麻烦的不是美国人民而是杜鲁门和他的反动政府。如果罗斯福还活着的话,情况也许会好一些。”我还可以举各省市的许许多多例子。

美国政府今天同新中国打交道时实行的现行政策,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他们迅速、果断而且明确地抛弃那些政策,表示愿意建立真诚的友谊并老实地做生意,

那么在同新中国的交往中，他们或许会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

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表示，他们不想同新中国发展友谊或做生意。他们说，难道我们要帮助建立一个在一场危机中将站在俄国一边的国家吗？这是一个必须坦率地予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它将决定美国究竟走和平道路还是战争道路。新中国同苏联站在一起究竟能走多远？毛是否会成为“克里姆林的仆从”或是成为另一个“铁托”？

中国有近五亿人口，他们有很高的觉悟并打算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本书如果不说明这一点就是浪费纸张了。中国共产党赢得领导权靠的并不是莫斯科的武器和黄金，而是依靠唤醒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今天的第一需要正如毛亲自宣布的那样是民族独立。这也是美国在一七七六年时的第一需要。以后才是开发西部。蒋垮台并非由于腐败，当他带领人民团结抗日时，全中国人民都聚集在他的腐败政府的周围。只是在蒋发动内战，破坏国家的团结，并签订“卖国条约”作为购买武器的代价时，蒋才垮台了。

在今日之中国，任何一个把中国的利益出卖给外国的人都不能掌权。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本人使之成为不可能。即使他不是一个人爱国者，他也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而不会梦想出卖中国的利益。即使他想这样做，也做不到。但是中国的利益并不是华盛顿规定给它的那些利益。中国同苏联有许多共同的利益。

第一项共同利益在于一个和平的边界。这条漫长的边界线比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线还长一倍多，而且更为复杂。中国不会同俄国在边界上卷入一场战争，如果任何人或任何国家有此企图将会被视为是一个敌人。毛泽东曾经直率地说过，假如美国进攻苏

联,中国将站在俄国一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能想象苏联会破坏和平;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了解中国人民宁可忍受美国的原子弹轰炸也不会在这条漫长的边界上进行全面的战争。

第二项共同利益很可能是联合开发横跨亚洲的现代化运输线,通过这条运输线可以开发新的资源并把落后的人民同当代的世界生活联系起来。穿过满洲直达大连的铁路、横贯新疆的战时公路则仅仅是这条大陆运输线的第一批道路。过去由于古老专横的帝国的怠惰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冲突,这里自然资源的开发曾受到阻碍。今天的发展则将是迅速而不可阻挡的。中国将得到通往欧洲的陆上通道;俄国则可得到直达太平洋的多种通途。多少世纪以来被锁闭在亚洲大陆的几十个古老民族将建造各自的铁路路段。他们通往世界的道路被两个国家打开了,这两个国家对待少数民族实行的并不是象美国开发西部时红印地安人遭受过的那种种族灭绝政策。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发展航运时,中国沿海将兴起一批可能同北美港口相竞争的港口。美国可能在几十年内都会有关于铁路和港口设备的定单,但前提是愿意帮助俄国的发展,而俄国是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的。这一政策的改变可能刺激扩大定货,从而增进世界繁荣。

新中国在联合国内将如何投票呢?她将投票赞成她认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事。如果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同苏联的利益相一致,人们无须感到意外。有些美国人因此就觉得有充分理由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甚至不惜使联合国破裂也不愿接纳一个他们不再能控制其投票的中国。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在一个势均力敌的安理会里,如果英国和法国偶尔同美国意见分歧,转而寻求俄国和中国的支持,这样可能要比由美国现在控制的自动多数更能反映联合国的实际情况。联合国最终会成为主权国家平等交换意见



的地方。通过交换意见使一些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不是向俄国挥舞鞭子，使它只能靠否决权才能脱身。美国的切身利益不会受到危害，它也能行使否决权嘛！对我们的外交官来说，应该使用其他方法，而不是以贷款施加压力的方法来争取多数，这样做也许是有益的。

那么，大连、旅顺口、俄国人从满洲拿走的工厂、从新疆拿走的矿产又怎样呢？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难道必须要由美国人来管理全世界？我大胆猜想，新中国将乐于同俄国人分享这条由俄国人按蒋签约规定的条款建造并得到美国赞许的铁路。那些条款还使俄国在大连获得一个“自由港”，以便来自半个大陆的货物能找到一个暖水航运的地方。他们并没有把一个自由港给地球另一面的美国。那些条款还包括中苏在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基地的设施费用由俄国人支付。这很自然，美国在加勒比海的任何一个基地都是这样做的。蒋没有使用属于他的那一半海军基地，而新中国则会使用。至于俄国人从沈阳搬走的东西，中国人有很好的记帐员，无须美国人来计算他们遭到多少损失。当他们有时间开出那张比较复杂的财产清单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俄国军队拿走的东西超过称为战利品的日本军火工业，他们可以开出一张帐单，也可以作为一种报酬而不予追究。因为俄国人把日本人赶出满洲时干得那么迅速而干净利落。

那是中国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美国同各国的贸易和友谊。如果那些制订美国政策的力量不想同新中国交往，我们尽可以坐在自己的炸弹堆上，听任本国的萧条如同潮水一般在我们的周围掀起，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不管我们说什么都会同中国进行贸易。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表示了这种交往的愿望。即使在东京这个麦克阿瑟的天地里，日本实业界的头面人物也组成了一个社

团准备同新中国进行贸易。他们竟向日共书记野坂参三就如何与中共接触征询意见！因为日本必须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不然的话就必须长期依赖美国。

毛泽东已经向中国人民发出警告：只有苏联和它的朋友们才是友好的国家，而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则将消灭新中国。美国过去执行的政策还能让他说什么呢？美国目前在希腊、土耳其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建立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海空军基地网又说明了什么呢？美国发表的白皮书表明：一切可能的方法从联合国托管满洲到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以及在中国内部制造武装叛乱来遏制和消灭毛泽东的新中国都已经考虑过或正在考虑之中，所有这些报道现在又意味着什么呢？毛说过：“我们或者杀死老虎，或者被老虎吃掉。”这是非常强硬的谈话。但是“老虎”并不是美国，而是美国人民也曾反对过的“帝国主义”。毛说过，美国垄断资本是当今各国反动派的世界基础。美国的大多数有识之士在暂时还没有被反苏的战争恐怖迷惑以前也持同样观点。

毛在欢迎苏联是新中国的天然朋友的同一声明中，还把“各国的工人和人民”也包括进去。他认为美国人民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和朋友。而以华尔街为基地的世界帝国主义力量，按照他的观点，则是新中国的敌人。他们可能对它进行封锁甚至派遣军队对她实行武装进攻。毛接着又说了一段实际而近乎无情挑战的话：“如果他们可能这样干的话，他们会这样干的。”

那么，领导世界反动势力的美国垄断资本的头领们是否有可能消灭这个新中国呢？不可能。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胜仗的时候，连在欧洲进行的冷战也开始熄灭了。性急的美国人已经看到，即使有原子弹，现在要在一场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也不可能了。由于俄国在亚洲漫长的边界有了保障，她在欧洲的紧张处境也缓和下来了。这支新的稳定力量的兴起使世界大战有可能永远防止。人们现在有希望了。

美国人民面临一种选择。他们必须为本国的对外政策并可能为战争付出代价。难道他们还准备解决从布拉格到大连这样包括全世界范围的问题吗？难道还应该争取使本世纪成为“美国世纪”，用美国人的捐税，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生活方式，并必然遭到失败吗？他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人民世纪的到来，美国仅限于实行“睦邻”的对外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人民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回答。美国可以决定中国的发展速度，却不可能决定它的目标。

因为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民，他们的过去一百年来都是由其他国家主宰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征服了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人民自己。